梵蒂冈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苏〕 M. M. 舍英曼 著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М. М. ШЕЙНМАН

ВАТИКАН

В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1

（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1年版译出）

内部读物

梵蒂冈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苏）М·М·舍英曼 著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1-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0 9/16 · 插页2 · 字数269,000

1979年4月第1版　197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9,820

统一书号：11093·23　定价：2.20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的，原书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梵蒂冈》。今据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51 年版本译出。

梵蒂冈 (Citta del Vaticano)，是以教皇为首的罗马教廷的所在地，位于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高地上，面积 0.44 平方公里。梵蒂冈原为中世纪教皇国的中心。1870 年教皇国的领地并入意大利王国后，教皇退居梵蒂冈；1929 年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同教皇签订《拉特兰条约》，承认梵蒂冈的主权属于教皇，由此成为一个独立国家。长期以来，梵蒂冈是天主教的世界政治中心。它一贯与欧美各国反动势力相勾结，进行各种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它在许多国家拥有大量土地和投资，又有大量黄金和外汇储备，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金融托拉斯。梵蒂冈的历史也是与帝国主义和欧美各国反动势力的历史连在一起的。

本书详细地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梵蒂冈的活动和国际关系史，揭露了梵蒂冈在当时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所扮演的反革命两面派角色，评价了梵蒂冈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本书资料丰富，叙述清晰，有助于我们了解梵蒂冈的历史和现状。但是，书中对某些国际问题的评述，如：苏联与巴尔干国家南斯拉夫的关系等问题，观点有明显的错误。希望读者注意分析批判。

作者舍英曼(M. M. Шейнман)是多年从事梵蒂冈史研究的苏联历史学博士。他的主要著作除本书外，有 1958 年出版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梵蒂冈和天主教》、《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梵蒂冈》等。《苏联大百科全书》、《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中有关“梵蒂冈”的词条也是他撰写的。本书的责任编辑是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

我们编制的参考资料和书目，人名、地名译名对照表，集中附在书末，供参考。

1978 年 5 月

目　　录

前　　言

罗马教廷和整个天主教会与封建社会制度的联系已逾千年。恩格斯曾指出，罗马天主教会“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它自己的教阶制，最后，它自己还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三分之一。”①

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的地位，受到资产阶级革命的严重破坏。许多国家出现了新教，它更加符合已经强大起来的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在一定时期内，天主教的地位削弱了。仅仅在经济不甚发达、封建成份有着很大影响的国家，例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天主教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390页。

地位才较为巩固。

在帝国主义时代，天主教会在工业发达的各国也增强了它的地位。被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吓得胆战心惊的资产阶级，把一贯对人民运动绝不相容的天主教会，看成了最可靠的同盟者。英国就是一个典型。十六世纪中叶，天主教在英国遭到了决定性打击。自十九世纪末起，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统治阶级明显地转向罗马—天主教会，而英国教会的上层人物越来越转到天主教立场上来。①

4

天主教会组织的政治影响和活动的加强，绝对不是劳动群众信仰上帝的人数增长的结果。相反，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越来越多地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和社会主义宣传的产业工人，在帝国主义时期，极其明显地脱离宗教，与教会组织决裂。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很久，各派教会的许多活动家曾经抱怨群众无神论思想情绪的增长和宗教的衰落。德国教会作家阿尔格尔米森写道，德国在1919—1927年间，正式(提出有

① 见《现代季刊》，伦敦，1950年，第4期，第328—341页有关文章。

关声明）脱离天主教会的有三十万零三千九百三十一人，脱离福音教会的有一百五十八万九千零八十三人[1]。根据瑞士《新苏黎世报》（1929年4月3日）刊载的资料，1905年至1913年的九年中，维也纳脱离教会的共两万零三百八十人，其中有一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名天主教徒。而在1919年至1927年的九年内，在这一城市里，脱离教会的有十四万零四十三人，其中有十一万九千八百七十名天主教徒。这种情况在别的国家也有。受大资产阶级全力支持，和垄断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美国天主教会虽是一股强大的反动政治势力，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天主教会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增长。天主教神父、华盛顿天主教大学讲师M·基尔希声称，美国的教会每年要失掉近五十万信徒。

美国天主教历史学家梅纳德写道：美国每年入天主教的人数并不能抵补脱离天主教的人数[2]。

---

① K·阿尔格尔米森：《无神论者、工人阶级与牧师》，柏林，1930年，第71—74页。

② Th·梅纳德：《美国天主教史》，纽约，1943年，第610页。

综上所述，在帝国主义时代开始的、天主教会地位的加强以及梵蒂冈在国际生活中影响的增长，并不说明该教会在群众中的地位加强了和群众的宗教信仰增长了。

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威廉·福斯特在[5]他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一书中，阐述了宗教的普遍没落和教会的危机。天主教会的危机尤为严重。但是，威廉·福斯特也写道，还存在着与宗教没落倾向相反的另一种倾向：资本家需要用宗教来瓦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因此，他们不断扶植和资助教会[1]。

天主教会所经受的危机，并不是以梵蒂冈为首的天主教会上层份子把教会的命运与帝国主义的命运联系起来的最终原因，也不是教会与一切可能动摇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统治的力量誓不两立的最终原因。天主教会突出的特点是它的中央集权，迷信教皇，把他奉若活神明，迷信神职人员，俗人对教会组织极其微不足道的影响，多少世纪以来精心挑选的影响群众的各种手段，维

---

① 威廉·福斯特：《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纽约，1949年，第92页。

护名符其实的中世纪黑暗——所有这一切，使得天主教会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进行斗争的极为得力的工具。

在资本主义时代，天主教会同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国家结合起来，它的教义开始改变，全部活动重新调整，以适应工业资产阶级的需要。

凡是存在着封建分子的地方，梵蒂冈和天主教神职人员便与他们有着牢固的联系。梵蒂冈的统治者们就是现在也还梦想恢复由地主贵族统治的君主制度。梵蒂冈复辟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计划得到英美权势集团的支持，是众所周知的。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仍然是已经用来适应资本利益的托马斯·阿奎那的中世纪经院哲学。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梵蒂冈同封建反动派进行任何联系时，其活动都是由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所决定的。

封建天主教会同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结合，由于封建贵族日益同工业资产阶级结合而变得简单易行了。

列宁写道，帝国主义就是“全面的反

动……”[1]，这种反动的表现之一是在各资产阶级6国家，包括天主教仅为少数居民的宗教信仰的国家（英国、美国）以及信徒人数微不足道的国家（日本等），天主教会的地位得到了加强。

天主教会同资产阶级的结合，还表现在教会本身成了最大的资本家：教会对银行、股份公司和企业都有巨额投资。

在教会同资本的结合方面，美国提供了最明显的例子。根据1926年的调查，美国仅仅十二个主要教会的宗教建筑就值四十亿美元。这笔巨额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八亿三千七百万美元是属于天主教会的。美国天主教会的资本数以亿万美元计。美国教授戴维斯写道，在美国，“教会本身就是庞大的商业机构”，他们向工业企业、股份公司和各种有利可图的企业投资。对此，这位教授又指出，教会资金投入企业时，“几乎从未从道德方面对该企业加以考虑。因此，教会同利润制度休戚相关。”[2]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90页。

② J·戴维斯：《资本主义及其文化》，莫斯科，国家外国书籍出版社，1949年，第383—385页。

天主教会的中心——梵蒂冈也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结合起来。

根据报刊上发表的远非完全的资料看，梵蒂冈在各国拥有资本达一千亿法郎。[①] 其资金投放到法国的纺织工业和石油公司、阿根廷的公用事业（电车、煤气公司、发电站等等）、玻利维亚的锡矿、比利时的橡胶企业、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各国的工业。[②]“神圣的宗座”并不嫌恶交易所的投机和赌场的红利。

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梵蒂冈便和摩根财团建立了密切联系，1938 年，庇护十一世曾授予该财团头子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以梵蒂冈勋章。梵蒂冈同美国各银行的联系和对它们的依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一步加强了。

这样，如果说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那么，在帝国主义时代，它则成了最大的资本家，同时在许多国家里又保持着大量土地和与地主贵族的联系（西班牙、意大利、葡萄

---

① 见 R·加罗迪：《教会、共产主义与基督教徒》，巴黎，1949 年，第 159 页。

②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48 年，第 4 期。

牙、法国以及其他各国)。

天主教会同资产阶级国家的结合，还表现在许多不同的国家与梵蒂冈签订了宗教条约这一点上，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签订的宗教条约。罗马教廷同天主教徒在居民中占少数的国家——美国、英国、日本帝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芬兰建立了外交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梵蒂冈同穆斯林国家扩大了外交联系。

天主教会成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它在许多国家插手文教事业，对报刊杂志、电影和无线电广播进行检查。例如，据报道天主教会在法西斯佛朗哥西班牙把持大权：

“国家政权这座庞大建筑的每个小孔，每道缝隙，每个部件，每道接缝，无不处在教会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婴儿的降生、书刊的问世、基础的奠定、命令的颁布、新影片的发行、学校的开办或是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生的短暂的千百件小事，——所有这一切，即或不是由教会倡导，也是经由教会同意……忠于教会的贵族和将军们保障把天主教作为官方机构来恢复教会的古老的权利，宣布其他一切宗教非法，禁止

不按宗教仪式举行的结婚和离婚，恢复每年六千五百万比塞塔的国家津贴，恢复耶稣会士的权利，归还他们多达二亿五千万比塞塔的财产。"①

天主教会的这种情况，不仅在法西斯西班牙一国如此。在美国、法国和意大利，天主教会(常常是隐蔽地）对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都有腐蚀性的影响。

天主教会及其各级神职人员是资产阶级帝国 8 主义政策和殖民政策的传播工具。因此，美帝国主义者在自己的扩张计划里，广泛利用天主教会组织。

英帝国主义在推行其殖民政策时，也求助于各种各样的宗教组织，其中也包括天主教会。

每个国家的天主教会都奉行本国资产阶级的政策。只有在涉及反对工人运动、民主制度和苏联的共同斗争时，各个国家的高级神职人员队伍才团结一致。天主教会同资产阶级国家的结合，首先表现在它同这个国家的其他机关（警察、军队、法庭、宣传机构）一起与工人运动和共产主

① 艾·普连：《橄榄丛中之风》，莫斯科，国家外国书籍出版社，1947 年，第 99—100 页。

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上。这种教会根据崇拜资本统治、神化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人剥削人的制度永恒不变等精神修改它的教义。

梵蒂冈和整个天主教会与帝国主义结合得越密切，教皇就越反复强调他的“神的使命”和“对世俗事物不感兴趣”。当今，教皇庇护十二世一面使天主教会完全为美帝国主义服务，一面却继续假惺惺地担保说，他对世界上敌对阵营的任何一方都不偏不倚，他所关心的只是宗教事业和道德。事实却完全相反。

1870年，教皇国——教皇们作为有无限权力的独裁统治者的教皇领取消了。此后的六十年中，教皇们都曾抗议“篡夺”罗马王位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抗议便纯粹流于形式。教皇国的取消，使得教皇和教廷有可能在政治生活中占据其独特的地位 从前，教皇不仅是天主教界的首脑，而且，首先是一个小小的暴君。通过他把统治教皇国三百万臣民的政权和神权统一起来。在这个国家里沸腾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时常爆发人民风潮。不大的教皇国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国际政策是太软弱了。它参与了欧洲列强的政治阴谋，

但却完全依附于列强。这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梵蒂冈作为宗教中心的威信。

末代教皇国君庇护九世，按照历史学家的描绘，是个“癫痫患者……是个迷信、轻浮、才智浅薄的人”①。他出面反对民主、科学、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强求承认教权对政权的统治权，最后宣布教皇绝无谬误的教义也不能提高教皇国和罗马教廷本身的威信。

随着教皇国的消除，教皇们由小封建国君（这种国君，在欧洲为数不少）首先变成了所有剥削阶级的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人物，并同他们一起与被剥削者进行斗争。这是决定现代教廷的全部政策的主要因素。

教会上层份子把加强帝国主义和镇压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看成是巩固天主教会本身阵地的条件，是扩大天主教会的活动范围并变成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机构的条件。梵蒂冈指靠着最富侵略性、最敌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势力，以达到其最反动的目的。

---

① A·金:《意大利统一史》，第1册，伦敦，1899年，第174页。

梵蒂冈上层人士保证说，教皇的行动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并不依赖于任何权势，而是遵循“崇高”的思想行事的。这些保证与事实毫无共同之处。对梵蒂冈有决定影响的是不同时期的各个不同的帝国主义列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内，法西斯制度在梵蒂冈最有影响，最受梵蒂冈主教们欢迎。梵蒂冈依靠法西斯制度，把它看作是反共反苏的堡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梵蒂冈站在“轴心国”一边，支持这些国家反对民主、反对苏联的反动计划，还支持英美帝国主义集团的计划，他们想同法西斯德国单独媾和，以便掉转炮口去反对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梵蒂冈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及其反对劳动人民、反对苏联领导的整个和平民主阵营的斗争工具。

同时，梵蒂冈还充当了各国剥削阶级利益的代表，因为它用尽一切手段，首先维护的是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私有制，竭力使人剥削人的，

10 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阶级社会永存

帝国主义的第一个矛盾，斯大林同志写道：“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把工人阶

级引向革命。"①

梵蒂冈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全部活动，都是由于它仇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害怕革命。同革命、同共产主义作斗争是教皇和整个天主教会的主要目的。

利奥十三世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任教皇。他自 1878 年至 1903 年一直任罗马教皇。资产阶级和天主教文献把他吹捧为"社会改革家"、"劳动人民利益的卫护者"，似乎是他给人类指出了达到"美好的社会制度"的"新道路"。在天主教主教中，有些社会主义的敌人甚至称利奥十三世为"伟大的、工人的教皇"②。为此，他们援引了他的关于工人问题的通谕——《列鲁姆·诺瓦鲁姆》③（1891 年），并称之为"劳动宪章"。实际上它是以上帝的名义和教会教阶制度的权威捍卫自己财富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65 页。

② O·瓦特巴赫：《利奥十三世与工人问题》，慕尼黑，1931 年，第 4 页；E·拉图雷特：《基督教发展史》，第 4 卷，纽约，1941 年，第 25 页。

③ 此是拉丁文俄语译音，意为"关于新事物"，也译为"劳工通谕"。——译者

和权力的资本家宣言。如果抛开教皇对“财富不均”的蛊惑性抨击，那么，在《列鲁姆·诺瓦鲁姆》中的主要内容，就是私有财产是上帝赐予人们的（因而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谁也无权染指）、阶级不平等永存是“天经地义”的等论点（所以任何反对这种“天经地义”的斗争，正如通谕所说，“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人与人之间天生就存在着最深刻的，各式各样的不平等”）。

利奥十三世曾把他的通谕寄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一份，认为俄罗斯专制君主会完全接受通谕中所阐述的“社会原则”，由此可以推断，利奥十三世的这份“劳工通谕”是何等反动。①

然而，为什么利奥十三世关心“工人问题”？是什么促使他进行社会性的蛊惑宣传，迫使他装成工人阶级之友呢？正是天主教作家自己对此作了回答。他们写道：利奥十三世由于马克思主义11影响的增长和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发展而惊慌不安，为了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他认为必须改用新的策略：分裂工人阶级，采取把工人

① B·拉姆兹多尔弗：《日记》（1891—1892年），第143页，莫斯科，1934年。

和企业主一起组成单独的天主教联盟的办法，在教会的帮助下，使工人脱离开社会主义运动。天主教作家们公开承认，通谕《列鲁姆·诺瓦鲁姆》的发布，是由于恐惧马克思主义日益增长的影响。①

利奥十三世在1890年给意大利神职人员的通谕中写道：社会主义煽动带来的巨大危险威胁着“现代社会”（亦即资本家的统治），单是国家机器还无力与其作斗争。教皇写道：没有教会的帮助，无论是法律、法庭、军队和警察，都无力对付这种危险。②利奥十三世提出天主教会愿为各资产阶级政府效劳，镇压社会主义工人运动。

在同亚历山大三世的代表伊兹沃利斯基谈判期间（1887—1888年），利奥十三世向沙皇建议结成同盟，以便共同与欧洲的革命运动作斗争。③后来，教皇又向威廉二世提议为同样目的而结成

① M·奥肖内西：《和平与重建》，纽约，1943年，第14—18页。

② H·加蒂耶利：《意大利劳工运动》，纽约，1946年，第188—189页。

③ E·阿达莫夫：《帝国主义初期梵蒂冈的外交》，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1931年，第73页。

同盟。1903年，威廉二世访问教皇时，利奥十三世宣布把战胜社会主义思想和无神论思想使欧洲回到基督怀抱的使命交给了他。①

接替利奥十三世任教皇的庇护十世，和他的前任一样，也遵循着同一路线。他认为天主教会的主要任务是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作斗争。这位教皇1910年8月25日给法国主教们写信说，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必须重视利奥十三世的教义，特别要注意他宣布应当“坚持等级和阶级的区分无疑是组织良好的社会生活的标志”这一部分。谁要求各个等级平等，教皇写道：“谁就是追求与天主教教义相违背的理想”。②由此可见，庇护十世承认，阶级和阶级不平等是永恒的这一12学说乃是天主教会关于社会问题的教义的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梵蒂冈最担心的是战争的结局引起革命。

参战各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组织了反对

① Б·比洛：《回忆录》，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1935年，第246页。

② V·卡特赖因：《社会主义与天主教教义》，帕德博恩，1929年，第72—73页。

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这个主要的“内部敌人”的斗争。梵蒂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样，也担心战争会增强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统治的仇恨，从而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强大起来。教皇贝纳蒂克图斯十五世在他的1914年11月1日（战争一开始发布的第一个通谕中）所谴责的不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战争罪犯），而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教皇抱怨社会分成两大营垒，无产者反对私有者，无产者的鼓动家们企图使人相信，人们生来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应处于同等的地位。教皇写道，那些反对富人，并认为自己可以享用富人财富的穷人“在反对正义”，因此，贝纳蒂克图斯十五世要求神职人员，立即在战争年代就应当与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在讲道时，在天主教会议上，在报刊上反对社会主义。①

德国天主教党党魁埃尔茨贝格尔1915年访问梵蒂冈后写道：同他会谈时，教皇“顺便指出，如果战争拖长，就会发生世所未见的社会革命。”②

---

①《教皇言论集》，纽约，1940年，第271—274页。

② M·埃尔茨贝格尔：《德国与协约国》，莫斯科，1923年，第54页。

教皇害怕战争的延长和德国与奥匈帝国的毁灭会引起革命。他被俄国革命吓得惊惶失措，于1917年8月发表和平照会。贝纳蒂克图斯十五世希望德国同它的敌国媾和，以便建立反对革命俄国的统一战线。在这以前不久（1917年6月），他派遣他在巴伐利亚的圣使，帕切利主教（即当今教皇庇护十二世）前往谒见威廉二世进行谈判。威廉二世在回忆录中谈到他给帕切利的指示，告诉他怎样做才对德国有利。威廉对教皇圣使说："如果教皇对有利于和平之事无所作为，那么就会发生社会主义者以强力获得世界的危险，那时教皇和罗马教会连在天主教徒中间的统治地位也要告终了。"[1] 这种理由，正如威廉所说，最能打动13教皇圣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共产主义思想在世界各国得到亿万新的信仰者时，梵蒂冈敌视社会主义的行动规模更大，花样更翻新了。教皇和所有天主教主教们由发表通谕反对共产主义变为支持反苏的阴谋活动和

①威廉二世：«事与人»，莫斯科，1923年，第129—132页。

武装进攻以及积极支持欧洲各国的法西斯反动派。

1919年2月，斯大林同志写道："世界已经确定不移地分裂为两个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这两个阵营的斗争是整个现代生活的轴心，它构成旧世界和新世界的活动家当前对内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①

旧世界对新世界进行了疯狂的斗争。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谢德门之流、诺斯克之流以及社会民主党其他右翼首领们的积极参与下扼杀了本国的革命，并组织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同武装干涉者和扼杀革命运动的刽子手站在一起的还有梵蒂冈。

1919年2月，斯大林同志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局势时，概括如下："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正在不可遏止地高涨，围攻着帝国主义的堡垒。革命浪潮的吼声在被压迫的东方各国发出了回响。帝国主义脚下的基地燃烧起来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②

---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06页。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09页。

社会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梵蒂冈的头子们胆战心惊地看到，社会主义思想日益广泛地掌握了群众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他们动员了教会许多世纪炮制的蒙蔽群众意识的一切手段来反对革命。他们燃起了宗教狂热病，散布对社会主义的诽谤。1918 年 1 月，教皇报纸《罗马观察家报》写道："无政府状态正在扣各国的大门。请赶快集合起你们的力量挡住它的路。"白卫(分子)"政府"驻罗马教廷的代表雷萨科夫斯基于 1919 年 10 月 14 日报告说，他从梵蒂冈领导人14物的谈话中得出了结论：宗座对"与他最害怕的布尔什维克作斗争"① 是同情的。

俄国内战时期，梵蒂冈同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都有联系。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梵蒂冈便和美帝国主义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梵蒂冈帮助他们组织反苏的武装干涉与对欧洲各国和美国工人阶级的恐怖活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梵蒂冈在西欧各国指

①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央档案局，第 3696 全宗，第 22 号案卷，第 11 页。

靠着最反动的势力。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刚一出现，特别是从1921——1922年起，梵蒂冈就支持了它，而现今连资产阶级文献也承认，梵蒂冈通过自己的"罗马银行"资助法西斯"向罗马进军"，亦即资助策划法西斯政变。①1929年，梵蒂冈同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签订了所谓的拉特兰条约和宗教条约。由于仇恨共产主义和苏联，梵蒂冈和希特勒也结成了同盟。

法西斯当政的欧洲各国的天主教群众也遭到了和全体劳动者同样的压迫。在许多情况下，对天主教会本身来说(例如在德国)法西斯的统治是以对教徒，而且常常也是对天主教低级神职人员的残酷迫害而臭名昭著的。可是，梵蒂冈却处处与法西斯合作。如果梵蒂冈也抗议对宗教的迫害的话，那也是因为不能再沉默了，再沉默下去，梵蒂冈的声誉就要在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面前受影响。

庇护十一世在1922年至1939年任教皇期间，一贯挑动天主教群众敌视共产主义。早在他1922年12月23日发表的第一个通谕中，就宣布

①《十九世纪以来》，伦敦，1943年2月，第58—59页。

阶级斗争是当前社会的万恶之源。1924年12月18日，教皇对红衣主教团讲话时，对苏联进行了尖锐的攻击。他声称，他一贯认为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带来的危险”是自己的义务，“特别是向国务活动家们指出。”

梵蒂冈和全体天主教主教们过去和现在都对共产主义和苏联进行最卑劣的诽谤。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中全会上（1931年4月），恩·台尔曼曾谈到天主教会的活动家、耶稣会士穆克曼对苏联的无耻诽谤。恩·台尔曼说：“曾多次要求这个无耻的家伙提出证据来证实这些论点的正确性。他起初引证了雷希贝格的话，后来又引证了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军官格德莱和塔特布尔格两名少校的话，而这两名少校又是从英国情报局的间谍那里引来的。反布尔什维克谎言家们这种无耻的捏造充斥我国报刊。而我国所有执政党的毒液四溅的语言就是这样的，那个遵循教皇建立反苏十字军号召的、每月都在进行战争思想准备的政党的语言就是这样的”①

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速记报告》，第2册，莫斯科，1931年，第198页。

穆克曼之类的耶稣会士们伙同英国间谍伪造了大量的反苏文件，而庇护十一世则从这一池浊水中大把大把地捞取反对共产主义的“事实”，放到他的通谕中来。须知穆克曼曾是当时在德国当政的天主教中央党的代表人物，是天主教的主要“反共专家”之一，他常为《德意志报》——执政的天主教党机关报(该报的主要股东是后来的战犯、希特勒的外交官冯·巴本)撰稿。

借助耶稣会士这帮丧尽天良的无耻之徒，庇护十一世动员了所有的反动、黑暗、野蛮的势力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仅指出他在1930年妄图组织反共反苏“十字军”一事就够了。

1937年3月19日，庇护十一世发表了反共的特别通谕，照例通篇都是对全世界亿万人信仰的共产主义伟大学说的最卑鄙龌龊的诽谤。

梵蒂冈不仅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宣传，而且建立信奉天主教的工人群众组织，以便分裂工人阶级。

自十九世纪后半叶起，天主教会开始建立天主教工人组织，以便使工人脱离社会主义运动。矛头指向社会主义的利奥十三世的通谕“列鲁

姆·诺瓦鲁姆”包含了教会“争夺”工人的计划。教皇假惺惺地承认工人渴望建立自己的工会是正确的，但是又指出工会无论是对工人或是对企业主来说，应当是共同的，亦即非阶级的，非革命的 16 工会，而是根据劳动与资本“团结”、“合作”的原则结成的同盟。

在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世俗天主教活动分子之中有些政客，他们怀着同样的目的提出了“基督教民主”的口号。在意大利，这种政策的倡导者之一是斯图尔佐神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成了天主教政党“人民党”的领袖）。“基督教民主”这个口号是个蛊惑人心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拥护者断言，天主教会和民主可以步调一致，工人们只有在教会主教那里才能找到自己利益的“维护”者，因此，应当团结在教会的旗帜下，而不是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

但是，连“基督教民主”这一反动的蛊惑人心的纲领，在教会主教们看来也是非常“左”的。斯图尔佐写道，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于1900年刚一公布自己的纲领，教会当局与教会有联系的反动集团便群起而攻之。“保守的天主教

徒”认为“基督教民主”这一口号抛弃了旧的王朝正统主义的教权主义的立场。① 利奥十三世于1901年还发表了反对“基督教民主”的特别文告。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天主教主教们对俄国革命和各国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怕得要死的时候，教会便急急忙忙到处建立群众性的天主教组织。当时的教皇在号召书中指出，神职人员应当到工人中去，把他们组织在教会的周围，使他们脱离社会主义运动。因此，1919年意大利便成立了天主教党“人民党”。该党的组织者就是十九世纪末宣布“基督教民主”这一口号的那些人物，其中也包括斯图尔佐神父。

这个党帮助法西斯夺取了政权。它分裂了工人运动，建立了自己的工会，这些工会在阶级斗争中充当了工贼的角色。当法西斯分子夺取政权以后，“人民党”对墨索里尼大帮其忙，有三名党的领导成员参加了第一届法西斯政府。其他国家的天主教党和组织也起了这种反动作用。德国天主教党(中央党)伙同社会民主党一起，为希特勒

① L·斯图尔佐：《意大利与新的世界秩序》，伦敦，1944年，第91页。

法西斯扫清了道路。

17 为了赢得群众，天主教会便按照庇护十一世的指示，建立“天主教行动会”这一组织，竭力把各阶层的劳动居民吸收进来。在“天主教行动会”内起领导作用的，是主教们和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客们。法西斯分子统治时期，意大利“天主教行动会”为法西斯制度服务，而且到处充当反动派的支柱。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法西斯夺取了政权的国家，照例都宣布解散群众性的天主教组织——党的、工会的、青年的以及其他等等。同法西斯合作的教会主教们不愿意让群众性的天主教组织存在下去，因为这些组织有可能把对法西斯抱反对态度的部分居民团聚在自己的周围。1926年，经梵蒂冈同意，意大利天主教党“人民党”解散。1933年，德国法西斯分子夺取政权后不久，许多基督教工会的领导人立即声明拥护希特勒制度，连工会本身也于1933年5月法西斯化了。同年7月，也是在梵蒂冈的赞同下，欧洲最古老的德国天主教党——中央党宣布解散。

法西斯统治时期，没有一个国家的高级天主

教神职人员企图建立世俗天主教徒的组织。因为他们不想建立针对法西斯的反对派。而保留天主教徒组织的地方（例如意大利的“天主教行动会”），它们也都经梵蒂冈同意，归附到法西斯组织系统中去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教会在资产阶级的积极支持下，建立了各种群众性的组织来同和平民主阵营作斗争，以挽救帝国主义。

在反对苏联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斗争中，梵蒂冈的主教们同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同卖身投靠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右翼份子找到了共同语言。关于这些“社会主义者”，列宁写道：“他们背叛了工人”，“成了社会主义的敌人，跑到资本家那里去了。”① 这些社会主义的敌人也跟梵蒂冈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企图挽救资本主义制度。

早在1919年4月2日，教皇贝纳蒂克图斯十五世便大张旗鼓地欢迎艾柏特当选德意志共和国总统，同年12月，驻巴伐利亚圣使帕切利抵达柏林，开始同政府进行谈判与德意志共和国建立外

①《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10页。

交关系问题，并于1920年初达成协议。后来，于1929年，以社会民主党人布劳恩为首脑的普鲁士政府与教皇签订了宗教条约。

众所周知，天主教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为希特勒在德国实行独裁扫清了道路。

奥地利也照此办理。1920年4月9日，教皇接见当时的首相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首领伦纳。伦纳早在这以前，便在自己的一份宣言书中表示，希望奥地利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能保持象至今这样亲热"。梵蒂冈鼓励奥地利集聚在天主教"基督教社会"党周围的反动的、教权主义的、君主主义的集团与社会民主党合作，共同反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

众所周知，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社会党的联合，也为奥地利教权主义一法西斯独裁扫清了道路。

庇护十一世在1931年5月15日的通谕《四十年》中写道：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并非象十九世纪末期那样是统一的。这位教皇写道，现今社会主义运动分裂成两大阵营：共产主义的和温和的。教皇在这个通谕中，又重复了关于共产主义的陈

腐的、欺骗性的和诽谤性的谰言。至于"温和派"，亦即社会主义的叛徒，正如教皇宣布的那样，他们抛弃了阶级斗争和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敌对态度，他们的纲领性要求接近教会的纲领性要求。①

梵蒂冈同反对共产主义、民主制度和苏联的右翼社会党人的合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更为密切了。目前"……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尤其是英国的工党分子和法国的社会党人）大部分领导人行事就象美国帝国主义集团的走狗一样……"②

"贝文、艾德礼、勃鲁姆、吉莫列、斯巴克、舒马赫尔、伦纳、萨拉加特之类的右翼社会党人和反动工会头子格林、凯里和狄金之流，推行分裂政策与反人民政策，他们都是工人阶级统一的主要敌人，战争贩子的帮凶和帝国主义的奴仆，

19

① 《教皇庇护十一世——关于社会制度的全球文告》，1931年，第34—35页，柏林。

②安·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载《1947年几国共产党代表波兰情报会议》，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8年，第46—47页。

他们用假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词藻掩盖自己的叛变行径。”①

跟右翼社会党的首领一样，梵蒂冈也是照美国帝国主义集团的意愿行事的；跟右翼社会党人一样，梵蒂冈的主教们一贯掩盖帝国主义政策的强盗本质，但和右翼社会党人不同的是，他们用的不是社会主义词藻，而是宗教语汇。他们竭力瓦解工人阶级的队伍。右翼社会党人的首领对马克思主义的仇恨不亚于梵蒂冈的主教们，而且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一切都使天主教神职人员同右翼社会党首领渐渐接近起来。

右翼社会党人和梵蒂冈直言不讳地强调他们政治目的的一致性和思想的共同性。美国天主教会社会问题教义注释家满意地写道：拉姆赛·麦克唐纳在自己的“社会主义”中反映了教皇利奥十三世的“社会原则”。② 美国反动报刊指出，根据英国工党首领艾德礼的说法，他们的“社会主义”

---

①《保卫和平与对战争贩子的斗争》，载《1949年共产党情报局匈牙利会议》，第11页。

② I·哈林顿：《天主教、资本主义、共产主义》，1926年，第239页。

与其说是来自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不如说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教义。①

法国右翼社会党首领莱翁·勃鲁姆早在战前就谈到过去天主教主教们和右翼社会党首领之间存在的共同点。他的传记作者和崇拜者写道，勃鲁姆曾不止一次地指出：梵蒂冈在某些对外政策问题上的见解接近国际社会主义的观点，②亦即右翼社会党人的观点。同一个作者写道：1936 年，勃鲁姆任总理后，“各天主教政治小组和组织喜欢莱翁·勃鲁姆甚于政教分治以来勃鲁姆的所有前任。”③

莱翁·勃鲁姆在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写的一本书中，把梵蒂冈吹捧为“纯粹宗教”政权及和[20]平因素。他为梵蒂冈参加战后国际组织而大卖其力。这还是勃鲁姆在梵蒂冈支持法西斯“轴心”国发动战争反对欧洲各国人民时写的。战后，勃鲁姆赞成同法国天主教党合作反对工人运动。

---

①《幸福》，纽约，1946 年 10 月，第 166 页。

② W·科拉尔茨：《勃鲁姆体制》，布拉格，1937 年，第 19 页。

③ W·科拉尔茨：《勃鲁姆体制》，布拉格，1937 年，第 19 页。

资产阶级(尤其是天主教的)政论家在阐述宗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立场和政策时伪造历史，是毫不足奇的。说实话对梵蒂冈的辩护士很不利，因为事实是，以苏联为首的爱好自由的各民族同希特勒强盗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梵蒂冈却站在“轴心”国一边，全力以赴来挽救法西斯的毁灭。

教皇派往美国的使节奇科尼亚尼写道：“欺骗性的宣传”说教会是自由和民主的敌人，平等与博爱的敌人。这位大主教保证说，实际上“保佑民主是教会的使命。”① 这话是1943年4月，当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给法西斯匪帮毁灭性打击以后写的。苏军的胜利，使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最后粉碎可恨的希特勒主义有了信心。大主教奇科尼亚尼不能不考虑到人民群众对法西斯的憎恨和对苏联的深厚感情。他认为应当为维护教会的威信而使人相信，似乎以教皇为首的所有天主教神职人员也是民主的维护者，他们同情当时反希特勒联盟为之而奋斗的事

① G·戈内拉：《需要重建的世界》，1944年，第12页，密尔沃基。

业。这些保证都是骗人的，因为就在奇科尼亚尼卖力宣扬教皇忠于民主的当时，梵蒂冈正在策划着幕后阴谋，以便为法西斯德国争得和平，以此挽救法西斯制度，同时纠集资本主义阵营一切反动势力一起反对苏联。

美帝亲梵蒂冈报刊竭力证实梵蒂冈的目的和反希特勒联盟的目的是相符的。英国资产阶级研究梵蒂冈政策的人，甚至一口咬定，似乎梵蒂冈在战时是同情反希特勒联盟一方的，似乎梵蒂冈的国务卿(外交部长)与尔昂纳早在欧洲只有少数 21 人相信同盟国必胜的时候，就相信同盟国会取得胜利。①

这些神话（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初期）梵蒂冈的主教们本身也拼命传播。1946 年 3 月，梵蒂冈电台坚持说，战时梵蒂冈是超然于“交战国双方之上”的。②

实际上，梵蒂冈的政策自 1917 年 10 月起，就一直把仇恨苏联放在首位，并且一贯与全世界劳动者的解放运动为敌，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①《国际事务》，伦敦，1946 年，第 1 期，第 51 页。

②《1947年全国天主教年鉴》，纽约，第 50 页。

间，是站在“轴心”国及其在美、英、法的同盟者阵营一边的。

战争前夕，梵蒂冈赞成作出对法西斯德国有利的极大让步，以便促使它反对苏联，梵蒂冈是张伯伦慕尼黑政策的拥护者。战争开始时，梵蒂冈主张同“轴心”国妥协，并力争同德国签订和约，以便组成资本主义列强统一的反苏阵线。对此，有许多事实为证。

梵蒂冈的政策，日益公开地服从帝国主义的利益，这导致天主教会早已经受的危机进一步加深。统一的天主教阵营是不存在的，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在主教们和广大的天主教徒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在高级主教和低级天主教僧侣之间的鸿沟也日益加深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梵蒂冈援助“轴心”国阵营时，当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各国教会的许多头面人物与占领军合作时，天主教阵营明显地出现了分裂。信天主教的劳动群众，其中包括部分低级僧侣参加了当时各地共产党人领导的抵抗运动，他们怀着极大的希望看着苏联，并为苏军的胜利而高兴，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胜利也会

把他们从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来。

信奉天主教的劳动人民的利益与梵蒂冈反动政策之间的矛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罗马教廷公开成为美国统治集团的帝国主义、仇恨人类政策的工具时，便更加深刻了。

第一章 梵蒂冈与慕尼黑

22

梵蒂冈和慕尼黑的目的一致

“希特勒在英法直接纵容下要发动大战的事，早在1937年就已经十分清楚了。德国覆亡后，苏军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文件，揭露了英法在那一时期对外政策的实质。根据这些文件可以看出，英法政策的实质，并非要联合爱好和平国家的力量共同反对侵略，而是要孤立苏联，唆使希特勒侵略东方，反对苏联，利用希特勒充当工具，达到他们的目的。”①

德国外交部档案库的这些文件公诸于世，雄辩地证明了英法政府所推行的是与法西斯德国妥协的政策，而这一政策是得到美国统治集团直接支持的。正如斯大林同志指出的那样，这一政策

① 《历史的伪造者》，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8 年，第 22 页。

在于怂恿德国人东进，反对苏联，“……以轻易获得战利品为诱饵，劝他们说：你们只要对布尔什维克开战，往后一切都会顺遂。”①

德国驻伦敦大使冯·迪克森在1938年7月10日的政况报告中强调指出，张伯伦及其政府的“施政纲领中占首位的和最重要的”是和法西斯列强妥协②。

“张伯伦对苏联的态度依然冷淡”，波兰驻英 23 大使1938年12月16日向他的外交部长报告说，“他始终不变，亦完全公开地规避有可能成为他的政治伙伴拒绝合作的借口的一切言行，这是真实的；而首相在官场中规避表示反对德国东进的企图，也是真实的。”③

实际上，张伯伦不仅“规避”反对“德国东进的意向”，而且还在这方面千方百计地赞助法西斯侵略者，把这些人看成是“防止布尔什维主义的

---

① 约·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11版，第571页。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件和材料》，第1卷，苏联外交部出版社，莫斯科，1948年，第145，148，152，153页。

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件和材料》，第一卷，第352页。

救星”。

1937年11月19日，哈利法克斯爵士（当时曾任张伯伦内阁的不管部部长）同希特勒会谈时声称，“他（哈利法克斯爵士）和英国政府的其他阁员深深感到，元首不仅在德国本国取得了许多成就，而且，由于他在德国国内消灭了共产主义，就挡住了共产主义进入西欧的道路。因此，德国有充分的理由被认为是西方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①

英法统治集团的亲希特勒政策，得到了美国和其他各国反动资产阶级的赞许和全面支持，这一政策的基础首先是仇恨苏联和工人运动。这一亲希特勒政策也应看作是梵蒂冈在大战前夕的政策。

在策划慕尼黑勾结期间，梵蒂冈曾因在德国和奥地利发生的宗教迫害与希特勒政府有过摩擦。

庇护十一世在1938年10月20日召开的基督教考古学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曾谈到过在德国和奥地利发生的宗教迫害问题，他说，这些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件和材料》，第1卷，第16页。

迫害使人想起叛教徒儒略时代对基督教徒的血腥迫害。

1938年，因法西斯分子要取消教会的群众性组织“天主教行动会”，梵蒂冈同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的关系也恶化了。实行依照希特勒的模式炮制的种族主义的法律，同样引起了庇护十一世多次出面反对“过份的民族主义”。[①]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教皇任命编辑的《公教文明》杂志，却不 24 断发表反犹文章。

自1938年中期起，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疯狂推行的种族主义方针政策，是和该政府的反人民政策密不可分的。《真理报》在评论梵蒂冈与法西斯政府之间的冲突时写道：“由于在阿比西尼亚和目前在西班牙进行劳民伤财的战争，国库日益空虚。所有各阶层居民的不满情绪在增长。意大利劳动人民不愿为法西斯集团的利益卖命。结果，法西斯统治者更加拧紧了螺丝——加强了早已笼罩全国的残酷的恐怖活动。按照希特勒的方式宣传仇恨人类的‘种族理论’的目的，毫无疑问也是相同

---

① 《消息报》，1938年8月4日第2版；W·谢泼德森：《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8年》，纽约，1939年，第397—398页。

的：即对'不满分子'除法西斯大棒以外，又加上了暴行、迫害和血腥镇压……，梵蒂冈与墨索里尼之间的冲突，是法西斯独裁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的又一证明。"①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38年8月发表的声明中写道：法西斯政府已表现出它完全无力满足人民群众的起码要求。它把国家拖进在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的军事冒险，并且为了意大利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希特勒德国和日本结成联盟，企图将整个世界卷入新的战争。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声明中指出，法西斯分子的排犹运动，乃是他们实行广泛的战争动员的一部分。这一运动的目的，旨在转移群众对法西斯政策失败的注意力。意大利共产党认为，天主教群众反对种族主义，乃是人民反对法西斯战争政策和与希特勒德国结盟的表现。共产党号召建立反法西斯制度的统一战线，号召为建立人民政府和意大利民主共和国而斗争。②

教皇庇护十一世很珍视意大利的法西斯制度，他害怕意大利人民在反对法西斯制度的斗争

① 《真理报》，1938年8月10日。

② 《工人日报》，纽约，1938年11月9日。

中取得胜利。因而他对种族主义法令和反犹太人法令的"抗议"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意义，只是为了应付社会舆论而已。

意大利国外的反动天主教神职人员也是这样 25 看待教皇对种族主义的"抗议"的，认为这种抗议并不使他们承担任何责任。就在教皇"抗议"意大利种族主义法令的同一时期，美国天主教神父柯林曾发表广播演说，大加赞赏希特勒和他在德国组织的排犹暴行。柯林的演说遭到人们的抗议，对此，电台经理处辩解说，柯林的讲稿曾受到他的教会上司大主教蒙尼的赞许。后者被迫出面"解释"，这对耶稣会士来说，是非常典型的。照他的话说，他允许柯林发表反犹的演说和赞赏希特勒，但并不意味着也赞同他这些话。①

在教会和宗教问题上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政府的分歧早已存在，这并不能削弱梵蒂冈与法西斯统治者之间的联盟。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苏联的仇恨，促使梵蒂冈成为法西斯的同盟者，受这种仇恨所驱使，即或是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政

① 《工人日报》，纽约，1938年11月25日。

府触犯了教会利益时，罗马教廷也不会反对他们的政策。

早在1938年8月，梵蒂冈就和意大利法西斯政府达成了协议。教会放弃了对种族主义政策的抨击。将“天主教行动会”各级组织置于法西斯国家监督之下。

可是不久，梵蒂冈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之间，就因1938年11月通过了禁止“阿利安人”与“非阿利安人”通婚的法律而产生了新的冲突。梵蒂冈认为此举破坏了宗教条约。但是，梵蒂冈与意大利政府之间立即开始谈判，以便找到一种公式，使教会的理论与法西斯的种族主义理论一致起来”。① 双方达成了协议。

教皇在1938年圣诞节文告中，虽然抱怨意大利破坏了宗教条约，但是仍然宣称他祝福意大利国王及其“无与伦比的治理者”墨索里尼，因为后者于1929年同梵蒂冈缔结了协定②

---

① C·查费拉：《梵蒂冈与欧洲战争》，纽约，1944年，第145页。

② 见C·多伊尔：《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生平》，纽约，1945年，第85页。

《纽约时报》驻梵蒂冈多年的、消息灵通的记[26]者，笃信天主教的查费拉在评论梵蒂冈与墨索里尼政府之间于1938年8月达成的协议时写道："庇护十一世和墨索里尼所耽心的是发生政治冲突，因为国际上重又战云密布。"①

梵蒂冈了解，局势正朝着法西斯德国及其同盟者策划的战争发展。教皇和他的亲信顾问们都知道，英法和美国的统治集团正在想方设法地纵容法西斯侵略者，张伯伦和达拉第的政策是通过对法西斯战争贩子许多要求的让步，促使他们东进反对苏联。对张伯伦——达拉第这一政策，梵蒂冈是完全同意的。

1937年4月30日，教皇国务卿帕切利（后来的教皇庇护十二世）写信给希特勒驻梵蒂冈大使冯·贝尔根说，梵蒂冈"认为建立……政治防线防御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具有重大的意义"。帕切利继续写道：宗座也正在同布尔什维主义进行斗争，只是用的方式不同。然而他也赞成采取极端措施防御"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②这意味着，

① C·查费拉：《梵蒂冈与欧洲战争》，第136页。
② 参阅《统一》杂志，柏林，1948年，第11期，第1100页。

红衣主教帕切利歌颂希特勒罪犯们是保护资本主义避免“布尔什维主义危险”的救星。这和后来（1937年11月9日）哈利法克斯爵士说的话（前面提到的同希特勒的会谈）如出一辙。当时，他代表英国政府向希特勒表示赞成他同共产主义进行斗争。

梵蒂冈很清楚，希特勒匪徒渴望在东方和东南欧夺取“生存空间”。希特勒要肢解苏维埃国家，使其臣服德国，消灭苏维埃制度等妄诞的计划，对梵蒂冈也跟对国际资产阶级一样，具有诱惑力。希特勒扬言要“拯救世界免于共产主义灾难”，亦即粉碎世界工人运动，他这种大吹大擂的保证，对天主教主教们也跟对所有国际反动派一样，具有诱惑力。梵蒂冈同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波兰以及其他各国的反动资产阶级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希特勒德国全部反苏、反民主计划深表同情。

梵蒂冈盘算，若是欧洲天主教各国也都落到“伟大德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时，“伟大德国”就会被迫寻求同天主教会合作，以便借教会的帮助，使被征服国家的居民“顺从”征服者。

宗座要借助于法西斯根除那些受法西斯统治的国家里所有其他宗教信仰，并建立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希望，是和所有这些政治动机相联系的。

这是梵蒂冈积极参与推行张伯伦—达拉第的慕尼黑政策的原因。

庇护十一世用他的“布尔什维主义危险”的哀号为张伯伦同希特勒勾结大帮其忙，并转移了对战争危险和战争贩子们的注意力。

1938 年 5 月，在布达佩斯召开了国际天主教代表大会——“圣体大会”。一开始，这个会就是作为天主教会国际性的反共示威运动来筹划的。早在 1937 年 11 月 25 日，当希特勒接见匈牙利首相达兰伊和匈牙利外交部长时，“互道例行的祝词后，匈牙利首相遵照摄政王霍尔蒂的委托通知元首说，明年将于布达佩斯召开圣体大会。虽然摄政王本人是新教徒，但是，他请求元首，希望德国对大会参加者赴布达佩斯不要有任何阻拦。”①

梵蒂冈想使他们筹备的大会具有广泛的规模，并通过匈牙利权势集团事先卖力争取德国法

①引自希特勒办公厅主任梅斯纳·牛赖特的秘密记录《德国外交部文件》，第 1 卷，莫斯科，1946 年，第 19—20 页。

西斯执政者对大会的关心。

梵蒂冈国务卿、红衣主教帕切利以教皇使节的身份前来参加大会。5 月 28 日，他在大会上发言，他对前不久并吞天主教奥地利和挑起世界大战的法西斯德国，没有谴责一言半语。帕切利讲的全是宣传民族仇恨的、反共的言语。同希特勒一样，帕切利以“布尔什维主义危险”恐吓资本主义世界，号召它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危险”——苏联。

28 既然梵蒂冈跟张伯伦、达拉第以及美国统治集团一样，把法西斯德国和其他“轴心”国看成是“消除布尔什维主义的救星”，那么它必然也赞同促使法西斯德国东进反苏，并参与推行这种政策。

梵蒂冈与德国侵占奥地利

长时期以来，奥地利被认为是教皇宝座的支柱，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堡垒”。1918年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废除，并未削弱教权主义者在奥地利的地位。他们在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的帮助下，逐渐成为共和国一股极大的势力，并且实行了独特的、教权主义方式的法西斯专政。以首席

主教泽佩利，而后是教权主义者陶尔斐斯和舒施尼格为首的奥地利各届政府的政策，都得到梵蒂冈的鼓励。奥地利的教权主义者残暴地镇压工人运动，纠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一切势力，帮助了希特勒侵占奥地利。

奥地利的教权法西斯主义受到天主教主教团的全力支持。民主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仇视苏联者、耶稣会士、维也纳大主教、红衣主教因尼茨尔始终是这一主义的鼓舞者（在他之前具有同样品行的是维也纳大主教、红衣主教毕福利）。

陶尔斐斯也好，舒施尼格也好，都与教皇有密切联系。1932 年 9 月 27 日，陶尔斐斯总理在国联大会发表演说时声称："奥地利正在制订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将遵守教皇庇护十一世在他的通谕《四十年》中确立的各项基本原则"①。庇护十一世在这个通谕中宣布了资本主义、阶级和人剥削人的制度是永恒的，不可动摇的。

奥地利天主教教会的领导集团和多年来统治这个国家的天主教的基督教社会党领导集团始终

---

①约·斯蒂尔：《欧洲的未来》，1945 年，第 221 页。

是大日耳曼沙文主义者。舒施尼格（陶尔斐斯的继任者，战前奥地利的最后一任总理)在 1938 年 2 月 24 日说："我们是天主教国家，我们是日耳曼国家……"① 天主教的执政者屡次动用武器来对
29付劳动人民，奥地利教权主义的头目们害怕劳动人民，从而转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奥地利的教权法西斯主义在其对外政策中起初指靠法西斯意大利。这一方针受到梵蒂冈和庇护十一世本人的赞许。后者在传记作者们的笔下是一位"意大利爱国者"：意大利帝国主义的利益与他休戚相关。这就是他赞同奥地利当时统治集团亲意大利方针的原因。教皇曾经和意大利执政者一起反对德奥合并，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然而，随着法西斯意大利越来越依赖柏林，它也就被迫让希特勒在奥地利为所欲为了。

梵蒂冈对"合并"计划也越来越表同情：它与英、法、美的统治集团一样，赞成把奥地利献给德国，对德国的其他要求也一味迁就，并且唆使希特勒侵略苏联。

①《国际事务文件汇编，1938 年》，第 2 卷，伦敦，1943 年，第 61 页。

希特勒分子注意到天主教在奥地利的影响，于是竭力把教会上层人物拉拢到自己这边来。

1934 年，冯·巴本作为希特勒的私人代表被派往维也纳。在纽伦堡审讯德国主要战犯的法庭上宣读的一份文件中说，巴本打算利用其“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声誉，对某些奥地利人，诸如红衣主教因尼茨尔之流施加影响。① 法庭上还宣读了巴本于 1935 年 5 月 17 日从维也纳给希特勒的一封信。巴本写道，奥地利法西斯领导人深信不疑，“在奥地利，最初阶段应由倾心于大日耳曼思想的那部分基督教人士同国家社会党的联合来代替”德国法西斯党的“极权主义原则”②，简而言之，巴本就奥地利问题建议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与奥地利的教权法西斯主义联合起来。这正是奥地利天主教的头目们所希望的。

早在德奥合并之前很久，在梵蒂冈的积极参与下，希特勒分子与奥地利教权法西斯分子就已尽心竭力地从事于建立这种联合了。

---

①《德国主要战犯审讯记录》，第 1 编，伦敦，1946 年，第 221 页。

②《德国主要战犯审讯记录》，第 1 编，第 232 页。

早在1931——1932年间的冬天，德国法西斯30分子就开始寻求与奥地利有势力的天主教徒联系。在维也纳红衣主教毕福利的积极参与下，希特勒的代表(哈比希特)和维也纳一些天主教的头面人物开始谈判。希特勒的代表知道用什么来引诱教权主义者：他宣称奥地利天主教徒与德国法西斯分子合作的目的是“建立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共同战线”。毕福利死后，谈判由红衣主教因尼茨尔参加继续进行。在有教会人士、神学教授和法西斯分子参加的谈判过程中，奥地利的教会人士产生了一个问题：天主教和法西斯主义除了共同仇恨马克思主义之外，是否还有“思想上的共同性”，即法西斯主义与天主教可否并行不悖？得到柏林专门指示的希特勒代表阐明，法西斯党徒承认“实证的基督教”，经过这番解释，参加谈判的教会人士立即领悟了这指的是天主教会及其圣秩和制度，于是得出了结论：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与天主教之间，不仅存在着政治上的，而且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共同性。

希特勒在德国攫取政权以后，谈判更为活跃，耶稣会士培养出来的舒施尼格（在他担任奥地利

总理前后）积极参加了所有这些谈判。资产阶级的，特别是天主教的报刊力求使读者相信，似乎是希特勒于 1938 年 2 月强迫他在奥地利投降书上签字。事实上舒施尼格早在投降之前五、六年期间就同希特勒分子进行了关于合并的秘密谈判①。

1935 年初，谈判的参加者按照冯·巴本的建议，决定吸收梵蒂冈更直接地参与这一勾当。梵蒂冈的代表收到一封信，信中说，教皇应当帮助奥地利政府同奥地利希特勒分子，即德国的代理人达成协议。提出来的主要理由：德国是共产主义的敌人。1936 年复活节时，按照冯·巴本的建议，有关此事的第二封信又送往了梵蒂冈②。此

---

① 1947年在维也纳审讯吉多·施密特（舒施尼格内阁中最后一任外交部长）的过程中确定，早在合并之前很久，舒施尼格就投降希特勒德国了。

② 在纽伦堡审讯德国主要战犯的法庭上，冯·巴本不断地吹嘘自己是“天主教的代表”，他与罗马教廷签订了条约，给德国人民保障了“基督教的生活基础”。当控诉人问他为什么不抗议希特勒分子对奥地利教会所作的种种宗教迫害时，这个天主教的代表和希特勒的奴才恬不知耻地回答：“那时候我不是官方人士”（«新时代报»，柏林，1946 年 5 月 20 日）。

31 信递交教皇本人和他的国务卿红衣主教帕切利。①

谈判在梵蒂冈参加下进行，其结果是1936年7月11日缔结了奥德协定，由舒施尼格和冯·巴本签字。根据这一协定，有两名希特勒分子进入奥地利政府内阁。新条约正式确认奥地利的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但是，在这个文件中有这样的条文：奥地利政府“在其对外政策中将始终不渝地遵循的基本路线，应符合下述事实：即奥地利承认自己是德意志国家”②。《外交史》指出，“在签订协定的这项条文时，奥地利政府亲手废除了自己国家的独立”③。

梵蒂冈既然积极参加了奥地利统治集团同希特勒德国签订协定的准备工作，而当德奥合并业已实现之时，它能提出抗议吗？罗马教廷在德奥合并时的行为，正是耶稣会士们所特具的那种伪善和奸诈的样板。

---

① 关于这些谈判的史料，公布于《奥地利杂志》，维也纳，1948年，第4期。

② 《真理报》，1936年7月13日。

③ 《外交史》，第3卷，第574页。

1938年3月11日，德国军队越过奥地利边界。满脑子法西斯思想的奥地利高级僧侣张开双臂，拥抱希特勒分子。3月12日，这些僧侣的头子红衣主教因尼茨尔发出号召，要教徒们于3月13日为德国侵占奥地利举行感恩祈祷。由于对侵略者卑躬屈节，过了两天，因尼茨尔被希特勒赐予接见。

为了向全世界显示，似乎奥地利人民赞成合并，希特勒指定于4月10日举行“全民投票”，其准备工作是在法西斯恐怖极为猖獗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显示奥地利人民与侵略者的“团结”，希特勒分子广泛利用了以因尼茨尔为首的天主教上层人物。①3月24日，希特勒的“全民投票”特派员比克尔在维也纳发表演说，标榜法西斯分子对待教会的态度。他避而不谈德国发生的迫害宗教事件，却大力吹嘘自己对教会和宗教的忠诚，并且声称，在为“上帝”服务的同时，可以为“上帝建立的”国家，即德意志法西斯国家服务。比克尔提出要奥地利的主教们转而为希特勒分子效劳，他

---

① 关于教会和梵蒂冈对待合并的态度的资料，见《国际事务文件汇编，1938年》，第2部，伦敦，1943年。

提醒说，基督吩咐“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①。

比克尔的演说博得了天主教主教们的好评。3月27日，一份奥地利主教们赞成合并的声明出笼了，有红衣主教因尼茨尔和萨尔斯堡公爵一大主教魏茨的签名。主教们这份奴颜婢膝的可耻声明，颂扬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虚构的“伟大成就”。因尼茨尔在附给比克尔的一封信中表示，随着声明而来的将是主教们与希特勒侵略者的“友好合作”，这一切首先是因为他们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以及地主们一样仇恨民主和工人运动，于是把希特勒匪帮看作是剥削者统治的救星。主教们赞美法西斯分子“及时防止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并且号召教徒们在“全民投票”日赞成德国侵占奥地利。奥地利主教们这份亲法西斯的声明激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

各民主阶层懂得，侵占奥地利是进一步走向希特勒所准备的世界大战，梵蒂冈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反法西斯情绪。当然，梵蒂冈并不表示反对奥地利主教们的声明，但同时却企图欺骗世界民

① 典出《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译者

主舆论，瞒天过海，假装主教们发表声明，它事先并不知道。1938 年 3 月 29 日，梵蒂冈的机关报《罗马观察家报》“解释”说：奥地利主教们的声明似乎是以保持教会在奥地利的权利为条件发表的。这只能理解为梵蒂冈赞许奥地利主教团的所作所为。

3 月 28 日，法国哈瓦斯通讯社有一篇报道，说奥地利主教们发表声明是经梵蒂冈同意的。因尼茨尔，显然是按照罗马的指示行事，于 3 月 31 日公布了给比克尔的一封信，驳斥了哈瓦斯通讯社的说法。这个红衣主教再次表示自己对法西斯德国和希特勒党的忠诚之后，保证说，声明是主教们自己倡议发表的。4 月 1 日，《罗马观察家报》写道，奥地利主教们作出赞成合并的决议，并没有得到梵蒂冈的赞同。当晚，梵蒂冈电台在德语广播中批评了奥地利主教们的立场；表白说，并[33]未授权后者作出政治性声明，教徒们无须受其约束。但是，刚过了一天，4 月 3 日，梵蒂冈的另一说明接踵而至：4 月 1 日的电台广播是“纯属非官方的”，红衣主教国务卿事前毫无所知。

一些奥地利主教被召往梵蒂冈，其中有因尼

茨尔。4月6日，他被教皇和国务卿帕切利接见并于当天飞返维也纳，留下了下述声明：奥地利主教们的声明“不应被视为赞成与上帝的教义和天主教会的利益相悖的东西”，也不应被法西斯党利用来为自己作宣传。

无论如何也不能把遵照梵蒂冈指示而作出的这项声明，看成是梵蒂冈对奥地利主教团的立场持否定态度，尤其是对合并持否定态度。因尼茨尔刚从罗马回来，立即命令属下的维也纳僧侣们，为了希特勒在全民投票前夕发表演说而在教堂上悬挂德国法西斯旗帜和鸣钟致敬。4月9日，因尼茨尔第二次被希特勒接见，而于4月10日，“全民投票”日，来到了投票站，并向在场的人们致法西斯敬礼。如果梵蒂冈反对合并，那末因尼茨尔就决不会如此令人注目地表现出他和希特勒侵略者的团结一致。

问题全在于梵蒂冈并不反对合并，如同墨索里尼现在也不表示反对一样。张伯伦、达拉第和美国统治阶级在希特勒军队开入奥地利后，急忙承认这一侵略行为，同时教皇庇护十一世同他们一样赞成把奥地利割让给德国。奥地利统治集团

及其高级僧侣们惧怕本国人民，因而认定出卖祖国给德国法西斯是镇压奥地利劳动人民的反抗和自己参加德国帝国主义者掠夺计划的途径，梵蒂冈的意见同样也和他们的反动政策完全一致。

同时，梵蒂冈考虑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仇恨希特勒德国的冒险政策，认为公开表露其对合并的赞成态度于己不利。教皇宁肯装出他并不完全同意奥地利主教们的立场的样子，然而实际上却赞成它。

“当时，只有苏联发出了警告的呼声，并再次[34]号召实行集体捍卫遭受侵略威胁的各国的独立……而英国政府对苏联照会的复文，却证明英国政府不愿阻挠希特勒的各项侵略计划”①。

梵蒂冈也同英法美三国政府一起，坚决反对阻挠希特勒的各项侵略计划。

梵蒂冈承认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

“德国在欧洲实行侵略和准备战争的下一环节，就是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只有在英法两国的

① 《历史的伪造者》，第28页。

直接援助下，希特勒才能够实现这一发动欧洲大战的最重要步骤”。[①] 苏联新闻局的历史考证《历史的伪造者》一书揭露了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法西斯德国任其蹂躏的张伯伦和达拉第政府与希特勒的可耻勾结。

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揭露了张伯伦和达拉第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于 1938 年 9 月 29 日在慕尼黑勾结的真正意图。斯大林同志说：“人家把捷克斯洛伐克奉送给德国人，本来是作为一种代价来换得德国人履行向苏联开战这一义务的……”[②]

张伯伦和达拉第政府关于把捷克斯洛伐克让给希特勒的秘密谈判，在慕尼黑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张伯伦政府于 1938 年 8 月派往捷克斯洛伐克充当“调解人”的朗西曼勋爵，到那里之后一开始就站到了希特勒德国的代理人亨莱因分子一边。[③]关于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任其蹂躏，

---

① 《历史的伪造者》，第 28 页。

②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 572 页。

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件和材料》，第 1 卷，第 230 页。

在张伯伦、丘吉尔和工党上层人物之间意见惊人地一致。丘吉尔在 1938 年 7 月 14 日同但泽法西斯头子弗尔斯特的谈话中向他保证说，“英法两国将竭力说服布拉格政府同意”满足德国的要 35 求。①

希特勒驻伦敦大使冯·迪克森在 1938 年 8 月 1 日报告了德国驻伦敦大使馆参赞科尔特同工党党员、工党议员顾问罗登·巴克斯顿的谈话。后者提出了大不列颠与德国协商包括答应满足希特勒分子一切要求的计划，并保证英国参加希特勒的反苏计划。②

英法两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了前所未闻的压力，迫使它接受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慕尼黑拟定的瓜分捷克斯洛伐克和割让其领土给德国的计划。

英法两国的统治集团把卑鄙的慕尼黑勾结口是心非地吹捧为“和平的保障”。以亿万美元豢养德帝国主义并用美国武器武装希特勒军队的美国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件和材料》，第 161 页。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件和材料》，第 2 卷，第 125 页。

资产阶级，也同样千方百计地支持张伯伦和达拉第的慕尼黑政策。苏联的敌人，诸如胡佛、布利特、林白（此人在慕尼黑之后不久从希特勒手里获得了法西斯勋章）之流则百般赞扬慕尼黑。

实际上，慕尼黑勾结不仅与和平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是准备反苏战争的又一步骤。张伯伦签订慕尼黑协定的另一目的是挽救希特勒制度免于垮台。

“英法两国的全部举动毫无疑义地表明，英法政府叛卖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及其共和国的这种前所未闻的行为，决不是两国政策中的意外插曲，而是目的在于使希特勒侵略势力反对苏联的这一政策中最重要的环节”①。

在那些竭力欺骗各国人民，向他们掩盖慕尼黑勾结的真正目的的帝国主义走狗之中，既有各个社会党的右翼头目，也有英法两国天主教的主教们。法国社会党人的头子莱翁·勃鲁姆于慕尼黑叛卖的次日在《人民报》上写道：“生活重新走上了常轨。我们又可以开始自己的工作，安稳地睡

①《历史的伪造者》，第31页。

觉了。我们可以欣赏秋日晚霞的绮丽……”①　奥 36
地利社会民主党首领伦纳在慕尼黑之后立即赞扬地写道，这一勾结的结果，“没有战争和战争的牺牲者，可以说是一夜之间苏台德问题就完全解决了”②。美国“社会主义者”首领诺尔曼·托马斯神父颂扬战争贩子们的慕尼黑交易是对“和平事业”的贡献③。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效劳的社会党右翼首领们，帮助它欺骗群众，隐瞒慕尼黑勾结的实质。教会的主教们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

“当时所有的强国之中，只有苏联一个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惨剧的各个阶段上，曾积极出来捍卫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独立和民族权利……”④
苏联政府宣布准备保卫捷克斯洛伐克，按照1935年的互助条约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一条约要求法国同时出兵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然而，法国拒绝

①Д·迈耶：《美国在劫难逃吗？》莫斯科，国家外国书籍出版社，1950年，第75页。

②《道路与目的》，维也纳，1950年10月。

③《工人日报》，纽约，1938年11月3日。

④《历史的伪造者》，第33—34页。

履行自己的义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也准备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军事援助，但有一个条件，即捷克斯洛伐克将采取自卫并亲自向苏联请求援助。可是，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宁愿投降。“当捷克斯洛伐克已被占领，而各帝国主义国家政府相继声明承认这一既成事实的时候，苏联政府在 3 月 18 日的照会中把希特勒德国在英法协助下强占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指斥为肆虐、暴力和侵略的行动……”①

梵蒂冈主教们对约翰·胡斯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从来不抱同情。罗马教廷在历史上与哈布斯堡君主国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这个王朝崩溃了。此后，梵蒂冈念念不忘其复辟哈布斯堡王朝和在欧洲中心建立一个一切反动派的支柱“天主教君主国”的计划。在梵蒂冈的计划里，哈布斯堡王朝的“天主教君主国”也应该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梵蒂冈的计划是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为敌的。其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①《历史的伪造者》，第 33—34 页。

成立的最初年代，有两百多万捷克人脱离了天主教会。

为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巩固自己的阵地，梵蒂冈鼓励那些企图从捷克斯洛伐克分离出来的斯洛伐克自治分子的活动。斯洛伐克教权主义的自治分子同亨莱因分子(苏台德的法西斯分子)和捷克反动分子一样，都是国内的反人民势力，希特勒依靠这股势力在1938——1939年先是肢解而后是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

德国法西斯主义通过天主教的政客们和天主教组织，竭力利用德意志少数民族（苏台德区大部分德国居民是天主教徒）为希特勒德国的利益进行破坏和间谍活动。苏台德区的许多天主教神父利用布道坛作亲德宣传。

希特勒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有自己的代理人：在苏台德地区是亨莱因分子的法西斯党，在斯洛伐克是格林卡分子（天主教党，其领导人是格林卡神父，他去世后从1938年8月起是提索神父)，在喀尔巴阡乌克兰，希特勒的代理人是教会合并派的(同样与梵蒂冈有联系的)沃洛申神父。希特勒所有的这些代理人都按他的指示行事，帮

助法西斯德国实现其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和地主们由于仇恨本国人民和苏联，竟与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独立的最凶恶的敌人勾结，出卖了自己国家的利益。1948年通过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指出："当我们两族人民又面临最凶恶的德国纳粹主义这种帝国主义新的扩张威胁我国生存的时候，新时代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在当代就象过去大贵族在胡斯革命运动时期出卖人民一样，也出卖了人民。在最危急的关头，它同敌人联合起来反对本国人民，因而使国际帝国主义有机会以卑鄙的慕尼黑勾结损害我们两族人民的利益来暂时调和他们的分歧。"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叙述道：

"在危急的1938年，我被邀请到斯大林那里去作客。在长时间的谈话中，我们讨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和希特勒德国一旦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时的苏联援助问题。当时，斯大林对我明确宣布，苏联已准备给捷克斯洛伐克军事援助，即使法国拒绝这样作（法国的援助本是苏联援助的

38

条件），即使当时贝克的波兰和贵族的罗马尼亚拒绝苏军过境。斯大林强调说：当然，苏联可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唯一的条件是捷克斯洛伐克自己将保卫自己，并向苏联提出援助的要求。我问斯大林同志，我可否把这个诺言转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当局。斯大林在回答时直接委托我把谈话的内容转告当时的总统贝奈斯。我完全照办了。

后来，苏联政府的正式代表也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作了类似的声明。其实，在捷克斯洛伐克投降后连贝伦[①]本人在他的声明中也承认这一点。可惜，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没有接受苏联伸出的手、斯大林伸出的手，却宁愿可耻地投降了。

这些事实，将以苏联的荣誉与光荣、斯大林的荣誉与光荣，以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的耻辱而永远载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史册"[②]。

---

①贝伦，前捷克斯洛伐克亲法西斯的农民党主席，慕尼黑之前主张与希特勒德国勾结；慕尼黑勾结之后即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理。

②《真理报》，1949年12月28日。

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党之中，在慕尼黑前夜起了很大作用的是各个天主教政党：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捷克教权主义者)，斯洛伐克人民党(斯洛伐克教权主义者)，和德意志基督教社会党(德意志教权主义者)。这些党全都和资产阶级地主们的其他政党一起，积极地参加了叛卖捷克斯洛伐克的准备工作，而在慕尼黑以后公开为希特勒效劳。向慕尼黑勾结者投降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的那些领导人。

还在1938年2月，斯洛伐克天主教党的头子格林卡神父同苏台德法西斯党党魁之一弗朗克(战后作为战犯判处死刑)签订了两党在反对共和国并肢解它的破坏活动中共同合作的协定①。当时，1938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的德意志基督教社会党退出了执政联盟，转到了希特勒代理人的阵营：这个党的上议员、下议员们加入了39 亨莱因的法西斯党议员团。②德意志基督教社会党头子希尔根雷涅神父成了亨莱因最亲密的助手。亨莱因分子和斯洛伐克的教权主义者串通一

①《中欧观察家》，伦敦，1947年，第8期。

②《真理报》，1938年3月26日。

气，前者开始了争取苏台德区“自治”而后完全脱离的运动，后者则开始了争取斯洛伐克“自治”而后完全脱离的运动。希特勒的走狗们领导的其他主张自治和亲德的集团也开展了争取使其他领土脱离共和国的运动。

由于不惜任何代价把希特勒推向东方去反对苏联的张伯伦和达拉第的罪恶政策，由于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叛卖政策的结果，柏林领导的亨莱因分子以及法西斯德国的其他走狗们反对共和国的阴谋，于1938年9月以慕尼黑勾结宣告完成。

这一勾结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开始迅速法西斯化，使得希特勒轻而易举地侵占全国。出卖了民族利益的资产阶级，向愿意保卫共和国以避免法西斯德国悍然入侵的工人阶级发动猛烈进攻。对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迫害开始了。10月28日，这个为捷克斯洛伐克独立英勇斗争的唯一的政党共产党被解散了。

各天主教政党积极参加法西斯化。捷克天主教党的机关报《大众日报》日复一日地论述向法西斯德国投降的必要性。这个党在捷克地区的边区组织于1938年11月加入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组成

的联合政党"民族统一党"；而捷克天主教党的斯洛伐克组织则加入了主张自治的斯洛伐克天主教党，并同它一起从事自治的准备工作，最后使斯洛伐克脱离共和国，变成了希特勒的殖民地。①

先是以安德列·格林卡神父为首而后是约瑟夫·提索神父为首的斯洛伐克天主教党，是一个斯洛伐克自治分子——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法西斯政党。它受到民主制度的和苏联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斯洛伐克天主教僧侣们的无限支持。英国新闻记者拉尔夫·帕克在其捷克斯洛伐克旅行印象记中这样写道："斯洛伐克的天主教会和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的教会合并派极力鼓吹同苏联誓不两立。还在战争爆发很久以前，有一天，我听了怙恶不悛的纳粹分子约瑟夫·提索在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墓地上向人数众多的一群斯洛伐克农民布道。这次布道是号召向'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进军'"。②

---

① 《真理报》，1938年，10月15、17、20、28日，11月18—20日。

② 拉·帕克：《反和平的阴谋》，莫斯科，《文学报》出版社，1949，第15页。

慕尼黑勾结的结果，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和其他某些地区被德国侵占。同时，波兰和匈牙利也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某些领土。但是，希特勒的计划并不到此为止。在实现希特勒计划中起很大作用的是提索神父和他的斯洛伐克匪帮、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的沃洛申神父以及希特勒的其他走狗们。1938年10月5日，按照柏林的指示，斯洛伐克教权主义的政党向政府提出关于给予斯洛伐克完全自治的最后通牒。10月7日，政府承认斯洛伐克自治。提索成了斯洛伐克"政府"的首脑；以部长身份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教权法西斯"政府"的第一个行动是：在斯洛伐克取缔共产党，禁止集会，解散工会。天主教党建立的法西斯部队"格林卡近卫军"的恐怖活动猖獗起来。提索"政府"按照德国的样本在斯洛伐克制定了种族主义法令。蹂躏犹太人和捷克人的暴行也开始了。教权主义分子已经不满足于自治：提索、都卡、杜尔坎斯基以及天主教党的其他头目们按照柏林的指令，要求斯洛伐克脱离捷克斯洛伐克。

与斯洛伐克自治的同时，外喀尔巴阡乌克兰

也实行自治。它的总理是勃罗迪，不久之后因从匈牙利取得金钱而被捕。继他之后任总理的是上面提到过的教会合并派的沃洛申神父，他是好几个外国间谍机关的特务，当地天主教党的头子。他立即在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建立了德国式的法西斯“秩序”。他的主子法西斯德国打算把西乌克兰变成进一步向东方扩张的战略基地，首先是进攻苏维埃乌克兰的基地。

1939年3月初，德国终于作好了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准备。德国部队在后者的边境上集结。斯洛伐克的教权主义分子奉柏林之命组织了旨在使斯洛伐克分离出来的法西斯阴谋。为此，3月10日，提索和他的亲信同谋者被布拉格政府解除斯洛伐克政府的职务。3月13日，提索和杜尔坎斯基被召往柏林，希特勒命令他们召开斯洛伐克议会（议会中法西斯分子起主要作用）并宣布“斯洛伐克独立”。3月14日，一切遵命照办，提索成了新斯洛伐克“国”的政府元首，他的付手是斯洛伐克另一个教权主义分子都卡。当天宣布斯洛伐克“国”受德国保护。3月14日夜，希特勒德国事先取得英法美三国当权人物的同意，占领了捷克和

摩拉维亚。沃洛申也乘机宣布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独立"；不过，它是经德国同意于3月14日由匈牙利军队占领的。

希特勒的傀儡提索在斯洛伐克一直统治到法西斯德国崩溃。他把斯洛伐克变成了德国的附庸国。1939年8月，他同德国签署了军事同盟条约。

综上所述，捷克斯洛伐克首先是斯洛伐克的教权主义分子顺应梵蒂冈的政策，并在梵蒂冈的完全赞同下，积极帮助希特勒准备和实行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消灭符合梵蒂冈的计划。各资产阶级国家争先恐后承认希特勒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占。

只有苏联政府对这一暴行提出了抗议。苏联政府在1939年3月18日的照会中声明，"德国军队占领捷克和德国政府随后的一切行为，不能不被认为是肆虐、暴力、侵略的行为。上述谴责也完全适用于改变斯洛伐克的法律使其从属于德意志帝国一事……"。①

① 《真理报》，1939年3月20日。

提索的教权法西斯政府在斯洛伐克建立了血腥的法西斯制度。成千成万无辜的人们被杀害应归罪于这个主教。①

提索屡次声明，他的法西斯纲领与天主教完全一致。天主教与纳粹主义，据他讲，“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亲密无间地进行合作”。提索的付手都卡于1940年8月宣布，“斯洛伐克未来的国家制度将是德国纳粹主义和罗马天主教的结合”。②提索和他的“政府”与梵蒂冈关系密切，如上所述，他们的反捷克斯洛伐克阴谋是在梵蒂冈赞许下进行的。提索从教皇那里获得了教皇高级侍从的称号并被提升为主教。③1939年4月，梵蒂冈承认斯洛伐克傀儡国。④于是，提索领着一帮朝圣者动身去拜谒教皇。1940年6月，梵蒂冈无线电

① 提索因血债累累于1947年被判处死刑。梵蒂冈至今还祭祀这个罪犯。他的亲密同伙杜尔坎斯基则逃到了梵蒂冈，躲避审判。

② L·莱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梵蒂冈的政策》，纽约，1946，第28页。

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梵蒂冈的政策》，第28页。

④ 《十九世纪以来》，1944年3月；I·斯蒂尔：《欧洲的未来》，第226页。

台广播报导说，对斯洛伐克国家元首提索主教企图“根据基督教原则”改造斯洛伐克的声明“至圣的宗座十分满意”。这里说的是什么“原则”，听下去就很容易明了，梵蒂冈无线电台继续广播说，提索的“政府”将根据“劳资协会主义的”（即法西斯的）原则建立，如同在西班牙那样。①

关于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梵蒂冈与慕尼黑勾结者意见完全一致，它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千方百计地协助侵占这个国家。三名捷克新闻记者在论述教皇政策的一本书中谈到，梵蒂冈方面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仇视态度在希特勒分子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表现得更为强烈。“在此之后我们的公使拉季姆斯基立即被请到梵蒂冈。国务卿马尔昂纳接见了他。简短的谈话之后，马尔昂纳在离别时表示：‘如果您什么时候还想同我谈话，公使先生，我将高兴地接待您……在我的私人住宅里’。

宗座的代表用这句外交词令暗示，对他说来捷克斯洛伐克已不复存在。此外，宗座是急忙承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梵蒂冈的政策》，第28页。

认罗马教皇亲爱的儿子——提索创立的‘斯洛伐克国’的最早的一个……”① 梵蒂冈的主教们除了43把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看作是对德国侵略者准备反苏战争的报酬之外，还指望在捷克斯洛伐克废墟上建立的教权法西斯的斯洛伐克国将成为天主教会在各斯拉夫民族中传布天主教的又一个支柱。

这样，梵蒂冈的方针完全符合于张伯伦政府的反苏和亲希特勒的方针。为了与后者更好地联系，1938 年 11 月， 慕尼黑勾结后不久，教皇在英国与罗马自十六世纪断交以后，第一次任命了他驻伦敦的代表“教皇特使”。教皇与慕尼黑政策的一致，还表现在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于 1939 年 1 月 13 日访问了梵蒂冈。梵蒂冈的报刊关于教皇及其国务卿同张伯伦及哈利法克斯谈判的报道，“大不列颠与至圣的宗座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令人满意”。在这次谈判中搞出了新慕尼黑、新叛卖计划。这一次，阴谋的牺牲品则是西班牙共和国了。

---

① A·斯沃博达，A·图奇科娃，B·斯沃博达娃：《梵蒂冈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阴谋》，外国书籍出版社，1950年，第 88 页。

庇护十二世的政治方针

1939年2月10日，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死了。他的政策的基调是仇恨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庇护十一世在位期是从1922年起到1939年。早在被选为教皇之前，1919年，他就以教皇驻华沙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活动。波兰的地主资本家政府赏给了他一枚白鹰勋章。庇护十一世顽固地推行反苏方针一直到死。

与共产主义和苏联为敌使他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同盟者。就是这个教皇，于1929年同墨索里尼签订了《拉特兰条约》，于1933年同希特勒签订了宗教条约。由于敌视民主制度，这个教皇"走得如此之远，"他的天主教徒的传记作者写道，"以致于如他所说，愿和魔鬼本人协商"，如果这有利于教会的话。①

仇恨苏联和敌视民主使庇护十一世加入了慕尼黑勾结者的阵营。他在晚年时可以确信，勾结和对法西斯侵略者让步的政策已导致新的世界大

① Cb·多伊尔，《教皇庇护十一世生平》，第31页。

战。

庇护十一世死后，围绕着新教皇的选举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报刊要求[44]选举教皇会议选出一个能被妄图统治世界的法西斯分子所接受的继任者。驻梵蒂冈外交使团团长、德国大使冯·贝尔根于1939年2月16日向全体红衣主教提出了这一要求。他在对红衣主教们的演说中吹捧希特勒的“新秩序”，并且坚决要求红衣主教们在选举教皇时应符合“轴心”列强的利益。①

在有势力的教会权贵中间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追随者。六十二名参加选举教皇会议的红衣主教之中有三十五名意大利人；其中许多人是法西斯制度的忠实奴仆。

3月2日，红衣主教欧金尼奥·帕切利当选为罗马教皇，接受庇护十二世称号。他任命前教皇驻巴黎圣使红衣主教马里昂纳为他的国务卿，即最亲信的顾问和助手。马里昂纳是由于参与1935年法意两国关于阿比西尼亚事件的勾结而戴上了

① C·査费拉：《梵蒂冈与欧洲战争》，第27页。

红衣主教之冠的。

庇护十二世出身于与梵蒂冈有密切关系的贵族家庭。他的弟弟直接参加了梵蒂冈与墨索里尼的勾结，这一勾结以 1929 年签订拉特兰条约告终。他的伯父创办了天主教最大的银行之一“罗马银行”。帕切利一家直到今天还在这家银行拥有很大权势。这个家庭与意大利最大的资产阶级集团关系密切，它的许多成员是各种企业的股东，并在意大利各银行的监事会中占有地位。

1901 年，这个未来的教皇利用其与梵蒂冈上层人物的关系，开始在梵蒂冈的外交部门供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梵蒂冈中央机构最重要的机关之一教会非常事务部的秘书。1917 年，他被任命为驻巴伐利亚圣使，并被派往威廉二世处谈判和平以挽救威廉的德国，以及组织各大国反对俄国革命的统一战线。1920—1929 年，帕切利担任教皇驻德国圣使并以亲德外交家著称。他与巴伐利亚最反动的天主教上层人物有着特殊关系，还在 1918 年他就在他们面前亮了相。当时他担任驻慕尼黑圣使的职务，积极出头反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人。

从1930年起到被选为教皇，帕切利任庇护十45一世的国务卿，他鼓励了后者与法西斯侵略者建立同盟。庇护十二世过去和现在都是共产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1939年3月，在他加冕的日子里，德军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他对这一事件只字不提。当选以后，庇护十二世立即开始就互相协调同德国秘密谈判。德国大使冯·贝尔根同出席选举教皇会议的德国红衣主教们一起参加了这次谈判。[①]新教皇最初的演说之一是宣布他想让人人皆知，"他如何热爱德意志，并乐意为她做许多事情"。[②]这发生在希特勒德国已经侵占了欧洲的一部分并准备新的侵略之时。

正如1939年5月《新苏黎世报》驻罗马通讯记者所写的，梵蒂冈人士认为教皇将利用一切可能来重新建立与德国的牢固关系。这位通讯记者写道："关于这一点，有一事可资证明：庇护十二世在希特勒生日之前给了他一封亲笔信，这封信

---

① O·查费拉：《梵蒂冈与欧洲战争》，第149—150页。

② 《新国际年鉴，1939年》，纽约，1940年，第681页。

已被愉快地接受了”。[1]

稍后，6月间，德意两国抗议不合它们胃口的梵蒂冈无线电广播，教皇顺其心意，将其无线电广播的两名领导人德利亚耐主教和金列伊撤职。[2]

庇护十二世当选教皇后，立即极力设法改善与德国的伙伴法西斯意大利的关系。意大利国王祝贺他当选教皇，庇护十二世在回信中写道，他荣幸地告知“国王——皇帝”（这个称号意味着教皇承认意大利国王同时也是阿比西尼亚皇帝），他在为国王全家的康宁祷告上帝。教皇给墨索里尼写道，愿“上帝帮助”他。[3] 5月18日，罗马举行了有当局参加的典礼，庆祝教皇登上罗马主教宝座。就在那一天传出消息说，梵蒂冈正在调停法意两国关于让给意大利非洲领土的秘密谈判。[4]

5月22日，意大利和德意志缔结军事同盟， 46

① 《新苏黎世报》，1939年6月2日。

② 《工人日报》，伦敦，1939年6月19日。

③ R·马索克：《从内部看意大利》，纽约，1943年，第139页。

④ 《教皇言论集》，第64—65页。

而后日本加入了这个同盟，此后不久，6 月 14 日，教皇在梵蒂冈接见大批意大利人士时宣布，他愿上帝赐福于国王和墨索里尼。[1] 这一切都证明，庇护十二世与意大利统治集团的政策是一致的。

庇护十二世祝颂意大利侵占阿尔巴尼亚祝颂反西班牙共和国的战争

庇护十二世对意大利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支持，也表现在赞同意大利于 1939 年 4 月侵占阿尔巴尼亚。无论是天主教的报刊，还是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神职人员，都丝毫没有表示不同意法西斯侵略势力的这一行动。[2]教皇收到许多电报，要求抗议侵占阿尔巴尼亚，但是正如他的天主教传记作者所写的，代替抗议的却是“教皇在祈祷”[3]。实际上，梵蒂冈对意大利侵占阿尔巴尼亚感到高兴，因为教皇指望这一侵占能加强法西斯意大利的地位。此外，将为天主教传教士们在这

① 《工人日报》，伦敦，1939 年 6 月 15 日。

② 《美国政治学评论》，1945 年 4 月，第 285 页。

③ 《教皇言论集》，第 54 页。

个国家开辟道路。梵蒂冈跟张伯伦政府一样，承认这一侵占。

意大利帝国主义者在阿尔巴尼亚有支持者，他们是大地主以及按照意大利精神培养出来的天主教上层僧侣们。①

1939 年 4 月 9 日，复活节，教皇发表了关于欧洲事务的演说。他口是心非地侈谈和平和世界利益。但是，他说，如果庄严签订的条约遭到破坏，义务不履行，和平又怎么可能呢？②这种说法似乎可以解释为对德意两国侵略者的谴责。实际上这是企图欺骗社会舆论的一种蛊惑人心的手法：天主教记者查费拉写道，为了不得罪“轴心”列强，教皇“保持了平衡”，他在表示反对破坏条约之后立即补充说：必须使“上帝创造的财富”，“公平合理地”分配给“他的所有的子女们”。③这完全符合法西斯侵略者为了掩饰其掠夺计划而撒的弥天大谎：他们是为争取必要的“生存空间”而战。庇护十二世用这种说法来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侵

47

① 《世界新闻与展望》，伦敦，1944 年 3 月 4 日。

② 《教皇言论集》，第 128—133 页。

③ O·查费拉：《梵蒂冈与欧洲战争》，第 163 页。

略政策辩护。

梵蒂冈和法西斯战争贩子一起，极力使共和制的西班牙尽快灭亡。

各国的天主教主教们奉行梵蒂冈的方针，对西班牙人民的英勇斗争抱仇视态度，并且替佛朗哥叛乱分子和德意两国干涉者的一切罪行辩护。尤其是美国的天主教主教们，他们对西班牙共和国恨得要命。1938 年初，德意两国的轰炸机大规模袭击巴塞罗那。在教会节日里的一次空袭中将近九百人被炸死。为答复对这些罪行的抗议，纽约大主教、红衣主教海斯和波士顿大主教奥康内尔出来替这些暴行辩护。在这些日子里，海斯公开为佛朗哥的胜利祈祷，而奥康内尔竟宣称巴塞罗那的大规模屠杀只不过是法西斯分子的“军事演习”。①

英法美三国政府为了彻底实现与“轴心”列强的勾结，积极协助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扼杀西班牙共和国。梵蒂冈直接参加了反西班牙人民的这一勾结。例如，1939 年 1 月，张伯伦和哈利法克

① 《工人日报》，纽约，1938 年 3 月24、25日；Г·Д·迈耶：《美国在劫难逃吗？》，第 65 页。

斯在梵蒂冈期间曾就此进行过谈判。

1939年初，各国的天主教机构和报刊，犹如听到一声号令，重新掀起了更强烈的反西班牙共和国运动。天主教徒们开始到布尔戈斯去朝圣，拜谒佛朗哥。1939年2月，法国红衣主教波德利亚尔（此人以后在德军占领法国后主张与占领者合作）被法国政府派往西班牙就承认佛朗哥一事进行秘密谈判。过了几天，一小撮法国右派政客卑躬屈节地去朝拜佛朗哥，其中就有夏特勒市的主教。法国的天主教机构奉梵蒂冈指示，开展了有利于佛朗哥的运动。

在美国，“虽然各进步团体和社会广大阶层一 48 再呼吁，但是美国反对西班牙合法政府的禁运政策仍然没有取消。在这个问题上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是合众国天主教会的主教们。所有的西方国家在天主教会的鼓励下，很快就与佛朗哥暴徒们缔结了同盟”。①

3月28日，共和国的马德里陷落了。英法两国政府立即承认佛朗哥政权。被派往佛朗哥那里

① Г·Л·迈耶：《美国在劫难逃吗？》第66页。

担任法国大使的是贝当(一个天主教徒、保皇派、法西斯分子)。4月1日，美国政府也承认了佛朗哥。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由于扑灭了西班牙共和国而到处兴高采烈。梵蒂冈也欣喜若狂。4月1日，教皇向佛朗哥发出贺电，庆贺他战胜了西班牙人民。[1]教皇赞扬这个西班牙的刽子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走卒)，要求他在西班牙恢复"古老的基督教传统"。关于这些传统，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何塞·狄亚斯说得好："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传统，现代的反动分子、法西斯分子代表着这种传统。但是，还有世世代代为反对黑暗势力、争取进步和自由而斗争的传统，代表着这种传统的是我们。历来就有两个西班牙在相互斗争着。一个建立了宗教裁判所，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而采用一切野蛮方法，这些方法是力求取得一小撮人对广大人民统治权力的凶手们所惯用的。还有另一个西班牙——为反对宗教裁判所而斗争、为争取人民自由……而牺牲自

① 《教皇言论集》，第52页。

己生命的人们的西班牙。西班牙法西斯分子把宗教裁判所活动家的名字作为旗帜高高举起。让他们举吧！我们的旗帜则是反对宗教裁判所的人们的名字……"①

教皇指的正是恢复宗教裁判所的传统。庇护十二世在赞扬佛朗哥时，满怀恢复他心爱的君主制度的希望。4月2日，向佛朗哥致贺电的第二天，教皇和他的国务卿在梵蒂冈接见了前西班牙国王阿尔丰斯。讨论了在这个国家恢复君主制的问题。②

4月16日，庇护十二世对西班牙广播。他祝贺法西斯刽子手们的成功，赞美他们的"基督教英雄主义"(众所周知，它体现在血腥恐怖和屠杀成千上万的人们上)，并为这些凶手祝福。教皇把西班牙的佛朗哥制度称之为反对"当代唯物主义无神论"斗争中的"天主教堡垒"③。1939年6月11日，教皇在梵蒂冈接见了以西班牙内政部长、希

49

① 何·狄亚斯：《在人民阵线的旗帜下》，党书籍出版社，1937年，第54—55页。

② 《教皇言论集》，第52页。

③ 《教皇言论集》，第134—136页。

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走狗塞兰诺·苏纳为首的三千名西班牙法西斯长枪党徒、士兵和军官。庇护十二世把他们当作“信仰与文明的捍卫者”来欢迎，并再次为佛朗哥和所有的法西斯强盗祝福。①

关于梵蒂冈对佛朗哥的政策，曾在1944年任美国驻马德里新闻专员的美国记者、学者艾比尔·普连这样写道：

“前红衣主教帕切利(现教皇庇护十二世——舍英曼)由于1936年美英两国规定禁止向西班牙共和国输出武器而受到许多拥护共和政体的人的间接指责，他既没有对内战时期枪决巴斯克民族主义的神父们一事予以谴责，也没有对逮捕二十名巴斯克神父（他们至今仍在佛朗哥的监狱里受煎熬）予以谴责。西班牙教会热衷于给佛朗哥、“春宫迷将军”凯波·德·利亚诺、司法部长奥诺苏以及政府中其他军队的和长枪党的头目们以宗教荣誉，而正是这些人应对成千上万西班牙人—— 男、女、儿童受迫害和死亡负直接责任，

① G·萨尔维米尼、G·拉·皮阿纳：《如何对待意大利》，纽约，1943年，第148页；I·斯蒂尔：《欧洲的未来》，第226页。

但梵蒂冈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西班牙教会这种行动。卡乌季利诺甚至获得了极高的荣誉——为了嘉奖他'对上帝和教会的特殊功勋'，他获得一枚庇护十一世的十字勋章"。①

综上所述，在西班牙问题上，梵蒂冈的政治方针也完全与慕尼黑勾结者的方针相吻合。

梵蒂冈孤立苏联的方针
出卖波兰的利益

"法西斯德国，从强占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便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完全公开地准备大战……英法两国在美国统治集团支持下，直到 1939 年春夏，当战祸已迫在眉睫的最后关头，还是继续执行其原来的政策路线。这种政策就是嗾使希特勒德国去进犯苏联，它们为了欺骗苏联而掩盖这一政策起见，不仅用了一些所谓决心和苏联合作的伪善词句，而且用了某些不很高妙的外交手腕，向各国舆论隐瞒它们所执行的政策的实质。"②

莫洛托夫同志在 1939 年 5 月 31 日苏联最高

① 艾·普连：《橄榄丛中之风》，第 108 页。

② 《历史的伪造者》，第 36—37 页。

苏维埃第三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苏联对外政策的报告中说："……如果实际上愿意建立一个爱好和平各国反对侵略势力进攻的有能力的阵线，那末，为此至少需要这样的条件：英、法和苏联缔结具有非常防御性质的反侵略互助公约；从英、法和苏联方面保障中欧和东欧，无一例外地包括与苏联接壤的欧洲各国不遭受侵略者的进犯；英、法和苏联签订关于在侵略者进犯的情况下对受保障各国与相互之间进行迅速与有效支援的方式与范围的具体条约……"①

同苏联缔结反对侵略者的有效互助条约，英法两国的统治集团是不愿意的，因为他们力求与希特勒德国达成协议，以便把它推向反苏战争。英国和法国政府于 1939 年夏开始同苏联谈判。在谈判中他们大耍可耻的两面手法，由于他们的过错，谈判破裂了。苏联新闻局的一本历史事实考证中指出："当时看得越来越清楚，破坏这次谈判，是西方列强代表在其两面手法中事先就策划好了的。事实上，英国人一面同苏联进行公开谈

① 维·莫洛托夫：《国际形势和苏联对外政策》，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39 年，第 8 页。

判，同时又同德国进行秘密谈判，而且他们把后一种谈判看得无比重要”①。

在这个时刻，在世界大战的前夕，梵蒂冈的立场又是怎样呢？

这一次，德国直接威胁了波兰。希特勒政府提出了把但泽并入德国以及允许德国在波兰走廊敷设享有治外法权的铁路和汽车干线的要求。 51

地主波兰的统治集团由于仇恨苏联而迷住了心窍，他们的政策与希特勒德国的反苏方针完全一致。他们欢迎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勾结，并且亲自参加掠夺这个国家。波兰反动派完全同意英法美帝国主义集团的反苏政策，也指望靠损害苏联利益来发财致富。然而，很快就明白了，希特勒政府向波兰频送秋波只是由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尚未结束。但在此之后，德国便开始威胁波兰的独立了。斯大林同志说：“波兰旧日的当局不愿与苏联建立联盟关系。他们宁肯进行一种在苏德两国间玩弄手法的政策，而结果当然是他们

① 《历史的伪造者》，第49页。

要失败了……"①

梵蒂冈的主教们多次虚伪地进行斡旋，仿佛波兰的利益对他说来"特别珍贵"。实际上现在和过去多次所作所为一样，梵蒂冈早已准备好出卖波兰人民的利益。

梵蒂冈的主教们把波兰当作是帝国主义各种势力之间作交易时的辅币。战争前夕，梵蒂冈的主教们用张伯伦、达拉第和美国统治阶级的眼光来看待波兰。1939年的整个夏天，梵蒂冈的外交活动就是为了达到其主要目的也就是英法美三国反动统治集团的目的——建立反苏联盟，而致力于协助张伯伦和达拉第把波兰作为牺牲品献给希特勒德国。

梵蒂冈运用其全部权势来阻碍爱好和平的各国建立反对侵略者进攻的有效战线。这完全符合张伯伦和希特勒的政策，从已公布的前德国驻伦敦大使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张伯伦和希特勒力求"撇开苏联来决定欧洲的命运"②。梵蒂冈也力求

---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83页，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件和材料》，第2卷，第33页。

达到这一点。这边张伯伦与希特勒秘密商议孤立苏联，那边庇护十二世却在公开地干 并且虚伪地以呼吁和平来掩盖其煽动反苏战争的政策。

1939 年 3 月，苏联政府建议召开一个“最有[52]利害关系的各国，即：英国、法国、罗马尼亚、波兰、土耳其和苏联的代表会议。按照苏联政府的意见，这样的会议能提供最有利的条件以澄清现实情况和确定其参加者的立场”①。英国政府拒绝接受这一建议。5 月初，为了对抗苏联的建议，教皇打算在梵蒂冈召开英国、法国、波兰、德国和意大利的代表会议来解决波德之间和法意之间的争端。这样一来，教皇成了召开没有苏联参加而有战争贩子德国和意大利参加解决欧洲问题的代表会议的发起人。教皇的倡议被评作为新慕尼黑的准备，在这样的会议上所谈的只能是对妄图统治全世界的法西斯分子作出新的让步。意大利的和德国的法西斯政府完全赞成教皇的建议。②

法国共产党著名的活动家加布里耶尔·皮里

① 《真理报》，1939 年 3 月 22 日。

② 《真理报》，1939 年 5 月 11 日。

就教皇的这一步骤在《人道报》上写道：

“四天前，宗座驻巴黎、伦敦、柏林和华沙的圣使们，奉庇护十二世之命拜访了各所在国的外交部长。这些拜访中最轰动一时的是教皇驻德国代表在贝希特斯加登拜访阿道夫·希特勒。现在大家认为这些拜访的目的是建议各国政府去梵蒂冈会合，开五大国会议。这些拜访中最重要的应该算是驻英国的特使戈弗雷与哈利法克斯的会见了。召开五大国（德、法、意、波、英，没有苏联参加）会议的这一创议，看来在伦敦进行了具体研究……。

德国报刊对他的（教皇的）创议不惜赞扬之词，把它与罗斯福总统的演说相对比，并且清楚地示意，墨索里尼对教皇的政治步骤不会持异议。千万不可闭目不视，这两个独裁者将从这个会议得到许多便宜。和平的各国人民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①

53　《人道报》写道，教皇的建议意味着新的慕尼黑。

① 《人道报》，1939年5月10日。

伦敦报纸《工人日报》写道，教皇提出新慕尼黑计划是英国唆使的，教皇拟议的梵蒂冈会议的目的，首先是以牺牲波兰来对德国作出新的让步。这家报纸写道，起初张伯伦认为德国和波兰之间的“调解人”应该是墨索里尼，但由于意大利同德国缔结了军事同盟，它已经无法成为“中立的”调解人了。于是梵蒂冈负起了这个使命。① 资产阶级的《泰晤士报》也承认这些事实。② 有趣的是梵蒂冈现在企图“驳斥”传遍全世界报刊的关于教皇“调解”的报导；可见两面三刀乃是梵蒂冈的耶稣会士们办事的惯伎。

梵蒂冈特别感到不安的是苏英法三国可能达成共同反击德国侵略者的协议。教皇建议召开梵蒂冈会议，就是企图阻挠这样的协议。

在舆论的压力下，英法两国政府不得不派出代表团去莫斯科谈判。众所周知，派出的是二流人物，因为张伯伦和达拉第不愿同苏联达成协议，同时却又与希特勒举行秘密谈判，并且确实力求同他达成协议。虽然如此，莫斯科谈判仍使教皇

① 《工人日报》，1939 年，5 月 10、17、23 日，6 月 12日。
② 《泰晤士报》，1939 年 5 月 8 日。

忧心忡忡。天主教徒查费拉写道："教皇对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可能签订英法苏三国条约感到不安。在这个时候，宗座害怕苏联与西方两个民主大国拟议中的同盟可能使苏联在欧洲外交中占重要地位。只要看到教会是布尔什维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这一事实，梵蒂冈的这一态度是很容易理解的。"①

慕尼黑分子把庇护十二世看作其朝夕不忘的目的的合适代言人，而这些目的他们自己并不是经常便于公开说出的。当时伦敦杂志《世界新闻与展望》写道，在那些反对同苏联缔约的反动势力之中也有梵蒂冈，梵蒂冈"竭力阻挠同苏联签54订条约，并促使波兰投降，而投降将是波兰的灭亡"。②

这些事实连资产阶级和天主教的作者也都承认。美国通讯社美联社驻梵蒂冈代表摩根当时在罗马，他写道："梵蒂冈坚持不懈地阻止缔约（指英、法、苏三国——舍英曼）。宗座在伦敦的特使戈弗雷受(教皇——舍英曼)专门委托向伦敦政

① O·查费拉：《梵蒂冈与欧洲革命》，第170—171页。
② 《世界新闻与展望》，第36期，1939年7月15日。

府提出，与苏维埃缔结同盟将给基督教带来危害”。①

英国天主教徒、庇护十二世传记作者在一本受到教会书刊检查机关赞同的书中写道：“在罗马，梵蒂冈反对拟议中的英、法、俄三国同盟一事并非秘密。教皇始终害怕这种条约将为布尔什维主义干涉欧洲事务开辟道路”。因此，这位作者写道，教皇提议召开梵蒂冈会议，并竭力说服英、法、德、意、波五国“在与苏维埃缔结民主同盟之前”② 达成协议。

另一个英国天主教作者写道，梵蒂冈人士“对同苏联的任何合作都提出警告”。③ 教皇企图召开五大国会议，就为的是阻挠这种合作。

综上所述，实际上梵蒂冈是极力企图以牺牲波兰来协助英法同法西斯战争贩子勾结，并怂恿德国反对苏维埃国家。梵蒂冈的目的同张伯伦、希特勒和国际上一切反动派的目的一样：使当时正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破裂。梵蒂冈为反对集体

① Th·摩根：《听音哨》，纽约，1944，第164—165页。

② Ch·兰金：《教皇言论集》，第70页。

③ D·格温：《梵蒂冈与欧洲战争》，伦敦，第177页。

安全而斗争，并以此为和平的敌人，首先是为希特勒德国直接效劳。

在梵蒂冈亲自进行阻挠英法同苏联缔约的外交活动同时，英法两国的天主教报刊奉教皇指示，也掀起了反对同苏联缔约的运动。1939年4月，当英国公众舆论因希特勒侵略行动而焦虑不安，要求与苏联达成协议之际，英国天主教指导性报55纸《天主教先驱报》登载了一系列反苏文章。教皇的这个传声筒要人们相信，这样的协定将会导致“世界革命的胜利”。法国的和其他的天主教报刊也进行这类反苏宣传。所有这一切必然使得张伯伦和庇护十二世很容易实现他们的计划。①

6月2日，教皇向红衣主教团发表关于梵蒂冈政策的演说。他说，教会有权表示愿意为和平效劳和“提出警告”；为此，他才向各大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而这建议如他所断定，已得到赞

① 正如伦敦的反动杂志《十九世纪以来》所报道的，法国新闻记者安利·德·基利里斯肯定说，在慕尼黑的日子里，德国人在法国耗费了两百万英镑贿买新闻记者和政客们，让他们赞扬慕尼黑协定和赞成希特勒（《十九世纪以来》，1941年5月，第469页）。这些钱有不少落入了颂扬慕尼黑的天主教报界编辑和出版者的腰包里。

同。

教皇宣称，似乎他“只对和平感兴趣”，以此在公众舆论的心目中证实梵蒂冈为适合张伯伦、达拉第以及美国统治集团的方针而炮制的牺牲波兰以利法西斯德国的新让步计划是正确的。然而，众所周知，张伯伦在出卖捷克斯洛伐克，而后出卖波兰时，也是口口声声说他感兴趣的只是“和平事业”。

苏联政府看透了张伯伦的阴谋诡计。“当时已不容丝毫怀疑，英法两国不仅没有想认真设法来阻挠希特勒德国发动战争，反而竭尽全力，用种种秘密协商和勾结办法，用一切可能做到的挑拨手段唆使希特勒德国进犯苏联”①。在这种条件下，苏联政府采取了英明而有远见的步骤，接受德国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这就使国际反动派的阴谋计划破了产，他们想……“在完全不利于苏联的局势下，在苏联陷于完全孤立的条件下挑动苏联去同德国进行武装冲突”②。“苏联政府这一步骤，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① 《历史的伪造者》，第52—53页。

② 《历史的伪造者》，第53页。

的不仅有利于苏联而且有利于一切爱好自由国家的胜利结局。"①

56 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了。梵蒂冈的反苏计划也随着国际反动派的反苏计划一起宣告破产。然而，梵蒂冈仍然顽固地设法牺牲波兰以向法西斯德国让步。8月24日，教皇对"各国政府、政治活动家和统帅们"发表广播演说。他大谈战争的危险，并且宣称，虽然他对事件的干预未能收到成果，但他重新呼吁通过谈判来解决争端。教皇指的是满足德国对波兰的要求的这种谈判。同时，教皇号召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不要听信"破坏性宣传"，要鼓励各自政府的"和平意图"②。这样教皇企图使各国人民相信，仿佛张伯伦、达拉第和希特勒的政策目的是达到和平。

教皇的这篇演说是承认梵蒂冈全部政策已完全失败，庇护十二世就连这一次也仍然在呼吁发动战争。英国政府赞赏教皇的演说，哈利法克斯在8月25日给英国驻梵蒂冈大使的电报中建议

① 《历史的伪造者》，第53页。

② W·谢泼德森：《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9年》，纽约，1940年，第323—325页。

把这一点告知红衣主教国务卿和教皇。①

这样，当希特勒侵略势力直接威胁波兰的时候，梵蒂冈却赞成把但泽给希特勒德国以满足它的要求。

不过，早在1939年事件之前很久，教皇就开始帮助希特勒分子在但泽巩固地盘。1937年，德国法西斯分子掀起了一个反对爱尔兰籍的但泽主教奥鲁尔卡伯爵的运动。他们指控他使但泽的教会“波兰化”。奥鲁尔卡决不是一个反对希特勒分子的人。1936年，他甚至出头驳斥过梵蒂冈关于但泽的希特勒分子迫害天主教会的声明。为了讨好法西斯分子，这位伯爵主教曾经替他们的暴行进行辩解。然而尽管如此，在此之后过了一年，法西斯分子却掀起了反对他的运动。教皇为了讨好希特勒分子，于1938年把奥鲁尔卡从但泽赶走，还取消了早先得到梵蒂冈赞同的在但泽组织波兰教区的方案。奥鲁尔卡的但泽主教一职，则任命希特勒分子所能接受的德国民族主义者斯普列特担任。

---

① 《大不列颠战争蓝皮书》，1939年，第246页。

57 此人是满脑袋沙文主义、死心塌地为希特勒效劳的德国天主教高级僧侣的典型代表。他把法西斯兽性的民族主义带进了他的宗教活动。到但泽上任后，卡尔·斯普列特主教在那里开展了反对波兰天主教徒的运动。他禁止在天主堂和作忏悔时使用波兰语，下令不仅从各天主堂而且从墓碑上撤除波兰的铭文。梵蒂冈在德国占领波兰时期还委任斯普列特负责赫明教区。

教皇于1939年5月提议召开的各大国梵蒂冈会议，想使在但泽和波兰走廊问题上对德国的让步合法化。这是牺牲波兰的新慕尼黑的准备工作。梵蒂冈通过驻华沙圣使凯尔特西对波兰政府施加压力，并且坚决主张向希特勒让步。

梵蒂冈在但泽问题上究竟执行了谁的政策呢？从已公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件和材料》中可以看出，英国的统治集团对波兰施加极大的压力，迫使它满足希特勒的要求。① 无论是张伯伦、或者是1938年7月接见过但泽法西斯头子弗尔斯特的丘吉尔，都为了与希特勒分子勾

① 参阅《工人日报》，伦敦，1939年，4月1、4、5日，5月3、4日，7月4日，8月7、17日。

结去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作斗争，即为了组织反苏战争而赞成牺牲波兰来满足德国的胃口。法国政府也促使波兰去满足希特勒的无耻要求。这两个政府根本没有打算履行其对波兰的义务。

德国驻伦敦大使迪克森报告了他们在1939年8月初同英国政府谈判缔结英德协定的情况。英国的代表、张伯伦的亲密合作者威尔逊在同迪克森会谈时确认："……随着英德协约的签订，英国的保障政策实际上将被废除。根据不侵犯的协定将保护波兰不受德国的侵犯，英国同德国签订协定能使英国在波兰问题上获得自由；这样一来，英国就完全摆脱了自己的义务。可以说，那时候波兰便单独地和德国面对面了"①。

庇护十二世步张伯伦和达拉第的后尘，当他 58 看到自己召开各大国梵蒂冈会议的计划已告失败，便开始极力设法使德国和波兰"直接谈判"，波兰与法西斯德国单独谈判，从而不得不接受它的一切强盗要求。

教皇劝说波兰驻梵蒂冈大使卡齐米尔·帕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件和材料》，第2卷，第220页。

普，要波兰政府开始与希特勒谈判并在但泽问题上让步。① 伦敦的《工人日报》在8月22日写道，教皇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昨天他的密使到达华沙，其使命是说服波兰政府在但泽问题上对德国让步。②

纽约的杂志《现代史料》月刊写道，柏林正式宣布，教皇的号召受到德国统治集团的热烈欢迎，他们把它解释为教皇承认德国对波兰的要求是正义的。③

英国《蓝皮书》里公布的远非完全的文件证实，教皇始终忠于慕尼黑路线。战争开始的前一天，8月31日，英国驻梵蒂冈大使奥斯本在给哈利法克斯的电报中报告，教皇向波德两国政府提出建议，希望它们"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加剧目前紧张局势的步骤"④；教皇竭力设法使德波两国"谈判"，而这种谈判将以满足德国的强盗要求为目的。

---

① 《工人日报》，伦敦，1939年8月19日，8月22日。
② 《工人日报》，1939年8月22日。
③ 《现代史料》月刊，纽约，1939年10月，第12页。
④ 《不列颠战争蓝皮书》，第242，246—248页。

这一次，离战争爆发只有几小时了，教皇指靠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呢？他向波兰和德国呼吁的副本分发给了英、法、意、美的大使（梵蒂冈与华盛顿没有外交关系，教皇把他的呼吁书通过西班牙大使转交美国）。哈利法克斯立即致电英国驻柏林大使和驻华沙大使，让他们向德国和波兰宣布："陛下政府决定支持教皇这一呼吁"[①]。

英国天主教徒、庇护十二世传记的作者报导说，教皇企图以他8月31日的照会使波德停止争 59 执，直到召开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比利时、荷兰、瑞士、美国和梵蒂冈的会议来解决争端。[②]梵蒂冈方面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按照希特勒的要求予以解决。

这样，直到最后关头，梵蒂冈仍然支持同法西斯大国勾结（用对它们的要求作最大让步的办法）和孤立苏联的张伯伦方针，即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慕尼黑方针。庇护十二世伙同张伯伦和达拉第使尽了一切力量，将波兰置于法西斯德国的铁蹄之下，并且鼓励德国的反苏强盗阴

① 《不列颠战争蓝皮书》第247—248页。

② Ch·兰金：《教皇言论集》，第81页。

谋。

梵蒂冈积极策动
反动派和战争势力

战争前夜，梵蒂冈千方百计协助法西斯主义势力在各地，特别是与苏联接壤的那些国家猖狂活动，这是准备反苏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3月23日，罗马尼亚在德国逼迫下签署了德罗经济“协定”。这是一个奴役性的协定：罗马尼亚经济的各个部门都置于德国监督之下①，罗马尼亚越来越陷入“轴心”列强的势力范围。与德国同时，梵蒂冈也对罗马尼亚显示出强烈的兴趣，并把它视作其反对苏联的前哨之一。5月3日，教皇接见了罗马尼亚外交部长，不久，又接见了财政部长。战争开始后，梵蒂冈越来越强烈地企图在罗马尼亚取得巩固的阵地。

1939年4月20日，教皇接见了到罗马与墨索里尼谈判的、以匈牙利总理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匈牙利当时已与“轴心”列强有着密切的联

---

① 参阅《真理报》，1939年3月25日。

系。

战争前夜，梵蒂冈也开始对立陶宛大感兴趣，它宣布立陶宛是“天主教的东方堡垒”。但教皇对3月22日德国侵占克莱彼达地区却根本不予抗议。他对立陶宛的“爱护”体现在设法利用它作为反苏的进攻基地上。战争爆发前几天，8月，梵蒂冈与立陶宛重新恢复了于1931年断绝的外交关系。①

梵蒂冈还积极参与法国反动资产阶级反对和平与各国人民安全的阴谋活动。它依靠有势力的天主教人物和报刊鼓励法国的亲法西斯势力赞成同希特勒缔约而反对与苏联缔约。

1939年7月5日，庇护十二世取消了他的前任在1926年对《法兰西行动报》(法西斯天主教保皇党“法兰西行动联盟”的机关报）所下的禁令。这是梵蒂冈与法国最反动的组织在断绝关系达十

① 1931年6月，立陶宛天主教政府与梵蒂冈断绝外交关系，将教皇圣使巴塔洛尼驱逐出立陶宛。其原因是梵蒂冈及其立陶宛的走狗(基督教民主党)搞阴谋，目的是强迫立陶宛放弃独立与波兰合并，以便为准备反苏战争的帝国主义者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根据地。

五年之久以后的和解行动。断交的原因之一是当时天主教保皇分子反对在梵蒂冈炮制的法德同盟计划(为了建立反苏的统一战线)。“法兰西行动联盟”对教皇的一切反苏计划都表示支持，但反对与德国缔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情况发生了变化：“法兰西行动联盟”和法国一切反动派一样，竭力颂扬慕尼黑①，并且热烈支持国际上一切反动派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的计划。“联盟”的首领夏尔·莫拉斯成了希特勒热忱的拥护者。他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收买，断然反对法苏协议。②为了酬谢这一点，红衣主教波德利亚尔（后为附敌分子）想方设法使莫拉斯选入法国科学院。教皇于7月5日取消了对他的报纸的禁令，以此对“法兰西行动联盟”的亲德方针表示满意。

为了阻碍成立有效的反侵略阵线，梵蒂冈在战争前夕还鼓动其他国家天主教组织的亲希特勒活动。在美国，希特勒的代理人、天主教神父柯

---

① 《现代史料》月刊，1939年3月。

② 《民族》，纽约，1943年5月22日。1945年，莫拉斯因战时与希特勒分子积极合作被判处终身监禁。

林领导的各法西斯组织加强排犹活动。①

梵蒂冈和天主教各级组织开展了疯狂的反共 61 反苏运动。教皇向国际天主教妇女大会（1939 年 4 月 14 日）的代表们发表演说时声称，天主教妇女组织的任务之一是促进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② 战争前夕，许多国家(法国、比利时、英国、加拿大等等）的天主教神职人员，遵照梵蒂冈的指示，举行了具有明显的反共性质的所谓“社会周”。

战争迫在眉睫之时，教皇和天主教各级组织坚决反对共产党人建议组织的与战争危险作斗争的统一战线。他们阻挠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共同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梵蒂冈就这样分

---

① “法西斯德国投降后，美军俘获了里哈德·扎列特，此人从1935 年至 1937 年曾担任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宣传专员，后来调到德国外交部。当司法部官员们审讯他的时候，他顺口供出说，1939 年，罗亚尔——奥克从事纳粹宣传的“广播神父”圣查理·柯林派遣“社会正义党”的商务副经理列奥·李顿到柏林去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磋商一系列问题。从司法部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扎列特安排了李顿同里宾特洛甫的会见”（Л·斯皮瓦克：《美国的拯救者》，国家外国书籍出版社，1949，第 28 页。）

② 《时代》，1939 年 4 月 15 日。

裂能够反抗希特勒侵略者的力量。

张伯伦的慕尼黑政策受到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和全体进步人士的坚决谴责。“英法两国代表在莫斯科谈判中的行为带有极大的挑拨性质，甚至在西方列强当权者阵营中也有人尖锐地批评过这种卑鄙的把戏”①。

广大人民群众(其中也包括天主教徒)反对梵蒂冈的反苏运动，反对它的亲希特勒的慕尼黑政策。劳动的天主教徒也和劳动的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新教徒等等一样，主张对战争贩子组织强大的反击，主张同苏维埃国家友好和结盟。下述例子颇能说明问题：1939年3月，慕尼黑以后，当事情已清楚表明张伯伦政府不愿同苏联一起为集体安全而斗争的时候，英国的民意研究所做了一个测验：英国和苏联的关系更为友好是否合乎你的愿望？民意测验得出下列结果：百分之八十四赞成与苏联更加友好，百分之七反对，而百分之九说他们没有固定的意见。一个月之后又做了62一次测验。这一次问题提得更加明确：你是否希

① 《历史的伪造者》，第44页。

望英国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百分之八十七赞成这种同盟，百分之七反对，而百分之六表示他们没有什么意见。

这次测验的材料之中，最有趣的莫过于有关威斯敏斯特隐修院——这个英国天主教中心的资料了。众所周知，英国的天主教首领们大多数具有特别的反苏情绪；然而在这个地区，参加民意测验的人百分之八十七表示赞成同苏联缔结积极有效的军事同盟。这说明，天主教首领们以及他们的报刊进行的反苏运动，对大多数天主教徒没有起作用。①

梵蒂冈和天主教的所有上层人物推行其慕尼黑政策，从而违反了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利益。

① «政治季刊»，伦敦，1941年，第4期，第354—355页。

第二章　梵蒂冈和西欧的战争

63

(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

梵蒂冈和德国进攻波兰

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在欧洲发动了战争，德军部队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两国参战。据美联社驻梵蒂冈多年的记者摩根说，尚在1939年8月中旬，教皇即已从其驻柏林圣使奥尔塞尼戈处获悉法西斯德国将要在9月1日进攻波兰①。

梵蒂冈作为一个领土只有弹丸之地、军队只有一百至一百五十人之众的小国家，当然已不能象当年的教皇国参加历代战争那样直接参加这次战争。但是梵蒂冈却有其政治能量：世界各国千

① Th·摩根，《听音哨》，第107—108页。

百万天主教徒把教皇当作宗教权威，对其训谕无不俯首听从。梵蒂冈同各国统治集团在政治上都有着牢固的联系。在政治上不能等闲视之的还有：梵蒂冈有庞大的宣传机器和庞大的间谍情报网。教皇、红衣主教和主教们的种种演说，其目的都是对信教的群众施加影响，在行动上和思想上左右他们的政治方向。因此，宗座的立场对于每个交战国来说完全不是无足轻重的，也是很自然的 64 了。

那么，当战争开始时，梵蒂冈又采取了什么立场呢？

梵蒂冈按照其一贯的、与慕尼黑分子的方针完全一致的总方针，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对德国部队入侵波兰一事保持沉默。对这一侵略行径，它一言不发，未加任何谴责。梵蒂冈继续奉行其一贯的反苏政策，即使是此时此刻，在战争发生以后，仍竭力设法怂恿各交战国的当权派互相谅解，一致对付苏联。

教皇对德国入侵波兰保持沉默一事，可以从当时身在罗马的《纽约时报》驻梵蒂冈记者、思想上亲梵蒂冈的天主教徒查费拉的著作中找到某种

解释。这位作者写道：教皇对德国未作谴责，因为他原本指望德波战争结束后，希特勒分子一定会建立一个波兰缓冲国①，根据教皇的如意算盘，这个傀儡政权依然是一道“反布尔什维主义的防疫线”。

整整一个月，教皇对德国进犯波兰一事一直保持沉默。他本来指望德国攫取波兰后战争一定很快就结束，张伯伦和达拉第就会同希特勒达成协议，以波兰人民的切身利益为代价，把战火引向苏联。

梵蒂冈事先知道有张伯伦和其他慕尼黑政策的推行者的这种计划，并在行动上同他们配合，这是无庸置疑的。有关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战争一开始后的政策，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在其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丝毫不用怀疑，他们实际上是在继续奉行慕尼黑政策。他们迫于形势，违反自己的意愿来帮助波兰……，他们准备以某种新的‘慕尼黑’来牺牲波兰……。”②

庇护十二世期待这个牺牲波兰的新勾结，在

① C·查费拉，《梵蒂冈与欧洲战争》，第192页。

② 转引自迈耶：《美国在劫难逃吗？》，96页

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对希特勒德国进攻波兰未加谴责。

在战争头几星期引起教皇不安的倒并不是德军部队入侵波兰。他和国际上的一切反动派都因苏德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而惶惶不可终日，都因"扩大战争的计划的破产，例如用把苏联"①这个在战争开始后严守中立的国家"拖入战争的办法来扩大战争的计划的破产"②而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合众社驻罗马的两位记者写道：教皇因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而"大为震惊"，在条约缔结后的第二天早晨，就两次接见不列颠帝国代办，接着又接见法国、意大利和波兰三国大使。③

教皇曾通过其驻德国的圣使奥尔塞尼戈抗议同苏联缔约一事，在文献中是有据可查的。④《罗马观察家报》和梵蒂冈电台曾攻击过苏德条约。⑤

①，②　维·莫洛托夫：《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1939年，第6页。

③　R·帕卡德和E·帕卡德：《阳台帝国》，纽约，1942年，第232—233页。

④　A·门赫坚：《梵蒂冈》，国家外国书籍出版社，1948年，第194页。

⑤　《世界新闻与展望》，伦敦，1940年，第10期。

以后，1940年2月1日，梵蒂冈电台在一篇反共的专门文告中声称：在1939年8月已很清楚“布尔什维主义已成为西方的新危险，”而按照梵蒂冈电台的判断，苏德条约就是一个信号，似乎可以证明上述论点①。

平日对希特勒唯命是从的德国天主教主教们，在战争发生的第一天便无条件地支持德帝国主义的军事计划，但是对苏德条约却持敌视态度②：主教们更乐于赞颂法西斯匪帮进军苏联，果然，法西斯匪帮于1941年6月真的这样干了。

苏联新闻局发行的历史事实考证《历史的伪造者》一书，令人信服地表明：同德国缔结条约本来并未包括在苏联对外政策的计划之内。但是，由于西方各国不愿在平等的基础上同苏联缔结反对德意侵略者的协定，于是，“……苏联政府才不得已作出自己的选择，即同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③。除此，苏联同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是因为同法国和英国的谈判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分

① 《国际新闻简报》，伦敦，1940年，第3期。

② 《新国际年鉴，1939年》，纽约，1940年，第318页。

③ 《历史的伪造者》，第53页。

歧，由于英法统治集团的过错，谈判未能成功。”①

斯大林同志在1941年7月德国背信弃义进攻苏联后曾指出：“我们在1939年同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后，便保证了我国获得一年半的和平及准备自己力量来回击敌人的可能，如果法西斯德国敢于冒险违反条约来进犯我国的话。因此这毫无疑义是我们赢了，而法西斯德国输了。”②

“斯大林同志及时识破了当时英法两国反苏阴谋的险恶居心。这就提供了可能，不仅推迟了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使我们祖国免受打击，而且使得事态朝着英美政府面临必须建立英、苏、美联盟的局面的方向发展，这符合一切爱好自由的各族人民的利益。”③

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统治集团由于他们组织反对苏联的战争的计划破产，由于苏联不顾他们的计划，利用苏德条约的缔结来巩固国防和更好

---

① 维·莫洛托夫：《关于批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39年，第13页。

②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1页。

③ 维·莫洛托夫：《斯大林和斯大林的领导》，1949年，第14页。

地准备自己的力量来对付可能发生的法西斯德国的进犯而感到恼火万分。因此他们极力歪曲苏德条约。梵蒂冈也因同样理由反对这一条约。

梵蒂冈对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重新并入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白俄罗斯更是暴跳如雷。

维·莫洛托夫在1939年9月17日广播演说中声明：由于波兰当时所出现的局势，庸碌无能的领导人拱手把波兰交给命运任意摆布，"波兰已成为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对苏联构成威胁的方便场所。苏联政府一直到最后时刻都严守中立。但有鉴于上述情况，它对此种局面不能再持中立态度。"① 维·莫洛托夫宣称："对于居住在波兰境内的，以前一直处于无权民族的地位，而现在完全被遗弃而使其听天由命的，与我们同族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命运"，苏联政府不能漠然视之。

67 1939年9月17日，苏军越过战前的苏波边境。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又重新归入苏联的版图。这一事件，也象不久以后苏联同波罗的海

① 维·莫洛托夫：《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8年9月17日广播演说》，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38年，第4页。

三国签订互助条约一事那样，引起了苏维埃国家的所有敌人恶毒的反苏运动。在此以前对希特勒德国部队侵占波兰一事一直保持沉默的梵蒂冈，现在开始说话了。它采取了耶稣会士惯用的恶毒中伤苏联的鬼蜮伎俩，散布有关被红军解放的地区情况的种种谣言，特别是有关“宗教迫害”的谣言，似乎苏联出兵后即开始了这种“迫害”[1]。对此心领神会的梵蒂冈报纸，日复一日地叫嚷，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重新并入苏联是“对天主教的一种威胁”。9月19日，英国电台广播说，教皇“对波兰这个天主教国家的命运，感到大为震惊。”可是应该指出的是，教皇对于希特勒的空军狂轰滥炸华沙，对于法西斯德国在波兰建立恐怖的占领制度却丝毫也不感到震惊。1939年9月24日，《罗马观察家报》写道：自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重新归并以后，由于新国境线的划定，“包围俄国的防疫线政策就遭到了彻底的破产。”这就使得梵蒂冈的大主教们气得发狂。于是世界各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也就遵照梵蒂冈的指令，变本加

---

① 《纽约时报》，1939年10月10日。

厉地号叫"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

《罗马观察家报》于1939年10月中旬发表了一篇述评，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宗教状况极尽造谣中伤之能事。这一点甚至连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时报》记者也不得不承认："毫无疑问，这篇述评是坐在这里（罗马）杜撰出来的"，"是得到教皇国务秘书处赞同的。"① 这家教皇报纸的编辑们根据梵蒂冈头子们的命令，昧着良心说谎，为了制造反苏舆论，胡说什么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解放地区有"宗教迫害"。

与此同时，梵蒂冈的官方人士却小心翼翼地避免发表任何会得罪希特勒德国的声明。

68 梵蒂冈的反苏活动并不限于在报纸上和广播中造谣中伤。1939年10月初，教皇照会英法两国政府，请求它们出面保护原先波兰领土上的"宗教自由"。而对德国却没有发出这样的照会。从这里可以看出，梵蒂冈力求英法两国政府发表声明抗议苏联，因为事情十分清楚，教皇照会这两个国家时，并没有期待这两国政府发表声明抗议正

---

① 见《纽约时报》，1939年10月18日。

在同他们交战的德国。教皇想要发动一次国际性的反苏示威。在对德关系方面，他对法西斯驻梵蒂冈大使冯·贝尔根拜会红衣主教国务卿马尔昂纳以及声言波兰德占区的“天主教徒的各种权利都将得到保障”[①]表示满意。但希特勒匪徒们对于自己的这个保证，却一天也没有遵守过，不过这并不妨碍梵蒂冈的主教们采取亲德立场。

有意思的是一则发自梵蒂冈的报道，谈到驻法圣使瓦列里在给教皇的有关法国政府对他的建议的答复的报告中写道，该国政府希望看到教皇在改善德国统治下的千百万天主教徒的处境问题上能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②]。这是一个极其清楚的暗示，说明教皇对波兰德占区所发生的事件保持沉默。

从战争开始之日起，德国法西斯占领者便在波兰境内开始实施它的一套惨无人性地灭绝波兰民族及其文化的强盗纲领。但与此同时，在苏联红军解放的地区，劳动人民却从地主和资本家的奴役中得到解放，在那里民族压迫已被消除。此外，

---

① 《纽约时报》，1939年10月12日。

② 《纽约时报》，1939年10月11日。

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其中包括实行宗教自由。

波兰红衣主教赫隆德收集了有关波兰被德军部队占领地区和苏军解放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情况的详细材料。在给教皇所作的报告中，赫隆德所列举的大量事实，都说明德国占领者在惨杀波兰居民，迫害宗教。赫隆德虽然是以敌视苏联著称，但他举不出一件事实可以证明苏军解放区中有宗教迫害或其他什么迫害，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实①。梵蒂冈虽然明知如此，却仍然散布虚构的苏军解放区宗教"迫害"的谎言，极力使英法两国政府出面，在外交上反对苏联。

这是因为梵蒂冈仍未放弃原先的反苏的"十字军远征"计划。

教皇不仅只找英法两国政府，而且还有参加"反共协定"的各缔约国，并向它们询问，它们是否认为该协定仍然有效。西班牙、意大利和匈牙利回答：它们都十分赞成这个"反共协定"继续存在下去。因此当时有消息说，教皇急于拼凑一个旨在

① 《在德国占领下的波兰对天主教的迫害》，伦敦，1941年；并见C·查费拉《梵蒂冈与欧洲战争》，第193—195页。

反对苏联的“宗教界反共联盟”①。教皇通过其驻西欧各国以及美国、日本、南非联邦等国的首都的代表去了解这些国家的政府是如何看待“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的，他用这个口号来吓唬资产阶级，极力纠集帝国主义阵营，企图组织一次反苏进军。

梵蒂冈进行反苏运动同资本主义世界最反动的势力惊人地齐心协力。这些人也象教皇一样，对未能将战火烧向苏联而大为不满。在这期间，意大利报刊反苏之声甚嚣尘上，特别是在苏军解放区的宗教情况方面大造谣言。意大利法西斯分子进行的反苏宣传是同梵蒂冈紧密配合的。②

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报刊也都遵照梵蒂冈的指令掀起反苏浪潮。比利时、英国、瑞士、西班牙、卢森堡、美国的天主教报纸都大肆叫嚣“苏联无神论的危险”。它们日复一日地刊登有关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宗教情况的捏造新闻。它们力图使人相信，似乎同宗教和教会有关的一切，在这些地区都已转入“权力无限”的无神论者协会手中，

---

① «纽约先驱论坛报»，1939 年 10 月 13 日。

② «纽约时报»，1939 年 11 月 10 日、11 日。

似乎这个协会“把无神论强加到”当地居民身上。惯于无中生有的教会报刊报道了神话般的消息，说什么似乎在这期间莫斯科正召开一个“全世界无神论者代表大会”等等，还刊登了伪造的无神论者协会的各种文告和号召。

70

这些“报道”没有一丝半毫真实之处。苏联当局在苏联新区彻底执行信教自由政策，并保证自由举行宗教仪式。

梵蒂冈和资产阶级报刊有关“宗教迫害”的诽谤运动是梵蒂冈和整个国际反动派反苏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期望把战火引向苏联之心不死。正因为如此，梵蒂冈对德国法西斯在波兰占领区所犯下的真实罪行保持沉默，却竭力唆使各国人民去反对苏维埃国家。

早在1939年9月17日，苏联政府即曾向全世界声明，“它准备采取一切措施，使波兰人民免于被不明智的领导人拖进一场不幸的战祸，并使他们有可能过和平生活。”① 众所周知，苏联已履行了它的这一义务，完全是依靠苏联，才从波兰

① 维·莫洛托夫：《1939年9月17日广播演说》，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39年，第4页。

清除了德国占领者，波兰人民才有可能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建设自己的生活。

而梵蒂冈的政策当时（同现在战后一样）却是为波兰人民的敌人服务的。

1920年被地主波兰所侵占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重新并入苏联，是建立反希特勒“东方战线”的需要，是“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西部国境建立防线，从而筑起阻挡德军部队向东长驱直入的壁垒”①的需要。修建这样一道壁垒也有利于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如果梵蒂冈同英、法、美的反动集团一鼻孔出气，攻击苏联的这一政策，那么这正好表明它妄图阻挠建立拦阻希特勒部队前进的壁垒。

庇护十二世关于战争的第一号通谕

梵蒂冈所打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它本以为德国攫取波兰后，定会建立一个能成为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新“防疫线”的波兰附庸国。但希特勒德国 71

① 《历史的伪造者》，第56页。

占领波兰后，却把它当作一个被征服的国家在那里发号施令。从波兰不断传出种种消息：法西斯恐怖盛行；大批屠杀波兰公民，首先是知识分子；毁灭波兰文化；宗教迫害残酷异常。梵蒂冈要想再以沉默来敷衍已不可能了，因为再沉默下去会使得它在天主教徒心目中声誉扫地。9 月 30 日，教皇接见以红衣主教赫隆德和波兰驻梵蒂冈大使为首的侨居罗马的波兰人。庇护十二世谈到由于战争人们不得不承受的苦难，谈到和平居民所遭受的灾祸，并表示深信天主决不会允许有人在波兰干预宗教仪式的举行①。

“当战火正旺之时，庇护十二世接见了居住在罗马的波侨代表。他们前来祈求圣父出面反对纳粹的野蛮暴行，即使是在道义上支持波兰人的反希特勒斗争也是好的。下面是教皇答复的原话：‘我并不奉劝你们收起眼泪，波兰不愿亡国。你们应该象你们土地上厚雪复盖下的花儿等待和煦的春风那样，相信祷告的力量，期待上天恩赐安宁时刻的到来。’

① 《纽约时报》，1939 年 10 月 1 日；《泰晤士报》，1939 年 10 月 1 日。

这就是圣父认为在‘世界上最信天主教的民族’患难期间需要对他们说的全部话”①。

庇护十二世不想谴责法西斯在波兰的强盗行径。这一点连资产阶级报刊也承认。例如，《纽约时报》记者对教皇的这番讲话作了广泛的阐述之后，以下面的几句话结束了他的报道：“其实，在梵蒂冈内部都断言说，教皇庇护十二世已下定决心严守中立，只过问宗教问题。作为教会方面的首脑，教皇特别强调‘该撒的物当归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②。这句话用在被德寇部队占领的波兰，没有别的意思，只能是劝告波兰人屈服于侵略者。

而在波兰国内，梵蒂冈则把赌注押在那些由于最仇恨苏联、对波兰的民主发展怕得要死因而准备同占领者妥协的反动集团身上。1939年10月，教皇承认了当时还在法国的流亡“政 72

① A·斯沃博达、A·图奇科娃、B·斯沃博达娃：《梵蒂冈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阴谋》，第49页。

② 《纽约时报》，1939年10月1日。

府"。①

梵蒂冈在波兰问题上的公然的亲德立场，使得宗座威信扫地。《罗马观察家报》有鉴于此，便在10月14日发表了一篇文章为教皇的立场辩解。这篇文章批评了许多报纸，因为它们说罗马教皇"对波兰的悲剧抱漠然视之的态度"。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罗马观察家报》承认教皇在9月30日接见波兰侨民时的那番话"是

① 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在整个战争期间奉行敌视苏联的政策。它是波兰反动派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体现者，是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体现者，深受英美反动集团的影响。这个"政府"竭力挑起波兰人同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之间的不和，千方百计阻碍在波兰建立反希特勒阵线，力图破坏反希特勒联盟营垒内部的团结。在这个"政府"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那些战前在波兰居于统治地位而在1939年事变中有罪的法西斯集团的代表人物。英国记者拉尔夫·帕克写道："……当时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代表人物，大部分都拚命在波兰的广大群众中灌输对苏联不信任的情绪。"（拉·帕克：《反和平的阴谋》，第64页）。在伦敦"政府"成员中，就有力主同希特勒分子妥协的人。苏联政府1943年4月25日照会中指出：伦敦波兰"政府"以其"讨好希特勒暴政"的政策，"对苏联进行了背信弃义的打击"；指出它已"滚到了同希特勒政府相勾结的邪路上去，实际上已经中断了同苏联的盟国关系，站到与苏联为敌的立场上去。"（《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对外政策》，第1卷，第347页）。

谨慎的，这是由于讲话者所处的崇高地位使之然。”同时认为在那番讲话里“并不缺乏悲天悯人之情。”《罗马观察家报》竭力使人相信，教皇为欧洲天主教徒所遭受的苦难而感到痛心，并对波兰的不幸“寄予同情”；但是该报却又写道：凡夫俗子总是根据自己个人的好恶来评论事件的是非曲直，然而需要的倒是“公正的权威”的“有分量的话”。而公正的权威，《罗马观察家报》让人相信，却似乎“只能是罗马教皇”。该报还“解释”说，应该记住，一般教徒以至于地区的主教可以表露于外的理所当然的或可以容忍的感情，是不能期待整个教会的首脑也同样表达①。

所有这一切“解释”只能证明教皇确实没有想谴责法西斯德国在波兰的罪恶政策。

1939 年 10 月 20 日，庇护十二世发布第一号通谕《至上的教皇职位》。自然，交战双方出于宣传的目的，都在通谕中竭力寻找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通谕的真实含意。由空泛词句堆砌而成的教皇通谕，也确是便于使人作随心所欲的解 73

① 引自《纽约时报》，1939 年 10 月 15 日。

释。它并未谴责战争的罪魁祸首，也未谴责希特勒分子在被占领的波兰所犯下的罪行。为了回避尖锐的政治问题，教皇宁可大谈其神学和道德。教皇认为，战争的原因在于世人信仰"种种错误的学说"，在于"反基督教运动的谬论增长"，在于"背离天主"；如果全部原因都在于世人的错误认识的话，那么，摆脱困境的出路自然就是从精神和宗教方面"重新教育人"了。这就是教皇所要求的。

然后，教皇就转而用法西斯分子的腔调扬言"可能，人类所遭受的灾难，是由于在物质上没有信心或利害之争所引起，是由于争取公平地分配财富所引起，而这些财富是天主赐给世人作为他们生存和进步的手段……"。综上所述，庇护十二世是用德国法西斯宣传的腔调，声称战争的根源在于"争取公平地分配财富"。

还有类似的"解释"，其目的都是掩盖战争的真正原因，为战犯开脱。

当然，谁也不会期待庇护十二世对战争的原因有什么正确的解释，但是不能不指出，在他的第一号通谕中所作的"分析"，是为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分子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辩解。

教皇在通谕的第二部分批评了那样一些人：他们不承认"戒命"，把世俗的权力置于天主的权力之上，认为最高权力应属国家。解释通谕的资产阶级评论者认为这些话，是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谴责。实际上，即使是教皇的这一番声明也是有意炮制得含糊其辞的。庇护十二世在事实上并不想去批评法西斯德国及其同盟者，这一点可以用教皇在同一通谕中对法西斯意大利和墨索里尼的赞赏来证明。"我们由衷地高兴，在这一告全世界基督教徒的第一号通谕中，我们能把我们可爱的意大利，这个我们信仰的忠诚的维护者置于这些国家民族之首。"众所周知，意大利是法西斯德国的盟友，"轴心国"的成员。庇护十二世对希特勒的意大利盟友大加赞美，也就表明那种认为他的通谕的一定的段落，似乎是针对法西斯主义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教皇的声明对法西斯分子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教会以自己的说教帮助了国家，它劝人们要尊重和服从世俗政权，因为这种政权似乎是天主确立的，劝人们"该撒的物当归该撒"。这一声明同时也是说给被占领的波兰、捷克、奥地利的天主教徒听的，因此在那样的条件

74

下，也只是表示号召对德占领者所建立的制度要逆来顺受。

庇护十二世在自己的通谕中断言，用尘世的力量去结束战争毫无结果，因此就应该“心向教会……应该祈求”和平。

教皇的这一声明，也有利于希特勒党徒及其在英、法、美的同伙们，因为教皇号召各国人民不要起来反对战争，不要反对那些组织战争并竭力使之进一步扩大的人们，而是号召他们驯服地等待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彼此之间达成协议。

关于庇护十二世的这一通谕，《纽约时报》前驻罗马记者在他的一本书中写道：“事情变得一清二楚了，庇护十二世不会超出抽象地批评法西斯理论及同时号召祈祷和遵守基督教的原则这样一个范围。全世界都大失所望，许多人都以为教会应该参加斗争，但是庇护十二世却并没有这样想……当基督教最大的宗教力量承认灾难，但却又不想同其作斗争时，普通的世俗人士就只能是大失所望。”①

---

① Н·马修斯：《法西斯主义之果》，纽约，1943年，第266－267页。

写这段文字的是一个对教皇毫无恶感之嫌的作者。通谕的政治倾向性是如此明显地符合“轴心”列强，甚至连亲梵蒂冈的作者们，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也都得承认这一点。

各资产阶级国家反动报刊和天主教组织所进行的反苏运动也利用了这份通谕。它那模棱两可的论点，声言灾害的根源在于“使基督失却尊严”，教皇对革命的攻击——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被用来攻击苏联。我们的敌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所广为利用的既有教皇的这一言论，也有他的其他言论。

根据梵蒂冈的传统，教皇当选后的第一号通谕往往是他整个在位期间的政纲。在战争一开始就发布的庇护十二世第一号通谕，证明教皇将力图回避尖锐的问题，不去批评战争贩子，证明他将要在中立的伪装下竭力去建立一个反苏的统一战线。这不仅对法西斯德国有利，而且也同英、法、美三国统治集团的目标相吻合，因为他们企图牺牲苏联的利益奉行与法西斯德国妥协的慕尼[75]黑政策。

通谕也证明梵蒂冈打算通过战争来巩固自己

的阵地。教皇在通谕中一再着重坚持只有在天主教教会传布的“理想”的基础上，在它的影响增长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持久和平。这一思想，在几天后接见新任大使加伊季时他又再次重申①。

因苏芬战争爆发梵蒂冈掀起的反苏运动

梵蒂冈把实现慕尼黑分子的计划的希望寄托在因苏芬关系而发生的事件上。天主教教会的首脑（口头上的“和平使者”）同国际上的一切反动派一起，狂热地力图把苏芬战争转变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反对苏联的战争。

苏联政府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努力寻求同芬兰政府之间的共同语言。维·莫洛托夫声明说：“公正的人们应当承认，曾同爱沙尼亚谈判过的，保障苏联，特别是保障列宁格勒安全的那些问题，正是现在同芬兰谈判的问题。可以说，在某些方面安全问题对于苏联来说，在这里甚至更为尖锐。因为重要性仅次于莫斯科的苏维埃国家的城市列

① 《泰晤士报》，1939年11月11日；《国际新闻简报》，1938年11月18日。

宁格勒与芬兰边境相距总共只有三十二公里。这意味着列宁格勒与另一个国家边境的距离比起现代化远程炮的射程更短。另一方面，通往列宁格勒的海路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芬兰对苏联的立场是敌对的还是友好的，因为芬兰湾沿岸的整个北部和芬兰湾中部所有沿海岛屿都属于芬兰。"①

维·米·莫洛托夫又说："我们在同芬兰谈判时所提出的建议是最大限度谦让的，并且只限于为保障苏联安全和调整同芬兰的友好关系所必不可少的起码条件。"② 芬兰的统治集团同法西斯德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得到了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他们不想同苏联达成协议。"虽然苏联政府同意满足芬方的正当利益，但是芬兰政府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了苏联政府为了保障苏联安全，特别是保障列宁格勒的安全的各种友善的建议。"③

芬兰在苏芬边境上的敌对行动和寻衅，挑起

① 维·莫洛托夫：《关于苏联的对外政策》，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39年，第12—13页。

② 《关于苏联的对外政策》，第14页。

③ 《历史的伪造者》，第58—59页。

了同苏联的战争。在苏联新闻局发布的历史事实考证《历史的伪造者》一书中，揭露了英、法两国政府扮演鼓励芬兰统治集团执行反苏政策的可耻角色。虽然亲希特勒的芬兰统治集团所作所为有利于法西斯德国，而德国又同英、法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但英、法两国却仍然以军火和飞机帮助芬兰，并准备派遣远征军。对苏联的刻骨仇恨和发动反苏战争的迫切愿望在他们心中占了上风，压倒了所有一切其他想法，压倒了本国的利益。

维·莫洛托夫说："……在芬兰发生的战争并不是简单地同芬兰部队发生冲突。不是的，这里事情更要复杂一些。这里所发生的冲突，并不简简单单只是我们的部队同芬兰部队的冲突，而是同包括英、法等等在内的一系列国家的帝国主义者的联合势力的冲突。这些国家以各种各样的武器，特别是飞机和大炮、以他们冒充'志愿军'的人员、以他们的黄金和军需物资、以他们在全世界掀起的各式各样鼓吹反苏战争的狂热宣传来帮助芬兰资产阶级。对此还应该作一点补充：在苏联的形形色色的敌人的疯狂叫嚣声中，一直显得刺耳的是所有第二国际的那些出卖灵魂的'社会

主义者'……所有那些艾德礼、勃鲁姆、西特林和儒奥之流、英特拉梅尔和赫德伦之流——那些最后终于把自己出卖给战争贩子的资本的走狗们的尖叫的声音。"①

在苏联的形形色色的敌人和战争贩子们的共同的叫嚣声中，起劲呐喊的也有天主教会的头[77]子、天主教的主教们和天主教报刊。在这个问题上，梵蒂冈的政策也是完全有利于希特勒德国的，也是同处心积虑要发动一场反苏战争的英、法、美三国统治集团的计划不谋而合的。梵蒂冈和法西斯意大利在借芬兰事件诬蔑苏联方面，尤其惊人地齐心协力。

还在苏芬之间进行谈判解决争端的时候，《罗马观察家报》就出头对苏联作了挑衅性的攻击，并呼吁芬兰不要同意苏联的旨在和平解决各项问题的建议。梵蒂冈担心这样解决问题会加强苏联的力量。伦敦《泰晤士报》刊登的 1939 年 10 月 13 日罗马来电说，苏联影响的增长和扩大不符合梵蒂冈的目标，这一点是《罗马观察家报》所直言不讳

① 维·莫洛托夫：《关于苏联的对外政策》，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39 年，第 14 页。

的[1]。

在1939年12月24日的传统的圣诞节文告中，教皇一再诬蔑苏联，并断言芬兰是“侵略的牺牲品”。

在那些日子里，《罗马观察家报》接连发表了由该报主编执笔撰写的一组反苏文章。教皇向其驻国外使节和天主教的所有主教发出指示，就战争问题组织全面的反苏运动。在英、美、意、法各国，天主教僧侣按照梵蒂冈的指令大张旗鼓地掀起了反对苏联和“保卫芬兰”的运动。英国的天主教教会头面人物、威斯敏斯特大主教在其1939年12月的一篇文告中甚至还断言，在与苏芬战争有关的种种事件中，存在着一种“消灭基督教的企图”。这位大主教呼吁“支持为争取正义的胜利而开始的斗争”。正巧就在这个时候，张伯伦政府把军火和金钱送到芬兰去，并准备派去远征军。威斯敏斯特红衣主教大主教作为张伯伦的传声筒出面说话。在得到威斯敏斯特红衣主教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赞许和神圣化了的英国顽固派的反苏运动

---

① 《泰晤士报》，1939年10月13日、14日；《纽约时报》，1939年10月13日。

中，也有工党领袖的积极参加。

执行挑衅性的反苏政策的不但有英国政府，而且还有法国政府。它所关心的并不是给巴黎门口的希特勒军队以反击，而是想要把战火引向苏联。同法国最反动的(其中包括天主教)集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将军们，如戴高乐、魏冈和甘末林等，都考虑过远征列宁格勒以及高加索的计划①。

美国的反苏集团则成立了一个以苏联凶狠敌人、反动透顶的胡佛为头子的"援助芬兰委员会"。1939 年 12 月，美国借给芬兰一千万美元的贷款，并协同英、法两国统治集团积极参予反苏阴谋。美国反动派的疯狂劲头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注意到美国资本家也象英国资本家一样，妄想借希特勒分子之手窒息苏联。此外，他们还把自己的魔爪伸向了芬兰的自然资源。他们当然不愿意让苏联和这个国家之间建立友好的关系。

---

① 《历史的伪造者》，第 62－63 页；莫·多列士：《人民的儿子》，国家外国书籍出版社，1950 年，第 132 页；A·伍姆塞：《戴高乐及其同谋》，1948 年，国家外国书籍出版社，第 178 页。

掀起广泛的反苏运动的还有法西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报刊。墨索里尼和佛朗哥号召组织反苏"十字军远征"。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同梵蒂冈密切配合的。据英文版的战争大事记所载，墨索里尼指望"在成立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战线方面得到梵蒂冈的可贵的支持。对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起到鼓励作用的是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前夕的教皇致红衣主教团的文告，也许，更重要的是教皇庇护十二世12月到克维里纳里斯王宫的访问。"①

为了表示对芬兰的反动派及其反苏政策的支持，教皇于1939年12月通过宗座代牧主教罗登给芬兰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②。

"因姑息和怂恿日、德、意侵略者而声誉扫地的国际联盟秉承英、法两国头子们的旨意，顺从地通过了反苏决议，把苏联"开除"出国联进行示威。"③《罗马观察家报》同所有的反动报刊一鼻孔

① V·巴特利特和G·威廉斯主编《1939年的战争》，第3卷，伦敦，1940年，第159页。

② 《现代史料》，1940年2月，第55页；《国际新闻简报》，1940年，第1期。

③ 《历史的伪造者》，第60页。

出气，于1939年12月初也曾要求把苏联开除出国联。

帝国主义者在苏芬战争问题上掀起反苏运动的目的，在著名的文件《历史的伪造者》中已充分揭露："当时英、法两国统治者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正在全力进行，在英、法两国的总参谋部正热衷于制订进攻苏联的计划。这些老爷先生们妄想用发动一场反对苏联的战争来代替同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但是，这些计划是注定不能实现的。芬兰在这个时候已被苏军部队打得落花流水，被迫投降，尽管英、法两国竭尽全力来阻挡它投降，也无济于事。"①

庇护十二世伙同英、美、法三国的统治阶级处心积虑要建立一个帝国主义列强的统一战线，以便发动反苏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正如下面所述的那样，他对苏芬战争的结束如此耿耿于怀和大失所望。他同反动势力的其他头子都对他们反苏计划的落空深感不满。

任何一个反对苏联的行动，都受到梵蒂冈的

① 《历史的伪造者》第62—63页。

赞许和欢迎。维·莫洛托夫在1939年10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报告时说到了苏联和土耳其之间的谈判情况。在这次谈判中，“谈的是缔结一项只涉及黑海和海峡地区的双边互助条约。”苏联认为，它“必须得到保证：由于战争迫在眉睫，土耳其不应让非黑海国家的军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黑海。”① 由于土耳其方面的责任，谈判没有达到缔结条约的目的。战争贩子对谈判的这种结局感到高兴。在这个问题上，法西斯意大利和梵蒂冈特别一致。罗马报道说，意大利和梵蒂冈都认为苏土谈判的失败会成为近东“布尔什维主义扩张的障碍”。《罗马观察家报》对同法西斯德国关系密切的土耳其统治者百般赞扬，因为有了他们苏土谈判才未成功。②

80 德国天主教僧侣对希特勒战争计划的支持

梵蒂冈在战争一开始就奉行既同“轴心国”利益完全一致，也同英、法、美三国内最富有侵略

① 维·莫洛托夫：《关于苏联的对外政策》，第17页。

② 《纽约先驱论坛报》，1939年10月19日。

性的反苏集团的计划完全合拍的方针，同时却又迫不得已把自己伪装起来，因为它不得不考虑到世界各地千千万万的人们对法西斯强盗的仇恨，不得不照顾到首先受到希特勒军队打击的千千万万的波兰天主教徒。因此，梵蒂冈一面帮了希特勒匪徒的忙，一面却喋喋不休地大谈自己“严守中立”。但是真情是掩盖不住的。

美国通讯社合众社驻罗马记者在他们的一本书中报道了如下一个事实。战争发生数天之后，教皇庇护十二世就接见了各个国家的一百五十名天主教徒，其中有五十名是穿军服的德国士兵，有关接见的情况，登载在《罗马观察家报》上。合众社有一名记者向美国发回一则电讯，报道此事。英国和奥地利的天主教徒立即对这一报道提出抗议，认为这是一个弥天大谎，因为他们不愿意相信教皇会接见他们的敌人——纳粹士兵。合众社因为受到抗议和责难，便建议其驻罗马记者更正自己的报道。于是该记者便询及教皇国务秘书处的一位头面人物蒙蒂尼主教，后者证实了《罗马观察家报》上所载有关教皇接见德国士兵的报道。他感到不安的只是此事竟引起非梵蒂冈所愿的国

际反应①。

从此以后，盟国和中立国天主教徒的抗议就迫使梵蒂冈不那么露骨地表示自己的亲德之情。

梵蒂冈大造自己"中立"的舆论。对希特勒军队进攻波兰一事始终一言不发的教皇，有时也出面发表一通极其模棱两可的声明，这样的声明你愿意的话总是可以解释为对德国暴行的谴责。有时，梵蒂冈的电台和报刊也偶而提及波兰境内的宗教迫害和德国同罗马教廷所订的条约遭到破坏。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丝毫不意味着梵蒂冈反对法西斯德国的强盗政策。梵蒂冈的主教们采取发表有关波兰境内的宗教迫害的声明这种手段，其目的无非是要同德国的统治集团讨价还价，想要他们在教会问题上作些让步罢了。在梵蒂冈发表的种种言论文章中也曾含糊其词地谈到"偶象崇拜"，但这也可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反苏的天主教人士便把这种言论解释为针对民主和共产主义）。在战争的整个期间内，在教皇的言论、梵蒂冈电台广播和报刊文章中，从未对法西斯主

① R·帕卡德和E·帕卡德：《阳台帝国》，第227页。

义和希特勒德国及其同盟者的所有敌视人类的政策作过任何谴责。

梵蒂冈赞同在希特勒面前卑躬屈节（正象1914年在威廉二世面前卑躬屈节那样）的德国天主教主教们的立场。德国天主教的主教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便声称他们无条件地支持德帝国主义的计划。他们不只是为希特勒德国所发动的战争大唱赞歌，而且还把整个教会机器开动起来为战争服务①。

在战争刚一开始，德国的天主教主教团就发表告教徒书，号召他们，首先是士兵要服从“元首”，准备牺牲。作为希特勒的走狗和同盟者，德国天主教（还有新教）的主教们号召人民“热忱祈祷”“上帝和天命”为希特勒送来胜利②。希特勒

① 为战争和希特勒德国的战争罪行大唱赞歌，并为法西斯制度尽忠效劳的德国新教界人士也持类似的立场。1939年福音派教会出版的供战时用的祈祷书祈求上帝降福于“为争取我国荣誉、自由和生存空间”的战争，降福于德国的“陆上、海上和空中”的武装力量，最后还祈求降福于“上帝派来的元首”。（见«柏林日报»——1950年12月22日）。

② 见天主教刊物«美好的未来»，维也纳，第3/4号，1939年10月15日。

的掠夺战争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主教们宣布为“正义之战”了。他们中几乎所有人在当时就在自己的教区里向教徒发布与此精神相同的特别文告。布雷斯劳大主教红衣主教贝尔特拉姆要德国士兵相信，为德帝国主义效劳“同信仰上帝的基督精神是一致的”。在各占领区杀害千千万万的人们（妇孺老幼）的凶手德国军官和士兵们，事先就得到了精通法西斯宣传家语言的主教们的祝福。

德国的天主教书刊上登载过一些文章，鼓吹一个士兵要是为德帝国主义者的利益牺牲自己，据说他就是“为基督”而献出生命。德国的一些神学杂志，说希特勒的强盗口号“争夺生存空间”合82乎“上帝亲自赋予自然界的正当权利。”①

天主教报纸和杂志同所有法西斯报刊一起，蛊惑人心地“谴责”金融寡头政治、“唯利是图”和资本主义，竭力使人相信，希特勒德国正在“为基督的正义和爱人的原则战胜一切金融寡头制度和资本主义”而战②。“战争是一个培育爱人之人的大学校”，谁在这场战争中献出自己的生命，谁

---

① 《讲经学及其应用月刊》，符茨堡、1940年，第6期。

② 《讲经学及其应用月刊》，符茨堡、1940年，第6期。

就是以基督为榜样而献身，有一家供僧侣阅读的天主教杂志就是这样说的①。

根据主教们的指示，整个德国天主教会在战争期间自始至终进行着可耻的军事沙文主义宣传，在德国背信弃义地进攻苏联以后，教会更是特别卖力地为战争大唱赞歌。正当秘密警察把许多神父和成千上万的普通天主教徒同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以及一切民主分子一起投入集中营的时候，主教们却把教堂的讲台变成了戈培尔宣传部的一个部门。如果说在战争进程中还有个别德国主教偶而也羞羞答答地批评政府几句，那并不是批评战争，也不是批评按照这个政府的指使在占领区所犯的罪行，而是批评政府的宗教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批评者"们坚持说，有碍于德国取得胜利。

德国主教们在宗教沙文主义方面表现得如此忠心耿耿，要是没有梵蒂冈及其驻德代表——圣使奥尔塞尼戈点头是不可能的。这位教皇圣使在德国天主教集团中颇有势力，在充当德国教会人

① «讲经学及其应用月刊»第 4 期

士、梵蒂冈和希特勒政府之间的中间人方面表现出了充沛的精力。

1939年10月末，奥尔塞尼戈按照梵蒂冈的命令就希特勒分子在波兰的宗教迫害一事提出"抗议"。数天之后，他就去梵蒂冈，并带着教皇的新训令返回柏林，进行改善关系的谈判。报刊报道，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这位教皇圣使拜访德国外交部不下六次。

梵蒂冈就波兰境内宗教迫害一事所提出的抗议是虚伪的，因为他们既然千方百计讨好屠杀教徒的刽子手——希特勒分子，就不可能保卫波兰。83就是在奥尔塞尼戈"抗议"波兰境内宗教迫害的那几天，教皇委托他向希特勒表示祝贺，因为他在慕尼黑法西斯党部大楼遇到炸弹爆炸时得以幸免。

《罗马观察家报》利用这个机会对共产主义发起新的攻击。它号召交战双方都不要忘记还存在"共产主义的危险"。①

1939年12月，德国主教团作了人事调动。各个最重要的讲坛都由以亲法西斯著称的主教们

① 《纽约时报》，1939年11月2日。

来把持。亲法西斯分子贝尔宁被任命为柏林主教①。按照宗教条约规定，主教团的人事调动必须得到梵蒂冈同意。

梵蒂冈一心要在教会在德国的地位这个问题上，消除战前即出现的同希特勒政府之间的分歧。战争开始以来，教皇即急于缔结一项有关在德国人占领的波兰境内教会的地位的协定。谈判在1939年末和1940年初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梵蒂冈表示愿意接受希特勒分子的要求，不惜破坏波兰同教廷所订的条约，使波兰各教区都听命于德国教会。德国法西斯分子斯普莱特被任命为赫明教区主教。格涅兹诺—波兹南大主教区则由德国人布赖廷格尔把持。梵蒂冈即安插这些希特勒的代理人充当波兰各教区的头目，这也就承认了德国对波兰的侵占和征服②。

---

① 《纽约时报》，1939年12月18日。

② 1945年9月，波兰共和国政府声明：梵蒂冈1940年任命德国人为波兰各教区主教是对1925年教廷同波兰签订的宗教条约的破坏，因此这种做法已使该约失去效力。《罗马观察家报》为此辩解说，当时梵蒂冈似乎屈服于德国压力，只是任命了几个人临时去管理波兰各教区（《每日镜报》，1945年9月29日）。这样一来，好象用任命几个人去“管理各教区”一说便可改变任命希特勒代理人霸占波兰各教区的讲坛这一事实似的。

梵蒂冈同法西斯意大利联盟的巩固

欧战爆发之后，梵蒂冈同“轴心国”的另一个伙计(法西斯意大利)之间，就在敌视苏联这个共同的基础上形成了特别密切的心心相印的关系。

法西斯意大利在侵吞阿尔巴尼亚以后，梦想攫取新的地盘，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因此对苏联影响的增强极感不安。意大利报刊的反苏运动、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的嚎叫，对芬兰白党的军事援助——所有这一切，都是墨索里尼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伦敦一家杂志《世界新闻与展望》1939年11月写道：意大利急于建立一个在它庇护下的巴尔干国家联盟。意大利报刊曾写道：意大利想要成为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保证”[①]。

《消息报》写道：“意帝国主义的目的同和平任务风马牛不相及。只需要指出一点便够了：它把它在巴尔干地区的奔波同对苏联的歇斯底里的攻

① 《世界新闻与展望》，1939年，第54期。

击配合在一起。"①

当战争开始以后，意大利即声称，它不会是"交战的一方"，但与此同时它却准备打仗。意大利帝国主义分子同法西斯德国休戚相关。"意大利法西斯在同更为强大的希特勒德国所结成的'联盟'中，迫不得已地满足于在德帝国主义的大赌博中只是扮演一名普通小卒子的角色，没有任何可能表现主动性和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②

意大利的参战只是时间问题。意大利法西斯执政者们在准备战争的同时，竭力巩固自己的后方。在这方面，梵蒂冈对他们帮了大忙。梵蒂冈根据墨索里尼政府的要求，还在战争刚一开始时便改组了意大利天主教的群众性组织"天主教行动会"。庇护十二世从红衣主教中选派数人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订该组织的新章程。1938年9月，新章程得到批准。从表面上来看"天主教行动会"好象是摆脱政治，只应为会员的"宗教需要服务"，但实际上新会章却使该组织彻头彻尾法西

① 《消息报》，1940年2月8日。

② Э·塞雷尼：《意大利农业问题》，国家外国书籍出版社，1949年，第40页。

斯化。会员过问政治的确受到禁止，如果所过问的不是法西斯政治的话。对“天主教行动会”会员的要求是支持法西斯制度。法西斯分子被安插到该会各种组织担任领导职务，以便于法西斯党进行控制，而该会各组织的全部活动则由主教来负责。与此同时，“天主教行动会”的青年组织则被解散，以此加强法西斯青年组织。梵蒂冈按意大利政府要求所进行的这种改组天主教群众性组织的目的，是使其更好地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

对苏联的刻骨仇恨这一共同点，早已使庇护十二世同墨索里尼亲近起来。英文版的战争大事记中写道，梵蒂冈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重归苏联问题上所奉行的反苏政策得到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好评①。

“墨索里尼不参予欧战以及他的反苏政策使教皇感到满意，因此，教会和国家关系日益亲密。”② 1939 年 11 月，意大利政府任命以亲德著称的前教育宗教大臣阿尔菲埃里为驻梵蒂冈大使。12 月 7 日，教皇接见这位大使时声称，他指

① 《1939 年的战争》，第 4 卷，伦敦，第 249 页。

② 《新国际年鉴，1939 年》，第 390 页。

望意大利支持他的政策。①

12月21日教皇接见意大利国王和12月28日教皇对国王的回访，也是梵蒂冈同意大利法西斯团结一致的表示。在接见国王时教皇对意大利国王和墨索里尼的"高瞻远瞩的领导"所采取的立场表示赞赏。教皇声明他深信意大利在争取持久和平的……斗争中能起主导作用。庇护十二世的这一声明当然是骗人的，因为法西斯意大利("轴心国"的参加者)根本没有为争取"持久和平"而斗争，而是准备参战。

12月28日，庇护十二世在克维利纳里斯宫受到意大利国王的隆重接待，在座的有意大利外相齐亚诺和梵蒂冈国务卿马尔昂纳红衣主教。庇护十二世在致词中赞扬了意大利王室，谈到了意大利和梵蒂冈之间的友谊。世界各国报刊都把这两次访问解释作是教皇赞同法西斯意大利的反苏政策的一种表现。例如法国资产阶级报刊指出："这两个罗马之间的协议的基础是反共斗

① 《纽约时报》，1939年12月8日；《教皇言论集》，第222—223页。

争"①。当时，教皇还授给齐亚诺伯爵(意大利外相、墨索里尼的女婿)以梵蒂冈的"金马刺勋章"。马尔昂纳在祝贺齐亚诺得到勋章时声称，授勋是由于他"为和平作出了努力"。对于准备参战的法86西斯意大利来说，散播它"酷爱和平"的谎言是大有好处的。

但是，希特勒承认，战争一开始，德意两国之间"就今后的措施问题统一了思想"。他还承认，德国从意大利的"中立"得到了"说不尽的好处"，因为意大利"一开始就牵制了"德国的敌人的巨大兵力②。

1940年2月13日，梵蒂冈电台满意地指出，罗马正在隆重地庆祝一年一度的拉特兰条约纪念日(1929年梵蒂冈和墨索里尼之间签订条约的纪念日)。这成了大肆吹捧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制度的新借口。

梵蒂冈赞成意大利在英、法同德国交战时守中立。在这个问题上它同美国统治集团一鼻孔出

① R·加罗迪：《教会、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徒》，巴黎，1949年，第72页。

② 《真理报》，1940年7月21日。

气。梵蒂冈一直希望交战双方议和并建立反苏统一战线。意大利要是同英法两国作战，势必会推迟这一前景。除此而外，同样重要的是，梵蒂冈清楚地了解意大利国情，知道它未做好战争准备[①]，知道法西斯制度并不巩固。在那里人们都明白，意大利一旦战败，法西斯制度就会崩溃。因此梵蒂冈一直竭力使意大利不参战。1940 年春，当事态已变得十分明显：法西斯意大利不久即将参战，站在德国一方，这时，梵蒂冈和意大利之间的关系曾一度紧张过。但是意大利一参战，合作关系又立即恢复了起来。在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以后，这种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了。

教皇的"和平条件"

希特勒德国在侵占和奴役波兰以后，本想在西欧结束战争，以便调动军队征服苏联。

---

① "战争开始时，意大利总共只有三个所谓的机械化师，但是这三个师却连一辆机械化的坦克也没有……空军无论是在飞机的数量上还是在作战性能方面也都占末位"。（M·埃尔科利：《反希特勒德国战争中的意大利》，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4 年，第 44 页。）

"由于波兰领导人的彻底垮台，德国同波兰之间的战争很快便结束了。众所周知，无论是英国的还是法国的保证人，都没有对波兰进行帮助。到目前为止，其实，谁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保证'……，已经开始的德国同英法联盟之间的战争，现在还正处于第一阶段，尚未真正展开"。①

正是在这个时候，正当同英、法两国的战争尚未真正展开之际，希特勒德国声称准备缔结和约，条件是承认它对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领土的侵占，归还德国殖民地并保证它在欧洲的霸权。

希特勒急于结束西欧战争以便开始对付苏联，这完全符合英、法、美三国统治集团的目的，也符合教皇和梵蒂冈主教们的计划。

关于"调解争端"的原因，庇护十二世在10月18日接见立陶宛驻梵蒂冈公使时曾直言不讳地说起过。教皇声称他无意卷入"纯世俗的争执"和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之争，但是作为最高牧师，"当拯

① 维·莫洛托夫：《关于苏联的对外政策》，第4页。

救灵魂的事业面临日益增长的新危险"的时候，当"天主的敌人日甚一日地威胁我们的时候，"据说他是不能"不闻不问的"。①

《纽约时报》驻梵蒂冈记者就这番话写道：教皇所说的"天主的敌人"指的就是苏联。要是认为教皇所指的也有德国，则未免太主观了②。说教皇的这番话是针对苏联而发的，还有他对立陶宛的评价为证，他认为立陶宛是"天主教北方的前哨"，是"基督教在包围着它的无神论面前的一个堡垒"③。这个"北方的前哨"，作为对付苏维埃国家的一个据点，为梵蒂冈以及苏联一切其他敌人所需要。伦敦《泰晤士报》在解释教皇的这番话时写道：不久以前苏联在欧洲势力的扩大"使得教皇深为不安，于是最神圣的宗座就通过其驻各国使节进行试探，以便采取大规模的防御措施来对付共产主义的活动。"④

因此，教皇在1939年末和1940年初的"调

① 《教皇的和平图案》，纽约，1944年。

② 《纽约时报》，1939年10月19日。

③ 《消息报》，1940年1月22日。

④ 《泰晤士报》，1939年10月19日。

解争端"的目的就是使交战双方缔结"和约"，以便
88将来发动反苏战争和镇压国际工人运动。庇护十
二世把自己的反动计划用"保护基督传统"的号召
掩饰起来(正如以前的教皇多次所做的那样)。

庇护十二世知道交战双方都在探求缔结和约的可能性，他希望能使这方面的谈判进行得顺利一些，于是便把圣诞节文告的重点放在"和平纲领"上①。教皇的"五项和平条件"被天主教的主教们和报刊当作一个似乎是能指出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一切纠纷的正当途径的文件来大吹大播。

在天主教书报以及整个资产阶级书报中受到如此吹捧的教皇的"五项和平条件"，实际上同和平的利益毫不相干，首先是因为这些条件根本避而不谈如何达到和平以及谁能保障公正的和平等等问题。在教皇"五条"中谈到的有大小民族的生存权和独立权问题，有各族人民摆脱军备的负担问题，有建立国际性法规以保证条约的履行问题，有满足各民族的各种正当要求的问题以及"在基

① G·戈内拉：《需要重建的世界》，密尔沃基，1944年，第294—296页；O·查费拉：《梵蒂冈与欧洲战争》第18章；《教皇言论集》，第224—236页。

督教理想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的问题。

教皇和平号召的虚伪性首先在于他所谓的和平就是张伯伦和希特勒的互相勾结。教皇向希特勒和张伯伦提出了“五项和平条件”。他散播幻想，似乎希特勒或张伯伦为了各国人民的利益能真正缔结民主和约。庇护十二世呼吁在“基督教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而这些原则要求保存和巩固产生法西斯和战争的帝国主义制度。德国法西斯报刊阐述教皇的“五项和平条件”（特别是第一和第四条）时，用来证明法西斯德国的强盗计划合情合理，因为照法西斯分子的说教，德国似乎是在为争取“生存和独立”，争取满足自身的“正当要求”而斗争。

教皇的“五项和平条件”打算促使交战双方易于勾结起来共同行动，以反对苏联。对这一点梦寐以求的不只是“轴心国”和梵蒂冈，而且还有英、法、美三国的统治集团。

庇护十二世发表其“和平计划”的圣诞节文告后的第二天，即1939年12月25日，他就将这一 89 朝思暮想的目的公诸于世了。他在接见红衣主教

团时声称："让我们结束这场兄弟相残的战争，同心协力来反对公敌——无神论。"① 没有别的解释，庇护十二世指的就是建立一个帝国主义的反苏统一战线；这就是他的"和平条件"的真正目的！

庇护十二世想使交战双方勾结起来，结成统一战线来反对苏联，为此，他特别寄希望于美国统治集团。他在圣诞节文告中用以下的话来表示他对美国总统决定派遣自己的私人代表去梵蒂冈一事的态度："对我们来说，不可能再有比这更愉快的消息了。"

美国总统代表在梵蒂冈

美国资产阶级花了数十亿金元复活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

在苏联新闻局的一本历史事实考证中写道："不要忘记，希特勒侵略的首要前提便是复兴和更新德国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而此事之所以可能，只是由于美利坚合众国统治集团给予了直接而广

① R·加罗迪：《教会、共产主义与基督教徒》第 65 页；《思想》，巴黎，1949 年，第 27 期，第 41—42 页。

泛的财政支援。"①

同德国垄断组织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美帝国主义，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也通过"中立"国家同希特勒分子合作。

理查德·萨苏利写道："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下，德国工业大规模地更新和现代化，国家的整个经济走上了轨道，准备恢复军工生产……"②。这位作者又写道："英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一样，同他们亲自帮助重新武装起来的敌人作战。"③

美国的反动集团帮助蒂森家族、克虏伯家族、施罗德家族以及德国垄断资本的其他代表人物扶植希特勒上台，把他看作是摆脱"共产主义威胁"的救世主。

在帮助希特勒上台执政的那批美国反动分子中，有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944年10月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克洛德·佩珀声言：约·福·杜

---

① 《历史的伪造者》，第13页。

② 理·萨苏利：《И·Г·法本工业托拉斯》，国家外国书籍出版社，1948年，第106页。

③ 《И·Г·法本工业托拉斯》，第42页。

勒斯是帮助希特勒上台执政的人物中的一个，“因为正是通过杜勒斯商行和施罗德银行领取他开始国际强盗生涯一步一步向上爬所必需的金钱。”①

美国前驻柏林（1933—1938年）大使多德也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过美国银行家及其代表约·福·杜勒斯同法西斯德国统治集团之间的联系。

多德指出，杜勒斯所代表的几家美国银行，到1933年年底就已给德国十亿美元的贷款②。

美国垄断资本家同张伯伦集团的英法帝国主义者一样，对希特勒侵略势力会向苏联进攻抱有希望。许多美国的外交界人士和政治活动家也都在这方面进行工作。例如，苏联最凶恶的敌人之一，极端反动的美国反动派代表人物，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布利特，早在战争爆发很久以前就已从事这种活动。1936年12月，多德在日记中写道：人们都断言，布利特已成为纳粹的信徒，现在正在为建立法德联盟而奔走③。布利特致力于

---

① 迈耶：《美国在劫难逃吗？》第38页。

② 《多德大使日记》，纽约，1941年，第62、74页。

③ 《多德大使日记》，第372页。

建立一个反苏的法德联盟。同他一起忙于拼凑反苏阵线的还有亲法西斯政客前总统胡佛、希特勒的走卒林白和天主教神父柯林以及美帝国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得到那些在美国制造“舆论”的人们——大通讯社的老板和反动报纸的发行人的全力支持。臭名远扬的黄色报刊“大王”赫斯特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狂热地顶礼膜拜，1934年，他曾受到希特勒的接见。他在自己的出版物中刊载吹捧法西斯头子们的文章。

战争前夜，美国统治集团支持过打算把德国侵略势力指向苏联的张伯伦和达拉第计划。当战争已经在欧洲开始时，他们同张伯伦一起都急于把战车扭转过来反对苏联。美国的反动集团把苏芬战争当作诽谤攻击苏联的一个新口实。美国银行老板向芬兰提供金钱。在美国成立的以胡佛为 91 头子的“援助芬兰委员会”大肆开展反苏活动。

反动记者沃尔特·李普曼更是直言不讳地把苏联在美国的敌人们的计划和盘托出。他写道：“问题不在于德国的国界或者是波兰的国界，或者是捷克的国界应该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于在欧洲

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扩张的边界线将在什么地方。”李普曼接着又写道：主要的问题在于“德国是否会回到西方国家的大家庭里来”，希特勒分子会不会在欧洲筑起一道“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壁垒”来①。

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希特勒侵略的新计划和欧战有转化为世界大战的危险而感到惊慌不安。他们批评希特勒德国的头子们并不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遭到摧残，并不是因为波兰境内到处一片恐怖景象。美国资产阶级报刊写道：如果希特勒分子迫不得已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撤走，那么就会掀起这些国家的革命高潮，这是美国统治阶级所最害怕的。因此，他们认为希特勒分子侵吞捷克和波兰是合法的。他们指责希特勒分子只是因为德国未同苏联开仗，只是因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写道——法西斯德国“破坏了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壁垒”。他们呼吁法西斯分子同张伯伦一起“保卫西方”，也即是同他联合起来向苏联进军。

---

① 《纽约先驱论坛报》，1939年10月12日。

另一名美国的希特勒信徒罗伊·霍华德在当时也写道:“希特勒要是能象攻入波兰那样轻而易举地攻入苏联该多好呀，那会立即得到全世界其他各国的赞同，而不是反对”。①

美国共产党报纸在揭露战争贩子的这一阴谋时曾写道:

“华尔街想在一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可怖的世界大战中扮演领导角色的强烈愿望正在与日俱增。”②

在这期间，美国形形色色的反动组织也都展开了卑鄙的反苏宣传。在它们中间，天主教组织是卖了不少力气的。美国有势力的亲法西斯工业界正在极力设法促使美国政府出面充当希特勒和张伯伦之间的调解人。报刊上报道，瑞典最大实业家、戈林的朋友和仇苏分子文内尔·格林在美国开展宣传，要美国政府帮助希特勒结束战争③。

所有这些苏联的敌人都欢迎庇护十二世的虚

① 转引自《工人日报》，1939年12月29日，纽约。

② 《工人日报》，1939年11月6日。

③ 《公众舆论季刊》，1946年，第333—334页；A·鲁特：《战争秘史》，第1卷，纽约，1945年，第626页。

伪的“调解争端”，欢迎他致力于使交战双方和解，以便发动反苏战争。

在这场“奇特的战争”进行的几个月期间内（从地主波兰亡国直到1940年春季战事在西欧更加扩大这一段时期），美国外交界一直同梵蒂冈密切合作，以达到这些共同的反动目的。对于美国的统治集团来说，同天主教会的首脑合作，是一种掩盖其真实意图的最好形式，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对和平的关心”、“人类的利益”之类笃信宗教的词藻做伪装。

“中立的”梵蒂冈方面也竭力依靠美国，依靠这一资本主义营垒中没有直接参战，但却能对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施加巨大影响的重大力量。

早在1936年，梵蒂冈国务卿帕切利即曾作美国之行，竭力设法同这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梵蒂冈在搞这些阴谋诡计时是依靠美国有势力的神职人员。帕切利离开美国以后，他所开始的谈判，由芝加哥红衣主教蒙代兰代表梵蒂冈来进行。1938年年底，他被罗斯福总统接见。他对总统说明，美国同梵蒂冈之间的外交关系一旦建立，对双方会是何等有利。例如，在谈判时曾提

到，美国政府如果同梵蒂冈建立联系，就一定能有世界各国供给梵蒂冈的大量情报可兹利用①。

美国当权派对这一主意持肯定态度。1938年11月，蒙代兰为了继续谈判一事赴梵蒂冈。②

93

1939年3月，举行庇护十二世的加冕礼时，有美国官方代表驻英大使肯尼迪参加。据报刊报道，他利用此次梵蒂冈之行继续谈判有关建立外交关系事宜。谈判也在华盛顿通过教皇派美特使大主教奇科尼亚尼进行。1939年6月，红衣主教恩里科·哈斯帕里赴华盛顿继续谈判，由纽约区大主教斯佩尔曼协助。

为了对美国统治集团施加压力，以加速有关

---

① Th·摩根：《听音哨》，第116—125页。

早在战前，梵蒂冈同美国的大资本代表人物，特别是同摩根财团就已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38年初，庇护十一世曾授给美国银行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和托马斯·拉蒙特梵蒂冈的最高勋章。《工人日报》就此事评论道，教皇甚至连天主教徒也不常常授勋；至于授给非天主教徒梵蒂冈勋章则更为罕见。而无论是摩根还是拉蒙特——摩根财团的头子都不是天主教徒。（《工人日报》，纽约，1938年3月10日）。

② 《曼彻斯特卫报》，1938年11月7日。

建交问题的解决，梵蒂冈决定在美国资产阶级面前显示一下天主教的力量，以提醒他们：天主教会是资产阶级“秩序”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可靠支柱。这一点，教皇在两份告美国书：“告美国天主教神职人员书”(1939 年 11 月 1 日)和“告华盛顿天主教大学书”(1939 年 11 月 13 日)中付诸实施。庇护十二世在“告美国天主教神职人员书”中，一开始就列举天主教在美国的实力，他指出了教区、教育机关、教堂、学校等的数目，特别提到了传教活动的规模之大，而且着重指出在黑人中间活动的传教士团的任务。教皇声言，美国天主教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深深渗透进政治中去，掌握学校、艺术、科学和出版事业。

教皇在内容广泛的“告美国天主教神职人员书”中，只字未提当时几乎已经席卷全欧的战争，因为教皇当时竭力设法使交战双方为了它们的共同目标（同苏维埃国家进行战争）而实现和解。因此在他的这个文告中，种种转移人们对战争贩子的义愤的说教占了很大篇幅，似乎“当今灾难”的原因是世人“忘了天主”。在各种“灾难”中，教皇说到的既有“摩登的奇装异服”，也有离婚案件，

唯独只字未提法西斯。

当话题转到比较棘手的各种问题上来时，庇护十二世便把道德家的腔调一变，用美国银行老板和垄断资本家辩护士的语言来说话了。他向被资本主义剥削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美国劳动人民说道，你们命中注定要充当资本家的奴隶，这是天主亲手为你们安排的。因此，你们要知足，并因受剥削而感到幸福。在教皇的文告中说："各个时代的历史都教导我们，过去一直都有穷人和富人之分，以后也将一直会有穷人和富人之分。这就是我们从人类本性的各种始终不变的特点中所作出的结论。"

为了"安慰"千百万注定要遭贫困和饥饿之灾的劳动人民，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庇护十二世在同一文告中又写道："穷人在天主那里占有受人尊敬的地位。向他们许下进入天国的诺言。他们更容易得到神奇的恩赐而致富。而富人——如果他们是公道正直的人的话——只不过是上帝赐给尘世的物品的管理者……" 接着教皇再次重复说："天主在他至高无上地支配着我们的命运时就确定：要使尘世上有穷人和富人之分，以便更 94

好地考验我们的人格。"①

天主教会首脑就是用这个有关"一千个美国人"的权力和财产起源于天主所赐的宣言来向美国资产阶级表白：教会维护他们的财产和利益。

教皇知道，美国有千千万万的工人信天主教，他们对于教皇宣称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杜邦家族等等的资本和权力是"受之于天主"，以及大多数美国人的赤贫如洗也同样"受之于天主"一说，不会有丝毫热情。教皇知道，类似这样的声明会引起人们，甚至是笃信天主教的教徒对教会的不信任。因此，他在将百万富翁的统治权神圣化的同时，虚伪地呼吁他们对"穷人"要"公道"。

在11月13日"致华盛顿天主教大学书"（纪念五十周年校庆）中，教皇再一次地向美国统治阶级表示，他和他的教会组织对于他们同共产主义的斗争是何等的有用。②

为了同美国当权派取得更为密切的联系，教皇于1939年10月设立了以美国首都华盛顿为中

① 《教皇言论集》，纽约，1940年，第198—215页

② 《教皇言论集》，纽约，1940年，第216—217页。

心的华盛顿大主教辖区。[1]两个月以后，为了巩固同美国军阀的联系，他又任命效忠于他的一个主教、善于随机应变的政客、工人运动不共戴天的仇敌和法西斯分子的朋友、纽约区大主教斯佩尔曼为美国全军天主教首脑。

已经在欧洲开始的战争加速了梵蒂冈和美国建交问题的解决。按美国宪法规定，教会与政府是分家的。为了避开宪法的这一规定，同时也为了不向国会提出为驻梵蒂冈使馆拨款的问题以免引起可能发生的新教派的反对，美国政府同梵蒂 95 冈之间便建立了另一种形式的正式关系，即往梵蒂冈派出"总统私人代表"。

1939年12月23日，罗斯福总统通过斯佩尔曼给教皇去了一封信，通知他向梵蒂冈派遣私人代表的决定。总统还把此信付本以及他对所采取的步骤所作的辩解送交美国新教和犹太教会领导人[2]。

12月25日，教皇在华盛顿的特使奇科尼亚

① 《纽约先驱论坛报》，1939年10月12日。

②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汇编》，第2卷，波士顿，1940年，第367—369页。

尼说，罗斯福的信件梵蒂冈已收到，此信给教皇“带来了极大的喜悦”。特使接着又写道：教皇保证，总统代表泰勒将在梵蒂冈受到大使规格的热情接待①。

1940年1月7日，罗斯福收到教皇复信。教皇说，总统的信为他带来“许多欢乐和希望”。他表示对“新旧大陆之间团结一致”反对“带有侵略性的和带来死亡的无神论和反基督精神的潮流“感到满意”。② 当然，梵蒂冈的主教们在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希特勒德国，因为他们正是想与它结成联盟来反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苏联。

迈伦·泰勒属于统治美国的“一千个美国人”之列。他同摩根财团有联系，是美国钢铁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就其政治观点而言，他属于亲法西斯集团，美国一位政论家塞尔德斯称他为“墨索里尼的帮凶和法西斯主义的吹鼓手”③。

---

①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汇编》，第2卷，第371—372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汇编》，第2卷，第374页。

③ D·塞尔德斯：《一千个美国人》，国家外国书籍出版社，1948年，第294页。

早在庇护十二世（即欧金尼奥·帕切利）访美（1936年）时，泰勒即已同他结识，这位梵蒂冈使节当年就曾作过泰勒的座上客。①

对泰勒的这一任命，引起了美国非天主教的各宗教组织的抗议，但是这些抗议到头来都毫无结果。

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写道：任命泰勒常驻梵蒂冈使人想起英国“在几个星期以前也派特使至梵蒂冈。英国特使曾建议教皇为组织一次世界性反苏战争祝福。在这场战争中同盟国列强将同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的军国主义者联合起来进行反对苏联的‘神圣进军’。美国人民必须时刻警惕着，泰勒在梵蒂冈的使命同哈利法克斯的罪恶计划有没有什么关系。”②

1940年2月25日，泰勒抵罗马，两天后即受到教皇的隆重接待。《罗马观察家报》就泰勒抵达一事兴高采烈地谈到梵蒂冈同美国的接近，谈到在世界上所形成的令人不安的条件下；他们“进

---

① Th·摩根：《长靴上的马刺》，纽约，1941年，第244页。

② 《工人日报》，纽约，1939年12月28日。

行合作警戒已刻不容缓。"①

"总统私人代表"泰勒在梵蒂冈处于大使的地位并同国务院发生联系。同他一道同时抵达罗马的还有美国付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

1939年冬至1940年各帝国主义企图勾结时梵蒂冈所扮演的角色

德国在侵吞波兰以后准备缔结和约（更准确地说是订立停战协定），条件是承认它对奥地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采取成立听命于德国的小附庸国的形式）、归还德国殖民地、承认它在欧洲的霸主地位。法西斯德国打算用这样的"和约"来保障它不费吹灰之力得来的猎物，并且使它可以放开双手来发动一场旨在侵占苏联领土和奴役苏联各族人民的新的战争。这就是德帝国主义欧洲政策的主要目标。早在1934年联共(布）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同志已经指出，在德国，特别是在希特勒分子上台执政以后，"'新'政

① 《纽约时报》，1940年2月17日。

策日益占上风，这种政策大体上与过去德皇的政策相似，他曾经占领过乌克兰、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变为根据地进攻过列宁格勒。”①

1940年国际事件述评（1941年美国出版）中说，1940年初，来自德国的谣言到处传播，似乎德国人准备缔结和约。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在 97 西欧和约迅速缔结的情况下，德国可能撕毁苏德条约②。

希特勒政府对有关它愿意缔结和约的说法表示确有此意，它想了解自己对手的意图。为此目的，它充分地利用了梵蒂冈的帮助。

而英法两国统治阶级也准备结束战争，以便继续推行慕尼黑政策，促使德国同苏联发生冲突。他们惶恐不安地看着苏联日益强盛。张伯伦政府也象希特勒政府那样，企图通过“中立国”的渠道来弄清同德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和条件。

关于英帝国主义在战争第一阶段时所奉行的政策，英国共产党领导人帕姆·杜德是这样写的：

---

① 约·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11版，第463页。

② W·谢泼德森·W·斯克罗格斯：《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40年》，纽约，1941年，第9页。

“英国的外交家和战略家所指望的是两个方面。第一，按照英国二百年来的一贯政策，在第一阶段他们在大陆上的盟军将承受战争的主要打击，而这时英国便能用最新式的技术彻底更新其部队的装备，以便在其他国家打得精疲力尽时，它可以胜利地干预战争。第二，他们（或者，更确切地说，英国部分当权派）指望对德国所施加的压力能迅速奏效，使德国改变政策，使那些同他们保持有密切接触的资本主义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如蒂森之流、弗立契之流等等的‘温和派’在德国内部取得胜利，以便可能在经过一场精心策划的有限战争之后，迅速达成协议，并‘拨转指示箭头’把战火引向苏联。这两个计划是相辅相成的。对他们来说，最有利的情况是第二个计划成功。那时，重新装备的部队便可以立即用来对付苏联。”①

1939 年 10 月初到 1940 年 4 月，双方进行秘密谈判，讨论在西欧停战以便在东方继续战争的98条件。梵蒂冈就是这个反苏阴谋的中心之一。许

① «共产国际»，1941 年第 2 期。

多作者都指出，关于德国人的"和平计划"最先是1940年初从梵蒂冈传出来的[①]。

伦敦的一家英国死硬派杂志《十九世纪以来》写道：德国人在积极进行争取缔结和约的运动，在这方面他们百般利用天主教教会各种组织和梵蒂冈，竭力取得梵蒂冈对德国"和平计划"的支持，而这个计划的目的首先是认可德国所侵占的领土。这家杂志写道："纳粹的天主教代理人好多个月以来就一直竭力要使天主教界，主要是中立国的社会舆论相信，这种'和约'是必要的。"[②]

"中立"的梵蒂冈已成为反苏阴谋的中心，而这一阴谋是披着"为争取和平而奋斗"的外衣的。美国付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的赴欧使命，特别是访问教皇的使命，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计划有关。伦敦《世界新闻与展望》杂志指出，他此行使

① W·鲁特：《战争秘史》，第1卷，第626页；W·谢泼德森：《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40年》，第18页。有关1940年初法国和希特勒德国当权派之间的秘密谈判，让·卡塔拉在他的《他们出卖和平》一书（莫斯科，1950年，第36—37页）中也有过报道。

② 《十九世纪以来》，伦敦，1940年4月，第398页。

命同美国资产阶级的反苏方针有联系①。

韦尔斯先同齐亚诺和墨索里尼谈判，接着从罗马到德国同希特勒、戈林、里宾特洛甫、魏茨泽克、赫斯会谈。他在一本书中写道，当时他在希特勒面前提出了有关德国议和条件的问题。以后韦尔斯又从德国到巴黎和伦敦，又从伦敦返回巴黎和罗马。在他访问欧洲各国首都期间，里宾特洛甫抵达罗马。他们两人在不同的时间里受到教皇的接见。有关他自己和泰勒同教皇所进行的谈判，韦尔斯涉及甚少，他只说梵蒂冈在国际问题方面消息灵通，有谙练的外交家，教皇本人便是其中之一。韦尔斯认为他不能透露他在梵蒂冈所进行的谈判的性质，但是通过谈判他确信梵蒂冈是“建设性力量之一”②。

所说的梵蒂冈的“建设性”活动是什么，尽管韦尔斯未肯谈及，但还是可以从报刊上透露出来的那些消息中得到了解的。当欧洲还在进行战争的时候，韦尔斯到那里去绝非是为了对欧洲各国

① 《世界新闻与展望》，1940 年 3 月 2 日。

② 萨·韦尔斯：《关键时刻》，纽约，1944 年，第 142—143 页。

负领导职责的政治活动家进行礼节性的访问，他同教皇举行谈判，也并不是要考考庇护十二世的外交才干。

《罗马观察家报》1940年2月26日写道：韦尔斯的访问不能看成是“学院式的”，因为现在并不是对问题作学院式研究的时候。该报强调说，冬季战事的暂时平静很快就要结束，而且“很有可能，冲突的第一个回合将是最后的一个回合”。教皇的报纸又写道：“每个人都懂得，欧洲和平问题已经不再是仅仅限于谈判了”；不管怎么说，现在是认清欧洲当前局势的最合适的时机①。

美国政府表面上奉行“中立”政策，实际上却一心想要在交战国双方之间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在需要的时刻能迫使它们接受媾和条件。而且，美国统治集团（正象英法两国统治集团那样）决不认为战争的目标是消灭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美帝国主义者百分之百地赞同英法两国进行的“奇特战争”的政策。他们赞成继续推行慕尼黑政策。韦尔斯的使命是要达到保证美国在各交战国

① 转引自《世界新闻简报》，1940年3月9日和《纽约时报》，1940年2月27日。

谈判时起决定性作用的目的①。

报刊上曾指出过，希特勒把德国的议和条件通知韦尔斯，虽然有关此事并未作过任何正式声明，但是德国的这些条件都"通过梵蒂冈的渠道"公之于众②。

美国政府急于通过其代表泰勒和韦尔斯预先取得教皇在"和平"谈判时对它的支持。

当时，里宾特洛甫也在和教皇谈判。他的罗马之行同韦尔斯在欧洲的使命有关，因为法西斯德国这一方面也急于设法取得教皇在"和平"谈判时对德国要求的支持③。伦敦《十九世纪以来》杂志在1940年4月号中写道：里宾特洛甫同教皇的谈判与德国的扩张主义计划有关系，德国想要借助于梵蒂冈和天主教会来实现其争取"生存空间"的纲领，即肯定它所侵占的领土属于它。该杂志又写道，德国竭力使梵蒂冈支持它的"和平"计

100

① 有关韦尔斯的使命，详见N·别格洛夫：《韦尔斯赴欧使命》，载《历史问题》，1949年第6期。

② 《1939年的战争》，第3卷，1940年，第166—167页。

③ 《1940年年鉴》，伦敦，1941年，第167页；R·帕卡德和E·帕卡德《阴台帝国》第115页。

划①。这位希特勒的部长知道，用提及法西斯德国在反布尔什维主义斗争中的“功劳”，最易取得“圣父”对自己的好感。天主教书报指出，里宾特洛甫曾向教皇保证：尽管有1939年的德苏条约，希特勒德国仍然是苏联的仇敌，而希特勒制度已“拯救天主教会和德国不受布尔什维克的侵犯。”②

正如书报中所记载的，里宾特洛甫曾向教皇保证，德国现在仍然是敌视苏联的，并且准备在相应的时机参加教皇组织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即反苏的十字军③。

希特勒和庇护十二世观点一致，可顺便举下列事实为证。里宾特洛甫离开罗马的第二天，希特勒即致电教皇，祝贺他的加冕纪念日。

英国政府这方面也在寻求梵蒂冈的支持，力求利用梵蒂冈的“渠道”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为此目的，向梵蒂冈派出了伯明翰天主教区主教格

① 《十九世纪以来》，1940年4月号，第397页。

② O·兰金的一篇文章，载《教皇言论集》，第100页；《泰晤士报》，1940年3月12日。

③ G·萨尔维米尼，G·拉·皮阿纳：《如何对待意大利》，第123—124页。

里芬，2 月 16 日，《纽约时报》记者从罗马报道，教皇在密室里接见了格里芬，他来此负有秘密使命，向教皇详细陈述英帝国政府在战争方面同梵蒂冈的观点不一致的立场。该报报道说，教皇委托格里芬向英政府转达他对当前欧洲局势的意见。除此，庇护十二世明确表示，梵蒂冈决不认为法西斯德国的可能失败对欧洲会有什么好处。与此同时，他向格里芬声称，天主教徒有义务效忠于本国的世俗当局①。这就意味着，教皇仍然忠于同法西斯德国之间的结盟，他从教会的“政权神授”的教义出发，要求英国的天主教徒效忠于张伯伦，101 德国的天主教徒则应忠心耿耿地为希特勒效劳。梵蒂冈的“中立”只不过是表现在它为交战营垒双方的天主教徒互相残杀而祝福。

值得指出的是《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根据格里芬的看法，要是意大利发动反苏战争，该是多么的好啊。

综上所述，梵蒂冈主张满足法西斯德国的要求，因为它认为德国是反共堡垒。但是它还竭力

① 《纽约时报》，1940 年 2 月 16 日。

为那些根据希特勒计划必须划归德国治下的国家中的天主教会争取一定的自由保证。在根本问题上梵蒂冈同法西斯德国是一致的，并且急于要结束西欧的战争。

梵蒂冈暗中参加了有关结束西欧战事以便策划反苏战争的秘密谈判，但表面上教皇保持“中立”。教皇一面用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其他各国人民的利益来同英、法、美三国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同时在另一方面却为了掩人耳目对波兰“表示关心”。梵蒂冈电台开始不时报道波兰境内德国人迫害僧侣和教徒的消息。梵蒂冈就是想用这种手段来一箭双雕，不仅可以向德国政府讨价还价，取得对方的一定的让步，而且可以掩饰自己的亲希特勒的真面目：全世界天主教徒都一定以为教皇庇护着被占领国家的天主教徒。

当然，有关波兰境内宗教迫害的广播并不妨碍梵蒂冈秘密同希特勒政府进行谈判。教皇驻柏林圣使奥尔塞尼戈也“抗议”波兰境内的宗教迫害，但与此同时，他却又受教皇的嘱托，在同德国政府进行的有关停战条件的谈判中充当掮

客[①]。波兰境内的宗教迫害同这一谈判的进程直接相关，这一问题，在梵蒂冈时而被提出来，时而又被遗忘。例如，在里宾特洛甫同教皇会谈以后，梵蒂冈电台在一个时期内不再提起有关波兰的问题，因为在这次会谈中，这位希特勒的专使向教皇保证法西斯德国与苏联为敌[②]。

梵蒂冈对苏芬战争结束的不满

结束西欧战争的谈判，在梵蒂冈的积极参预下正秘密进行的时候，教皇和天主教神职人员的102反苏反共的宣传也加紧了。梵蒂冈电台又重新开始广播捏造的有关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情况的新闻，[③]并以“共产主义的威胁”来吓唬人。2月1日，该台进行反共专题广播说，西班牙内战以后，本来可以认为共产主义已经遭到“致命打击”，但是，事情却并非如此：布尔什维主义又成了“新

① 《纽约时报》，1940年2月16、17日。

② G·萨尔维米尼，G·拉·皮阿纳：《如何对待意大利》，第123页。

③ 《1939—1940年战争日志》，第1卷，第70页。

危险”。梵蒂冈电台用所有苏联死敌所惯用的卑劣的诽谤手法来“评论”苏芬战争和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重归苏联。广播最后武断地说，似乎苏联在“颠覆”英国、法国、墨西哥、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政府”。①

梵蒂冈就用这种手段呼吁交战国双方结成一条反对“共同危险”的统一战线。甚至在资产阶级书报中也指出，对苏联的仇恨决定了教皇的全部政策，“对于梵蒂冈来说，共产主义的俄国仍然是可怕的、主要的敌人。”②

参加梵蒂冈反苏运动的还有英国、瑞士、比利时、卢森堡以及其他国家的天主教报刊。

梵蒂冈希望正在继续进行的苏芬战争会引起英、法、美三国的军事干涉，并且在“保护芬兰”的借口下结成一个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军事同盟。

梵蒂冈知道，张伯伦和达拉第政府正在准备出兵芬兰。“圣父”们催促战争贩子们反对苏联。1940年2月6日，《罗马观察家报》写道：如果芬兰得到了“实际的援助”（即军队的援助），

① 《国际新闻简报》，1940年，第3期。

② 《1939年的战争》，第3卷，第250页。

那么红军就会被击溃。庇护十二世的这家报纸还扬言，“一切反共国家”都对苏联的失败感到兴趣。①

2月17日，《罗马观察家报》发表了付主编古·戈内拉的文章。②他咬牙切齿地攻击苏联，103呼吁“欧洲”“有效地团结起来”，援助芬兰。他写道：“芬兰所需要的不只是供救死扶伤之用的医疗器材药品，而且还需要能接替牺牲者的有生力量。”③戈内拉向资产阶级列强呼吁，要它们立即发动反苏战争。这并非是这个野心勃勃的有势力的梵蒂冈官员战争贩子个人的意见，这是梵蒂冈的立场，而且首先是庇护十二世的立场。

1940年3月12日，苏芬条约签订。“红军作为第一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通过完全现代化的工事构成的广阔巩固的设防地带为自己开辟了道路的军队，不仅粉碎了‘曼纳海姆防线’，从而获得荣誉，红军同红海军一起不仅摧毁了准备用来

① 《国际新闻简报》，1940年，第4期。

② 古伊多·戈内拉，意大利天主教（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之一。1947年参加反动的亲美的德·加斯佩里内阁任教育部长。

③ 《纽约时报》，1940年11月18日。

进攻列宁格勒的芬兰军事基地，而且使得某些国家精心炮制的反苏计划落空。”[1]

苏芬战争的结束，使得梵蒂冈主教们暴跳如雷。一向就尽力使人相信“为和平奋斗”是自己使命的天主教会的领导人们，当苏联和芬兰之间签订和约时，却大失所望，怒不可遏。还在缔约前夕，《罗马观察家报》就出头反对和谈，缔约的第二天，它又出来对苏芬条约进行诽谤性的攻击。[2]甚至连资产阶级作者也指出梵蒂冈因战争结束而感到心如刀割。1940 年美国对外政策述评中写道：“苏芬战争结束了，但苏联的胜利，在罗马既没有给法西斯上层集团，也没有给梵蒂冈带来欢欣。”[3] 3 月 18 日，教皇专门接见了芬兰前总统斯文胡伍德。这也不能不看作是同芬兰反苏集团同心同德的一种表示。

维·莫洛托夫在 1940 年 3 月 29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六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英国首相张伯

---

① 维·莫洛托夫：《苏联政府的对外政策》，第 8 页，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0 年。

② 《新苏黎世报》，1940年 3 月 14 日。

③ W·谢泼德森：《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40 年》第 17 页。

伦3月19日在下院演说中“对未能阻挡芬兰境内战争的结束一事，表示了不怀好意的遗憾。这倒104反而使得他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了‘热爱和平’的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①

共产国际“五一”号召书中写道：“战争贩子们凶相毕露，这是因为他们在芬兰的挑衅受到了挫折，也是因为光荣的红军拔除了他们长期准备的反苏战争的桥头堡。他们气得发疯，因为苏联同芬兰缔结和约揭露了英法战争挑拨者的真面目，迫使他们摊牌，并且在各国人民面前揭穿了他们真正的意图。”②

庇护十二世同张伯伦和达拉第一样，因为芬兰境内战争的结束而咬牙切齿。他遗憾的是未能把这个战争转变为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反苏战争。而这件事却反而使他在全世界面前原形毕露。

所有这些事实，都揭穿了梵蒂冈外交界积极参加1940年初有关“和平”的秘密谈判时所抱的目的。

① 维·莫洛托夫：«苏联政府的对外政策»，第9页。

② «共产国际»，1940年第5期，第11页。

不论张伯伦及其所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反动集团，还是同他们一伙的法国统治集团，如何急于同希特勒妥协，以便使法西斯德国转而反对苏联，但是，他们仍然不想同意希特勒分子收回殖民地和统治欧洲的要求。至于德帝国主义，则因为在波兰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而兴高采烈，认为英、法两国统治集团不愿对它的掠夺性计划进行反击，所以它力求在欧洲捞一把，以便更好地准备反苏战争。据泰勒说，到 1940 年 3 月末，“同教皇及各外国代表在梵蒂冈进行的谈判证明恢复和平已无希望。”[1] 这样，泰勒便证实了他在梵蒂冈既同教皇，又同列强代表进行了谈判，讨论了有关结束西欧战争的条件。

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深刻矛盾，阻碍了 1939 年冬至 1940 年春达成有关结束西欧战争和建立反苏统一战线的协议，除此而外，还有苏联政府的有远见的英明的政策，使苏联的敌人的种种计划都遭到了破产。反苏阴谋之所以未能得逞，还因为苏军在同芬兰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而这场战

105

① 《罗斯福总统和教皇庇护十二世战时联系》，纽约，1947 年，第 27 页。

争，张伯伦、达拉第、胡佛、庇护十二世以及资产阶级其他反动政客，都把此看成是所有资本主义强国反苏战争的前奏。

梵蒂冈参预帝国主义分子在巴尔干地区的反苏阴谋

梵蒂冈曾直接参预组织帝国主义者反苏战线。而且它认为那些在帝国主义列强计划中应该成为反苏进军桥头堡的国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只是芬兰，而且还有巴尔干半岛，特别是罗马尼亚。

法西斯德国对掠夺罗马尼亚石油以及巴尔干半岛各国农产品和原料极感兴趣，并且打算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准备向苏联进军，因此一心想把巴尔干地区攫取到手。

在巴尔干地区大搞阴谋诡计的还有法西斯意大利。它在侵占阿尔巴尼亚之后，力求征服希腊和南斯拉夫。它对罗马尼亚的石油想先下手为强，并伙同希特勒德国，把巴尔干各国变为未来的反苏战争的桥头堡。

英、法两国统治集团也急欲侵占巴尔干地区，

以便用来实现其反苏计划。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巴尔干地区一直象磁铁一样吸引着各国帝国主义。

到1940年夏季，德、意两国已把巴尔干大部分国家攫取到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统治集团因害怕本国人民、仇恨苏联、指望乘战争之机牺牲苏维埃国家以大发横财，都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轴心国的附庸。

帝国主义阵营千方百计利用教会组织以便使自己在巴尔干各地扎下根来，奴役巴尔干各国人民，并把他们的领土变成反苏战争的桥头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罗马尼亚东正教会一直受到两个方面的拉拢：一方面是梵蒂冈（为了德国和意大利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是英帝国主义的走卒英国教会。有一部分罗马尼亚宗教界上层人士违反教徒群众的意愿去同帝国主义 106 阵营的这两个教会的代表勾勾搭搭。[1] 这部分僧侣同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和地主有着密切的联系，赞同帝国主义的反苏计划，并帮助他们在罗马尼

---

①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宗教自由》，布加勒斯特，1948年，第19页。

亚实现其阴谋诡计。在罗马尼亚参战前夕，为了完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下达的直接任务，梵蒂冈在这个国家特别卖力。

维·莫洛托夫在1940年3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报告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外国报刊对苏联同它的南方邻邦，特别是同与南高加索相邻的国家以及罗马尼亚的相互关系问题给予了极大的注意……。在我所提到的南方各邻国中，我们同罗马尼亚并未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这是因为存在着悬而未决的争议问题，即比萨拉比亚问题。苏联虽然从来没有提出过要通过战争的途径收回比萨拉比亚，但是却从来也没有承认过罗马尼亚对它的占领。因此说苏罗关系的什么恶化也就毫无根据了……"①

《罗马观察家报》认为需要对维·莫洛托夫的讲话作出反应，并按照反苏的惯例加以"评论"。这家梵蒂冈报纸虚伪地写道：正当人们"致力于忘却"欧洲这一地区的有争议的问题或力求把这些问题"束之高阁"的时刻，苏联政府却提出了比

① 维·莫洛托夫：《苏联政府的对外政策》，第17—18页。

萨拉比亚问题来，这正在引起“痛苦的感情”。[①] 梵蒂冈想要使苏联“忘却”罗马尼亚对比萨拉比亚的占领；与此同时它却鼓励帝国主义分子同罗马尼亚统治阶级站在一起准备利用这个国家的领土来进攻苏联。

1940年2月，罗马尼亚反动青年组织的领导人西多罗维奇将军抵达罗马，作为罗马尼亚国王的代表同墨索里尼政府谈判。[②] 当时布达佩斯的一家报纸《佩斯泰尔洛伊特》写道：“西多罗维奇在罗马进行的谈判，首先受到意大利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所左右。”[③] 意大利报刊环绕着罗马尼亚将军到罗马的问题议论纷纷。他受到了国王和墨索里尼的接见。 107

庇护十二世也接见了西多罗维奇将军，并授给他一枚大十字“庇护勋章”。《纽约先驱论坛报》驻罗马记者就此次接见报道说：“此次接见的重要性，由于在同一时间内宣布意大利贸易代表团不久启程赴罗马尼亚谈判扩大贸易一事而更显得突

① 《国际新闻简报》，1940年，第7期。

② 《纽约时报》，1940年2月17日，2月27日。

③ 转引自《世界新闻与展望》，伦敦，1940年3月9日。

出。"①

此后不久，教皇又接见了罗马尼亚的天主教主教、罗马尼亚大学生和侨居罗马的罗马尼亚侨民。梵蒂冈估量到东正教教会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作用，便借助亲意大利的罗马尼亚将军们和当权派以及合并派僧侣竭力去拉拢罗马尼亚东正教会的主教们。1940 年 2 月、3 月间，罗马尼亚东正教会代表曾数次到过梵蒂冈。意大利外交部对他们这几次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兴趣。② 庇护十二世向巴尔干各国呼吁的不是去为反对把巴尔干变成战争基地桥头堡而斗争，而是为反对共产主义而斗争，这实际上就是号召同苏联开战。③ 4 月间，梵蒂冈组织了一个天主教会和"东方基督教"之间的"联络周"活动。其目的是使"东正教会回到天主教母亲的怀抱里来"。耐人寻味的是这个"联络周"在米兰由意大利法西斯最忠实的奴才——红衣主教舒施泰尔领导进行。

即使在战争的年代里，教皇仍然顽固地坚持

①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0 年 2 月 18 日。
②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0 年 2 月 23 日。
③ 《无神论者》，1940 年 6 月 11 日。

推行他的使罗马尼亚东正教会归附于天主教的计划。"有重要的根据可以认为在反苏战争期间，米哈伊·安东内斯库（罗马尼亚外交大臣——舍英曼）进行过有关罗马尼亚东正教会同梵蒂冈完全合并的谈判。此外，进行这个谈判不仅把东正教会本身排除在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反对东正教会本身的……"。① 梵蒂冈依靠罗马尼亚的天主教会和合并派教会组织在这个国家里煽起敌视苏联的情绪。庇护十二世在接见罗马尼亚宣传大臣时，诽谤地扬言说罗马尼亚受到莫斯科的威胁"。②

梵蒂冈为了意大利法西斯的利益还在其他巴尔干国家大肆活动。 108

1940 年初，梵蒂冈又恢复了同南斯拉夫的有关宗教条约的谈判。它对当时苏南关系的改善深为不安。梵蒂冈和意大利在南斯拉夫的代理人是萨格勒布大主教斯特皮纳茨，他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和苏联的敌人。为了配合德、意两国对南斯拉

①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宗教自由》，布加勒斯特，1948 年，第 19 页。

② 《纽约时报》，1940 年 4 月 19 日。

夫施加的压力，同时也是想要帮助“轴心国”，教皇于1940年5月把斯特皮纳茨召到梵蒂冈。他接受的任务是不惜用一切手段来阻挡苏南两国的亲近，并为意帝国主义的扩张创造有利条件。教皇还派代表去希腊，商定有关作为意大利法西斯走卒的当地天主教僧侣同梵蒂冈配合进行反苏活动事宜。

可见，庇护十二世并不限于号召巴尔干各国人民“联合反共”。他还为拼凑反苏力量大卖力气，帮助“轴心国”拉拢巴尔干国家参战。

梵蒂冈参预了1940年初的意大利和匈牙利之间的谈判，为巩固意匈联盟、为使这两个国家不仅在巴尔干地区，而且在反苏方面能配合行动而大卖力气。

1940年3月末，以泰莱古伯爵为首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抵达罗马同墨索里尼谈判。这位伯爵受到了教皇的接见，并且同他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谈话。此后谈判在教皇国务卿红衣主教马尔昂纳参加下继续进行。梵蒂冈对匈牙利统治集团的亲意大利方针和参加意帝国主义反苏计划感到满意。

梵蒂冈和意大利的参战

尽管梵蒂冈以种种手段来帮助墨索里尼政府在巴尔干各国施展阴谋诡计，并积极参加意大利的反苏政策的推行，但是与此同时它却竭力阻挠意大利统治集团参战，因为梵蒂冈的主教们都为法西斯制度的命运担心，并且极力保障建立帝国主义反苏统一战线的条件。

《共产国际》杂志写道：梵蒂冈“认为自己的使命是：通过帝国主义各国的战线保持同反动的资本主义力量的联系，在资本主义各交战国战线的上空举起反对国际无产阶级的旗帜。”①

109

梵蒂冈也知道：意大利参战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要打仗的思想在这个国家里还没有深入民心。1940 年 5 月初，当罗马举行官方一手包办的要求参战的游行示威时，聚集在一家教堂听完教皇亲自布道的人群高呼“我们要和平”②。

M. 埃尔科利（帕·陶里亚蒂）写道：“在军事上同希特勒帝国主义结盟对意大利帝国主义集

① 《共产国际》，1940 年，第 6 期。

② 《工人日报》，伦敦，1940 年 5 月 6 日。

团来说，是实现这些狂妄的侵略计划的最可靠的保证。但是十分清楚，同希特勒德国的联盟很快就会转化为对意大利的奴役。"① 以墨索里尼匪帮为首的意帝国主义叛国集团掠夺自己的国家，并把它出卖给希特勒德国。

1940 年春，意大利帝国主义分子准备参战，他们认为现在参战能够以最少的人力和物力换来最大的好处。当时《真理报》写道：意大利"知道自己国力虚弱"，因此它希望不打仗就捞到一些资本。但是，另一方面它却担心万一行动过于迟缓，它就会坐失良机。"①

意大利同英、法两国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一场争夺地中海霸权、争夺非洲殖民地、争夺小亚细亚的势力范围、争夺巴尔干地区的霸权的斗争正在进行。

梵蒂冈外交界在这时就出面来充当意大利和英国、法国的中间人。3 月间，教皇电令其驻伦敦的教皇特使戈弗雷和威斯敏斯特大主教亨斯利，

① M·埃尔科利：《反希特勒德国战争中的意大利》，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4 年，第 7 页。

② 《真理报》，1940 年。

要他们协助英意双方达成协议。[①] 梵蒂冈同样还在突尼斯和吉布提问题上充当法、意两国之间的中间人。[②]

1940 年 5 月最初几天，教皇向美国总统建议作"最后的努力"来对意大利政府施加影响，阻止它参战，与此同时还派奥尔塞尼戈去柏林，以便了解清楚，德国统治集团对他的这一步骤持什么态度[①]。同意大利政府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的是美国驻意大使菲利普斯和迈伦·泰勒[③]。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纽约）曾就此事评论说：梵蒂冈和美国已经联合起来准备一场反苏战争，而这一勾当又是在为"和平"而奋斗的幌子下干的。

教皇指望得到意大利王室的支持，而王室实际上却完全同意墨索里尼的侵略计划。5 月 6 日，庇护十二世接见意大利王太子，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此后王太子又同红衣主教国务卿进行了谈话。同意大利参战问题有关的这次访问是

110

①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0 年 3 月 6 日。

② 《教皇言论集》，第 66 页。

③ 《工人日报》，纽约，1940 年 5 月 7 日。

④ 《纽约时报》，1940 年 5 月 7 日。

在墨索里尼的同意下安排的。

使意大利天主教群众都知道教皇在支持墨索里尼，这对墨索里尼是十分有利的。因此，法西斯宣传机构利用了教皇接见王太子一事[1]。

但与此同时，墨索里尼法西斯集团却发现，梵蒂冈呼吁达成协议有碍于在意大利煽起军事沙文主义的狂热。在意大利参战之前不久，意大利当局对《罗马观察家报》作了猛烈的抨击。法西斯报刊有一个时期甚至还要求禁止教皇的报纸在意大利出售。1940 年 5 月，法西斯分子在罗马和其他城市没收了书亭报摊上出售的《罗马观察家报》，并在广场上烧毁，同时还殴打报贩和买这一报纸的人[1]。事情闹到天主教徒大学生和僧侣同法西斯分子武装冲突的地步。这些冲突向双方表明：国内存在着不小的反法西斯力量。当时《罗马观察家报》的发行份数从通常的一万五千份剧增至十七万份。

但是，梵蒂冈本身却根本没有想要建立这样

---

① Тп·摩根：《听音哨》，第 193 页。

② 《真理报》，1940 年 5 月17日；《工人日报》，纽约，1940 年 5 月 16 日。

的法西斯制度的反对派，或在国内支持什么反对派。为了对意大利统治集团施加影响，从接近梵蒂冈的人士中放出空气，似乎教皇有迁居葡萄牙的意思，有关美国准备为教皇提供避难场所的报道也出现了。梵蒂冈驳斥了这些谣言，但是这些说法在以后仍然为教会人士所衷心支持。

法西斯政府对冲突的升级也并不感兴趣。它 111 要求《罗马观察家报》不要再刊登"清一色"的意大利法西斯报刊上所没有的外国新闻报道，并放弃和平主义的宣传。这些要求梵蒂冈全部接受。签订的协定规定：《罗马观察家报》今后刊登的只是不加任何评论的交战双方的官方消息①。此后，该报发行份数下降到一万份。

亲梵蒂冈的书报在为教皇的这个新的让步辩解时往往说：庇护十二世"担心会遭到沦为拿破仑阶下囚的庇护七世的命运"。② 实际并非如此。

《共产国际》杂志写道："正当意大利开始参战的时刻，教皇就同意大利法西斯作了一定的妥协，

① 《消息报》，1940年5月29日；《当代评论》，1940年7月号。

② С·查费拉：《梵蒂冈与欧洲战争》，第228页。

这对劳动人民来说，是教皇为首的教会反动派不可能也不想同法西斯制度作对。它害怕人民的战斗力量会得到解放。”①

5 月 29 日，教皇接见意大利新任驻梵蒂冈大使阿托利科（以前曾任意驻德大使，正象他的前任一样，他也以亲希特勒著称）。庇护十二世要他向国王和墨索里尼转达“教皇的问候”②。“这一机会又再度为领袖及其各报的编辑们用来表明：至圣的宗座的立场同意大利的黩武政策是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③

6 月 10 日，意大利向英、法两国宣战。以主教们为首的意大利天主教僧侣也立即宣称这场为意大利和德国资产阶级利益而发动起来的战争是一场“圣”战。主教团向墨索里尼和国王庆贺，并表示祝愿意大利武装力量胜利。

特别起劲地开展军事沙文主义运动的是米兰区大主教舒施泰尔红衣主教。他访问营房，向士兵们分赠护身香囊。据他说这种香囊在战斗时能拯

① 《共产国际》，1940 年 6 月，第 103 页。

② 《时代报》，1940 年 5 月 30 日。

③ 摩根：《长靴上的马刺》，第 249 页。

救他们免于阵亡。他还到教堂去作祈祷，鼓励士兵们去为同意大利人民毫不相干的目标而战。“天主教行动会”号召自己的会员去促进意大利武装力量的胜利。意大利天主教报刊也学希特勒的腔调说，好象战争的发生是由于“那些富有民族”的过错所致，而这些民族“本身是欧洲巨大财富的占有者，他们不愿知道新世界即将诞生。”①

112

梵蒂冈赞同意大利天主教僧侣的沙文主义立场。

当阻止意大利参战的尝试失败以后，“教皇重又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情，”并宽宏大量地对待意大利天主教僧侣“教权主义的热忱”。——美国的一篇梵蒂冈外交活动述评写道②。

其实，梵蒂冈不仅是“宽宏大量”地对待意大利主教们的战争宣传。《纽约时报》驻梵蒂冈记者报道，意大利参战后的最初几天，当他走访梵蒂冈国务秘书处，询及梵蒂冈对有天主教僧侣参加的法西斯分子的战争游行示威的态度时，他得到的

① 转引自《美好的未来》杂志，维也纳，1940年，第49、50期。

② 《外交政策报道》，纽约，1944年1月15日，第286页。

答复是："神圣的宗座对所有国家的天主教徒负责，"似乎梵蒂冈的立场是取决于这一点的。"而意大利天主教僧侣和天主教徒对他们的国家负有特殊的义务。他们将一如既往地、高尚地履行这些义务。"①这意味着教皇完全赞同意大利主教团的军事沙文主义立场。

应该注意的是，教皇也是意大利天主教僧侣的首脑（首席主教）和罗马市主教。可见意大利天主教僧侣直接从属于教皇，而教皇也需为他们的行为负责。

为了不妨碍意大利报刊向居民谎报军情，《罗马观察家报》从6月13日开始停止刊登任何战争公报②。

梵蒂冈的耶稣会杂志《公教文明》号召意大利113青年去为别人的、反人民的目标打仗——即"以公民和军人所应有的忠顺和勇敢"③来执行法西斯统治者所要求的一切。这家耶稣会杂志还号召

---

① C·查费拉：《梵蒂冈与欧洲战争》，第238页。

② 《国际新闻简报》，1940年6月29日；R·马索克：《从内部看意大利》，第253—254页。

③ J·斯蒂尔：《欧洲的未来》，纽约，1945年，第227页。

所有意大利人都要“以自己的鲜血来证明一丝不苟地履行了这些义务。”①

《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在意大利参战后不久从梵蒂冈报道说：现在教皇庇护十二世竭力奉行同意大利和德国合拍的政策，意大利、德国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目前已有了好转。② 梵蒂冈同意大利的关系有所好转正是从后者参战以后开始的。

意大利参战一星期后，教皇即向英、法两国政府发出不要轰炸罗马的呼吁，因为在这个城市中有许多教堂和文物古迹。罗马城中有名的历史文物古迹要是遭到破坏，这对人类文化来说当然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许多城市里也有不少最珍贵的文化古迹，教皇却无论是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以后都既没有向意大利政府，也没有向德国政府呼吁，要求这两个国家的空军不要轰炸波兰、法国、英国和苏联的城市。对于人类文化来说，不可弥补的损失倒是希特勒分子在诺夫哥罗德、斯摩棱斯克、基辅、切尔尼

① 《纽约时报》，1940 年 7 月 2 日。

②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0 年 7 月 9 日。

戈夫、普斯科夫各地和列宁格勒郊区，还有华沙和其他地方对历史古迹，其中包括古老的庙宇的破坏。教皇庇护十二世却从来没有抗议过这些罪行。

梵蒂冈接受希特勒的"新秩序"

"但是在西欧事态还是照样发展下去。1940年4月，德军占领了丹麦和挪威。5月中旬，德军侵入了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5月21日，德军进抵英吉利海峡，并在弗郎德勒地区截断了盟军。5月末，英军从敦刻尔克撤退，离法回国。6月中旬，巴黎陷落。6月22日，法国向德国投降……。这是绥靖政策的彻底破产，是拒绝集体安全体制政策的彻底破产，是孤立苏联政策的彻底破产。"①

114　由于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投降和叛卖政策，法西斯德国并未遭到其对手的严重反击，但他却对自己的胜利大吹大擂。希特勒宣传机器力图使世界各国人民相信，似乎

---

① 《历史的伪造者》，第66－67页。

德军“无敌于天下”，从此以后统治欧洲的将是德国，它将到处建立其“新秩序”。

法西斯德国轻而易举地取胜和法国以及其他国家资产阶级的叛卖政策，决定了梵蒂冈和德国本土内的以及被占领国家的天主教高级僧侣的立场。

梵蒂冈的主教们公然地开始顺应希特勒在欧洲的“新秩序”，并在这强盗式“新秩序”的框框里同法西斯匪徒合作起来。梵蒂冈希望它同希特勒政府之间存在的主要是在教会问题上的分歧将会消除，就象以往宗座不止一次地同欧洲某些国家政府(如俾斯麦政府)之间解决分歧一样。梵蒂冈不无根据地认为，希特勒的强盗式“新秩序”需要得到宗教的圣化。十分清楚，日耳曼民族优于一切民族的血腥的种族“理论”，无论如何也不能作为使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容忍”德帝国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上的武器。因此，梵蒂冈头子们认为，为了上述目的，德国一定会需要天主教会组织这个在精神上奴役群众使之驯服于剥削者的老手来帮忙。这种帮忙在天主教居民人数众多的那些国家中尤为重要。

以希特勒强盗集团作为自己意志的执行者的德帝国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和苏联是自己的主要敌人，这对梵蒂冈来说已不是个什么秘密。英国顽固派杂志《十九世纪以来》承认：敌视共产主义、害怕希特勒制度的被推翻会导致民主制度的胜利是把梵蒂冈同"轴心国"联系在一起的最主要条件之一①。教皇以及他周围的人们都相信：希特勒德国的胜利不仅"会封闭布尔什维主义通向欧洲的道路"，而且梵蒂冈也知道，得到各被占领国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支持的希特勒集团不久即会将115自己的兵力投入反苏战争。梵蒂冈的主教们都期望：他们的梦想终将实现，即希特勒分子一定会在全欧消除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并扼杀苏联。

与此同时，梵蒂冈却不得不考虑被占领国家的人民群众对希特勒匪徒的敌对态度。它也不得不考虑在各非欧洲国家中民主阶层和天主教阶层居民的反法西斯情绪。这有碍于梵蒂冈无条件地和公开地在一切方面都支持希特勒德国，特别是支持他在各被占领国的赤裸裸的掠夺方式。梵蒂

① 《十九世纪以来》，1941年2月，第168—178页。

冈宁愿使希特勒的强盗式的"新秩序"用比较"基督教化的"方法来推行，因为这涉及一系列的国家和民族。但是，尽管梵蒂冈对希特勒分子的这些或那些行动有所不满，在主要方面它还仍然支持希特勒分子，并力求顺应法西斯德国在欧洲的统治。

当德军部队占领丹麦和挪威以后，《罗马观察家报》的态度与意大利所有报刊不同，它表示反对德国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行动。但是就在这里表现出了梵蒂冈的两面三刀：对德军部队占领丹麦和挪威的"谴责"是何等的虚伪，因为早在1940年1月，教皇在接见丹麦宗座代牧主教特奥多尔·苏勒时即声明梵蒂冈要尽力同美国一起采取措施以"保护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防止布尔什维主义的扩张"①。其实大家都知道，威胁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并不是布尔什维主义，而是竭力想把它们变为进军苏联的桥头堡的帝国主义。这种计划正是梵蒂冈所同情的，只是为了保存体面《罗马观察家报》才批评了一下希特勒部队对丹麦和挪威

①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0年1月2日。

的占领。在教皇或梵蒂冈的任何一个负责官员的任何一个声明中，没有一句话反对希特勒这一新的侵略行为。连一位在思想情绪上决不会敌视梵蒂冈的《纽约时报》记者也写道：尽管不断传说，好象教皇将要谴责德国人入侵斯堪的纳维亚，但是在梵蒂冈的权威人士中间却认为这样的声明是不会有的。

这位记者继续报道说，在梵蒂冈人们都强调指出，挪威总共只有二千六百名天主教徒，因此即使“从道义的观点来看”德国的行为似应受到谴责，但从实用的观点来看，则梵蒂冈更需注意到德国的三千万天主教徒[1]。十分清楚，斯堪的纳维亚天主教徒的人数在这里是毫不足道的。芬兰的天主教徒比挪威更少，而且，当梵蒂冈希望苏芬战争会成为资产阶级各国共同的反苏战争的开端时，教皇公开出面支持芬兰反动派。梵蒂冈拥护希特勒德国的主要目标。因此它不能对德寇入侵斯堪的纳维亚表示反对。

4 月 15 日，在希特勒部队占领挪威和丹麦一

① 《纽约时报》，1940 年 4 月 18 日。

个星期之后，教皇致书国务卿马尔昂纳指示为恢复和平组织群众性祈祷。庇护十二世写道，他认为祈祷是终止战争的唯一手段。教皇写道："我们特别希望……无罪的孩子们成群地重新聚集在祭坛旁边，祈祷天主。"根据教皇的说教，只有教徒们的祈祷和向祭坛敬献鲜花，才能唤起天主对世人的怜悯。①

在内容广泛的书信中教皇却没有一句话谴责战争的罪魁祸首。书信中对刚刚发生的德国部队在斯堪的纳维亚登陆一事只字未提。

一个月以后，由于德军部队入侵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教皇出面说话了。在致上述三国执政者的信中他表示"痛心"，并且许下诺言，说他将为恢复这三个国家的和平、自由和独立而祈祷②。但是在教皇的这几封书信中也没有直接谴责希特勒的侵略。

教皇的这种言论无论如何也不是反对希特勒德国侵略的表示，因为教皇对国王利奥波德三世

① 《维也纳教区报》，1940年，第9号。

②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0年5月12日；《卢森堡灰皮书》，伦敦，1942年，第42页。

这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崇拜者也表示“同情”，和“同情”其他人一样。利奥波德三世这个天主教徒和神秘主义者相信希特勒德国无敌论的神话，在希特勒分子入侵比利时后，他作为比利时军队的最高统帅立即向侵略者投降。他仍留在被德军占领的故国，同占领者合作，并在贝希特斯加登觐见过希特勒①。利奥波德是抵抗运动的敌人。117教皇对这位希特勒的崇拜者表示，由于比利时被卷入战争而“痛心”，这当然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对侵略比利时的抗议。

梵蒂冈同法国卖国贼合作

法国是被它那些最害怕本国人民、仇视人民阵线、民主、共产主义和仇视苏联的统治阶级出卖的。斯大林同志说，法国的执政者“被革命怪影所吓倒，放弃抵抗，惊慌失措地把自己的祖国送到希特勒的铁蹄之下”。②

法国资产阶级从进攻法兰西优秀儿女——共

---

① 《新民主主义》，巴黎，1950年，第1期，《共产主义》，布鲁塞尔，1949年12月。

②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2页。

产党人，开始了战争。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写道："法国资产阶级如今恢复了反革命恐怖的最黑暗的时期。自从法国血腥镇压巴黎公社之后，反动势力还从来没有如此猖狂地向工人阶级进攻……"。①

1940 年 3 月和 4 月，在巴黎举行了对共产党议员的审讯。法国资产阶级同它的"社会党"奴仆们一起，大肆污蔑共产党人和苏联。当时，莫里斯·多列士写道："他们在发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是以这些真正出卖我国人民和我们国家的叛徒的控告者身份出现的，因为我们揭露了诸如达拉第、勃鲁姆、保罗·富尔、儒瓦之流出卖灵魂的政客，他们违背了誓言，却厚颜无耻地污蔑我们……"②

共产党在就法国投降所发表的呼吁书中写道："资产阶级执行镇压和杀尽法国民族最积极的一部份，即共产党人，劳动人民的先锋战士的路线，从而破坏了人民和军队的士气，削弱了国防，使我国注定遭到军事上的失败。当德国有组织地、

① 《共产国际》，1939年，第 8—9 期，第 29 页。

② 《真理报》，1940 年 5 月 29 日。

坚持不懈地准备大举进攻之时，达拉第和勃鲁姆却正在捕捉共产党人。”①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弗洛利蒙·邦特118跟其他共产党议员一起被达拉第政府逮捕，并被判处监禁。他在自己的激动人心的《忠诚之路》一书中叙述了“二百家族”的所有代理人，如达拉第、庞纳、勃鲁姆之流出卖民族利益的活动：“……达拉第在进行战争：他在同法国人民作战。他捉到俘虏——但这是一些法国人，他们的罪名就是对党、对祖国一贯忠诚，这些法国人敢于公开宣布：法国只有同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才能得救。但他们得到的回答是粗野的嘲弄和谩骂，以及死亡的威胁。

所有这些人，如赖伐尔、多里奥、戴·布里农、庞纳之流以及他们的代理人都厚颜无耻地卖弄权势；而有的人就巴结他们。报刊要求对共产党人严刑拷打，并送上断头台。达拉第在进行战争，但不是同希特勒，而是同法国人民，同法国共产党，同一个拥有接近一百五十万选民的大党。

① 《共产国际》，1940年，第8期，第49页。

1939 年 9 月 26 日，他发布了取缔法国共产党的命令。反动派欢喜若狂。"①

法国资产阶级一方面迫害法国的优秀儿女，迫害法国的真正爱国者，另一方面正准备向希特勒德国投降。它对苏联采取敌视的政策。1940 年 8 月 1 日，维·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上发言说到法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这里的问题不仅是由于军事准备很糟，——尽管这个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另外还有一个情况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是法国领导集团"……对待苏联在处理欧洲事务中的作用和比重的问题过于轻率了。最近几个月事态的发展清楚地说明了更多的问题。这表明：法国统治集团同人民没有联系，它们不但不依靠人民，反而害怕自己的人民，而法国人民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是具有名符其实的热爱自由的人民的声誉的。这也是暴露出来的法国软弱的重大原因之一。"②

法国的许多卖国贼同反动的天主教人士和高

---

① 弗·邦特：《忠诚之路》，国家外国书籍出版社，1949 年，第 20 页。

② 维·莫洛托夫：《苏联的对外政策》，第 4 页。

级僧侣有着密切联系。赖伐尔就是这类人物。他是贝当上台之后法国的实际执政者，又是希特勒的直接代理人。1935年，教皇庇护十一世曾赐给119他以“教皇侍从”的称号、梵蒂冈勋章和伯爵的爵位，贝当本人也属于反动的天主教阵营。他同法国的天主教保皇派（属于“法国行动党”）有联系，同西班牙的天主教人士有联系，通过佛朗哥跟希特勒和戈林有联系。贝当最亲密的合作者魏刚将军，也属于反动的天主教集团。他一贯敌视苏联，最初在英国特务机关工作，后来又在德国和美国特务机关工作。正是这个魏刚，要求由于德国人的进攻从巴黎迁到图尔的政府迅速投降，因为据说共产党已经“占领了巴黎”。这是挑拨性的谎言。

在贝当阵营中起很大作用的还有：家庭和青年事务部长伊巴尔内加勒，他是法西斯分子佛朗哥的朋友，天主教法西斯组织“战斗十字团”①的头目之一，另外还有德·拉·罗克，他是“战斗十字团”的首领。这些卖国贼的后台就是法国大资产

① 又名“火十字团”。——译者

阶级，例如，同天主教阵营，同主教团和梵蒂冈都有联系的百万富翁戴·范德尔家族。

甚至连反动报刊也承认，害怕人民正是“二百家族”的人们，其中包括天主教领导集团，把法国出卖给德国人的主要原因之一。伦敦的一家反动杂志《十九世纪以来》当时曾写道：“害怕共产主义，对贝当、魏刚及其军事和政治同僚们的心理，无疑产生了强烈的失败主义的影响……，他们害怕革命的程度，比害怕敌人要强烈得多。”①

5月中旬，德国军队经过比利时，进占法国领土。6月14日，他们进入巴黎。6月22日法国投降。关于投降的谈判，是由梵蒂冈和西班牙从中引线的。教廷驻巴黎圣使瓦勒里奥·瓦列里在谈判中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贝当担任“国家元首”，赖伐尔得到政府中最重要的职位。法国政府——这个希特勒的代理机构迁到了维希。

同德国资本家有联系的法国资本家，从投降初期，便公然与占领者合作。“法国的一些金融寡头和工业寡头，出于他们为了从恶劣的环境中捞

① 《十九世纪以来》，1940年5月，第113页。

取巨大利润而适应任何形势的根深蒂固的习惯，120正在或者可能已经迈上了同昨天的军事对手勾勾搭搭的途径。这指的是把法国企业、工厂、煤矿或铁矿卖给德国资本家，或者让德国资本投入法国企业”①。

莫里斯·多列士在揭露法国统治阶级出卖本国利益的活动时指出，目前正在发生法国资本同德国资本结合的现象："集中了大量资本并同德国经济生活各部门的相应的团体达成协议的银行、托拉斯和保险公司的作用就有代表性。……德国工业和法国工业这种独特的'结合'过程，都是通过银行(主要是巴黎银行)为中介，并且往往是在这些银行的压力下发生的……这种现象极为普遍。"②

维希政府卖国集团沾污了法国人民的优秀传统。亲希特勒的贝当集团侈谈"民族革命"，答应"消灭阶级斗争"，"使法国人回到原来的土地上"，建立"超阶级的国家"，实现"道德上和文化上的

① 《共产国际》1940年，第12期，第25页。

② 莫·多列士：《论所谓的法国"民族革命"》，载《共产国际》，1941年，第5期，第17页。

民族新生”。所有这些，不过是模仿希特勒的调子进行的蛊惑宣传。贝当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教权主义的“劳资协会主义的”(法西斯的)国家。贝当的“民族革命”在实际上意味着解散工人组织，禁止罢工，消灭残余的一点民主自由，实行托拉斯和银行的绝对统治。对希特勒奴颜婢膝，并恢复中世纪的教会特权。

莫里斯·多列士在揭露贝当集团大肆吹嘘的所谓的“民族革命”时写道：“于是，‘民族革命’便保存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利润，保存了人对人的剥削和阶级的分化，从而保存了阶级斗争……法国资产阶级及其统治集团在‘消灭阶级斗争’的口号掩盖之下，正在对无产阶级，对劳动人民发动阶级的战争。”①

天主教的高级僧侣是贝当阵营的组成部分，这些红衣主教和主教们，同资产阶级和据有土地的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同法国所有其他反动分子一样仇视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在 121 大战前夜和战争爆发之后，他们都参预诽谤人民

① 莫·多列士：《论所谓的法国“民族革命”》，载《共产国际》，1941年，第5期，第19页。

阵线和陷害共产党人的活动，并极力阻挠天主教徒参加人民阵线。1940年3月末，在巴黎举行了法国主教和大主教会议，讨论“保障社会安定”的议题。这次会议是在同共产主义作斗争的口号下进行的。

巴黎大主教韦迪埃在4月去世。教皇任命兰斯大主教、红衣主教絮阿尔接替他的职位。法国高级神职人员在絮阿尔的领导下，同贝当和侵占法国的德寇合作。他们完全赞同贝当所采取的“消灭阶级斗争”和镇压工人运动的路线，他们宣称，这就是教皇圣谕所说的“天主教的社会纲领”。

这些主教还指望贝当的法西斯制度能确保教会在法国的地位。他们一心想靠人民的贫困而大发横财，同时还极力要人民相信，国家之所以多灾多难，原因在于人们背离了宗教。为了转移劳动群众对造成他们贫穷的真正的罪魁祸首即出卖法国的资产阶级的注意力，主教们跟统治阶级的其他代理人一起反复强调，法国的失败是“唯物主义、人民阵线、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的结果。

这个调子是贝当本人定的。他在法国刚投降

后的一次发言中声称，这次失败是“对罪恶的应有的惩罚”。法国的其余的卖国贼也曾经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卖身投靠敌人的报刊宣称，法国同德国开战就是“犯了大罪”，而罪魁祸首就是具有民主传统和要求的工人阶级。①

法国的主教们接受了这一“忏悔的”调子。格勒诺布尔主教盖奥在向他那一教区的信徒发出的呼吁书中，要求他们完全信赖贝当。他写道，法国的灾难是“上帝的旨意”“牺牲可以赎掉从前的罪恶，使灵魂变得纯洁。”

于是各种各样的天主教组织便跟高级僧侣们一起，转而为贝当和希特勒匪徒效劳。

以夏尔·莫拉斯为头子的、跟梵蒂冈有密切联系的保皇党“法国行动党”，在法国投降后立即同占领者合作。纽约的《民族》周刊写道，这些人准备遵守教会的一切仪式，只要教会能助长反革命的声势。他们会在祭坛前屈膝下跪，只要他们知道祭坛会为王位祝福。② 莫拉斯是法国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和苏联的对头。早在法国投降之前，

122

① W·鲁特：《战争秘史》，第1卷，第193页。

② 《民族》周刊，1943年5月22日。

他就被意大利人、德国人和西班牙人所收买了，尽管他当时在口头上和发言中表示反对亲德政策。法国投降后，夏尔·莫拉斯在自己的刊物《法兰西行动报》上发表文章，对法国失败兴高采烈，并一再声称这是"天赐的礼品"。①

莫里斯·多列士谈到这个希特勒的可耻走卒的这种言论时写道："向希特勒出卖法国的集团，在法国失败以后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在法国建立法西斯制度的机会。反动派这种在外国刺刀保护下并用整个民族受奴役的代价换取的胜利，便是'整体民族主义'理论家夏尔·莫拉斯吹得天花乱坠的'天赐的礼品'"。②

出于对法国民主和共和国的仇恨，交战双方——德国和英法的教权派令人愤慨地联合起来了。

德国天主教刊物，同贝当分子和法国主教们唱一个调子，一再宣称法国的"一切罪恶"都是从1789年，即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法国在那时开始

① A·伍姆塞：《戴高乐及其同谋者》，国家外国书籍出版社，1948年，第12页。

② 莫·多列士：《人民的儿子》，第143页。

“犯罪”，它的第一条罪状就是政教分离，并设立世俗学校。①

英国天主教僧侣由于仇恨民主而丧心病狂，竟然对盟国法国的失败非常高兴，并为贝当制度的建立喝采。英国那些代表梵蒂冈的天主教活动家宣称，“这一年夏季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指1940年），莫过于法国“共济会的垮台”，据说共济会是共产主义的同盟者。②

英国天主教中张伯伦的同盟者和希特勒的朋友们在大谈“共济会的垮台”时，之所以兴高采烈，实际上是以为法国民主已被消灭了。英国研究教皇政策的专家麦凯布写道，英国天主教报刊 123 丝毫也不掩饰他们对于贝当制度的满意。③

美国的反动集团，包括希特勒的天主教盟友，对于贝当的法西斯制度的建立，也是高兴不已。美国天主教杂志《国际天主教徒》谈到法国的失败时写道：“这场灾难是上天降给法国的”。这家杂志

---

① 见载于《美好的未来》的文章，维也纳，1940年，第49—50期。

② 《工人日报》，伦敦，1944年3月23日。

③ J·麦凯布：《法国的天主教》，伦敦，1943年，第6页。

还高兴地宣布："在法国搞社会主义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天主教复兴'的日子到来了。"梵蒂冈在美国的这个机关刊物还写道："法国失去了自己的舰队，但是得到了自己的灵魂。"①

这是国际反动派的大合唱，他们不仅想从法国的灾难中捞到油水，而且还把希特勒当作救世主，认为他可以使他们的资本、大庄园和统治人民的政权得到保护。他们对于法国的失败兴高采烈，并一心指望希特勒的下一个打击就该轮到苏联了。在法国的掘墓人中间，以梵蒂冈为首的天主教组织占据重要地位。

在贝当的王国里，教会获得了巨大的权势。天主教僧侣，尤其是高级僧侣，都开始为法西斯制度服务。僧侣的分化不是立刻开始的，而是直到他们看到广大群众起来反对占领军及其傀儡时才出现的。

维希政府取消了世俗学校。设置了宗教课程，并取消了1904年颁布的禁止隐修会的人员到学校授课的法令。小学里拉丁语成为必修课。据说

① 转引自《真理报》，1944年2月9日；《工人日报》，纽约，1942年5月20日。

是为了“恢复耶稣的家庭精神”，天主教的僧侣开始在家庭生活和儿童教育中起很大作用。颁布了一系列禁止妇女在国家机关和工业部门工作的反动法令。连担任非宗教的职务也要由僧侣推荐。所有的工人组织、政党和工会全都被取缔。天主教徒贝当由于害怕工人阶级，连天主教工会也取缔了。在法国也照搬了德国那套反犹太人的种族主义法令。

为了用仇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精神教育青年，成立了一些天主教的青年组织，召集了几 124 次天主教徒的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的代表大会。《罗马观察家报》以热情的赞许口吻报道了天主教青年工人组织的情况，并劝贝当要大力依靠它。从前被驱逐出境的隐修士组织都纷纷回国。资产阶级报刊扬言，这些隐修士可以树立“脱离尘世”的榜样，树立“忘我、无私、守贫、沉默”的榜样。反动派希望人民群众默默地、有耐性地忍受“自己的”剥削者和德国占领军的压迫。

法国的高级僧侣号召人民同占领军合作。他们欢迎贝当采取的一系列反动措施，尤其是把教会变成官方机构的措施。主教们一心指望贝当借

助德国人的力量铲除“法国大革命的极危险的精神”——即法国人民的民主精神。伦敦的《经济学家》写道，法国僧侣当中，最典型的附敌分子就是红衣主教波德利亚尔。这个红衣主教本人就宣称，他支持同德国人合作，因为他害怕法国的革命人民。红衣主教扬言，“1870 年跟 1940 年一样，法国到处都有要坚决斗争到底的游击队”，和“给巴黎带来被围的恐怖和公社”的人们。[①]《经济学家》写道，忠诚于维希政府，是高级僧侣必须遵守的政治原则。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们希望在欧洲建立天主教国家联盟。

僧侣们千方百计为卖国贼贝当制造一个“法国救主”的光圈。弗洛利蒙·邦特用下面这一段话描绘了皮伊市主教在卖国贼贝当到该地时为他举行的欢迎场面：“在进入城市的最近一个十字路口上站着戴着法冠的主教。他左手握着牧杖，用戴着紫晶戒指的右手为从他身旁走过的信徒们祝福，这些信徒手里举着十字架和神幡，口里唱着教会的赞美诗《谢天主颂》，向着法国的主要掘墓

① 《经济学家》，1942 年 4 月 11 日。

人走去，还一边高喊着："和散那"[1]。

法国天主教的权威报刊《十字架报》天天都在宣传，法国人应当支持贝当，并同希特勒匪徒合作。这家报纸说，这种合作最重要的条件，便是忘却过去的一切耻辱。

《十字架报》写道，贝当的方针，"同教皇的指示惊人地吻合"。确实如此，梵蒂冈十分欢迎贝当的反人民、亲希特勒的制度的建立。庇护十二世和他的亲信对于贝当极端仇视工人运动、民主和社会主义，对他的反动的"社会纲领"也非常赞赏。梵蒂冈的主教们，对贝当的制度，同战前的奥地利泽佩利——陶尔斐斯制度或当代的西班牙佛朗哥制度和葡萄牙的萨拉查制度一样加以赞赏。梵蒂冈指望借助于贝当的公开教权主义制度来恢复法国天主教教会的事业。 125

1940年7月，驻巴黎圣使瓦列里从梵蒂冈得到指令：要支持贝当政府。当时，在《罗马观察家报》上刊出一系列文章，对维希政府表示十分热烈的赞扬。《纽约时报》的记者从罗马发出报道解释

[1] 弗·邦特：《忠诚之路》，第308页。（"和散那"，赞颂的呼声，意为"主啊，拯救我！"——译者）

这一现象的原因时说："梵蒂冈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由于害怕贝当元帅一旦垮台，左派革命便会在法国取得胜利。"①《罗马观察家报》评论贝当时，发表的公开支持法西斯的文章，在德国统治集团中受到赞许。②

战争期间在美国出版的梵蒂冈政策述评中写道，法国的迅速灭亡和德国即将取得的全面胜利，"使梵蒂冈大为震惊"，于是庇护十二世"又采取了必不可少的措施"③，即更加起劲地适应希特勒的"新秩序"。

7月末，教皇向法国的红衣主教和主教们发出信件。信件的要点是，教皇希望法国的灾难，即"上帝加给法国人民的这场考验"，能为宗教的复兴奠定基础。④梵蒂冈想用这些被本国的法西斯统治者出卖了的人民的苦难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

① 《纽约时报》，1940年7月9日。

② 《纽约时报》，1940年7月19日；G·萨尔维米尼，G·拉·皮阿纳：《如何对待意大利》，第150页。

③ 《外交政策报道》，纽约，1944年1月15日，第286页。

④ 《国民日报》，巴塞尔，1940年7月31日。

梵蒂冈如此重视贝当的亲希特勒的反动制度，甚至连贝当对天主教徒犯下的种种罪行，教皇都置若罔闻。当时，法国有大批西班牙难民，他们是从佛朗哥的屠刀下逃出来的。其中有几千名巴斯克天主教徒和天主教神父。盲目忠诚于教皇的天主教徒、原巴斯克共和国总统阿希雷说，贝当当局在一夜之间搜捕了七千名在法国工作的巴斯克难民，连同巴斯克神父一起送进集中营①。 126

梵蒂冈的主教们连一句为他们辩护的话也没有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梵蒂冈不仅同贝当一鼻孔出气，而且同佛朗哥保持同盟，至于这些巴斯克天主教徒，在教皇看来不过是些反对"神授君主"佛朗哥的"造反者"。

梵蒂冈对于德国的傀儡贝当的支持，不能不引起英美以及其他国家天主教徒的公愤。1940年7月，英国红衣主教亨斯利不得不"驳斥"广泛流传的说法，即梵蒂冈支持贝当。这个红衣主教断言，《罗马观察家报》刊登的赞扬贝当的文章，代表"非官方意见"。这样可笑的论证，骗不了任何

① J·A·德·阿希雷，《经柏林逃亡》纽约，1945年，第29页。

人。亨斯利在1940年为自己兜揽了这样一种徒劳无益的使命，同其前任红衣主教博尔恩在1915年所干的勾当如出一辙，博尔恩当时也极力否认教皇贝纳蒂克图斯十五世的政策是亲德的。

正当庇护十二世和所有的高级僧侣为贝当制度的建立而欢欣鼓午之际，法国的优秀儿女在英勇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全力以赴地同占领军及其傀儡作殊死斗争。

梵蒂冈同维希的同盟，就是为了镇压抗战的法国。

梵蒂冈对贝当集团的支持表明，它不仅是希特勒的同盟者，而且是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最反动的集团的同伙，因为这些反动集团都完全同情贝当的反人民制度，并为法国民主力量遭到镇压而幸灾乐祸。美国驻法大使布利特于1940年7月返回美国，对贝当制度赞扬不已。1940年秋，美国政府派出海军上将莱格为特使拜谒贝当。莱格属于同梵蒂冈有联系的美国反动天主教集团。莱格认为贝当是法国最适宜的统治者。美国支持贝当，并且直到1942年11月之前一直同维希政府保持外交关系。与此同时，美国统治集团

(跟英国一样)对法国的抵抗运动抱敌视态度，千方百计加以破坏。美国统治集团同维希政府所以 127 能保持良好关系，梵蒂冈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①。梵蒂冈是通过美国有影响的天主教徒和加拿大天主教主教们进行活动的。红衣主教，魁北克大主教威利耶努埃瓦评论法国人民所唾弃的可耻卖国贼贝当时说，这是一位"高尚的长者"，他"英明而果决地主宰着我们祖先的祖国的命运。"②

梵蒂冈对于法国失败一事所采取的立场，是从它对战争的总立场出发的，它希望通过这场战争在整个欧洲镇压民主和共产主义，消灭苏联，建立有产阶级的反动的教权派的专政，并在这一基础上，重新恢复天主教教会的统治地位。德国在 1940 年的胜利，似乎预示了这些计划的实现；因此梵蒂冈的主教们一再宣扬，希特勒的手是"上帝指挥的"。于是他们急忙承认这些既成的事实。

① G·萨尔维米尼、G·皮阿纳：《如何对待意大利》，第 151 页。

② A·伍姆塞：《戴高乐及其同谋者》，第 132 页。

梵蒂冈帮助巩固轴心国的后方

6月末，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重新并入苏联。不久，“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人民一致投票支持他们那些异口同声表示愿意在本国实行苏维埃制度的代表，支持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梵蒂冈原来同交战双方的帝国主义者们竭尽全力要把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变成反苏战争的进攻基地，如今认识到，这些反苏计划完全破产了。

梵蒂冈面临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并入苏联以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加入苏联这一事实，加强了反共反苏运动。《罗马观察家报》的编辑们，千方百计地“证明”，比萨拉比亚似乎“纯粹是罗马尼亚土地”，似乎并不是罗马尼亚在1918年侵占去的，而是根据“全民投票”合并进去的。[2]梵蒂冈对于苏联的扩大所表现的不安，

---

① 维·莫洛托夫：《苏联的对外政策》，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0年，第8页。

② 《纽约时报》，1940年7月2日。

丝毫不加掩饰。由耶稣会士出版的梵蒂冈的权威杂志《公教文明》于7月20日发表了一篇恶意攻击苏联的文章，并用“苏联之剑”来恐吓交战的双方。尤其令罗马的耶稣会士不安的是，交战双方都不能不对苏联有所顾忌。梵蒂冈的这家杂志写道，这种情况必然会引起“可怕的后果”。《日内瓦日报》援引合众社从罗马发出的报道说，梵蒂冈人士，鉴于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重新并入苏联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加入苏联，愈加担心共产主义哲学“可怕的”扩散以及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国家影响的增长。教皇为了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作斗争，准备了一篇新的反共通谕。原驻拉脱维亚圣使被任命为在梵蒂冈建立的反共斗争委员会的头目。①

当希特勒匪徒把绞索套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比利时和其他国家人民的脖子上，并准备进行新的侵略行动时，教皇所关心的事，不过如上述而已。他一贯地号召帝国主义阵营进行反苏斗争。为了使这些卑鄙的计划得以实现，天

① 《日内瓦日报》，1940年10月9日。

主教教会的主教们千方百计地巩固希特勒匪徒在德国、意大利以及被占领国家的后方。他们还为希特勒正在准备的反苏战争招徕新的同盟者。

8月末，在富尔达市举行了每年一度的德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德国的，而且还有奥地利的主教，一共有四名红衣主教和几乎所有的主教（四十八名主教中有四十五名参加）。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贝尔宁主教的报告。由他作主要报告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很多问题，因为贝尔宁在1933年法西斯分子刚一上台就由戈林提议被任命为国会议员。① 他以亲法西斯著称。在会议上通过并要在德国所有的天主教教堂里宣读的牧函中表明，教会的权贵们完全赞同希特勒的掠夺与扼杀欧洲的计划。牧函要求信徒们无条件地支持希特勒政府。主教们在向希特勒的强盗军队的士兵讲话时对他们表示感谢。主教们完全按照戈培尔的官方宣传，把德国帝国主义129者发动的这场罪恶战争叫做“正义的战争”，其实

① F·赛辛：《我给希特勒的回报》，纽约，1941年，第214页。

早在1939年，他们就是这么干的。[1]

拜倒在法西斯面前的主教们宣称，德军的战绩保证了德国天主教徒得以毫无阻碍地满足他们的宗教要求，——仿佛为了保障德国的宗教自由，就必须侵占比利时、法国、卢森堡、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其实，无论是富尔达会议之前还是之后，在德国根本没有宗教自由，关于这一点，连梵蒂冈电台偶尔也不能不提到。

德国主教们这种表明德国天主教教会完全赞同德国帝国主义者军事侵略纲领的牧函，是在梵蒂冈了解并赞同的情况下发表的。富尔达会议有教皇圣使奥尔塞尼戈参加。不经他的同意，主教们的亲希特勒的宣言是不能通过的。此外，在会议召开之前，有三名德国主教特往梵蒂冈请求指示，并由梵蒂冈直接返回富尔达。

富尔达会议之后，被派到德国军队中的天主教主教马上根据会议决议精神，向德国士兵中的天主教徒发出号召。这分可耻的文件同希特勒的将军们的命令完全一致，文件竟称："这场战争是

① 《纽约时报》，1940年8月28日；J·威尼威茨：《我们在德国有盟友吗？》，伦敦，1944年，第7页。

不可避免的；这场战争必须进行，而且也正在进行。”主教要人们相信，这场战争在士兵中间唤起了“他们在和平与安全时期不可能在自己身上唤起的那些精神力量，”又称德国“正在进行一场出于国防需要的正义战争”，“正义和天主的祐助”都在德国一边。①

科隆大主教红衣主教舒利泰在致信徒书中，假惺惺地劝谕，希特勒德国向欧洲各民族发动的进攻，使得德国免受其他强国的攻击。舒利泰号召信徒为德国的胜利而祈祷。弗赖堡大主教、法西斯分子贝尔宁在他发出的文告中赞扬了“德国人的英勇”(指那些在被占领国家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的士兵和军官)，并一再声称，德国需要通过这场战争来保障自己的“生存空间”。这完全是重复希特勒及其匪帮的陈词滥调。埃尔姆兰德大主教柯列尔在他的文告中说，似乎德国正在为“争取130生存权利”而斗争，②并不是为了掠夺和征服别的民族。

---

① 《僧侣日报》，诺伊施塔特，巴伐利亚，1940年，第4期。

② J·威尼威茨：《我们在德国有盟友吗?》，第5—6页。

德国天主教的其他主教，也发表过类似的文告。他们利用教会的讲坛进行军事沙文主义的宣传，为希特勒匪徒的犯罪行为祝福。

德国基督教教会的领导人，也发表过同样的言论。"灵魂的牧人"齐心协力地帮助戈培尔和希特勒培养刽子手。

正当德国天主教的主教们奴颜婢膝地声言他们多么支持希特勒的掠夺计划之际，梵蒂冈同德国正在进行秘密交易，谈判内容不仅涉及到如何调整有争议的教会问题，[1]而且涉及梵蒂冈如何通过被占领区的天主教僧侣和世俗的天主教阶层来帮助德国巩固他们在这些国家的地位。

这些主教的言论以及梵蒂冈对他们的立场的支持，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反对。

在英国，切尔姆斯弗德主教威尔逊声明，教皇的政策是反英和反民主的。关于此事，伦敦天主教杂志《宇宙》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教皇的立场；庇护十二世"仿效他的神师的榜样"，不能去讨好无知的人们；他这样做的理由是，"最终看

① 纽约时报》，1940年5月7日。

来，这更有利于拯救人们的灵魂”。[1]“为了拯救人们的灵魂”(即为了反动势力的胜利)，庇护十二世当然认为希特勒得胜最为有利。

9月3日，梵蒂冈电台对报刊登载的富尔达会议“通过决议向元首发出致谢电”一事进行了解释。关于这件事，以及这次会议的一切决定，梵蒂冈电台都假惺惺地说，梵蒂冈似乎“毫无所知”。又不久，梵蒂冈电台企图“驳斥”关于富尔达会议后在德国天主教的各个教堂曾经为希特勒祈祷的报道。

梵蒂冈认为，希特勒的“新秩序”已经取得胜利，并据此得出了相应的结论。尽管梵蒂冈电台偶尔也抱怨德国破坏了同罗马教廷签订的宗教条约，抱怨在奥地利对教会进行迫害，但是基本情况没有变化。不过，对“新秩序”的承认并没有解决某些有争议的教会问题。

131 梵蒂冈极力使被占领国家的人民“服从”德国当局。但是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断奋起同占领军进行斗争。

---

① 《宇宙》，1940年11月1日。

梵蒂冈本来知道德国占领军使波兰人民受到的难以置信的苦难。梵蒂冈电台广播说，1940年6月3日，德国人要求波兰的教会当局，甚至在教堂里也要禁止使用波兰语[1]。尽管如此，梵蒂冈仍然努力使波兰人民和占领军之间达到“互相了解”，也就是说，要波兰人民毫无怨言地服从希特勒奴役者。

梵蒂冈还向波兰天主教僧侣施加影响，要求他们同占领军合作。有一部分波兰僧侣的确转而为德国人效劳了[2]。

例如，主教阿达姆斯基号召居民同“现当局”

---

① O·达切：《阴霾笼罩着欧洲》，伦敦，1942年，第101页。

② 1950年6月，《真理报》记者从华沙报道，波兰的主教们拒绝在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发出的关于禁止和销毁原子武器和宣布首先使用原子武器的政府为战犯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字。据《真理报》记者报道，带头拒绝在这一宣言上签字的是，“曾积极同希特勒匪徒合作的附敌主教。在他们中间，有斯坦尼斯拉夫·阿达姆斯基，他是卡托维茨的主教，是战前西里西亚最大的工业股东之一；还有切斯拉夫·科契马列克，他是凯尔采的主教，在法西斯占领波兰的年代捞到一大笔财产”。（《真理报》，1950年6月9日）。波兰主教团后来考虑到教徒和低级僧侣的情绪，才改变了原来的立场，表示支持《斯德哥尔摩宣言》。

（即法西斯占领军）和平合作。

法国天主教高级僧侣，根据梵蒂冈的总方针，也号召法国人同贝当和德国占领军合作。在比利时，希特勒的代理人中间有教皇的亲信德格雷尔及其匪帮。比利时的许多法西斯分子（雷克斯党徒）从前曾参加过天主教党和“天主教行动会”组织。比利时法西斯的党魁德格雷尔本人就是耶稣会士的门徒和主教皮卡尔特别宠爱的人①。

比利时的高级僧侣，从占领一开始，就根本不反对占领军。他们准备同占领军合作。比利时天主教的主教们，于10月向教徒发出呼吁：“必须132承认占领军政权是实际存在的政权，并在国际协定的范围之内服从他们。”②

捷克斯洛伐克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1950年4月和11月在布拉格对一些天主教神父的审讯表明，当德国占领军在捷克斯洛伐克实行镇压劳动群众的前所未闻的恐怖制度，并残酷杀害成千的天主教徒，其中包括天主教神父之时，捷克斯

① L·莱曼：《独裁者的幕后》，纽约，1945年，第60页；W·鲁特：《战争秘史》，第1卷，第99页。

② L·莱曼：《独裁者的幕后》，第61页。

洛伐克的主教们按照梵蒂冈的指令，向基层教区发出通告，要求“在拉伊赫[1]里工作，同拉伊赫共存亡并为拉伊赫而工作。”[2]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转而为希特勒德国服务。有不少捷克斯洛伐克的神父积极参加同占领军的斗争，但是梵蒂冈在德国秘密警察的帮助下，把这些对它无用的神父清除掉了。

法国失败之后，梵蒂冈同另一个轴心国——法西斯意大利的关系更加巩固了，尽管意大利法西斯报刊讹诈梵蒂冈，责难它同情贝当的法国；法西斯意大利千方百计想夺得法国的某些领土。教皇关于希望“法国复兴”的言论（尽管教皇所理解的“复兴”不过是反动统治而已），却得不到意大利帝国的赞同。

教皇对于法西斯意大利进行掠夺战争的真实态度，在1940年9月4日在罗马向“天主教行动会”五千名会员讲话时，表明得最为清楚。这些

① 拉伊赫，德语“Reich”的俄语译音，意为“国家”、“帝国”。——译者

② 《真理报》，1950年，4月2、3、5、6日，12月3日；《消息报》1950年4月6日，1951年1月20日；《新时代》，1950年，第15期，第27—30页；《每日评论》，1950年11月29日。

会员来自全国各地，还有上百名的主教陪同。教皇当时说："天主教行动会"的成员的义务，是服从世俗当局及其命令。教皇说，天主教徒应该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不仅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是"善良的公民"，一旦"他们的国家的合法的利益要求他们做出最崇高的牺牲时"，他们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教皇的这些话，全是替意大利法西斯的帝国主义掠夺性战争进行辩护。号召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不仅要做一个忠实的基督教徒，而且要做一个善良的公民"，这意味着要求他们驯顺地服从当局，并为德意志资产阶级的冒险目的而牺牲自己。在教皇讲演之后，《罗马观察家报》又发表文章，赞扬意大利的"天主教行动会"，说它尽133到了"对祖国的义务"，也就是说，全心全意为墨索里尼服务。

梵蒂冈这类有教皇和他最亲近的合作者参加的亲意大利的示威行动，以及教皇越来越频繁地接见德意两国的官兵，根本不能证明梵蒂冈对一切参战的大国都"一视同仁"，尽管梵蒂冈的宣传极力要人们相信这一点。

鉴于法国投降后欧洲所形成的局势，美国总

统驻梵蒂冈的私人代表泰勒返回美国，以便“在家里商定对策”。①

与此同时，在法国投降后，希特勒准备进一步扩大战争，打算创造进攻苏联的条件。这一次，德国帝国主义掠夺欲望的最直接目标为东南欧各国，特别是罗马尼亚。早在1940年5月13日，德国驻布达佩斯公使向柏林报告：“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德国向东南欧各国不仅可以提出经济方面的生存空间，而且可以提出一些政治特权的要求。东南欧的大多数国家是不敢加以拒绝的。”② 1940年9月，德国使罗马尼亚完全屈服于自己。罗马尼亚总理由希特勒的傀儡——安东内斯库将军担任。10月，德军进驻罗马尼亚。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外交官和代理人，为了联合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准备发动反苏战争，进行了狂热的活动。意大利和德国以“仲裁人”的身分出现，要求这些国家不要互相斗争，并答应分给他们一部分战利品。9月和10月，里

① 《战时联系》，第29页。

② 《德国外交部文件》，第1卷，《德国在匈牙利的政策》，莫斯科，1948年，第111页。

宾特洛甫和齐亚诺频繁往来于意德之间，希特勒亲自同墨索里尼会晤，并把仆从国政府首脑召往柏林和罗马。

9月，西班牙内务部长塞兰诺·苏纳（不久改任外交部长），被召到柏林。关于他此行的官方报道，西班牙将参加“新型的欧洲团结组织”，即“轴心国”。① 苏纳离开柏林，又到罗马去朝拜墨134索里尼。10月，在西班牙和法国交界的地方，希特勒和佛朗哥举行了会晤。谈判的内容是佛朗哥西班牙如何更积极参加德意帝国主义者的罪恶的战争计划。佛朗哥及其集团被牢固地拴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战车上了。1941年1月8日，德国驻马德里大使施托勒向柏林外交部报告说：“西班牙外交部长请求意大利大使……向齐亚诺伯爵转达，西班牙如果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以渡过饥荒，那么现在就可以参战。他对这一障碍表示十分遗憾，但是他仍然相信这一障碍定会排除。”②

梵蒂冈急欲加强轴心国的地位，因此，全力

① 《1939年的战争》，第4卷，第194页。

② 《德国外交部文件》，第3卷，《德国的政策与西班牙》，莫斯科，1946年，第69页。

支持西班牙统治者的亲希特勒方针，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德意的战争冒险。

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协定。协定称这三个侵略者达成协议，为了取得"它们所必须的空间"，和"建立与维持新秩序"，将"一致行动和互相合作"。[①] 这三个国家彼此承担义务，在掠夺世界和压迫与奴役其他民族的活动中，将"采取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手段来互相支持"。

10月，希特勒同他的傀儡贝当、赖伐尔举行会晤，11月，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加入轴心国。10月28日，法西斯意大利的军队入侵希腊。战争逐渐向东南欧各国扩展。

教皇帮助轴心国组织反苏战争的联盟。

1940年11月，罗马尼亚总理安东内斯库到达罗马，同墨索里尼举行会谈。安东内斯库还受到庇护十二世和国务卿马尔昂纳的接见。安东内斯库的柏林和罗马之行，同罗马尼亚参加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正在准备的反苏战争有关。"约恩·安

① 《消息报》，1940年9月28日。

东内斯库元帅……，在他向苏联审讯机关提供的亲笔证言中说，1940年11月、1941年1月和1941年5月，他同希特勒举行三次会晤，讨论有关反苏战争的准备工作问题。在安东内斯库同希特勒的第一次会晤中，有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的私人翻译施密特参加，讨论了同德国正在准备中的侵苏战争和罗马尼亚参战有直接关系的问题。"① 为了这件事，安东内斯库又到罗马拜访墨索里尼。安东内斯库受到教皇接见，这次接见远非形式，绝不可同接见罗马尼亚其他许多反动政客和教会活动家相提并论。教皇接见安东内斯库，是把他看作轴心国正在准备中的侵苏战争的同盟者。

135

11月，教皇又接见了匈牙利贸易部长，"因为一旦罗马尼亚和德国军队发起对苏的军事行动"，匈牙利"应承担越过喀尔巴阡山打击红军后方的既定任务"。② 教皇也完全支持匈牙利法西斯统治

① 《苏联主诉人P·A·鲁金科同志在纽伦堡审讯德国主要战犯的法庭上的开庭词》，法律出版社，1946年，第18页。

② 摘自安东内斯库同德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于1942年2月10日谈话记录（《苏联主诉人……的开庭词》，第20页）。

者的政策。

意大利和梵蒂冈在南斯拉夫的代理人、大主教斯特皮纳茨也加紧活动。他于1940年10月被教皇任命为“军事代理人”[①]。11月在萨格勒布，在他的主持下召开了天主教主教大会，这次大会，是根据斯特皮纳茨从梵蒂冈领得的指令进行的（他在开会前几个月去过梵蒂冈）。以斯特皮纳茨为首的主教们，在这次会议之后不久就帮助意大利实现了它在南斯拉夫的侵略计划。

教皇支持意大利军队侵略希腊。这个事件的两天之后，他接见了二百名意大利军队的军人，从高级军官直到士兵，并向“他们的善良的祖国”和他们本人祝福，因为他们“怀着忠诚和爱”为祖国服务。

在希特勒同贝当和赖伐尔举行会晤，并为法国卖国贼同法西斯德国亲密合作奠定基础之际，法国天主教报刊遵照梵蒂冈的指令，号召教徒同占领军合作。梵蒂冈电台也为贝当卖国贼帮忙，一边赞扬贝当的政策，一边仿照戈培尔的口吻污

① 《全国天主教年鉴，1947年》，纽约，第772页

蔑法国的优秀儿女。

梵蒂冈对苏芬战争的周年也加以利用。梵蒂
136 冈电台于12月就这件事向芬兰表示了“特别的同情”，教皇本人向赖提发出贺电，祝贺他就任总统。可是，从纽伦堡法庭对德国主要战犯的审讯中得知，早在1940年末，希特勒政府已经得到芬兰配合德国进攻苏联的保证。①

梵蒂冈还积极采取措施同轴心国的第三个成员——日本帝国主义接近。1940年，教皇曾寻找各种借口，几次向日本统治者致意。2月，他曾借日本纪元节之机向日本天皇发出贺电。贺电表示，教皇在为日本（对华战争）的迅速胜利而祈祷。5月，教皇接见了前往罗马同意大利政府进行谈判的日本使团。教皇还派他的特使马列拉主教去日本，寻求同日本亲近。天主教的教皇同“异教徒”的日本天皇能够联合的基础就是他们对共产主义、苏联和受帝国主义者压迫的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仇恨。

① 《苏联主诉人……的开庭词》，第18页。

教皇的新"和平"表演

从纽伦堡法庭对德国主要战犯审讯的有关文件中得知，早在1940年春德国军事当局便制定了进攻苏联的计划。"被告雷德尔在审讯时作证说，进攻苏联的想法早就在希特勒的脑海里出现了，但是随着1940年6月在英国登陆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他的这个想法就越来越坚定。"①

在这个时期，法西斯的宣传极力想影响英国的慕尼黑分子，迫使他们同德国妥协。为了转移对正在准备的对苏战争的注意力，同时为了讹诈英国，希特勒匪徒及其代理人大力宣扬德军准备在英国登陆。实际上，希特勒匪帮并不准备登陆。这还不算，希特勒为了同英国妥协创造条件，于1940年夏给予英国军事当局从敦刻尔克撤退军队的机会。当时，希特勒在同他的将领们谈话时解释说，如果英军在敦刻尔克被俘或被击溃，那么便切断了英国政府同德国妥协的途径。②

137

1940年7月，德国报刊登载大批文章，鼓吹

① 《苏联主诉人……的开庭词》，第17页。

② 关于此事参阅《新时代》，1950年，第4期，第30页。

希特勒的所谓欧洲“新秩序”。法西斯报刊《为德意志服务》写道：“新欧洲”的统治中心为柏林——罗马“轴心”，小国应该受轴心强国的“保护”。[①]法西斯德国认为自己是胜利者，希特勒于7月19日在国会中宣称，他看不出有继续打下去的任何理由。[②]这个匪首的意思是说，只要承认德国已经侵占的土地归它所有，西方的战争便告结束。

德国关于交战双方达成“协议”的宣传，得到张伯伦集团的响应。在后者看来，同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不过是一场误会，他们希望希特勒去打苏联。

正当希特勒向英国的慕尼黑分子发出妥协的呼吁时，教皇又提出他的“和平建议”。教皇在1940年秋冬之际提出的“和平”计划，恰恰与轴心国所希望的“和平”完全符合。梵蒂冈“调解争端”的活动，正中轴心国的下怀，因为当法西斯各国占领了大部分欧洲时，和平能使希特勒的强盗“新秩序”永远保存下去。

最主要的一点是，庇护十二世寻求“和平”的

① 转引自《真理报》，1940年7月15日。

② 《真理报》，1940年7月21日。

目的，在于把交战双方的资产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进攻苏联。这也正是希特勒和张伯伦以及美国和其他各国反动集团所梦寐以求的"和平"。

梵蒂冈积极参予张伯伦和希特勒的代表寻求妥协的秘密谈判。梵蒂冈极力想组成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反苏统一阵线。

在这些谈判中，耶稣会士及其总会长列多霍夫斯基伯爵起了特殊的作用。从战后出现的文献中得知，早在1940年末，希特勒的特务机关的代表便同列多霍夫斯基谈判，让耶稣会士帮助法西斯德国同其敌手达成协议，以便共同进行反苏战争。在谈判过程中，列多霍夫斯基表示，准备为"共同反共斗争的利益"确立耶稣会同德国特务机关之间的合作。据列多霍夫斯基的意见，这种合作应该使德国、意大利同西方强国达到"互相了解"，以便组成广泛的欧美反苏统一阵线。①

138

由此可见，1940年末，在"奇怪的战争"时期，正当交战国双方秘密进行关于在西方结束战争并组成共同的反苏阵线之际，梵蒂冈积极参予

① 瓦尔登：《巨大的阴谋》，载《每日评论》，柏林，1950年8月19日。

了这些谈判。耶稣会的头目、苏联最凶恶的敌人列多霍夫斯基曾经同德国秘密侦察机关的刽子手们谈判商讨耶稣会同党卫队和秘密警察合作，并发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反苏战争。实际上，在整个战争年代，耶稣会一直同德国侦察机关和秘密警察密切合作。

通过上述事实不难看出，教皇庇护十二世正当梵蒂冈力图挑动新战争之际，发表"和平"宣言及和平的"计划"与"条件"该有多么卑鄙！

1940年11月24日，教皇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发表了关于"和谐的和公正的"和平的讲演。他极力不去触犯发动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尽量回避尖锐的政治问题，侈谈"基督教的正义"和"基督教的爱"，说这是建国的基本原则。意大利报刊十分满意这篇讲演，并加以说明。报刊写道，教皇关于必须建立"更为正义的和更为和谐的秩序"的声明，就是对法西斯"新秩序"表示赞同。①

随后不久，教皇在圣诞节向红衣主教们发表的演说，相当大的一部分谈的是"欧洲新秩序的

① G·萨尔维米尼，G·皮阿纳：《如何对待意大利》，第127页。

问题”。这次演说中，有许多内容同希特勒和戈培尔的虚伪的煽动性声明直接呼应。教皇在圣诞节演说中谈到，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次大战的结果，必将建立一种新秩序；“如今有一种共同的信念：战前的欧洲及其社会机构已经进入改革的过程，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意味着新时代的开端”。庇护十二世谈到“新秩序”时所用的语言，跟戈培尔的一模一样。所以德国宣传机器对于教皇演说的这些地方特别拥护是不足为奇的。教皇在他的这篇演说中接着又说道，“交战双方各种不同的政党，抱有不同的理想和目的。然而他们大家追求新秩序的想法则是共同的……”这样一来，教皇就把以奴役欧洲各民族、消灭其文化并把它的人民变成奴隶为目的的轴心国的掠夺计划，说成是追求“更为健全、自由和强有力的社会制度”的理想了。

139

教皇要人们相信，他不想附和交战双方的任何一国，因为“在世界之主的法律的范围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见解活动的广阔天地和自由”。正当全人类都在诅咒法西斯种族主义者这些屠杀别的民族的强盗之际，教皇却宣称“在主的法律的范围内”，应该有“各种各样社会见解”的自

由，其中包括法西斯匪徒的犯罪的“见解”的自由。这是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直接而公开的支持。由于教皇一贯坚持反共，他根本否认共产主义有存在的权利。那么他的演说的意思便是说，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见解”，为了共同的反共斗争可以而且应该和睦相处。

庇护十二世的圣诞节演说，以“新秩序”胜利的“五项条件”作结束。教皇以为用关于道德的议论掩饰一下自己的意图更为有利。他的这些“条件”，比他1939年提出的“和平条件”更为模棱两可。教皇是不想激怒那些法西斯强盗的。

如果考虑到，庇护十二世盼望当时正在希特勒匪帮和张伯伦分子之间在梵蒂冈的参予下进行的秘密谈判尽快达成协议，这一切便容易解释了。因此，在教皇的“条件”中，没有一句责难希特勒侵略者的话，也没有一句同情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及其他被德军占领的国家的人民的话。然而，在“新秩序”胜利的“条件”中，我们却找到了下述说法：“战胜仇恨”(教皇建议被占领国家的人民要战胜对占领军的仇恨)；“战胜不信任”(被希特勒强盗屠杀的人们要放弃对于这些刽子手的

不信任）等等。① 法西斯分子毫不费力地把教皇140的"条件"解释成对他们的夺取"生存空间"的计划的支持。

由此可见，教皇的圣诞节文告，实际上是号召欧洲各族人民服从希特勒德国的统治。

教皇的"和平条件"应该有助于希特勒同英美等国的慕尼黑分子达成协议。教皇恰恰是在列多霍夫斯基等耶稣会士同党卫队就建立反苏统一阵线进行谈判时提出这些条件的。

法西斯报刊对教皇的演说表示赞赏，是毫不足怪的。希特勒的报纸以格外满意的心情提到教皇关于"新时代"、关于建立"新秩序"的必要性已经成熟的声明。教皇关于道德的说教，目的在于转移各国人民对于给他们带来灾难的罪魁祸首的注意力，消除他们对于刽子手的仇恨；教皇的关于道德的说教，教给人们的是奴隶的驯顺和服从。

教皇指示，全世界所有的天主教堂，在12月要为和平而祈祷。但是教皇所宣扬的和平，并不是各国人民所要的和平。

① G·戈内拉：《需要重建的世界》，密尔沃基，1944年，第296—297页。

在教皇"调解争端"的背后，站立着希特勒和英美及其他各国统治集团中的反动派的狰狞形象。这些反动派为了共同的反共斗争，也极力想同希特勒妥协。所以，恰恰在教皇发表在"新秩序"基础上建立和平的讲演时，梵蒂冈和许多国家的天主教组织及天主教报刊进一步加紧了反共宣传，这绝不是偶然的。

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前夜的梵蒂冈和轴心国

据被告凯特尔的证词，希特勒在 1940 年末便打算进攻苏联。早在1940年春，对苏作战计划便已拟定好了。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整个夏天开了一系列会议。1940 年 7 月在雷亨塔尔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讨论了对苏作战计划。另外，被告约德尔的证词也可证实这一点。在审讯时，约德尔作证说，对苏作战计划在 1940 年 11—12 月具体制定，并在当时就向海陆空三军发出第一道命令。约德尔所说的命令，就是指以"巴巴罗塞方案"著称的文件。[1]

---

① 《苏联主诉人……开庭词》，第 17 页

1940年末和1941年初，德国加紧了进攻苏 141 联的准备，除了采取军事措施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以利于他们已经拟定的罪恶行动的实现，从思想上巩固各法西斯国家的后方，并使德国和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对未来的战争能有所准备。希特勒不但准备把德国人民而且准备把被占领国的人民一起投入战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轴心国和仆从国进行反苏战争的思想准备时，又得到了以梵蒂冈为首的天主教会的帮助。

意大利早在战争初期，便在非洲和巴尔干遭到惨败，国内形势极不稳定。连德国报刊《法兰克福报》在2月分谈到意大利形势时也说：

"战争给我们的盟邦带来了失望和严重的损失。对意大利来说，最近几个月事态的发展，意味着严峻的考验。国家第一次感到这场战争的全部严重性，将来有人提起这场战争，一定会说从前的一切战争都会相形见绌。"①

墨索里尼于1941年2月向黑衫党徒发表演说承认，意大利在非洲遭到严重损失，他们需要

---

① 转引自《消息报》，1941年2月18日。

进行长期而艰苦的战争。①

这时，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又得到教会宣传家们的帮助。“天主教行动会”首脑科里大主教向该会成员发出号召：要献出一切力量“为意大利效忠”，要团结在政府的周围，为胜利而斗争。1941年2月初，意大利全国的教堂都举行了祝愿意大利军队胜利的庄严的祈祷。大主教们发表了军事沙文主义的演说。米兰的僧侣还发起了“意大利人民向耶稣心灵献身”的运动。这一运动变成了支持墨索里尼侵略计划的军事政治大示威。

“中立的”梵蒂冈并没有袖手旁观。它不但支持意大利僧侣的行动，而且还亲自积极参加。

2月初，教皇大批接见德意的官兵，并向他们祝福。受教皇之命，红衣主教贝利蒙泰到医院去142看望意大利的伤兵，向他们转达了教皇的祝福，并赠送他们礼品。

1941年2月，意大利同梵蒂冈签订的《拉特兰条约》已达十二周年。意大利报刊为此发表文章，对该条约大加赞扬。

---

① 见《真理报》，1941年2月25日。

梵蒂冈和意大利主教团就这样为希特勒的主要同盟者之一墨索里尼大帮其忙。他们帮助他驱赶士兵去为受到人民反对和敌视的意德资产阶级的利益去打仗。

德国天主教主教团，也极力帮助希特勒军队巩固后方。亚琛大主教在新年祝词中说，他祈求天主赐给德国"元首"和德军士兵以"特殊的力量和恩典"。① 由于希特勒匪徒在德国进行宗教迫害的结果，比意大利主教们处境更为尴尬的德国主教们，仍然甘当德国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并号召士兵们一直战斗到"胜利结束"。

1941年1月，驻梵蒂冈的德国大使冯·贝尔根同教皇就"被占领国家的宗教事务和改善德国梵蒂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谈判。② 驻柏林的教皇圣使馆，根据同最高当局协商结果，命令苏台德区的各个教区归德国教区管辖。③ 这是正式承认法西斯德国对苏台德区的占领。

连法国的主教们，也急忙地巩固希特勒的后

① 《美好的未来》，1941年3月2日。

② 《纽约时报》，1941年1月17日。

③ 《僧侣日报》，巴伐利亚，1941年第3期。

方。1941年初，他们又发出要同占领军当局无条件合作的号召。1941年1月在里昂，2月在巴黎，召开了法国非占领区和占领区的主教会议。主教们在给教皇的联名书信中写道，他们表示完全效忠于已经建立的国家政权，并且要求教徒们对卖国贼贝当和占领军同样的忠诚和服从。① 巴黎天主教大学校长红衣主教波德利亚尔，于1941年1月宣称，他支持同德国的合作。他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他极力证明同占领军合作的必要性。阿腊斯主教杜多瓦及教会其他著名143代表人物也都号召人民同占领军合作。

1月，里昂大主教红衣主教热利埃受贝当的委托前往梵蒂冈。② 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求梵蒂冈帮助巩固贝当的制度，并为战争结束前缔结法德和约的谈判准备基础。热利埃从梵蒂冈回来之后宣称，教皇支持贝当。早在1941年初，法国的主教们便坚决表示反对法国居民反抗占领军当局的行动。在天主教的权威刊物《十字架报》上发表了

① R·加罗迪：《教会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徒》，第94页；《新苏黎世报》，1941年2月10日。

②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1年1月20日。

该报编辑马尔克兰反对抵抗运动的文章。耶稣会士马尔克兰呼吁政府镇压这一运动，他在文章中写道，有的时候，“国家首脑应该拔出剑来”。

法国的抵抗运动越高涨，高级僧侣越坚决反对。梵蒂冈对法国主教团同德国占领军合作完全支持，尽管对于阿尔萨斯教会的可怜的处境不无怨言。①

在其他被占领国家，天主教的主教们也奉行梵蒂冈的同德国占领军合作的方针。

综上所述，1941 年上半年，梵蒂冈和意、德、法的天主教高级僧侣都极力为正在准备进攻苏联的轴心国巩固他们的后方。

1941 年 3 月初，《罗马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天主教传教士团在殖民地的任务的大块文章。文章充满了对于共产主义的攻击。各国的天主教报刊，又开始刊登关于苏联宗教情况的谎言。1941 年 1 月在各教会中宣读的荷兰天主教的主教们的牧函中，便包含着对共产主义的激烈攻击。与此同时，恰恰是荷兰及其他被占领国家的共产

① 《国际新闻简报》，1941 年 4 月 19 日。

党人领导了反对占领军的斗争。荷兰主教们向天主教徒威胁说，如果他们支持共产党，他们便会被剥夺参加圣礼的权利。

梵蒂冈的主教们明白，他们同轴心国合作，会给教徒群众造成极为不良的印象。这一情况促使《罗马观察家报》于 1941 年 2 月出面驳斥广泛144流行的一种观点，即教皇承认“欧洲的新秩序”。该报声言，教皇遵守中立。梵蒂冈不得不进行“辟谣”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许多问题。

在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的前夜，梵蒂冈同轴心国的第三个成员——帝国主义的日本建立关系，并巩固下来。1941 年 4 月，梵蒂冈同日本外相松冈进行谈判时就追求这一目的。

日本已经同轴心国建立了军事同盟。在东京对日本主要战犯的审讯中，确凿证实，尽管日本于 1941 年 4 月 13 日同苏联签订了关于保守中立的条约，日本却仍然帮助了德国。日本同苏联签订条约时就不想遵守它。松冈对他的德国朋友保证：“只要德国同俄国发生冲突，日本的任何首相或外相都不可能迫使日本严守中立。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将基于必要性而站在德国一方，向俄国

进攻。任何中立条约都不会改变这种情况。"①

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一个它在东方进行侵略的掠夺计划，它把这一计划叫做"大东亚共荣圈"。为了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协调动作，松冈于1941年初前往柏林和罗马。4月2日，他受到教皇接见。报界关于松冈来访的报道说，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他的使命是在教皇那里预先求得对于日本侵略计划的支持。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受到教皇特使的帮助，在日本是马列拉主教，在中国是扎尼尼主教。

梵蒂冈以极其盛大的仪式接待了松冈。对国际工人运动和苏联的共同仇恨使教皇同日本军国主义者接近起来。

松冈在同教皇谈话时，大吹日本反共的"功勋"，按照他的意见，由于这一原因，日本有权指望得到梵蒂冈的支持。②在教皇同松冈谈判时，除开其他问题之外，还讨论了为西方结束战事而采取共同行动的问题。③

在进攻苏联的前夕，法西斯德国采取坚决步 145

① 转引自《新时代》，1941年，第46期，第17页。

② 《国际新闻简报》，1941年4月19日。

③ 《国民日报》，巴塞尔，1941年4月3日。

骤，准备同英国媾和，以便进行反对苏联的“十字军远征”。赫斯为了这一目的于1941年5月飞往英国。① 斯大林同志于1941年11月6日的报告中说：“并非无名小卒的赫斯被德国法西斯派往英国，其真实意图就是为要说服英国政治家参加共同反苏战争。”②

庇护十二世同松冈的谈判，也同样只能谈论这类的“和平”。教皇于4月13日发表的复活节演说，指的也是这类的“和平”。③ 据合众社报道，教皇曾经同松冈讨论过他的复活节演说提纲，④ 这是耐人寻味的。教皇在这次演说中，号召为和平而祈祷。

教皇的这些和平呼吁，是同他对法西斯接二连三的侵略行动的祝福密切结合的。比如，教皇赞同轴心国对南斯拉夫的进攻。

1941年4月5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联和南

---

① E·麦金尼斯：《战争的第二年》，伦敦，1941年，第205页；《世界新闻与展望》，1941年，第21期。

② 约·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21页。

③ 《教皇的和平图案》，第53页；《国际新闻简报》，1941年4月19日，第53页。

④ 《国民日报》，1941年4月3日。

斯拉夫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消息报》在一篇社论中评论道："众所周知，近来巴尔干的国际政治局势十分紧张"，"南斯拉夫边界上的情况令人不安"。[1] 这种令人不安的情况就是德意的冒险阴谋造成的。

德军于4月6日侵入南斯拉夫，并占领了这个国家。"这次进攻，只有对被侵略国家说来才是突然的，因为法西斯集团早已……详细制定了进攻方案。在元首大本营于1941年3月27日只发给德军高级指挥官的绝密指令中说：'我的意图在于用集中的打击进入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的内政危机将由于对克罗地亚人的政治保障问题而尖锐起来'。"[2]

德国和意大利在准备侵占南斯拉夫时，不但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而且指望用挑拨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仇恨的方法，促使该国国内形势尖锐化。为此目的，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分子——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代理人被广泛利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在挑起克罗 146

① 《消息报》，1941年4月6日。

② 《苏联主诉人……的开庭词》，第14页。

地亚的天主教徒和塞尔维亚的东正教徒之间的宗教纠纷上大打主意。为了在南斯拉夫挑起宗教的和民族的纠纷，侵略者必须得到梵蒂冈和以法西斯分子萨格勒布大主教斯特皮纳茨为首的克罗地亚天主教僧侣的帮助。

德军占领萨格勒布后，马上宣布成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克罗地亚法西斯分子帕维利奇成为这个傀儡国家的总理，法西斯分子克瓦特尔尼克将军成为付总理。这些“领导”不过是墨索里尼的代理人，这个“独立”国的真正主人是希特勒德国。5月14日，克罗地亚“部长会议”公布决定，在国内建立君主制。克罗地亚王位献给意大利萨伏依王朝。意大利国王把克罗地亚王位给予他的侄子斯波莱托公爵。

“独立”的克罗地亚立刻得到轴心国及其仆从国家的承认。5月，以帕维利奇为首的克罗地亚代表团来到罗马。在这里同意大利签订了边界协定，“关于保障和合作”的条约与军事协定。这些条约肯定了“克罗地亚国”对意大利的依附关系。①

① 《真理报》，1941年5月20日，《美国政治学评论》，1944年12月，第1144—1151页。

梵蒂冈对德军侵入南斯拉夫表现出掩饰不住的喜悦。除开其他各种原因以外，教皇对于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受到扼杀，十分高兴。梵蒂冈的主教们认为，以意大利亲王为王的“独立的克罗地亚国”的成立，也就是如同斯洛伐克、西班牙、贝当法国之类的新型“劳资协会主义的”天主教国家的诞生，也是巴尔干反动的反苏力量阵地巩固的保证以及天主教得胜和东正教消灭的有利条件。事实果然如此，法西斯分子帕维利奇及其匪帮，从他们统治克罗地亚的最初日子起，便大批屠杀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居民，毁坏东正教教堂，并强迫东正教徒改信天主教。仅1941年4月到8月之间，克罗地亚便有三十五万塞尔维亚人 147 被法西斯乌斯塔施匪徒所杀害，有五十万塞尔维亚人被迫逃亡。① 萨格勒布大主教斯特皮纳茨是教皇的代表和受托人，是他领导了对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居民的血腥屠杀。由此可见，梵蒂冈得知德意侵占南斯拉夫，不但不对占领军及其在克罗地亚的走卒犯下的野蛮罪行表示抗议，反而欢

① 《1941年年鉴》，伦敦，第196页。

欣鼓午，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5月18日，在罗马举行了克罗地亚国王的加冕典礼。在加冕之前，国王受到教皇的接见。在举行加冕那天，教皇又接见了克罗地亚“政府”首脑帕维利奇和克罗地亚代表团。①

梵蒂冈同这个法西斯政府建立了极其良好的关系。教皇对于克罗地亚的法西斯分子和天主教僧侣所犯下的一切罪行都负有直接责任。

希特勒匪徒占领南斯拉夫，是轴心国实现反苏战争准备计划中的一个新步骤。梵蒂冈参预了这一侵略行动，从而再一次表现了它完全赞同轴心国的一切计划。

鉴于战事将进一步扩大，并深知德国即将进攻苏联，梵蒂冈急忙调整它同另一个“新秩序”的参加者和轴心国的盟邦——法西斯佛朗哥之间有争议的问题。佛朗哥在1939年建立了法西斯专政之后，便要求梵蒂冈承认他享有根据1851年宗教条约所规定的西班牙国王的权力，即在该教区之内，对西班牙主教的任命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权

① G·萨尔维米尼，G·皮阿纳：《如何对待意大利》，第130—131页。

力。教皇则以宗规法为根据，坚持主教的任命应该归梵蒂冈所绝对掌握。1941年6月7日，西班牙签署的一项妥协协定，是梵蒂冈对佛朗哥政权的让步。这项协定仍以1851年宗教条约为基础。天主教被确认为“西班牙民族的唯一宗教”，学校完全置于教会监督之下，结婚必须经教会认可；与此同时，决定主教的任命问题不是在罗马解决，而是在马德里由西班牙政府协同教皇圣使决定，然后同梵蒂冈协商。①

按照新协定，西班牙主教必须向国家及其政府进行忠诚宣誓，并且不许参加任何“同国家体制不相容的”、亦即反对佛朗哥法西斯制度的或持反对立场的组织或集会。他们还要宣誓，竭尽全力使他所管辖的僧侣忠诚不渝地为法西斯制度效力。新协定使法西斯政府对教会的监督合法化，并且把本来就已忠诚于血腥的法西斯制度的教会变成了法西斯国家机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148

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不久，即1941年6月1日，教皇为纪念利奥十三世的《新事物》通谕五十

① 《1941年年鉴》，第227页；W·鲁特：《战争秘史》第2卷，第88—89页。

周年发表通谕。

庇护十二世宣称，来源于上帝的“天经地义”要求承认私有制，所以尽管每个人都有权利用天然财富，但是这种权利不应该靠破坏私有制原则而加以实现。[①]庇护十二世的新通谕是宣传资本主义神圣不可侵犯的宣言书，旨在反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反对共产主义。庇护十二世的这一通谕，为三周之后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提供了宗教的“根据”，而法西斯德国企图掩饰自己的掠夺目的，便断言它是在领导“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远征”。

综上所述，到1941年6月，梵蒂冈已经完全投入轴心国阵营，并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它同轴心国的大多数成员及其仆从国家建立了最为良好的关系。到这时为止，梵蒂冈已经完全承认所谓希特勒在欧洲建立的“新秩序”，并且也同意日本在亚洲建立“新秩序”的计划。

梵蒂冈所以对强盗的“新秩序”十分满意，首先在于这个“新秩序”旨在反对民主、社会主义和

① 《教皇的新训谕》，伦敦，1943年，《教皇的和平图案》，第53页。

苏联。此外，在梵蒂冈的计划中，强盗的“新秩序”的胜利是同压制东正教的计划相联系着的，这有利于到处传播天主教，并且有利于象在意大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匈牙利以及部分地在贝当法国那样，使天主教成为国教。至于同德国还没有解决的教会机构问题，教皇指望以后妥善解决。除此而外，梵蒂冈在同希特勒分子就教会问题进 149 行谈判时，还企图通过其它轴心国从中斡旋，即通过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和法国的信奉天主教的执政者及其他有影响的政治家。

梵蒂冈对希特勒的“新秩序”的承认和对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反苏计划的赞同，便决定了它对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的进攻的态度。

150

第三章　梵蒂冈与法西斯德国进犯苏联

（1941年6月末至斯大林格勒会战希特勒溃败）

希特勒德国背信弃义进攻苏联 苏联争取建立反希特勒同盟的斗争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背信弃义，大举进犯苏联。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芬兰站在法西斯德国一方，参加了反苏战争。

斯大林同志在7月3日的广播演说中指出：“敌人是非常残酷而铁石心肠的。他所抱定的目的，就是要侵占我们用自己的血汗浸透了的土地，要夺取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粮食和石油。他所抱定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地主政权，恢复沙皇制度，就是要毁灭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

斯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摩尔达维亚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尔拜疆人的以及苏联其他各自由民族的民族文化和国家体制，使他们德国化，把他们变成德意志公侯贵族的奴隶。所以，目前的事件，是关系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事件，是关系苏联各族人民或则保持其自由或则沦为奴隶的事件。"①

151 苏联各族人民，其力量在于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团结在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周围，团结在其天才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的周围，他们奋起参加神圣的卫国战争，反对嗜血的侵略者。苏联的战士们同野兽般的敌人进行斗争，表现了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斯大林同志在1941年11月6日的报告中说："毫无疑义，我国人民为捍卫祖国而战，这种思想一定会在我国军队中产生出，事实上已经正在产生着把红军团结成磐石的英雄……"②。苏联全体人民在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忘我地劳动，供给自己的军队彻底战胜敌人所需要的一切。在德国侵略者的后方，在他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3页。

②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23页。

们暂时占领的土地上，开展了强大的游击运动，游击队不让敌人有片刻安宁，追击和消灭他们，打乱他们的计划。

伟大的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人民反对希特勒强盗的英雄战争，不仅争取把苏维埃土地从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且争取把全欧洲各国人民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斯大林同志在1941年7月3日的演说中指出，对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不仅是两个军队间的战争。它同时是全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伟大战争。这场反法西斯压迫者的全民卫国战争，其目的不仅是要消灭我国面临的危险，而且还要援助那些呻吟于德国法西斯枷锁下的欧洲各国人民。”①

在这次解放战争中组成了英苏美三国反对希特勒德国的同盟。苏联是这个同盟的领导力量，它独自担起对德国及其同盟者战争的主要负担。苏军消灭了德寇的精锐师团。多亏苏联人民英勇斗争，欧洲各国人民才得以从希特勒奴役者魔掌中解放出来，而美英和其他国家人民才得以逃脱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6页。

战败者的命运。苏联人民的大无畏精神从法西斯强盗铁蹄下拯救了文明。

苏联英勇顽强的斗争，鼓舞在德国占领军压迫下的欧洲各国人民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勇敢坚决地斗争。在希特勒所占领的各国开展了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人民抵抗运动。苏联政府在1941年9月伦敦国际会议上的声明中指出，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强加给各民主国家人民的这场战争中，决定着欧洲和全人类许多世纪的命运。决不许纳粹主义的桎梏威胁和平与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命运，决不许武装到牙齿、自命并宣布为最高贵种族的希特勒匪帮，为了实现其统治全世界的妄想，而不受惩罚地摧毁城市和乡村，把大地洗劫一空，屠杀成千上万的和平居民。”①

152

苏联不屈不挠地致力于巩固和扩大反希特勒同盟，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共同进行反希特勒侵略者的斗争。

1941年7月12日，苏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在对德战争中共同行动的协定。两国政府有责

①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第1卷，第164页。

任“在目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在各方面互相帮助和互相支援”，在这场战争期间“未经双方同意，不得进行谈判，不得订立停战协定或和平条约”①。

7月18日，在伦敦签订了苏捷协定，7月30日，签订了苏波协定。这两个协定规定在对希特勒德国的这场战争中相互援助以及在苏联领土上组编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和波兰军队。

8月，苏联和美国交换了关于延长贸易协定的照会。当时，行使美国国务卿职权的萨姆纳·韦尔斯的照会指出，美国政府在苏联反对希特勒侵略者的斗争中给予其经济援助的决定“是由于合众国政府坚信，加强苏联对不仅威胁苏联而且威153胁其他各国人民安全与独立的侵略者掠夺性进攻的武装抵抗，符合合众国国防利益”②。

苏联同挪威和比利时的外交关系也恢复了。苏联政府宣布准备同在伦敦建立的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建立联系和合作。苏联政府声明，它“准

---

①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第1卷，第131—132页。

②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第1卷，第141页。

备在反击希特勒德国及其盟国的共同斗争中给予自由法国人民全面援助……”①。

同英国也签订了关于贸易和贷款的协定。苏联政府的所有这些措施，其目的是团结和扩大反希特勒同盟，以便尽快解救欧洲人民免于死亡。“反希特勒同盟所抱定的目的，就是要粉碎希特勒制度和解放被希特勒德国奴役的各国人民。虽然盟国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和经济制度方面是不相同的，但英苏美联盟成了齐心协力进行反希特勒主义的解放斗争的各国人民的强大联盟。”②

英苏美三国反希特勒同盟的建立，受到全世界劳动人民和各民主阶层的热烈欢迎。这个同盟的建立，增强了被希特勒强盗奴役的欧洲各国人民对迅速击溃万恶的占领军的信心。苏联在这个同盟中的主导作用，使得民主阵营有了胜利的信心，从而促进了所有被占领国国内抵抗力量的发展。无论在那里，共产党人在抵抗运动中都起着最积极的领导作用，树立了勇敢和英雄主义的榜样。

---

①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第1卷，第168页。

② 《历史的伪造者》，第68—69页。

美英和其他国家的反动人物对建立英苏美同盟的态度则完全不同。这些人原先搞过反和平的慕尼黑阴谋，而后来战争开始时，却寻求与法西斯德国勾结，以便组织反苏战争。反动的资产阶级为德国进攻苏联而兴高采烈，希望希特勒匪军一举粉碎苏维埃国家，扑灭全世界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资产阶级害怕本国人民，因而出154卖国家民族利益。阶级利益促使资产阶级同希特勒分子勾结，因为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挽救自己的财富。德国的宣传工具对这种情绪火上加油，以“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吓唬美英和其他国家的统治阶级。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匪军的头目们扬言他们是在“拯救基督教文明”。当德国进犯苏联时，意大利报刊竟号召参加“反布尔什维主义的神圣十字军远征”。

全世界人民坚信，希特勒碰到苏军锐不可挡的反击，必将招致灭亡。他们赞成用一切办法支援和巩固反希特勒同盟。反动的资产阶级则在整个战争期间寻找同法西斯德国勾结的机会，并竭力削弱反希特勒同盟的阵营。

关于英美当权人物的这一政策，维·莫洛托

夫指出：

“当希特勒德国终于向苏联进犯的时候，我国的敌人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大家知道，在德国进犯后不久，伦敦报纸报道说，英国大臣穆尔一柏勒巴松在谈及1941年夏天苏德战场情况时，恬不知耻表示希望苏德两军两败俱伤，而英国则乘机加强自己的实力，便可称霸于世。有些美国活动家也不甘落在穆尔一柏勒巴松之后。1941年6月，《纽约时报》发表了美国一位极有名人物的如下一段言论：‘当我们看见德国会胜利时，我们就应帮助俄国，而当我们看见俄国会胜利时，我们就应帮助德国。总之，要让他们互相残杀，死得越多越好。’”①

发表这番言论的美国活动家不是别人，正是杜鲁门。

当希特勒军队进攻苏联的时候，英美两国当权人物深信希特勒德国很快就会“消灭”苏联，苏军的抵抗持续不了多久。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向美国总统报告说，苏军能顶住德军逼攻最多不

① 维·莫洛托夫：《对外政策问题》，第493页。

[155]过六个星期。英国参谋总部则认为东方战争的进行不会超过四星期。美国总统驻伦敦私人代表亨利·霍普金斯于1941年7月25日打电报给总统:"此间认为，俄国战役（即苏军的抵抗。——舍英曼）仅能保证英国人短暂喘息。"① 然而，就是这个霍普金斯，1941年7月末访问苏联之后，在其记述中指出,英美的打算已经不能建立在"俄国很快崩溃"的可能性上了,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完全改变了"②。改变了什么呢？亨利·霍普金斯深信，希特勒秘密和公开的朋友们希望苏维埃制度崩溃是毫无根据的。他深信,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党的领导下，在伟大斯大林的指挥下，决心捍卫其社会主义祖国和粉碎冒险进犯的敌人。

梵蒂冈和天主教主教们赞同希特勒德国进犯苏联

梵蒂冈和天主教全体权势人物，也同整个反

---

① M·希尔:《斯大林、罗斯福与丘吉尔，载《复兴》，柏林，1949，第12期，第1099—1105页。

② M·希尔:《斯大林、罗斯福与丘吉尔》，载《复兴》，柏林，1949，第12期，第1099—1105页。

动阵营一起，指望苏联在劫难逃。因此，他们由于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而得意洋洋。他们在慕尼黑时期梦寐以求的宿愿终于实现了。诚然，按照梵蒂冈心愿最好现在就能看到一切资产阶级国家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但是，它只能指望这样的统一战线在其积极参与下能在战争过程中形成。

各参战国和中立国天主教上层僧侣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同梵蒂冈对待德国进攻苏联的态度密切相关。

德国天主教的主教们根据其固有的反民主反苏立场，都拥护向苏联进攻，赞美德帝国主义对苏维埃国家的罪恶战争。他们在1941年7月的《告德国人民书》中宣称："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将等于基督教义的辉煌胜利。"①

德国的主教们，在1941年与以后曾表示过反对希特勒统治者在德国推行的宗教政策；主教们认为这个政策会削弱法西斯的后方，会妨碍德国在战争中获胜，他们所希望的正是法西斯德国的 156

① J·麦凯布：《梵蒂冈与纳粹》，伦敦，1942年，第46页。

胜利。作为本国的帝国主义奴仆，德国天主教的(还有新教的)主教们，竭力使所有的德国人团结在反人民的法西斯匪帮政府周围。但是，尽管他们(极其谨慎地)批评希特勒的宗教政策，却从来没有谴责过希特勒的掠夺性战争，以及司令部与所有德军在占领区犯下的罪行。

伦敦一家亲近工党的杂志写道，“战争时期，天主教在纳粹德国奉行的政策，是在‘防御’和进行战争的事业中同国家忠诚合作”①。这家杂志接着写道，“教会既没有对集中营提出过抗议，也没有对德国战争方式提出过抗议”，即没有对希特勒在被占领各国所犯的罪行提出抗议。

为墨索里尼效力的意大利上层僧侣，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在法国，反动的天主教人士也为希特勒进攻苏联感到高兴。在希特勒分子面前匍匐献媚的法国红衣主教波德利亚尔，于1941年6月30日谈及希特勒德国对苏联的罪恶战争时居然说，这是“为了保卫欧洲文化免于共产主义蹂躏的英勇事业”②。

---

① 《政治季刊》，1946，第4期，第302页。

② R·加罗迪：《教会、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徒》，第94页。

法国人民的叛徒——贝当集团——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并且开始组织“志愿军团”援助希特勒分子。正值此时(1941年7月24日)，法国天主教的大主教和主教们发表了一项声明，要求法国人民俯首听命于贝当和他的柏林主子。大主教和主教们写道：“我们尊敬国家元首，并坚决要求全体法国人团结在他的周围”。天主教权威报纸《十字架报》要求政府和占领军无情地镇压游击运动①。这一切都是因为法国的主教们竭力想在反苏反法国人民的战争中帮助希特勒。

希特勒德国在各中立国，首先是在美国，有着庞大的间谍——宣传网。这个国家里为数众多的法西斯间谍组织同天主教会及天主教组织、同希特勒的走狗——“广播神父”柯林及其教权法西斯协会有着密切联系。 157

希特勒进攻苏联后，美国的希特勒分子在“孤立主义”口号下开展了有利于法西斯德国的疯狂的反苏运动。美国天主教会权势人物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猖狂，他们伙同胡佛、林白、美国“社会

① R·加罗迪：《教会、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徒》，第94、97页。

主义者"首领诺尔曼·托马斯神父以及其他人，领导了亲希特勒的运动，反对同苏联合作[①]。

华尔街的这些走卒断然扬言，不应当反对希特勒，而应当同美国共产党人作斗争。美国希因主教、红衣主教奥康内尔、天主教的许多其他主教以及所有的天主教报刊，疯狂地掀起了反对美苏在战争中合作的运动[②]。他们号召同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作斗争，不言而喻要同希特勒合作，而希特勒也是用同共产主义斗争的口号来掩盖德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计划。美国各天主教组织在上层主教们的鼓励下，展开了歧视和反对苏联的宣传。

柯林及其法西斯组织"基督教阵线"（同德国在美间谍中心"德美协会"有着密切联系）狂吠狂叫，说美国的主要敌人乃是苏维埃国家而不是法西斯主义。天主教主教们还通过其他法西斯式的组织——"哥伦布骑士团"、"退伍军人团"等等开展活动[③]。他们对罗斯福千方百计地施加压力，

① «1941 年年鉴»，伦敦，1942，第 268 页。

② G·萨尔维米尼和 G·皮阿纳：«如何对待意大利»，第 133 页。

③ L·莱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梵蒂冈政策»，纽约，1946 年，第 42 页。

迫使他拒绝美苏合作，甚至于不少天主教活动家（其中有法布罗的德菲）声称，如果美国成为苏联的盟国，那末他们将号召信奉天主教的美国士兵拒绝服从命令①。

南美洲天主教上层僧侣，不仅同梵蒂冈，而且同美帝国主义有着密切联系，他们也持同样的立场。南美洲的德国的代理人广泛地利用天主教组织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

158 珍珠港事件之后，即日本对美国开战初期，希特勒的美国走狗通过教堂讲坛和天主教报刊开展的反苏运动依然如故，只不过采取了另外的方式，即使在此之后，美国天主教的主教们仍然继续奉行其仇苏政策，进行破坏反希特勒同盟的阴谋，并且参与了美英反动分子同希特勒德国单独媾和的秘密试探。

苏联承受了德军的主攻，顶住了他们的进逼，然后击溃了法西斯德国，从而挽救了英国免遭覆灭。在苏联战场上决定了英国的命运。英国人民深知苏联人民及其军队的英勇斗争对于他们和

① A·曼哈顿：《拉丁美洲与梵蒂冈》，伦敦，1946年，第27页。

全世界具有何等意义。英国人民对苏维埃国家抱着同情与好感。英国天主教会领导人不得不考虑这一点，虽然从 1917 年起他们就站在极端仇苏的立场上，并且经常伙同顽固的保守党人进行反苏。

1941 年，正当希特勒威胁英国而苏联为拯救英国承受了德国武装力量的主攻之际，英国天主教主教们无法公开推行其反苏政策。他们的立场特点是表里不一，其基础是仇视苏联，耽心苏联不断强大。战争开始时，英国天主教人士表示赞成同苏联合作，不过有“附带条件”，而这些附带条件无论如何也无助于反希特勒同盟的团结①。例如，天主教机关报《神灵之剑》写道，现在存在着一种极大的危险，这种危险是有人想“利用共产主义粉碎欧洲的希特勒霸权”，为此这些人准备援助各国共产党人。这就是危险所在，因为共产主义在战时越强大，战后要按照“欧洲传统恢复秩序”就越困难。

天主教的这家报纸所说的符合于“欧洲传统”的“秩序”，指的是资本主义“秩序”。早在 1941 年

① 参阅《现代季刊》，1949—1950 冬季，伦敦，第 50—52 页。

战争开始时，英国天主教人士就对共产主义会在战后日益强大表示耽心了。

伦敦报纸《天主教时报》在1941年7月18日的社论中承认，苏联承受了“德国残酷进攻的全部重担，而且是代替我们承担的”(即代替英国)。这家报纸还承认与苏联结盟有利于英国。然而，它感到有必要强调其对共产主义的否定态度，于是接着就声明：“我们是共产党人的盟友，而不是共产主义的盟友”①。 159

谁也不会期望英国天主教领导人士能拥护共产主义，决不要求这样。不过，当务之急是使反希特勒同盟团结起来，面临法西斯奴役的危险，却强调天主教徒与共产党人的分歧，而不是指出更多的促使他们团结的因素，这是不利于热爱自由的各国人民的。

英国天主教主教们在1941年6月和7月承认，苏联代替英国承受了德国进攻的打击。提醒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们在战争过程中力求“忘却”这一点，而在苏军给予法西斯军队毁灭性打

① 转引自《世界新闻与展望》，伦敦，1941年8月2日。

击之后，英国天主教的上层人物却公开采取了极端仇视苏联的立场。

加拿大天主教报纸《天主教行动报》更露骨地说出了天主教主教们居心叵测的计划。1941 年 9 月 4 日，这家报纸写道："苏联的抵抗与我们利害攸关，但是我们对苏联的迅速胜利不感兴趣"①。这与上述的英国航空工业大臣穆尔一柏勒巴松和杜鲁门的无耻言论如出一辙。英国及其自治领的天主教主教们都站在英国当权人物的立场上，他们所怕的也正是丘吉尔所怕的，这就是苏联威力的增长、民主阵营的胜利。

梵蒂冈也同各国天主教上层人物一起，为德国进攻苏联而兴高采烈，这是它的战前立场的自然继续。

1941 年 6 月 29 日，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后一星期，教皇发表了广播演说。他谈到战争的惨祸、战争给人们和各国人民个人和家庭生活的灾难②。然而，教皇只字未提希特勒分子刚刚犯下的新罪行——进攻苏联。全人类注目的最重大事

① 转引自W·侩特：《战争秘史》，第 2 卷，第157页。

② 《国际新闻简报》，1941年 7 月 12 日。

160

件，已经开始的决定欧洲和全世界命运的大搏斗，他却避而不谈。教皇噤若寒蝉，因为他不愿谴责德国，但是又不能说自己支持希特勒匪徒，因为他明知世界舆论同情苏联，公开支持希特勒的罪行，有损于梵蒂冈和整个天主教会的声誉。教皇认为尽量更隐蔽地推行其亲希特勒政策较为妥善。于是他授意德国、意大利、美国、南美洲、西班牙、欧洲各被占领国的天主教主教开展反苏运动，挑拨离间反希特勒同盟，这样做同样有利于“轴心”国。

庇护十二世的仇苏立场，他对希特勒反苏战争的赞同，由于1941年9月泰勒第二次出使罗马而暴露得特别明显。

当时任《纽约时报》驻梵蒂冈记者的查费拉，既接近梵蒂冈上层人物，也接近美国驻教廷代表机构，他报道，1941年7月初，代泰勒担任驻梵蒂冈总统代表的哈罗德·蒂特曼，曾两次觐见教皇及其国务卿，转达了美国国务院的愿望：请教皇放弃那些会被理解为同意“轴心”国政策的措施①。蒂特曼有足够根据向教皇提出这种要求，因为有

---

① C·查费拉：《梵蒂冈与欧洲战争》，第273页。

大量事实证明教皇的亲德立场，证明梵蒂冈当局对进攻苏联抱赞许态度，并且仇视反希特勒同盟。

蒂特曼的使命看来未能完成。罗斯福于是急忙派出泰勒前往罗马。泰勒谈及此事时指出，过去，庇护十一世在 1922 年曾特地表示反对共产主义，禁止天主教徒同共产党人合作；但现在，美国政府决定援助苏联，因此有必要向教皇阐明美国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及弄清教皇的立场。此外，泰勒说，罗斯福还委托他了解教皇对大西洋宪章[161]的态度，如果教皇同意大西洋宪章的原则，那末就请他向全世界表明态度①。

泰勒再次出使，还因为美国政府企图转变美国天主教僧侣公开的亲希特勒立场，压制他们反对反希特勒同盟的顽固斗争和对美苏合作政策的攻击。美国天主教僧侣的这种政策已把一部分美国天主教徒引入了歧途②。

---

① 《教皇庇护十二世与罗斯福总统战时联系》，第 57—58 页。

② 关于泰勒的出使，德国统一社会党机关理论刊物《统一》杂志写道：罗斯福不得不“在 1941 年 9 月 3 日致教皇的信中驳斥了教会的反苏宣传，指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对教会的危险性”（《统一》，柏林，1949，第 11 期，第 1008 页。并参阅《柏林日报》，1938 年 7 月 15 日）。

只能指出，罗斯福向教皇呼吁支持反希特勒同盟，可是，他却仇视这个同盟的宗旨，而总统的使者属于并不打算彻底粉碎德国法西斯的美国统治集团：他们只不过想在世界市场上排除德国的竞争而已。

从罗斯福 9 月 3 日致教皇信中可以看出，泰勒奉命在梵蒂冈讨论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与希特勒德国进犯苏联有关的问题。罗斯福给教皇写道，法西斯德国企图征服全世界，德国希特勒的独裁，对宗教、教会以及全人类来说是真正的危险。罗斯福写道，应当清楚地意识到这一事实。

罗斯福赞成在苏德战争中援助苏联，当然认为美国天主教主教们的立场有利于希特勒。罗斯福在其致教皇信的结尾说，“我深信，美国所有教会的领导人应当认清事实，不应该对根本问题视而不见，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目前的立场是在直接帮助德国”①。

9 月 9 日，泰勒抵达罗马。虽然他不属于苏联的朋友之列，但他却承认，美国和其他国家都

① 《战时联系》，第 62 页。

极为“钦佩俄国人民”，他们正在“为保卫自己的祖国”免遭希特勒侵略者蹂躏而“顽强地斗争”①。

162 战后泰勒公布了关于战时他出使的材料，其中并无1941年9月与教皇谈判的详细情节。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在1947年公布了这些文件，附有庇护十二世写的序言，这时泰勒已经是美国新总统的代表，在战后实行美国统治世界的政策中同教皇亲密合作了。他会在他的书里承认庇护十二世在1941年是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同在一个阵营的吗？泰勒只能公布大家早已知道的东西——谈判时教皇申明了自己对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国家的仇视②。就是这种仇恨，使得庇护十二世成为希特勒的盟友，期望他谴责美国主教们的亲希特勒立场，岂不枉费心机。

泰勒避而不谈教皇对罗斯福的建议作何答复。他只援引了庇护十二世1941年9月20日给总统的正式复文。庇护十二世写道，关于总统的建议他同泰勒进行了多次会谈，向他阐明了自己对事态的观点。什么观点呢，他没写，显然将由

① 《战时联系》，第57页。

② 《战时联系》，第58页。

泰勒亲自向总统报告。教皇怀着如下的信心结束了他的信：他祈祷建立在“基督教原则上”的和平早日到来①。

泰勒同教皇谈判时究竟谈了些什么？教皇对罗斯福的来函采取了什么立场？

纽约《现代史料》月刊在 1941 年 12 月写道：泰勒同教皇的谈话如此重要，以致教皇要求容他几天时间考虑所讨论的问题。这家杂志接着写道，谈的似乎是请教皇承认对“轴心”国的战争是正义的，但是教皇拒绝了这个建议②。

关于这次谈判，伦敦天主教报纸《天主教先声报》的编辑写道，罗斯福使教皇相信，全世界的利益与战胜德国休戚相关，请求他在道义上支持同盟国的事业，或者哪怕是谴责一下“轴心”国的政策。然而，这些努力都失败了③。

当时正在梵蒂冈的查费拉，比较详细地报道了泰勒同教皇的谈判。他写道，教皇拖延了五天

---

① 《战时联系》，第 63—64 页。

② 《现代史料》月刊，1941 年 12 月。

③ 米·德·拉·贝杜阿：《梵蒂冈与今日世界》——《双周刊》，伦敦，1943 年 4 月，第 226—232。

才答复罗斯福的建议，最后还是给了否定的回答，163 他推诿说他“代表全体天主教徒”，战争双方的营垒里都有天主教徒，因此他似乎不能支持战争中的一方①。

凡是正直的人，都会认为教皇的答复经不住任何批驳。何况这种答复是虚伪的，因为教皇早已加入法西斯食人者的营垒了。他的答复，证明了他不愿意阻碍希特勒的美国天主教走狗们搞的瓦解同盟国事业的宣传，不愿意对希特勒阵营的掠夺性反苏计划和行动哪怕口头上稍加谴责。

庇护十二世同泰勒的谈判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1941 年 9 月，报刊上报道说，教皇拒绝承认对希特勒分子的战争是正义的，此时，梵蒂冈机关报《罗马观察家报》急忙发表声明，说是没有任何人向教皇提出过这样的建议。《罗马观察家报》写道，“我们受权声明，从未有过这种请求；因此，这种报道(指教皇的否定答复。——舍英曼)毫无根据”②。现在，泰勒公布了（居然还附有庇护十二世的序言）罗斯福同教皇的信件，就不难

① O·查费拉：《梵蒂冈与欧洲战争》第 273 页。

② 《国际新闻简报》，1941，10 月 4 日。

使人相信，教皇的这家报纸声明“实无其事”是在撒谎。问题全在于梵蒂冈在战时的政策是如此亲希特勒，以致当报刊上透露出泰勒同教皇谈判的某些情节时，梵蒂冈就急忙加以否认。

10 月 2 日，泰勒返回美国。离开意大利之前，他把他在佛罗伦萨的价值五十万美元的高级别墅赠给了教皇①。

梵蒂冈对德国进攻苏联的态度，再次表明了天主教主教们的反动性。他们的立场与包括千百万信奉天主教的劳动群众在内的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背，虽然主教和其他僧侣们疯狂搞反苏运动，但是这些天主教徒却站在苏联这一边。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在研究美国民意材料的基础上得出了结论：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希特勒关于他正在进行神圣的反共战争的声明，对美国人民没有产生影响”②。

反动的天主教组织（“天主教退伍军人团”等等）向罗斯福请愿，要求拒绝同苏联合作，但适 164

① 《现代史料》月刊，纽约，1941 年 11 月。

② 《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鉴》，1942 年 3 月，第 145 页。

得其反，甚至某些天主教活动家也考虑到人民的情绪，表示赞成这种合作[1]。

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他们的走狗吉斯林分子，号召组织"反苏十字军"未能成功。无论在比利时、荷兰、葡萄牙、挪威、法国（德国人、维希分子和反动的天主教上层人物在那里策划组织大军去对苏作战），或者在其他国家，这种号召都没有得到劳动人民的支持[2]。

梵蒂冈及其权势人物与天主教的群众是站在各不相同的营垒里的。

关于梵蒂冈的所谓"中立"

反希特勒同盟进行的是正义的解放战争，旨在拯救人类免遭希特勒的蹂躏；"轴心"国进行的战争则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旨在奴役欧洲人民，剥夺其民族独立，消灭其民族文化，使他们沦为德国资本家和容克地主的奴隶。

斯大林同志在其 1941 年 11 月 6 日的报告中指出：

---

① P·格雷夫斯：《第七季刊》，伦敦，第 257 页。

② P·格雷夫斯：《第七季刊》，伦敦，第 257 页。

“列宁把战争分为两种：侵略战争，即非正义的战争；解放战争，即正义的战争。德国人现在进行着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这个战争是打算侵略他国领土并征服他国人民的战争。因此，一切正直的人们都应当把德国侵略者当作敌人而奋起反抗。苏联及其同盟者与希特勒德国不同，是进行解放的、正义的战争，这是打算把被奴役的欧洲和苏联人民从希特勒暴政下解放出来的战争。因此，一切正直的人们应当把苏联、英国及其他盟国的军队当作解放军而予以援助”①。

苏联参战之后，更加强了对“轴心”国战争的反法西斯性质和解放性质，在击溃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中起了主要作用。

斯大林同志于1946年2月在莫斯科斯大林 165 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对轴心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具有反法西斯、解放战争的性质，恢复民主自由也是这场战争的任务之一。苏联参加反轴心国的战争只会加强（并且的确加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34页。

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的、解放的性质”。①

各国的亿万人民（其中包括千千万万天主教徒）对反希特勒同盟进行的反击“轴心”国的战争的正义性深信不疑。

美英两国的广大人民群众要求他们的政府履行盟国的义务，忠于同苏维埃国家的联盟。他们坚决反对与希特勒分子勾结的企图，并且坚决要求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各国人民对苏军的每一胜利感到高兴，深知这些胜利将会把全世界从法西斯奴役的危险中解救出来。

欧洲各被占领国的人民群众，把反希特勒同盟的事业看作是把他们从希特勒占领的恐怖中解放出来的正义事业。他们注视着苏联和苏军，把苏军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他们参加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游击运动。

为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希特勒占领军铁蹄下解放出来而斗争的传奇式的战士、共产党员尤利乌斯·伏契克，在从事极秘密的地下工作时，于

① 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前选民大会上的演说》。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6年，第7页。

1941 年 11 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地下机关报《红色权利报》上写道，德寇进犯苏联是希特勒走向灭亡的第一步："因为尽管他以空前的损失为代价暂时取得了成功，但是他将永远不能战胜苏联的力量……这场斗争只能以希特勒彻底失败而告终。而在这场斗争中……也决定着我们的命运……"。①

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希特勒匪帮及其在英美和其他国家的有势力的同伙，利用参加反希特勒同盟的各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千方百计地离间同盟国之间的关系。 166

斯大林同志在 1942 年 11 月 6 日的报告中指出：

"有人说，假使英苏美同盟中没有一个能够削弱它和瓦解它的本质上的缺点，那末，英苏美同盟是有获得胜利的一切机会的，而且一定会获得胜利。按照这些人的意见，这个缺点表现在这一同盟是由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制度的国家组成的。这种情况使它们不可能组织共同行动来

① 尤·伏契克：《随笔论文集》，国家外国书籍出版社，1950 年，第 145—146 页。

反对共同敌人。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否认英苏美同盟成员之间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别，当然是很可笑的。但是，这种情况是否排斥该同盟中各成员可能并宜于采取共同行动去反对那个使它们受到奴役威胁的共同敌人呢？无疑是不排斥的。况且，已经造成的这种威胁，迫使这个同盟中各成员必须共同行动，以便挽救人类，使之免于退回到野蛮时代，退回到中世纪残暴时代去。难道英苏美同盟的行动纲领还不够作为根据来组织共同斗争反对希特勒暴政，并达到战胜的目的吗？我认为是完全够了的"①。

反动势力完全本着法西斯宣传精神，千方百计分裂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阵营，其中名列前茅的就有天主教会的主教们。

教皇、他的红衣主教和主教们，喋喋不休地强调"基督教原则"与共产主义的不可妥协性；为了拯救人类免遭法西斯奴役，各国人民需要统一行动而不问对宗教的态度如何，可是，教会领导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72—73页。

人士却强调参加反希特勒同盟的成员国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竭力设法在它们中间散布仇恨和怀疑。梵蒂冈为了“轴心”国的利益，千方百计地把天主教群众的注意力从政治问题转移到宗教问题上去。但是，进行斗争并不是为了宗教信仰，而是为了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关于宗教与共产主义是否相容或不相容的问题，对这场斗争来说毫无关系。反动分子——希特勒的走狗们故意夸大这一点。梵蒂冈也干这种罪恶可耻的勾当。教[167]皇以宗教为借口，千方百计地证明他（并非受宗教原则所左右的）仇恨反希特勒同盟的领导力量——苏联和他同情“轴心”国的反苏反民主计划是正确的。

但同时，梵蒂冈也考虑到各国人民对希特勒侵略者的仇恨。因此，教皇在煽动仇恨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时候，一再保证，他在战争中是“中立的”，站在“斗争之外”。

资产阶级报刊，首先是与维护教皇威信有着特殊利害关系的天主教报刊，无论在战时或战后（战后尤甚），对教皇“中立”的神话总是津津乐道，企图用如下的理由为教皇的战时政策辩护：

似乎他无法“站在一方的立场上”，如果那样，就会使另一方的天主教徒感到委屈。对他说来，“一切天主教徒都是他的儿女”，他“对他们一视同仁”。

一位美国天主教作者，在受到教会书刊检查机关和纽约大主教斯佩尔曼赞赏的一本书里，对于批评庇护十二世的政策提出不同意见，他想使人相信，教皇的活动似乎“不受政治倾向的约束”，庇护十二世似乎比其所有的前任更为努力地避免教会参与政治的任何嫌疑，战时，教皇似乎把一切天主教徒——无论中立国的或参战国的——都看作是“自己的儿女”①。

意大利天主教党的首领斯图尔佐神父是教皇政策的狂热辩护士，他在1944年写道：庇护十二世在战时的中立是政治上的而不是道义上的；他非常“谨慎”，因为他不愿给“轴心”国以同宗座发生冲突的借口②。总之，虽然教皇似乎“在道义上并非中立”，但是对希特勒的侵略却始终不肯表示反

① C·兰金：《教皇言论集》第3—5页。

② L·斯图尔佐：《意大利与世界新秩序》，1944年，第162页。

对，唯恐法西斯分子会以为他在谴责他们的罪行！

庇护十二世本人战时屡次声称：法西斯德国和侵略的受害者，对他来说"同样珍贵"。《罗马观察家报》在1943年12月对天主教首脑战时的立场概括如下："教会为全体世人而不为某个人"①。

反希特勒同盟在这场战争中为正义事业而斗争，而希特勒的"轴心"国是非正义的，这场战争决定着人类的命运，而梵蒂冈在战争中的这种立场，丝毫不能给教皇自诩的"道德权威"增添什么光彩，因为对待希特勒分子的罪行漠然置之，其实质就是帮凶。 168

然而事实上，梵蒂冈根本没有采取"中立"立场。《罗马观察家报》写道，宗座不可能对当代的冲突（即对战争）漠不关心。那末，他究竟赞成谁呢？据教皇的报纸说，他赞成神的物当归于神，"该撒的物当归于该撒"②。

教皇对两个阵营天主教徒提出的这种要求，

① J·斯克里夫纳：《同德国人一起在罗马》，纽约，1945年，第79—80页。

② 《罗马观察家报》编辑部给G·戈内拉《需要重建的世界》一书写的序言，第24页。

表现了梵蒂冈统治者的骇人听闻的厚颜无耻和伪善。要求信徒们处处把"该撒的物当归于该撒"，实际上意味着赞美战争而不管此方或彼方所追求的目的如何。这一要求意味着希特勒、墨索里尼及其盟国部队中信奉天主教的士兵应该忠于其"元首"，并执行他们的一切命令，包括在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被占领区屠杀千百万人民，在麦丹尼克、布痕瓦尔德；奥斯威辛以及其他集中营的炼人炉里烧死成千上万的老人、妇女和儿童。

伦敦反动杂志《十九世纪以来》，解释教皇为什么不谴责德国法西斯分子的战争时，用如下的说法袒护梵蒂冈：他不愿引起"宗教与爱国主义的冲突"。这家杂志解释说，天主教会主张士兵们无条件服从命令[①]；谴责希特勒分子的政策，也就是在德意两国士兵的头脑里散布怀疑，这一点恰好是教皇不愿意做的。

美国一家专论外交政策的杂志也以类似腔调替教皇的立场辩护，说什么：教皇不愿引起"爱国主义与政策的冲突"，破坏"梵蒂冈长期形成的

① 《十九世纪以来》，1941年2月。

特殊立场：作为超然于战争之上的力量"①。资产阶级的作者们千方百计地把他的亲希特勒政策简单地概括为"超然于战争之上"，他们在战时就是这样袒护梵蒂冈的。

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者萨尔维米尼教授和拉·皮阿纳教授谴责梵蒂冈的战时政策时写道："教皇就象一支庞大军队的最高司令官，尽管他的 169 一部分士兵（世俗天主教徒）和军官（天主教主教和僧侣）站在一方队列里，而另一部分站在另一方的队列里，双方都积极参加战争，而这个最高司令官却宣布他严守中立"②。

梵蒂冈并未超然于"战争之上"，在整个战争期间，它站在苏联和欧洲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不可调和的敌人那边参加了战争。战争一开始，作为教会领导人的教皇就使宗教为希特勒匪徒的吃人计划效劳。当德意两国的主教遵循梵蒂冈的总方针向士兵宣讲执行希特勒司令部的命令是他们"神圣天职"时，这些主教不仅是为德军司令部大

① 《外交政策报道》，纽约，1944年1月15日，第278页。

② G·萨尔维米尼，G·皮阿纳：《如何对待意大利》，第121页。

力效劳，而且成了它的帮凶。当德国各宗教杂志在教会当局赞许下，宣扬牺牲于德国资产阶级发动的罪恶战争之中的士兵，可“与基督媲美”时，主教们就成了希特勒分子罪行的同犯。

下令屠杀被占领各国和平居民，并且同士兵一起参加大规模残杀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德国将军和军官，大多数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希特勒匪帮头目之中有不少天主教徒：希特勒、戈林、戈培尔、赛斯—英夸特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①]。希特勒刽子手们口不离信仰上帝。主要战犯之一约德尔将军，战后被捕并因其罪行累累被送交审判时，居然声称，他的所作所为都没有“忘记上帝”。另一个参与希特勒罪行的战犯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审讯中声称，他“向来是个好基督徒”[②]。至于刽子手和掠夺者戈林，各报报道，1945年12月，他作为战犯坐牢，竟“饱含泪水”高唱圣

---

① 美国1947年度天主教年鉴特别指出，在纽伦堡法庭受审的德国主要战犯之中，有天主教徒巴本、赛斯—英夸特、汉斯·弗兰克和卡尔登勃鲁纳（《全国天主教年鉴，1947年》，纽约，第703页）。

② 《每日评论》，柏林，1946年3月30日。

诞赞美诗①。对于所有这些强盗，连同匪帮最大的头子希特勒（此人也口口声声强调上帝与他同在，“上帝佑助他”）在内，教皇未予开除教籍，170 并且根本不予谴责。

梵蒂冈完全赞成德意两国僧侣的军事沙文主义立场，并且积极支持被占领各国的附敌主教，鼓励同盟国和各中立国的天主教主教们开展反苏宣传，参与美英反动分子同希特勒勾结以便共同进行反苏战争的密谋，凡此种种，都表明它根本没有超然于“战争之上”，而是在为法西斯匪帮及其公开的或秘密的同伙效劳。

说什么罗马教廷是“根本反对战争的”，这也纯属无稽之谈。在它一千五百年历史过程中，历任教皇经常进行战争，而且往往亲自率领主教们一起出征。教皇国废除（1870 年）以后，教皇失去了领土和军队，已经无法直接进行战争了；然而，梵蒂冈仍然参加了并正在参加各国之间发生的战争的某一方。而且梵蒂冈的立场并非取决于什么“崇高的”、“宗教上的”理由，而纯粹取决于

① 关于此事，请参阅《奥地利人民之声报》，维也纳，1945 年 12 月 28 日。

政治目的。教皇在这方面永远是拥护剥削者对被剥削者、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殖民强盗对被奴役的各国人民的那些战争，梵蒂冈过去没有，现在也决不可能支持劳动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支持殖民地人民反对其压迫者的起义。

梵蒂冈对待十九世纪战争与革命的态度，斯图尔佐神父是这样描述的：教皇"宁肯要执政当局而不要起义者；要右派阵营而不要左派阵营；要自由主义者而不要社会主义者"，而且在这些问题上教皇通常的立场是"政治成分多于道德成分"。斯图尔佐写道："总之，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教会（指天主教会——舍英曼）是反对革命和以民族为名的战争的。不问道德观点如何，无论这些战争是正义的或非正义的，由于其基础是自由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会改变君主政体、贵族和僧侣们赖以生存的所有制基础，所以教会一律予以反对"①。

171 请看，甚至连天主教作者们也驳斥什么梵蒂冈"根本反对"战争这种荒唐可笑的杜撰。

梵蒂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没有保持什么

① L·斯图尔佐：《战争与基督教思想》，引自《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45年4月，第285页。

中立。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是偶然的，或者是由于某些国务活动家的错误（虽然错误无疑有过），那就不对了。事实上，战争的发生，是世界经济政治力量在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者不止一次申明，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体系包含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平稳均匀地继续向前，而是通过危机和军事冲突"①。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奴仆们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和神圣，极力不让人民群众了解，正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周期危机和军事冲突。天主教主教们过去和现在都千方百计混淆视听，转移各国人民视线，使他们看不到正是资本主义产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它产生了法西斯主义，然后法西斯主义燃起了世界大战的烈火。庇护十二世在1940年3月27日的讲话中宣布，战争的原因是各国的当权者"忘记了上

① 斯大林：《在莫斯科斯大林选区选前选民大会上的演说》，第6页。

帝"①。为了转移各国人民对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的愤怒，梵蒂冈统治者们过去和现在都强调说，如果欧洲各国人民顺从教会的话，那末就不会有战争，战争是"自由主义时代的灾祸"②1943 年 4 月，梵蒂冈无线电台广播断言：战争乃是上帝对罪孽的惩罚③。

天主教会领导人物的这些论调，其目的在于袒护法西斯战争贩子。教皇为了希特勒、墨索里尼及其背后的德意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强调说，战争是"巨大的不幸事件"④。

172 梵蒂冈主教们企图利用世界人民遭受的战争灾难，为天主教会捞取政治资本。美国天主教会人士在其战时发表的各项声明中断言，似乎战争的根源在于"理智的时代"(即十八世纪)，在于"多神教的文艺复兴时代"⑤。德国的主教们在其战后

---

① 《国际新闻简报》，1940 年 4 月 6 日。

② 《十九世纪以来》，1941 年 2 月。

③ 《工人日报》，伦敦，1943 年 4 月 21 日。

④ 《真理报》，1945 年 2 月 2 日。

⑤ A·彼得森：《神权还是民权》，纽约，1944 年，第 23—24 页。

写出来的东西里开始论证，战争本来就不该归咎于谁，因为战争的罪魁祸首是"撒旦"①。

庇护十二世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多年的盟友，战后完全投靠了英美帝国主义，为他们效劳；为了讨好新主子，他在告德国人民书（1948年）中竟厚颜无耻地宣称，战争和德国城市的毁灭应归罪于……《共产党宣言》②。

诸如此类的"理论"，用来替梵蒂冈从战争一开始就采取的亲希特勒政策辩护，十分方便。这些理论为教皇拒绝罗斯福总统的建议（承认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是正义的）进行辩护，也非常容易。梵蒂冈电台就这个问题于1941年9月23日羞答答地声称：从教会的观点而言，捍卫自己国家的战争是可以允许的，而侵略性的战争应该受到谴责③。然而，全部问题在于梵蒂冈根本拒绝表示"轴心"国进行的战争恰恰是侵略性的；梵蒂冈同意这些国家的罪恶目的。

"法西斯德国准备并实现了对热爱自由的各

---

① 《统一》，柏林，1947年，第3期。

② 《统一》，柏林，1948年，第11期。

③ O·查费拉：《梵蒂冈与欧洲战争》，第275—276页。

国人民背信弃义的进攻之后，把战争变成了系统的军事化的匪帮活动。屠杀战俘、残杀和平居民、劫掠被占领地区以及其他战争罪行，成了希特勒分子策划的总体闪电战纲领的一部分。法西斯恐怖在暂时被占领的苏联领土上特别猖狂，而且特别残酷"①。

全世界都知道希特勒匪帮的血腥罪行。关于法西斯强盗的兽行，战时就已众所周知，虽然法西斯分子在暂时被占领的欧洲各国，特别在苏联173领土上所犯下的罪行，其实际规模与残酷程度远远超过战时人们所写下的一切。

1941年11月25日和1942年1月6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米·莫洛托夫同志向与苏联有外交关系的各国大使和公使散发了两份照会：《关于德国当局对待苏联战俘令人发指的兽行》②和《关于德国当局在被其侵占的苏联领土上到处抢掠、破坏居民经济以及其他骇人听闻的种种暴行》③。

① 《苏联主诉人……开庭词》，第26页。

②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第1卷，第184—190页。

③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第195—215页。

这两份照会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德国人残酷地折磨和屠杀苏联战俘与和平居民，掠夺和毁灭城市乡村。照会中还指出，所有这些罪行决不是个别不守纪律的部队、个别军官和士兵干的，而是"德国政府和德军司令部早已策划和鼓励的既定方针，他们在军队中、在军官和士兵中蓄意煽动最卑鄙的兽性的本能"[①]。

1942年4月，公布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同志的一份新照会——《关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苏联被占区骇人听闻的暴行和惨无人道的兽行以及德国政府和德军司令部应负的罪责》[②]。照会中指出："现在，苏联政府掌握着不久前在被击溃的德军指挥部里缴获的大量文件，从中可以看出，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血腥罪恶与兽行是根据德国政府详细策划和精心炮制的计划及德军司令部的命令干的。"[③]德国侵略者的这些计划和命令中规定：普遍劫掠苏联居民，彻底破坏希特勒匪帮

①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第1卷，第195—215页。

②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28—269页。

③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第1卷，第229页。

被迫退出的那些城市与乡村，由德国占领者侵占土地并在侵占的土地上安插德国地主，把工人和农民当作奴隶，劫持苏联人到德国去从事强制性劳动，消灭俄罗斯民族文化与苏联各族人民的文化，残杀居民和战俘。

174 照会中援引了大量材料，证实法西斯食人者正在实行这些罪恶的计划。苏联政府在照会中宣布："希特勒政府及其帮凶决逃不脱严重的罪责和因其对苏联人民与热爱自由的各国人民所犯下的前所未闻的暴行而应得的惩罚"①。

全世界都知道德寇的这些罪行。梵蒂冈也不例外，甚至比任何一个同盟国或中立国政府知道得更多，因为它在被占领区有自己的代理人，整个战争期间它同这些领土上的教会组织、同德意两国的统治集团都保持着联系。

对这些罪行教皇为什么不抗议？为什么"众人之父"默不作声？莫非"父爱"就表现在鼓动某些"儿女"去屠杀千千万万的其他"儿女"吗？

梵蒂冈以全人类的"道德师表"自居。请问，

①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第1卷，第269页。

向这种“师表”又能学到什么呢？

甚至对于希特勒分子迫害宗教机构，对于他们破坏教会，对于法西斯分子屠杀许多僧侣，等等，梵蒂冈都装聋作哑。德寇“在苏联领土上烧毁、抢劫、消灭和亵渎了一千六百七十所教会，二百三十七座罗马天主教堂，六十九座礼拜堂，五百三十二所犹太会堂和二百五十八幢属于宗教机构的其他建筑物”①。

梵蒂冈为什么对这些罪行也装聋作哑呢？毫无疑问，梵蒂冈大主教们根本不反对希特勒分子消灭东正教会、犹太会堂、以及其他非天主教的教会建筑物和机构，因为他们指望靠这种办法减轻在被占领各国传布天主教的困难。

众所周知，梵蒂冈特别希望依靠占领军的帮助在苏联的被占区传布天主教。

罗马教廷现代史中最可耻的史实之一不仅仅是梵蒂冈同法西斯侵略者结盟，而且还企图依靠德国占领军的帮助在暂时被占领的各国强迫传布天主教。罗马教皇不反对借助于德国坦克和绞架

① 《苏联主诉人……开庭词》，第43页。

175 来实现其消灭教会的“异端”(分裂出去的教派)和使一切基督教会服从罗马的计划。

在克罗地亚，法西斯当局依靠占领军和天主教僧侣，大规模强迫塞尔维亚东正教居民改奉天主教。从早在战时就已公布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在帕维利奇的所谓“克罗地亚国”，成千上万的人们在死亡威胁下被迫由东正教改为信奉天主教。横行一时的法西斯分子在克罗地亚毁坏千百座东正教堂和修道院，屠杀成百成百的神父，把许多神父投入集中营[1]。在这个教皇所承认的、由庇护十二世的德意两国朋友统治的“克罗地亚国”，只许有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东正教和犹太教被取缔[2]。在梵蒂冈赞许下，天主教僧侣夺了东正教居民的教堂，改为天主教堂。不仅如此，克罗地亚两百万以上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居民，也遭到了残酷杀害。

在占领军卵翼下，萨格勒布大主教斯特皮纳茨和萨拉热窝大主教沙里奇在克罗地亚建立了名符其实的宗教裁判所。天主教神父们在那里亲

① 《塞尔维亚人的殉教》，芝加哥，1943年，第7页。

② 《塞尔维亚人的殉教》，芝加哥，1943年，第40页。

自动手枪决法西斯恐怖下不幸的受难者。在占领军及其走卒们的无比关切和热情参与下，这些宗教裁判者在克罗地亚屠杀了八十万左右塞尔维亚东正教徒，强迫大约三十万人改奉天主教，数十万人被劫掠和驱逐出国①。

天主教的教会人士甚至建立了破坏东正教堂的专门组织。

已公布的文件中指出："萨格勒布大主教斯特皮纳茨和克罗地亚的其他主教表明他们是赞成这种非基督教的血腥野蛮暴行的，因为他们从未抗议过僧侣界这种暴行，他们也没有用任何行动表达过对这些罪行的不满。他们完全沉默——这就是他们完全赞成的证据"②。接着文件中又指出："塞尔维亚大部分僧侣遭到残酷拷问和杀害。其中有普拉东主教、萨拉热窝都主教彼得和萨瓦主教"③。斯特皮纳茨是梵蒂冈在南斯拉夫的代表。他在克罗地亚与占领军共同组织的对塞尔维亚东 176

---

① 《东正教的光明》，科希策市（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10月1日。

② 《塞尔维亚人的殉教》，第177页。

③ 《塞尔维亚人的殉教》，第179页。

正教居民的难以置信的兽行、对东正教神父和教徒的屠杀、改东正教堂为天主教堂、强迫改奉天主教——全是在梵蒂冈同意下干的。

1942 年 3 月 2 日，梵蒂冈东方教会事务部(其任务是千方百计使东方教会服从罗马教廷)秘书、红衣主教蒂谢兰对克罗地亚傀儡“国”代表宣布:“当德国人同我们一起消灭了所有的东正教神父，当三十五万塞尔维亚人已不存在的时候，德国人才承认了克罗地亚的东正教会（此教会是天主教主教们和占领军为使东正教徒天主教化而建立的。——舍英曼)。”

可见，梵蒂冈不但知道斯特皮纳茨和克罗地亚其他天主教僧侣所组织的宗教裁判所，而且赞许这些罪行。

战后，教皇千方百计地藏匿凶手。例如，德拉戈诺维奇神父，同时也是为克罗地亚法西斯分子效劳的中校，犯有屠杀六万人的罪行，战后竟躲在梵蒂冈，身份是……德国天主教专科大学教授。

梵蒂冈还打算通过自己人和占领军消灭斯洛伐克的非天主教徒，在那里也取得“天主教的辉煌

胜利”。梵蒂冈走狗提索神父的斯洛伐克“政府”，残酷迫害和屠杀东正教徒、新教徒和犹太人，天主教僧侣直接参加了这些罪行。1942年末，斯洛伐克罗马天主教僧侣代表大会召开，炮制了消灭斯洛伐克东正教的计划，关于此事的备忘录曾呈交提索的政府。这份备忘录倒是一份对梵蒂冈令人发指罪行的控诉书。这是肉体上消灭斯洛伐克居民中的东正教徒、灭绝东正教僧侣与教会的狠毒计划①。在这次天主教宗教裁判者会议之后，对东正教僧侣和教徒的迫害更变本加厉。东正教神父仅仅举行一次圣礼和祈祷仪式就会遭到逮捕。

教徒占斯洛伐克居民六分之一的路德派新教 177 教会，在天主教首席主教提索统治时代，也同样遭到残酷的迫害②。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于1941年在伦敦出版的官方刊物中指出：百分之九十的斯洛伐克天主教神父为希特勒祈祷，这个国家的天主教头目们疯狂迫害犹太人和福音教派③。

---

① 《东正教的光明》，1948年，第1、2和9、10期。

② 《占领区实况》，第3卷，伦敦，1942年，第9页。

③ 《德国压迫捷克斯洛伐克的两年》，伦敦，1941年，第134—135页。

梵蒂冈毫不反对灭绝斯洛伐克非天主教徒，因此它从未谴责过提索神父以及斯洛伐克其他凶手们的罪行。

梵蒂冈也毫不反对希特勒在挪威的宗教迫害，因为那边遭到疯狂迫害的也是新教徒。法西斯分子企图使挪威新教的宗教组织法西斯化，企图把为法西斯制度祈祷的经文塞入祈祷书，使教会服从占领军及其奴仆吉斯林，然而，他们的企图遭到了强烈的反抗[①]。

总之，对德国人残酷迫害东正教和新教以及犹太教的罪行，梵蒂冈在战时只字未提。其头面人物经常鼓励这些迫害行为并且参与其准备工作。

梵蒂冈也从未抗议过德国人残杀千百万斯拉夫人和犹太人。教皇对经常通过德国天主教徒——将军、军官、士兵、官吏之手犯下的法西斯罪行一清二楚。然而，他对此也恪守“中立”。梵蒂冈同“轴心”国的同盟关系达到如此程度，甚至于希特勒分子猛烈攻击到天主教会之时，梵蒂冈

① B·霍夫，T·艾杰尔：《挪威教会反对纳粹主义的斗争》，纽约，1943年。

居然还保持"中立"。

侵略者知道欧洲各国人民仇恨他们。法西斯分子恐怕在他们摧毁了各被占领国的一切政治的(当然，附敌的除外)、文化的、社会的以及其他机构之后，教会组织可能违反主教们的意愿，在自己周围聚集相当一部分不满的居民。的确如此，天主教主教们同占领军及其走卒合作的时期千百万信徒——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同共产党人一起并在他们领导下与侵略者进行着斗争。一 178 部分低级僧侣也参加了反对占领军的斗争。

占领军以残暴的镇压回击反抗。

战后，审讯原希特勒驻但泽总督弗尔斯特时查明，据不完全材料，占领军奉其命令，仅在但泽一地就枪杀了一千零一十九名教师，一千六百一十七名学生和四百七十六名神父①。

在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人到教堂去就会被德国人视作敌意示威。1940 年 11 月 1 日，秘密警察在波特米亚和摩拉维亚逮捕了四百八十七名神父，把他们投入集中营，许多神父在那里

① 《新德意志报》，柏林，1948 年 4 月 18 日。

被折磨致死①。梵蒂冈协助刽子手们：它的捷克斯洛伐克代理人同秘密警察合作，出卖那些参加反占领军斗争的天主教神父们。

其他被占领国家的教会机构，也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占领军强迫卢森堡天主教神父离开祖国，那里的教会财产被没收，修道院被封闭，犹太教堂被劫掠和炸毁②。

在阿尔萨斯-洛林，德国人对宗教机构也进行了有计划的进攻③。

梵蒂冈希望"按家庭方式"同希特勒统治者和睦协商，解决有争议的教会问题。它不愿因这些问题招致物议，以免损害"轴心"国。

宗教迫害波及天主教会之时，梵蒂冈偶尔也通过其无线电广播和报刊提一提。这是不得不迁就一下世界公众舆论及作为向希特勒讨价还价的手段。

梵蒂冈对于各被占领国的状况也发表意见，

---

① 《德国压迫捷克斯洛伐克的两年》，第70—75页。

② 《卢森堡灰皮书》，伦敦，1942年，第59—60页。

③ O·达切：《阴霾笼罩着欧洲》，第98—107页；《欧洲德占区现状》，第10页。

但这种情况颇不多见，只限于教会问题的范围，而且尽量回避涉及法西斯侵略者的罪恶政策。其实，问题很清楚，不赶走占领军，欧洲各被占领国的宗教自由不可能恢复。因此，要想获得宗教自由，就应努力战胜法西斯强盗，尽力援助反希特勒同盟，但是，梵蒂冈不愿如此，因为它同“轴心”国 179 的总政治目的息息相关。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战争中梵蒂冈无论在原则上和实际上都不是中立的。它赞同希特勒同盟的反动目的，在“轴心”国发动的罪恶战争中是站在轴心国那一方的。

教皇勾结德军司令部在苏联被占区搞合作

梵蒂冈主教们早就精心炮制了在苏联传布天主教的计划。庇护十二世已知道希特勒德国准备进攻苏联。与德国谍报机关合作的耶稣会总会长列多霍夫斯基伯爵也知道此事。早在战争开始之前，列多霍夫斯基就力求借助德军当局保障耶稣会士能以“传教士”的身份在苏联领土上活动。

梵蒂冈同希特勒政府签订了一个专门协定，

在梵蒂冈专门机构受训的教皇的特务，将以“传教士”身份随同德国法西斯军队派往苏联领土。他们的“传教”活动是一面传播天主教，一面协助占领军奴化苏联各族人民，充当间谍和煽动者为希特勒分子效力。他们利用耶稣会士数百年来练就的宗教欺骗、恫吓和挑拨离间等一切手段，协助希特勒匪帮巩固占领区的地盘，与游击运动作斗争，减轻占领军执行仇视人类计划的困难。

希特勒军队的司令部乐于协助教皇的特务。希特勒分子了解苏联被占区居民对占领军的不共戴天的仇恨，他们抱着希望：梵蒂冈特务的支援，对他们来说，将是秘密警察屠杀活动的极为重要的辅助行动。

请看，前面提到过的合众社原驻意大利记者P·帕卡德和E·帕卡德在其1942年于纽约出版的一本书里，是如何描述梵蒂冈同希特勒的这个协定的。

梵蒂冈训练到俄国搞“传教活动”的神父已经十五年了。为此目的，罗马开设了特种神父训练180班，教授俄语、乌克兰语和苏联通用的其他斯拉夫语言。此外，还专门训练他们“与异端邪说”作

斗争[①]，所谓异端邪说，希特勒的梵蒂冈盟友指的是共产主义思想。正是为了与这种思想作斗争，梵蒂冈才派出“传教士”援助秘密警察。

P·帕卡德和E·帕卡德写道：“我们获悉，已有不少这样的神父前往德军占领的俄国地区，他们正在那里努力传布天主教”；司令部对“神父们追随德军而来”表示满意，因为它期望教皇的特务“将能有助于使俄国人顺从德军占领”[②]。

天主教的文献资料也谈到了梵蒂冈同希特勒政府关于在苏联德占区合作的协定。1945年巴黎出版的教皇书翰文告集，其“序言”中直截了当地写着：“德军占领一部分俄国领土后，梵蒂冈同柏林签订了一项协定，允许天主教传教士前往占领区，并把波罗的海领土划入柏林圣使馆的权限范围之内”[③]。这样，梵蒂冈同希特勒分子不但商定了派遣特务去苏联领土，而且还签订了关于把苏联被占领地区划入柏林圣使馆管辖范围的协定，

---

① R·帕卡德和E·帕卡德：《阳台帝国》，第230页。

② R·帕卡德和E·帕卡德：《阳台帝国》，第230页。

③ 转引自《世界舞台》，柏林，1949年11月21日，第44期第1341页。

从而正式确认这块领土并入希特勒帝国是合法的。

根据梵蒂冈同希特勒分子签订的这项协定，教皇的特务被派往苏联一事，我们也可从英国记者拉尔夫·帕克的书中得到证实。他写道："敖德萨解放后，一名法籍神父来到罗歇·加罗领导的莫斯科法国大使馆，请求保护。查验证件之后，得悉他原来是个耶稣会的神父，根据1941年梵蒂冈同里宾特洛甫的协定，他是暂时调到东欧德国占领军方面工作的神父之一。这个神父有一张维希政府发给的护照，上有德军当局的印记"①。

181 教皇的特务借助于秘密警察，在许多地方建立了自卫的"传教士团"。例如，他们在立陶宛就建立了一个这样的"传教组织，并且是在同占领军合作并参与其一切罪恶活动的立陶宛天主教上层僧侣积极参加下搞的。立陶宛天主教的主教们和许多神父，向秘密警察出卖苏维埃工作人员、共产党员、红军战士、犹太人，并且参加大规模绞死苏联人的活动。教皇的西乌克兰代理人——教

① 拉·帕克：《反和平的阴谋》，第146—147页。

会合并派的头目们，也指靠占领军的协助来巩固其地盘，迫使东正教居民改奉天主教。

里沃夫教会合并派的舍普季茨基都主教欢迎占领军并同他们合作。教会合并派领导人出于对苏联的仇恨，赞同占领军的罪行和大规模残杀苏联公民。1943 年，舍普季茨基发表了告苏联德占区全体东正教居民书，要求他们改奉天主教。

德国法西斯分子进攻苏联，打算以闪电战取胜结束战争，妄图粉碎苏维埃国家，使苏联沦为被奴役的国度。

斯大林同志在 1941 年 11 月 6 日的报告里谈到了法西斯强盗的这些妄想：

"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开始进犯我国的时候，曾认定他们能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消灭'苏联，并在此短时期内进到乌拉尔。必须指出，德国人并没有隐瞒这个'闪电'胜利的计划。正相反，他们百般宣扬这个计划"①。

然而，希特勒的"闪电胜利"的计划落了空。斯大林同志说：苏军"实际上比德国人所预料的要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 20 页。

强，而德军却比根据德国侵略者的吹牛宣传所能设想的要弱"①。苏联后方巩固而团结。"苏维埃的后方还从来没有过象现在这样巩固"②。"利用某些国家内阶级间的矛盾以及这些国家与苏联间的矛盾来玩弄把戏的"德国政策，也无济于事了③。

还在 1941 年 11 月初，斯大林同志就宣告，法西斯侵略者"闪电战"的狂妄计划"应当认为是彻底破产了的"④。德军在莫斯科城下的溃败，使希特勒德国和其他国家里苏联的敌人的计划受到了挫折。

182

希特勒政府眼看自己的计划破了产，便开始寻求与英国妥协，以便在西方停战并且与英国共同对苏联作战。

正当苏联"在没有任何军事外援下单独进行解放战争，反对德国人、芬兰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的联合力量……"⑤之际，英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 24 页。

②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 22 页。

③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 21 页。

④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 21 页。

⑤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 25 页。

国反动集团的代表却背着苏联，同希特勒德国进行关于签订和平条约的秘密谈判。从苏军在德国缴获的文件中可以看到，1941年秋在里斯本曾进行过这种谈判。“文件之一是当时德国外交次长魏茨泽克报告的附录，其中载明了1941年9月在里斯本谈判的经过。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到，9月13日，贝弗布鲁克勋爵的儿子艾特肯（英军军官，后来是议员）代表英国方面，同一个受德国外交部委托的匈牙利人古斯塔夫·冯·克韦尔会谈过，关于这一委托，从德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克拉韦尔写给魏茨泽克的一封信上可以看出。在这次谈判中，艾特肯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可否利用即将来临的冬春时期密商媾和的可能性问题？’”①

正如1942年1月《现代史料》月刊报道的，在德国方面，帮助它同英国达成协议的立场是它们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共同仇恨②，即对苏联的仇恨。

梵蒂冈也积极参与希特勒分子和英国反动派反对苏联和被德国奴役的各国人民的阴谋，不过，

① 《历史的伪造者》，第71—72页。

② 《现代史料》月刊，1942年1月。

它是在"和平缔造者"的假面具下进行活动的。与希特勒德国和英国代表们秘密举行和谈的同时，梵蒂冈为了援助他们，于 1941 年末开展了争取和平的运动。10 月，教皇下谕各地普遍举行和平祈祷①。

183 1941 年 12 月，教皇发表了圣诞节文告，其中提出所谓能保证长期和平的"五项基本条件"②。新的"和平条件"同教皇 1939 年抛出的货色区别不大。其中谈到了自由、尊重大小国家的完整和独立、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权利等等。

教皇的"和平条件"，在亲梵蒂冈的书刊中被毫无根据地吹捧为与"大西洋宪章"相媲美的文件③。

实际上，1941 年 8 月通过的苏联政府同意其基本原则的"大西洋宪章"中（苏联政府曾指出，实际运用这些原则"必需要符合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情况和历史特点"，并且特别强调，"承认必

① 《现代史料》，1941 年 12 月。

② G·戈内拉：《需要重建的世界》，第 303—321 页。

③ 《外交政策报道》，1944 年 1 月 5 日，第 268 页；R·帕卡德和 E·帕卡德：《阳台帝国》，第 237 页及其他章节。

须粉碎希特勒侵略和消灭纳粹桎梏的各国人民现在面临的基本任务，是集中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一切经济、军事资源，去尽快彻底解放呻吟在希特勒匪帮压迫下的各国人民"①）有专门条款，指出只有"彻底消灭纳粹暴政以后"才能确立和平，"这种和平将使各国能够在自己领土上安全生存，也将保证所有国家的所有人无忧无虑地渡过一生"②。

正当希特勒分子蹂躏欧洲各国人民之时，决不可能取得公正的、民主的和平。要取得这样的和平，必需彻底消灭法西斯暴政。然而，庇护十二世却不愿如此。被梵蒂冈宣传机构大吹大擂为"改造世界秩序的基础"的教皇"和平条件"，里面却没有这项取得公正和平的根本条件。在教皇"改造世界秩序的计划"里，规定要保留法西斯暴政。

不仅如此，教皇还以其"和平计划"求教于法西斯强盗本人。教皇拿他的"和平计划"向"全世界"（首先向法西斯各国）呼吁，而同时却欺骗群众，协助希特勒分子及其朋友在幕后搞帝国主义 184

①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第1卷，第166页。

②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第1卷，第167页。

和平阴谋。

教皇的“和平计划”于1941年12月出笼，作为对大西洋宪章的答复与抗衡。泰勒说过，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9月派他觐见教皇，任务是了解教皇是否认为大西洋宪章的各项原则符合他个人观点，如果认为对，就请教皇在全世界面前表态①。

但是泰勒并未写明教皇赞成大西洋宪章。庇护十二世是反对它的基本原则的。他的“五项和平条件”与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他的“条件”里根本没有最主要的和平条件——要求“彻底消灭纳粹暴政”。

1941年末的教皇“和平创议”，旨在帮助法西斯德国，同时也符合当时同希特勒的代表进行幕后谈判的英国反动集团的愿望。

梵蒂冈同日本帝国在战争中的合作

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美国开战。次日，

① 《战时联系》，第58页。

它向英国宣战。德国和意大利由于同日本有1936年《反共产国际协定》和1940年军事同盟关系，也向美国宣战。纽伦堡审讯德国主要战犯和东京审讯日本主要战犯过程中，无可辩驳地证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其征服世界和奴役各国人民的掠夺性计划中，是共同行动相互支援的。日本同法西斯德国是一丘之貉，它同样急于侵占苏联领土和奴役苏联人民。日本军国主义者炮制了一个“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即日本在亚洲称霸的计划。他们把西伯利亚和苏联的远东也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对苏侵略战争是日本国策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审讯日本主要战犯的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指出，日本虽然同苏联订有中立条约，但它却认为自己势必参与反苏阴谋而只是等待对己有利的时机而已。德国对苏闪电战的彻底失败，185 迫使日本推迟其进攻苏联的计划。进攻苏联尽管延期了，但日本仍然认为这种进攻是它的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而且从不放松对苏战争的准备工作①。

① 《真理报》，1948年11月13日

日本竭尽所能协助德国进行对苏战争，在满洲边界保持强大部队，以此牵制可投入对德作战的苏联兵力。它击沉苏联船只，阻挠苏联航运，向希特勒分子提供有关苏联的情报。

由此可见，谁支持日本，谁也就是支持希特勒德国；支持联合国的敌人。

日德意三国对美宣战后不久，原先是“孤立主义者”的美国天主教主教们，在上罗斯福总统书（1941年12月22日）中宣称，他们将竭尽全力动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来取得胜利，并保证支持政府①。然而美国主教们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把战胜德日仅仅看作是美国资产阶级战胜竞争对手。他们并不想为了彻底粉碎法西斯主义而加强反希特勒同盟。他们与同盟国中的一切反动势力一样，害怕苏联强大，也害怕整个民主阵营由于战胜法西斯分子而强大起来。他们拥护庇护十二世的“和平”计划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种“和平”计划归根结蒂追求如下的目的，即在欧洲保持反动制度。1941年，美国主教会议建立了一个委

① D·A·麦克莱恩：《充满生气的世界秩序》，密尔沃基，1945，第210—211页。

员会，宣传教皇的、即反苏的、帝国主义的“和平”条件[①]。

为了德国的利益，美国亲法西斯集团竭力离间苏美关系。共产党的《工人日报》写道，柯林分子、林白分子、以及其他法西斯分子是第五纵队；他们鼓吹反对与苏联结盟，开展反罗斯福的运动[②]。赫斯特、布利特、胡佛等等，也属于这个 186 匪帮。天主教神父柯林的下流报纸《社会正义报》登载了不少文章，赞扬希特勒仇恨苏联，赞扬他扼杀了法国的民主。这家报纸替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计划辩护，声称日本“对亚洲各国人民来说是上帝的警察。”[③]柯林煽动种族纠纷与民族纠纷，鼓吹憎恶黑人和反犹主义，诽谤苏联。

美国统治集团并不急于采取认真的措施，来反对希特勒的走狗，因为这个集团内部就有不少人赞同希特勒的反苏反民主计划。由于国内群众

---

① 同年，美国新教的教会建立了一个“公正和平基础研究”委员会，为首的是不无名气的战争贩子和苏联的敌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② 《工人日报》，纽约，1942 年 3 月 9 日。

③ 《工人日报》，1942 年 3 月 23 日。

的抗议，柯林的报纸被查禁了，但是，另一种具有同样法西斯性质的天主教刊物——《天主教国际》杂志开始出版，代替了它①。

虽然许多天主教徒提出了抗议，但天主教主教们却对损害联合国事业的天主教权势人物的亲法西斯以及反苏宣传不予谴责。它甚至没有想制止柯林煽动民族仇恨的活动。

天主教上层僧侣的立场，完全符合在对德战争中追逐渔翁之利的美国反动派的计划。美英反动分子的目的是"与反德国法西斯斗争的解放任务毫不相干的。他们并不打算彻底粉碎德国法西斯主义。他们从狭隘的自私目的出发，只想破坏德国的实力，主要是想消除世界市场上危险竞争者的德国。但他们绝对没有想把德国和其他国家从那些一贯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和推行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势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也没有想到要实行根本的民主改革。但是他们却指愿苏联实力削弱，精疲力竭，指望苏联由于战争的折磨将会在长期内失掉其作为伟大强国的作用，而在战争结

① 《工人日报》，纽约，1942年5月20日。

束之后，依附美英”①。美国天主教主教们执行的正是美国反动派的这一政策；因此，他们才鼓励柯林及美英两国在战时寻求同希特勒勾结的一切 187 人士的亲法西斯活动。

尽管梵蒂冈的立场，包括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的态度在内，与美国利益相背。美国天主教主教们同梵蒂冈沆瀣一气。

日本进攻美国之后，梵蒂冈同日本的关系更为友好，终于在1942年3月建立了外交关系。教皇赞成任命驻维希的代办原田为日本驻梵蒂冈大使②。同时，马列拉主教被任命为驻东京圣使。

任何宗教上的理由都无法论证日本参战后不久梵蒂冈有必要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天主教教皇同“多神教的”日本天皇不可能有什么共同的宗教目的。只有与“轴心”国具有共同的政治目的，才是这种友谊的原由。梵蒂冈把自己的妄诞希望寄托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身上，认为他们会摧毁欧洲的共产主义，同样，它指望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亚洲做到这一点。梵蒂冈深知日本帝国

① 《历史的伪造者》，第75页。

② 《新国际年鉴，1942年》，伦敦，1943，第349页。

主义分子仇恨苏联。它知道他们站在希特勒这一方狂热地准备着对苏战争，这不能不增加宗座对日本的好感。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这方面也能利用同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来为其政治利益服务。对他们说来，驻梵蒂冈大使馆是一个重要的“观测哨”①，因为那里在教皇的参与下，各国反动势力围绕着组织反苏统一战线问题进行着幕后斗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需要梵蒂冈援助他们进行对中国人民的战争。果然，教皇在其给中国的传教士的指示中，建议他们同日本侵略者合作②。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的菲律宾，他们更需要梵蒂冈的帮助。菲律宾三分之二的居民是天主教徒。被日本人拘禁在马尼拉的美联社随军记者拉瑟·布林斯讲过，188 利用宗教是日本人各种奴役占领区居民的手段之一。他们在军队里建立了专门的“宗教部”，其任务是在占领区安插受过专门训练的日本军官充当神职人员。日军“宗教部”的代表在日军占领菲律宾之后，立即开始吸收当地的天主教上层僧侣们

① 《新国际年鉴，1942年》，伦敦，1943，第349页。

② L·莱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梵蒂冈的政策》，第36页。

为占领军效力。日本当局在马尼拉建立了"日菲天主教友好协会"。他们从日本迁来了日本的天主教徒，并在马尼拉安插了一名日本主教，他执行军事当局的任务[①]。

天主教教会人士协助日本军国主义者巩固占领区的地盘，这一事实，许多资产阶级作者也直认不讳[②]。

日本人还利用梵蒂冈的宗教威望和机构，替占领区里的战争罪行辩护。

总之，在日本加入德国一方参战后不久，梵蒂冈同日本就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教皇对"轴心"国的直接支援，而且被它利用来为其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法西斯报纸为此举欢呼庆贺。意大利报刊写道，外交关系的建立，旨在"使日本同宗座之间已存在的友好关系更加亲密"，这是日本对美国的外交胜利[③]。

---

① 拉·布林斯：《到他们吃石头的时候》，纽约，1944年，第90—91页。

② R·沃德：《亚洲人的亚洲吗?》，芝加哥，1945年，第176页；J·恩布里：《日本民族》，纽约，1945年，第219页。

③ C·查费拉：《梵蒂冈与欧洲战争》，第288页。

这一事实，各同盟国当然也领悟到是梵蒂冈同日本侵略者团结一致的举动。美英两国驻梵蒂冈外交代表，奉本国政府之命，抗议在梵蒂冈建立日本外交使团机构，“因为促使日本这个并无多大基督教利益的国家(与梵蒂冈建交)的动机十分可疑”①。

梵蒂冈的这种作法，引起了各同盟国和中立国天主教群众的极大不满。中国一家天主教报纸，以四百万中国天主教徒的名义请求教皇拒绝189 日本同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的计划。这家报纸写道，日本人在中国杀害天主教神父，烧毁天主教堂。日本急欲往梵蒂冈派遣大使——这是企图向各被占领国的天主教徒显示日本是保护天主教的；实际上是它想把这些国家的人民变成自己的奴隶②。

纽约大主教斯佩尔曼，这个梵蒂冈的美国走狗和美国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的代表人物，深知美国天主教徒极为不满③，便出来(完全可能是

① 《国际新闻简报》，1942年3月21日。

② 转引自《工人日报》，纽约，1942年3月20日。

③ 《现代史料》月刊，1942年6月。

奉宗座指示)替教皇决定接受日本大使一事辩护。他以惯用的万灵的"理由"替这个决定辩护，混淆视听，说什么，你们要明白，教皇是"不偏不倚的"，他应当接受"寻求与梵蒂冈接触的"大使①。斯佩尔曼对主要之点避而不谈，即帝国主义的日本"寻求与梵蒂冈接触"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些目的与各国人民的实际利益毫无共同之处。

1942 年夏梵蒂冈对"轴心"国的援助

斯大林同志在 1942 年 5 月 1 日的命令中指出，从战争开始以来，无论是法西斯德国及其军队的状况，无论是我国和我们苏军的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毫无疑义的，在这个时期德国及其军队较之十个月以前削弱了。战争使德国人民感到莫大的失望，付出了几百万人的生命，遭

① 约·斯蒂尔：《欧洲的未来》，第 226 页。斯佩尔曼在美国颂扬梵蒂冈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另一个梵蒂冈的代表——匈牙利明曾蒂主教大写而特写颂扬日本军阀的"英雄主义"的赞歌。众所周知，这种"英雄主义"表现在日本占领军在中国、菲律宾和其他国家里犯下的前所未闻的残酷暴行之中。（《民族事务》，多伦多，1949 年 5 月，第 167 页。）

到了饥饿和贫困。战争终结遥遥无期，而人员后备却消耗殆尽，石油用完了，原料没有了。德国人民中间觉得德国必然失败的意识日益增长……，希特勒帝国主义占领了欧洲广阔区域，可是它没190有摧毁欧洲各国人民实行抵抗的意志。被奴役的各国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强盗制度的斗争，已开始具有普遍性。在一切被占国内，军事工厂怠工，炸毁德军仓库，破坏德国军列，杀害德国官兵的事，已成为普遍现象。整个南斯拉夫以及被德军占领的各苏维埃区域，都燃遍了游击战争的火焰。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德国后方削弱，因而也就使整个法西斯德国削弱……；第二，毫无疑义，在战争时期中，我国较之战争开始时加强了。不仅我们的朋友，就连敌人都不得不承认，我国较之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统一团结在政府的周围，我国前线和后方已团结为向着同一目标开火的统一战斗阵营，后方的苏维埃人供给我国前线的步枪和机枪、迫击炮和大炮、坦克和飞机，粮食和弹药日益增多。”①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52——53页。

克·叶·伏罗希洛夫写道：战争的第一阶段"从1941年6月的战役大致到1942年秋，即到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进行反击战时止。苏联最高统帅部以积极防御配合在最重要战略方面的回击和反攻，在这个时期摧毁了法西斯军队的突击力量，埋葬了德国的'闪电'战略。斯大林的天才领导和我军的无比英勇，在这个时期内使力量对比改变得对我方有利，从而创造了我军转入决定性进攻的良好环境，虽然第二战场还没有开辟"①。

大量的事实证明了法西斯后方和法西斯军队的削弱；连法西斯强盗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希特勒在其1942年4月25日的国会演说中，要求加强对"国内罪犯"的镇压。甚至连为希特勒效劳并支持他进行反对世界人民的侵略战争的德国天主教僧侣，也开始胆怯地抗议希特勒政府的德国宗教政策。1942年2月，柏林主教对没收其教区里的 191 教会土地提出抗议②。慕尼黑红衣主教福尔哈贝

① 伏罗希洛夫：《伟大卫国战争的天才统帅》，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9年，第6——7页。

② 《真理报》，1942年3月13日。

尔送呈教皇一份关于德国教会受迫害的报告①。秘密警察残酷镇压不满分子；许多神父被捕，投入了集中营②。

意大利的后方更加不稳。德国人在那里作威作福引起了极为强烈的不满。粮食供应愈形紧张。胜利的信心丧失了。“还在1942年夏天，正如都灵‘菲亚特’工厂的罢工和其他明显的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和组织活动又恢复了，工业无产阶级坚决地重新开始执行其人民和民族运动的领导者的任务”③。这个运动矛头指向希特勒分子及其意大利同伙。广大天主教群众对战争的不满情绪，在意大利较之德国更为激烈，已蔓延到相当大的一部分下层僧侣。许多神父由于被指控为“失败主义者”而被投入集中营④。

在被占领的苏联领土上和欧洲被奴役的国家

① 《现代史料》月刊，1942年7月，第399页。

② 《新国际年鉴，1943年》，伦敦，1944，第240页。

③ Э·塞雷尼：《意大利农业问题》，国家外国书籍出版社，1949年，第386页。

④ 《真理报》，1942年，5月21日，7月13日，11月18日；《现代史料》月刊，1943年1月；《新国际年鉴，1942年》，伦敦，1943年，第342页。

里，展开了反对侵略者的游击解放战争。欧洲各国人民受到苏联及其英雄军队的榜样的鼓午，奋起抗击奴役者。巴尔干半岛、波兰、法国、比利时，以及其他国家的游击运动，变成了反对占领军的人民运动。各地游击运动的主要组织力量是共产党。共产党人在与法西斯强盗的斗争中树立了勇敢和英雄主义的榜样，树立了无限忠于人民事业的榜样。

斯大林同志在1942年5月1日的命令中指出："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已联合起来反对德帝国主义。他们注视着苏联。我国各族人民为争取自由、荣誉和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使全体进步人类感到钦佩。一切爱好自由国家的人民都认定苏联是能拯救世界使其免受希特勒灾疫危害的力 192 量"①。

由于苏军英勇斗争，"轴心"国削弱，共产党人领导的游击运动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对苏联的同情与日俱增——这一切不仅加深了"轴心"国阵营的惊慌不安，而且使同盟国中的反动集团惊恐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54页。

万状。教皇及其周围的人士也为此惶惶不可终日。但是，无论福尔哈贝尔关于德国天主教会遭到迫害的报告，或者教皇熟知的占领军屠杀波兰僧侣的事实，无论是意大利神父遭到逮捕，或者是意大利报刊攻击天主教人士，指控他们是"失败主义者"，都不能改变宗座的有利于"轴心"国的政策。

5月13日，教皇发表广播演说。教皇似乎是对那些控诉在德国和被占领各国内有宗教迫害的教会人士作出答复，似乎是向与全体劳动人民一起参加反侵略者斗争的被占领国的教徒发出呼吁，他竟然号召人民"顺从管理他们的人和上帝。创世主的意旨就是如此。"这是说，要求顺从希特勒的总督们和秘密警察。在那次演说中教皇违背明显的事实，断然说他"对一切交战国是绝对中立的"，并且一再呼吁"和平"①。同时，教皇力争保持法西斯制度条件下的和平。《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在1942年7月15日报道说，教皇正在准备新的和平文告，其中指出"在意大利、西班牙、

① 转引自A·彼得森：《神权还是民权》，纽约，1944年，第20页，《工人报》，纽约，1942，5月17日。

葡萄牙和法兰西保存现有的、天主教的、有权威的(即法西斯的——舍英曼)制度"作为条件。①

梵蒂冈无疑也赞成保存德国的法西斯制度。

关于梵蒂冈的亲希特勒情感及其对"轴心"国的尽力支援，1942年6月末访问梵蒂冈的西班牙外长塞兰诺·苏纳也曾谈到过。

塞兰诺·苏纳是佛朗哥的姻兄、长枪党头目之一、长枪党天主教派系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德意日三国的走狗②，是苏联最凶恶的敌人。他在1942年4月同一家丹麦报纸的记者谈话中大 193
吹大擂地宣称：一万五千名西班牙人已经在东线对苏作战，如果德国需要的话，数字可以增加到一百万③。

6月末，苏纳动身去罗马谒见墨索里尼，就法西斯西班牙追随德意更积极参加战争和复辟西班牙君主制度的问题进行谈判。

6月24日，苏纳受到教皇的接见。关于这次接见，他向德国驻西班牙大使叙述道："教皇方面

---

① A·彼得森:《神权还是民权》第22页。

② 艾·普连:《橄榄丛中之风》，第194页。

③ 《现代史料》月刊，1942年6月，第288页。

的接待十分友好，因此谈话极为坦率。谈话一开始便是西班牙对'轴心'国的态度问题。我向教皇说明，西班牙忠于同德国和意大利的友谊，不仅出于感激或者温情，也基于对切身利益的明确理解。德国现在捍卫着欧洲使其免遭布尔什维主义的危害。如果德国在这场战争中遭到失败，那末，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拯救西班牙"①。

苏纳这个法西斯分子，他了解用什么能博得"圣父"的欢心——他用"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来吓唬他，而宣布希特勒德国是排除这种"危险"的救星。他向教皇表明，就连西班牙人民憎恨的佛朗哥，也赖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才得以生存，"轴心"国的复灭，必将导致佛朗哥政权象其他法西斯制度那样崩溃（无疑，肯定是会这样的，如果丘吉尔和美国反动集团不来援助佛朗哥的话）。

庇护十二世对塞兰诺·苏纳的真情表露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教皇首先表示遗憾，他同希特勒德国并不是就所有的问题都取得了一致意见，尽管他非常想取得一致。"教皇答复说：他十分痛

① 《德国外交部文件》，第3卷，《德国政策与西班牙》，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6，第120—121页。

心，在德国，人们并不认为他是德国人民的朋友……，当然，有些东西他作为教皇是不习惯的，——这首先是教育孩子的问题。他一直希望能够和好，如果有朝一日他能同德国取得一致，他将十分幸福”①。这里说的是就有争议的教会问题同法西斯德国取得一致。

教皇赞扬了塞兰诺·苏纳阐明的反苏联合战线纲领，授予这个希特勒走狗一枚梵蒂冈勋章，并请他向佛朗哥转达他的祝福。 194

为了加强“轴心”国阵营，梵蒂冈还同希特勒德国的另一个仆从国——芬兰法西斯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希特勒德国的反苏战争刚一打响，芬兰的执政者就站在德国方面投入了反苏冒险事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1941年11月18日《关于苏联政府对芬兰的态度和芬兰当局的背叛立场》的声明中指出：“……还在6月22日，即背信弃义地进犯苏联之日，希特勒在其给军队的命令中宣布，他同曼纳海姆的军队结盟并与芬兰军队共同行动。芬兰政府不但不拒绝希特勒的这些声

① 《德国外交部文件》，第3卷，《德国政策与西班牙》，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6年，第120—121页。

明，相反，却与德国法西斯勾结，将其军队与人民投入了反对苏联的军事冒险事业。”①

1942年6月2日，希特勒和凯特尔来到芬兰，仿佛是为了祝贺曼纳海姆的生日。当时，希特勒曾授予曼纳海姆一枚德国勋章②。当战争炽热之时，德国强盗头子及其匪军头目的芬兰之行，及6月27日曼纳海姆回访希特勒之行，目的都是巩固德国因战争延长在芬兰摇摇欲坠的地位。

正在此时，6月，传出了芬兰将同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③，而7月，格里本贝格男爵已经担任芬兰驻梵蒂冈大使到梵蒂冈上任了。

如众所周知，美国反动集团也极为重视芬兰这股反苏力量。虽然芬兰政府将其国家投入了对苏联——反希特勒同盟的领导国的军事冒险，但是美国政府却直到1944年6月30日，即芬兰退出战争前不久，才同它断绝关系。

在芬兰问题上，美国国务院站在符合希特勒利益的立场上，因为它鼓励了芬兰统治者的反苏

---

①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第1卷，第182页。

② 《现代史料》，1942年7月。

③ 《现代史料》，1942年6月，第289页。

方针。祝贺曼纳海姆生日的不单单是希特勒，而[195]且还有美国驻芬兰的大使①。

同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可以巩固苏联的狂暴的敌人在芬兰的阵地，可以帮助他们保持同美国的外交关系，并且在“轴心”国覆灭的情况下——以最小的损失退出战争。美国政论家鲁特写道：随着芬兰大使的到达梵蒂冈，传出了消息，他的使命同急于利用宗座的影响不让英美反对芬兰有关②。后来的事件证明，梵蒂冈和纽约大主教斯佩尔曼千方百计地保护芬兰反动势力，并力求使芬兰在其统治阶级损失最小的情况下退出战争，其目的在于保存他们的政权，以便从事新的反苏冒险。

1942年6月，梵蒂冈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

蒋介石惧怕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劳动人民甚于惧怕日本侵略者，这对梵蒂冈来说并不是秘密。从1944年10月以前在中印缅战区担任中美联合

① «工人日报»，1942年8月25日、27日；«工人报»，纽约。

② W·鲁特：«战争秘史»，第1卷，第49页。

部队总司令的美国将军史迪威的军事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在美英反动集团支持下，阴谋抵制抗日战争。史迪威写道："蒋介石宁愿德国战胜与中国接壤的强大的俄国，因为它是第十八集团军（中国的共产主义军队）的后盾"①。大战期间伦敦的《新闻纪事报》写道，蒋介石的抗日斗争"进行得并不如他力所能及的那样积极和有效。如果三百万人的国民党军队团结一致，有统一的目标和共同的战略计划，而且同华北的共产党军队一起进行斗争，那末，驻扎在中国的四十万日军，处境就会十分困难。然而，半数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却被用来封锁共产党人"②。

英美帝国主义者鼓励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对196他们说来，主要的敌人也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而是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梵蒂冈于1942年6月同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正是同中国的反动势力、同美国统治集团的走卒加强了联系，因为，对美国统治集团来说，蒋介石首先是中国民主力量的

① 转引自《新时代》杂志，1948年，第37期。

② 转引自《真理报》，1944年5月6日。

敌人和宪兵。

梵蒂冈和各国天主教主教的反苏宣传，是对"轴心"国和各同盟国内同情它们的反动集团的无可估量的援助。法西斯阵营处境越是不妙，天主教主教们和梵蒂冈就越顽固地、大张旗鼓地搞反苏运动。为了削弱反希特勒同盟，他们响应而且散布种种流言蜚语，歪曲苏联在当前战争中的目的，竭力在同盟国之间散布猜疑。1942 年 5 月和 6 月，外交人民委员维·莫洛托夫在伦敦和华盛顿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协议，其结果是苏联、英国和美国的同盟得到了巩固，对此，他们怕得要命。

"无论在伦敦或者在华盛顿的谈判中，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自然受到了重视。关于这次谈判的结果，无论在英苏或是美苏公报中都以同样的方式谈到了。在两份公报中都宣布，谈判时'在 1942 年建立欧洲第二战场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方面，达成了全面的协议'"①。

关于 1942 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决定，受到

①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莫洛托夫同志 1942 年 6 月 18 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载《苏联的对外政策》，第 1 卷，第 299 页。

了美英以及其他国家劳动人民和全体进步人士的衷心欢迎。在英国和美国，组织了拥护尽快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群众集会。协议虽然达成了，但是英美两国政府却阴谋拖延开辟第二战场。同盟国里的希特勒的朋友们，疯狂地展开了反对开辟第二战场的运动。天主教上层僧侣遵循梵蒂冈的总方针，积极参加这一运动。1942年夏，美国的许多天主教活动家出面反对与苏联合作，反对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①。美国主教们对特别疯狂反对第二战场的柯林神父的宣传民族仇恨的活动不予谴责②。柯林的杂志《天主教国际》肉麻地吹捧佛朗哥将军、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并且鼓吹同德国搞妥协性的和平③。

197

天主教反动分子攻击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决定，是与单独媾和的幕后谈判紧密相关的，这种谈判到1942年末还在梵蒂冈积极参与下继续进行④。

① 《工人日报》，1942年8月25日、27日；《工人报》，纽约，1942年6月28日，9月27日。

② 《工人日报》，1942年9月16日。

③ 《工人报》，纽约，1943年1月3日。

④ 《工人日报》，纽约，1942年10月2日。

希特勒的美英朋友们想保证这一谈判成功，于是就歇斯底里地鼓吹反苏和反对开辟第二战场。天主教人士和梵蒂冈掀起的反对开辟第二战场的运动，完全符合希特勒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丘吉尔的计划，因为英美统治集团根本不愿意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国彻底覆灭。他们指望削弱苏联，也指望能保存德帝国主义作为欧洲反动派的堡垒，所以他们阻挠开辟第二战场。梵蒂冈和天主教一切上层人物，也力求达到此目的。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击溃德国侵略者之后，梵蒂冈猖狂反对第二战场的斗争规模更加扩大。

198

第四章　梵蒂冈参与反对苏联和欧洲各国人民的阴谋

（自斯大林格勒会战击溃德军时起至1943年末）

梵蒂冈的亲美方针

"在1942年末到1943年初的冬季战役中，红军使希特勒军队遭受了严重的失败，消灭了敌军大量的人员和技术装备，包围并歼灭了敌人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两个集团军，俘虏敌官兵三十余万，从德寇桎梏下收复了苏联几百个城市和几千个乡村。"①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97页。

斯大林同志在总结史无前例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历史意义时指出：

"斯大林格勒是德国法西斯军队没落的起点。大家知道，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之后，就已不能恢复自己的元气了。"①

在1942年夏秋两季的艰苦战斗中，红军"为战胜德国法西斯军队奠定了巩固的基础。"② 在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中击溃德寇之后，"已经开始把敌人大批大批地驱出苏联。"③ 在1943年库尔斯克的夏季战斗中又给了法西斯军队以新的打击。"如果说斯大林格勒的会战，是予告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没落，那末，库尔斯克的会战，就使它已处于完全覆灭的灾祸之前了。"④

战争的第二个时期，克·伏罗希洛夫写道，"大约自1942年末，即自斯大林格勒会战时起至1943年末，是伟大卫国战争进程中根本转变的时期。苏联军队经过多次辉煌的搏战，从敌人手中 199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13页。
②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90页。
③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90页。
④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14页。

彻底夺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巩固了对敌人力量的优势，在广阔的战场上转入决定性的进攻，收复了三分之二被敌人占领的苏联领土。法西斯德国的武装力量受到巨大的损失，被迫在各条战线上转入防御。"①

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打击，使希特勒整个军事机器受到最强烈的震撼。法西斯阵营陷入严重的危机。

最高统帅斯大林同志在1943年5月1日的命令中指出：

"现时在敌人阵营中谈论闪电战已经不时髦了，——闪电战的空喊已为持久战是不可避免的沮丧号泣所代替了。"②

苏联军队在1942—1943年秋冬两季和1943年夏季给予希特勒匪帮的打击，向全世界显示了苏联的威力，苏军战士和指挥官卓越的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显示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祖国、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忠诚，后方和前方的团结，全国和全体苏联人民为取得对最凶恶的敌人的完

① 克·伏罗希洛夫：《伟大卫国战争的天才统帅》，第7页。

②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99页。

全胜利准备贡献出一切力量的决心。

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毁灭性打击证明，伟大的斯大林英明领导的苏军指挥部的战略是正确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同志在1943年2月23日的命令中指示："无可怀疑，只有红军指挥部的正确战略和我们的执行者指挥官们灵活战术，才能够作出如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包围和歼灭德寇三十三万巨大精锐军队这样的卓绝事实。"[1]

我们苏联军队的胜利彻底打破了以丘吉尔为首的美英两国心怀叵测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人们的梦想，他们原指望苏联在这些史无前例的大搏斗中流血殆尽，而英美统治阶级则坐享苏联的胜利果实。斯大林同志在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五周年的报告中令人信服地证明，德军司令部之所以能够把大批后备力量搜集起来并抛到东方战场上对付苏军而不冒任何危险，是因为欧洲没有第二战场。假如盟国履行诺言，及时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那么，德国法西斯军队早在1942年夏季就处于完全覆灭的灾祸之前了。当谈

200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93页。

到希特勒匪帮在没有第二战场的情况下能够调来对付苏军的兵力时，斯大林同志说："我想，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国家，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军队，能经受住凶残的德国法西斯匪帮及其同盟者的这种猛烈打击的。只有我们苏维埃国家，只有我们红军才能经受住这样猛烈的打击。……不仅能够经受住，而且能够战胜这种猛烈打击。"①

1943年是战争转折的一年。

苏联军队的胜利在我们的敌人阵营中引起了混乱。亲希特勒的土耳其统治集团和日本军国主义者等待着斯大林格勒的陷落，以便参加反苏战争。但是，他们的计划落空了。

德国附庸国的统治集团极为惊慌。"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莫里斯·多列士写道，"法国资产阶级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得出结论：希特勒的事业失败了。他们决定把自己的方针由亲德改为亲美……，许多著名的维希分子来到阿尔及利亚，千方百计地力求在这里谋得一官半职。"②

希特勒集团本身也愈来愈坚决地寻求与美英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70页。

② 莫·多列士：《人民的儿子》，第152页。

统治集团勾结。1943年2月，美国国防部长史汀生在他的战事述评中指出，苏联军队的伟大胜利使德国陷入困境，流行着各种各样关于德意方面有可能要求媾和的传说。①

在审讯德国主要战犯的纽伦堡法庭上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供认，他在1943年1月和以后就伸出了"和平的触角"。发动战争的强盗们明白他们失败了，便开始寻找以最小的损失退出战争的途径。里宾特洛甫打算不通过军事途径，而通过政治途径，②即与英美统治集团勾结的办法来结束战争。当时，希特勒强盗们把赌注押在这些国家的权势集团对民主阵营日益强大的恐惧和对苏联的敌视上。

美国和英国的统治集团承认苏军胜利的巨大意义。关于斯大林格勒会战，罗斯福1943年1月7日在国会发表演说时讲过："在1942年的整个战略局势中，最重大和最有意义的事件是在辽阔的俄国战场上发生的事件：一是斯大林格勒牢不

① Π·史汀生：《侵略的序曲》，华盛顿，1944年，第64页。
② 《每日评论》，1946年3月31日；《新时代报》，柏林，1946年3月29日。

可破的防御；二是俄国军队在各个战区的进攻，这些进攻自 11 月后半个月开始，现在仍然猛烈地、卓有成效地继续着。"①

1943 年 2 月，史汀生在他的述评中写道，斯大林格勒会战击溃德军，使希特勒的军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俄国人的反攻非常高明，是红军指挥部领导有方和俄国士兵勇敢、坚韧的标志。"②

英国的统治集团也承认苏军胜利有极其伟大的意义。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 1943 年 2 月 21 日在伦敦发表演说时讲到："德国军队在它全部悠久的历史中从来没有遭到过象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使它遭到的那种覆灭性的失败。"③ 当时的丘吉尔内阁副首相艾德礼，1943 年 1 月 19 日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声称："不把俄国军队惊人的成绩放在首位，就不能够评述战争。"④ 甚至蓄意迟迟不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期苏联打得力尽财穷的丘吉

① 《真理报》，1943 年 9 月 1 日。

② H·史汀生：《侵略的序曲》，第 56—57 页。

③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第 1 卷，第 488 页。

④ 《真理报》，1943 年 5 月 21 日。

尔，也在美国国会的发言中承认，苏联军队给了希特勒匪帮以致命的打击，苏联为同盟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应当予以报答。"①

然而，美国和英国的统治集团对苏军辉煌胜利的赞扬是口是心非的。他们不得不按照社会舆论的要求说话，因为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群众对苏联人民反对希特勒匪帮的英勇斗争寄予深切的同情，并为苏军的胜利欢欣鼓舞。实际上，我军的胜利使美英统治集团大为惊慌，——这些胜利并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1942 年 12 月，西班牙大使在伦敦与艾登谈话时曾指责艾登，说他在一次演说中赞扬了苏联。英国外交大臣回答说，"战争局势迫使他有时要赞扬一下东方的盟国。"②

苏联军队给予希特勒军事机器的打击愈多，美英统治集团就愈加惶恐不安，他们害怕，苏联由于在解放欧洲人民摆脱希特勒暴政的事业中作出了巨大贡献，而战后将在世界上占据他应有的

① 《真理报》，1943 年 5 月 21 日。

② 《德国外交部文件》，第 3 卷。《德国的政策和西班牙》，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6 年，第 155 页。

地位。他们还害怕，苏军的胜利，鼓舞被占领国中一切仇恨希特勒强盗的人们为争取解放而进行更坚决、更勇敢的斗争。苏联军队的胜利，使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欢欣鼓舞，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好感与日俱增。这也使美国和英国的统治集团感到不满，于是，他们一面假惺惺地承认苏联给予希特勒匪帮打击的巨大意义，一面却与德国代表进行幕后谈判，搞妥协性的单独媾和，策划反苏阴谋。丘吉尔虚情假意地作保证，表白他援助苏联的"真诚决心"和他对与苏维埃国家联盟的"忠诚"；与此同时，他却在1942年10月，在斯大林格勒进行决定性战斗的日子里，炮制了反苏备忘录，将它交给英国内阁成员，其中有艾登、艾德礼和贝文，并将备忘录的复制本送交美国总统。丘吉尔在这一备忘录中坚决主张建立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壁垒"。①

苏联军队的成就打乱了丘吉尔及其同伙们的计划，于是，他们力图结成帝国主义列强反苏联合战线。英国记者拉尔夫·帕克写道："……正当

① 《真理报》，1949年9月10日。

苏联军人表现出勇敢、忠诚、水晶般纯洁和善战 203 的奇迹的时候，正当苏联举国上下鼓足劲头，全力以赴地与希特勒德国斗争的时候，正当苏联为了全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战斗的时候，西方的军界和外交界已经为反对英勇的、奋不顾身的苏联人民设下了阴谋的罗网。"①

美国进步政治家约翰尼斯·斯蒂尔写道："1943年前夕就看清楚了，不能靠英美垄断资本主义消灭发动战争的德国垄断资本主义。当然，美国和英国的大资本家希望打败德国。他们甚至想要消灭希特勒主义这一政治制度。但是，他们当时并不想，现在也不想消灭德国垄断资本主义。"②

另一位美国进步政治家迈耶写道，在斯大林格勒击溃德军之后，"当英美垄断资本家想到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大大提高的后果时，吓得几乎失魂落魄了。最高级的特使纷纷奔赴莫斯科。大为震惊的鲁尔区的工业家们一再要求媾和，为

① P·帕克：《反和平的阴谋》，第55页。

② 约·斯蒂尔：《保卫和平》，国家外国书籍出版社，1949年，第25页。

此，英国外交部向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士派出了‘非官方的’牵线人。”①

苏联军队的胜利也在梵蒂冈引起了一片惊慌。庇护十二世、他的顾问、助手和所有天主教主教们无一例外都不得不承认，他们想要毁灭苏联的打算落空了。他们非常明白，现在轴心国已不能成为胜利者了。梵蒂冈的主教们惧怕日益增长的苏联威力。因此，他们积极参与正在寻求与法西斯德国勾结的美英反动集团在幕后搞的反苏诡计。

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击溃德军之后，梵蒂冈的策略和方针发生了转变。如果说它先前指望“轴心”胜利并适应希特勒的“新秩序”的话，那么现在，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开始愈来愈坚决地采取亲美英帝国主义者的方针，希望他们不会让德国、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反动制度被彻底摧毁，希望他们削弱苏联的影响并阻止民主阵营在战后取得胜利。梵蒂冈与“轴心”的关系当然谈不上有什么恶化。斯大林格勒会战击溃德军之后，

① Г·迈耶，《美国在劫难逃吗？》，第120页。

梵蒂冈仍然继续与"轴心"国密切合作，而且许多事实证明，这种合作更加密切了。法西斯匪帮打算在梵蒂冈的帮助下挽救法西斯制度被摧毁后所能够挽救的一切，首先是法西斯干部。但是，梵蒂冈一面继续与"轴心"合作，一面却开始采取亲英美帝国主义最反动的势力，首先是美帝国主义最反动的势力的方针，指望他们决定媾和的条件。

泰勒第三次出使梵蒂冈教皇号召进行反共的"十字军远征"

苏联军队在 1942—1943 年秋冬两季。给予希特勒匪帮的打击，引起了教皇的不安，教皇担心的究竟是什么？伦敦天主教报纸《天主教先驱报》编辑米海尔·德·拉·贝杜阿伯爵在 1943 年 4 月《双周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梵蒂冈政策的文章，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这位教皇代表写道，教会"看到了一心想消灭希特勒主义灾祸的普通英国人或美国人所看不到的东西。"教皇究竟"看到了"什么呢？德·拉·贝杜阿回答说，教皇担心苏联影响在战后的欧洲加强。这位天主教伯爵坦白地承认，在教皇看来，法西斯德国胜利要比苏联胜利

好。"①

可见，使美国和英国的统治阶级担心的事，也使教皇不能安眠。

德·拉·贝杜阿承认，教皇不仅不谴责法西斯"轴心"的政策，相反，他还同情"轴心"国及其走狗佛朗哥西班牙和盘踞在维希的叛徒，等等。这引起了英国的不满，但是，德·拉·贝杜阿伯爵为教皇的政策辩护，说他希望战争结束时"恢复战前的状况""并有合理的改善"，也就是说要牺牲欧洲（首先是苏联）人民和殖民地国家的利益向德国帝国主义的掠夺要求让步。教皇的理想，205这位作者写道，是贝当式"温和的权威制度的联盟"。这就是说，教皇和他的主教们主张战后在世界上保留法西斯制度并建立法西斯列强联盟，这一联盟完全是为了反对苏联和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的。

梵蒂冈希望永远保存帝国主义。按照德·拉·贝杜阿的说法，他力图"拯救欧洲，使之摆脱无政府状态"，即扼杀劳动人民的解放运动。他认为，

① 《双周刊》，伦敦，1943年4月，第226—232页。

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牺牲苏联和欧洲其他国家人民的切身利益，使美国和英国与希特勒勾结起来。德·拉·贝杜阿强调指出，梵蒂冈“无须费力即可充当交战国之间的调停者并结束战争。”

所有这些话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击溃德军之后不久写的。《天主教先驱报》的编辑不仅表达了梵蒂冈的意见，而且表达了英国统治集团的意见，他们也害怕苏联力量和世界各国民主力量的增长。

这种思想情绪在1942年末至1943年初的冬季控制着梵蒂冈。据长期作过合众社驻罗马记者的摩根说，教皇知道，美国和英国同苏联结成联盟是由于战争的需要，但也明白，战胜“轴心”将提高苏联的威望。这正是他所担心的事。[①]

总之，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法西斯匪帮还在摧残着欧洲人民，但是梵蒂冈已经预料到，苏联军队给予希特勒匪帮的毁灭性打击必然引起的后果，是彻底粉碎法西斯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获得胜利，因此它惊慌不安。

① Th.摩根：《听音哨》，第199页。

特别使梵蒂冈（同样也使丘吉尔和美国统治集团）担忧的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制度在意大利已经摇摇欲坠；教皇害怕，意大利人民对战争的强烈不满情绪和他们对把意大利出卖给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墨索里尼罪恶制度的仇恨爆发为革命。当时起来反对墨索里尼的不仅有工人阶级。著名的意大利共产党员埃·塞雷尼写道："1942年—1943 年意大利农村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事实是意大利农村居民各个阶层中日益公开反对战争的人数迅速增长。"①

认为墨索里尼的地位摇摇欲坠的还有法西斯206制度的狐朋狗友。1943 年1月，佛朗哥在马德里与德国大使谈话时说，"他也不得不说，他获悉意大利国内情绪的消息后，开始感到不安。战争打得越久，胜利就越成问题。因此，现在就应当考虑结束战争的可能性。"② 如果佛朗哥知道墨索里尼的地位不稳固的话，那么梵蒂冈对这一点了解得就更加清楚了，他在意大利有城乡僧侣组成的巨大情报网。意大利的统治者指望，在他们危急的时

① 埃·塞雷尼：《意大利的农业问题》，第 371 页。

② 《德国外交部文件》，第 3 卷，第 147 页。

候梵蒂冈将帮助他们与美国和英国勾结，以便退出战争而不引起“社会动荡”，即革命。

1942年9月，罗斯福派泰勒到梵蒂冈去完成一项新的使命。这次出使是在得到意大利政府同意之后进行的。关于这件事，泰勒本人的报道非常谨慎：他写道，九月初才知道，意大利政府准许驻教廷总统私人代表通过意大利。① 美国政治家鲁特写道，泰勒这次例行的出使是在驻华盛顿教皇特使奇科尼亚尼主教的积极参加下进行的，② 他与意大利那些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为了保持资产阶级统治甚至准备牺牲墨索里尼本人的反动地主和金融界人士有密切的关系。

9月18日，泰勒到达罗马。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外都没有公布过任何有关他和教皇谈判的内容。关于他的使命流行着各种各样的传说。例如，有人说，泰勒的责任是向教皇阐明美国在战争中的目的。③ 泰勒本人在他出版的关于他的梵

① 《战时联系》，第57页。

② W·鲁特：《战争秘史》，第2卷，纽约，1945年，第283页。

③ 《现代史料》，1942年11月，第230页。

蒂冈之行一书中，丝毫也没有透露1942年9月他与教皇谈判的内容。他写道，向教皇阐述美国政府在继续进行战争的问题上的立场是他的任务。如果根据泰勒极其简单的论述来判断，也不能不得出下述结论：庇护十二世在同他会谈时坚决主张必须尽快与轴心国妥协媾和。[①]

207 在教皇交给泰勒的备忘录中阐述了梵蒂冈的立场，其中包括以"基督教的正义和兄弟之爱"为基础的媾和要求。这是明确地要求对法西斯强盗表现出"基督教的正义和兄弟之爱"。1942年末，由于苏军的胜利，战争出现了转折，教皇在这个时候要求"兄弟之爱"和"基督教的正义"只能有一个目的——挽救轴心国使它不致于被彻底消灭。

斯大林同志在1942年11月6日纪念伟大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五周年的报告中，这样说明英苏美联盟的行动纲领："……消灭种族优劣论；各国权力平等及其领土不可侵犯；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和恢复其自主权；各国有权按自己意志来处理自己的事情；经济上帮助遭难的国家并协助其提

① 《战时联系》，第68页。

高物质生活；恢复民主自由、消灭希特勒制度”。[①]

这个纲领非常不合梵蒂冈的心意。无论是恢复民主自由、消灭希特勒制度，还是英苏美联盟纲领中的其他要求，梵蒂冈反动派一概不能接受。与此针锋相对，庇护十二世要求在同法西斯杀人犯和刽子手妥协的基础上、在保存法西斯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公正的”和平。

那时，美国统治集团已经在制订美国资本统治世界的计划了。泰勒说，在和他会谈时，教皇对未来世界的计划已成为美国统治集团仔细准备的课题这件事表示满意，[②] 这里所指的正是这些目的在于永远保存资本主义和制止战后欧洲民主发展的计划。

泰勒避而不谈教皇为分裂联合国所作的一切努力。但是，从他谨慎的评语中可以断言，教皇向他诉说了“共产主义的危险”。例如，泰勒在不说明谈的是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写道，教皇讲了某些基本的“道德原则”，他在这些原则上永远不可能 208 妥协，同时他——教皇感到高兴的是，美国也承

---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第71页。

② 《战时联系》，第69页。

认这些基本“道德原则”。[1]

教皇指的究竟是什么呢？时隔不久，他就在他那篇彻头彻尾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圣诞节文告中说明了。

从各方面看来，泰勒出使的目的在于使美国统治集团和梵蒂冈在继续进行战争和战后体制等问题上统一认识，并且在这一方面配合行动。自那时，即1942年末起，梵蒂冈就开始愈来愈多地依靠英美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了。

泰勒出使还与当时的意大利形势有直接的关系，并与教皇和美国统治集团使意大利在资产阶级蒙受最小损失的条件下退出战争的计划和镇压人民运动的计划有关。泰勒非正式地接触了意大利统治集团，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失败之后，在这一集团中占上风的已经是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绪了。[2]

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泰勒还和西班牙官方人士及葡萄牙的萨拉查进行了谈判。[3] 关于挽救欧

① 《战时联系》，第69页。

② Th.摩根：《听音哨》，第200页。

③ J.斯蒂尔：《保卫和平》，第228页。

洲各国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尤其是意大利退出战争的问题），纽约大主教斯佩尔曼继泰勒之后又与梵蒂冈进行了谈判，并在梵蒂冈参加下与意大利统治集团进行了谈判。

1942年12月24日，庇护十二世发表圣诞节文告，阐述了那些他曾向泰勒说过的梵蒂冈“永远不可能妥协”的“道德原则”。教皇一开始就虚伪地宣称，他“听到了他的孩子们”从世界各国发出的“呼声”，但是，“不愿意在各国人民或国家试图解决国内秩序和国际合作的重大问题的任何一种形式中站在一方。”这就是说，虽然教皇“听到了”惨遭法西斯野兽屠杀的千百万人的“呼声”，他却不愿意谴责强盗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制度。教皇玩弄“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发展家庭”等词藻的同时，明确地坚持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在各族人民的生活中，209 他宣称，“尤其在我们这个社会动荡的时代”，“破坏性的学说”流行的时候，“秩序”和“平静”是极其重要的。庇护十二世所说的“秩序”是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群众的秩序，而人民群众则要保持“平静”，即默默地忍受剥削者的压迫和欺凌。教皇声称，

这种“秩序”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威胁。他刚才还虚情假意地宣布，说不偏袒“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制度”，现在却猛烈地抨击了马克思主义。庇护十二世提醒人们，教会这个希特勒的同盟者和辩护士早已谴责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在仍然谴责它。①

这就是教皇对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击溃希特勒匪帮的回答。

欧洲被占领国中的千百万劳动人民从苏联军队的胜利中看到了使他们摆脱法西斯奴役和屠杀的生路。世界各国千千万万的人钦佩地注视着苏维埃国家及其军队从法西斯灾祸中拯救人类的英勇斗争。但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不仅法西斯国家的，而且还有同盟国的——却惶恐不安地看着苏联的势力不断地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不断地提高。天主教的主教们也和资产阶级一样感到恐惧。对法西斯及其罪行连一句谴责的话都不肯说的庇护十二世，为了维护一切反对民主的人，却在 1942 年 12 月公开号召动员一切力量去反对

① G.戈内拉：《需要重建的世界》，第 303—321 页；《国际新闻简报》，1943 年，第 1 期，第 40 页。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他的圣诞节文告旨在反对苏联、反对联合国、反对被占领国家中的抵抗运动。被占领国中信奉天主教的劳动者和共产党员一起并在他们的领导之下进行着反对占领者的英勇斗争。

庇护十二世向英美反动资产阶级发出呼吁：他提醒说，他们主要的敌人不是希特勒，而是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工人阶级。可见，教皇的圣诞节文告是与希特勒讲和，而对苏联、对欧洲被占领国劳动人民宣战的公开声明。纽约的《现代史料》月刊在1943年2月报道，庇护十二世反社会主义的圣诞节文告很象他的先辈之一——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十字军远征号召书[1]（在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号召下，在十一世纪末开始了第一次对东方的“十字军远征”）。庇护十二世的文告是反对苏联和整个民主阵营的“十字军远征”号召书。 210

纽约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在批判庇护十二世这一亲希特勒的文告时写道：教皇宣称，梵蒂冈在世界上进行的巨大斗争中是“中立的”；当法

① 《现代史料》月刊，纽约，1943年2月，第517页。

西斯强盗正在攫取世界霸权并将整个世界淹没在血泊之中的时候，难道可以中立吗？这是给法西斯刽子手打气，给"失败主义者"、"和事佬"及主张搞妥协性媾和的人撑腰。但是，教皇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攻击，对自由事业的危害更大，这种攻击的目的在于分裂联合国。教皇从希特勒"反对共产国际"武库中租来的反马克思主义论据，可能在每个国家的反法西斯营垒中和联合国内引起纷争。不过，该报强调指出，在希特勒压迫下的天主教徒们知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更为重要得多，因此，他们不顾教皇分裂反法西斯阵营的旨意，而主张团结一致。①

与希特勒匪帮的秘密和谈
斯佩尔曼的出使活动

除上所述外，教皇在1942年12月号召进行反社会主义"十字军远征"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当时美英德三国代表进行妥协性的单独媾和秘密谈判排除障碍。

---

① 《工人日报》，纽约，1942年12月28日。

据苏联新闻局的调查资料《历史的伪造者》指出：从苏军在德国缴获的文件中可以明确地看出，1943年2月美国和德国曾在瑞士进行谈判。“代表美方进行这次谈判的是美国特命全权代表艾伦·杜勒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之兄），他当时化名‘巴尔’出席谈判，‘白宫直接给予他任务和全权’。代表德方与他进行谈判的是M·霍恩洛厄公爵，他与希特勒德国的统治集团关系密切，以希特勒代表的身份参加谈判，用的假名是‘保利斯’，……从文件中可以看出，谈判涉及的重要问题有奥地利问题、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波兰问题、罗马尼亚问题、匈牙利问题，尤其重要的是与德国缔结和约的问题。 211

艾·杜勒斯（巴尔）在这次会谈中声称：

‘今后永远不容许各国人民象德国人民这样由于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和贫困而被迫从事冒险的尝试和英勇斗争。德国应当作为秩序和恢复的因素而继续存在。瓜分它或者把奥地利划分出去的问题是根本谈不到的。’

谈到波兰问题时，杜勒斯（巴尔）说：

‘……应当通过向东而扩展波兰领土和保存

罗马尼亚与强大的匈牙利的办法，建立一条抗拒布尔什维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防疫线。'

会谈记录中又指出：

'巴尔先生大体上同意欧洲的国家和工业组织，他认为由于幅员广大，联邦制的大德意志(类似美国）及与其毗连的多瑙河邦联将是中欧和东欧秩序和复兴的最好保证。

杜勒斯（巴尔）还说，他完全承认德国工业要在欧洲起主导作用这一要求。'

不能不指出，英国人和美国人进行这次试探并没有通知他们的盟国苏联，也没有得到苏联的同意，而且事后也丝毫未向苏联政府透露试探的结果。这就可以说明，美英两国政府这一次已经试图走上与希特勒谈判单独媾和的道路。"①

从文件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的代表（和英国的一样）准备满足法西斯德国在欧洲的一切掠夺要求。他出卖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为了建立反苏"防疫线"，他欣然同意德国垄断资本独

① 《历史的伪造者》，第72—73页。

霸欧洲。对于美国垄断集团利益的卫士杜勒斯来说，最重要的是保存德国的极其反动的制度，作为欧洲"秩序的保证"，也就是说，作为帝国主义的支柱、工人运动和各族人民自由意志的扼杀者 212 及一切反苏国际反动派的突击力量。

这个把德帝国主义作为美国垄断集团的同盟者和反动堡垒保存下来的无耻纲领使教皇庇护十二世和美英的天主教主教们感到十分满意。

法西斯的英美保护人和朋友尽量利用各种途径，企图与希特勒勾结。1942 年秋季，英国和德国银行界的代表在瑞士会晤，并讨论了媾和条件问题。①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傀儡、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的头子佛朗哥也出面充当法西斯制度的救星和单独媾和谈判中的掮客。

从苏联外交部档案处公布的德国外交部文件中可以看出，佛朗哥及其外交部长霍尔达纳进行"和事佬的"活动是经过希特勒政府同意并得到英国统治集团赞许的。1943 年 2 月，德国驻西班牙大使毛奇向本国外交部提供了佛朗哥与英国驻马

---

① 《工人日报》，纽约，1942 年 4 月 20 日。

德里大使霍尔会谈的情报。“在这次会谈中，佛朗哥发挥了下述思想，即面临布尔什维主义的巨大危险，英国从欧洲团结的愿望出发应当找到通向德国的道路，”① 也就是说，应当与德国勾结起来。佛朗哥恫吓霍尔说，苏维埃国家的胜利将使共产主义在欧洲广为传播。②

霍尔达纳也本着这种精神劝说霍尔，并且表示，西班牙愿意以中间人的身份为“建立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欧洲联合战线”③效劳。佛朗哥这个希特勒的帮凶企图用保卫“基督教文明”的空话来掩盖他卑鄙的反苏计划。

“佛朗哥确信，霍尔本人同意他对俄国危险的看法。”④ 霍尔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孤立。英国的(象美国的一样）统治集团中有不少人，由于害怕苏联和整个民主阵营加强而愿意与希特勒匪帮勾213结。1943年3月8日德国驻马德里大使指出：“已经收到代办曼布拉斯子爵从伦敦发来的好消息。

---

① 《德国外交部文件》，第3卷，第150页。

② 《德国外交部文件》，第3卷，第151页。

③ 《德国外交部文件》，第3卷，第162页。

④ 《德国外交部文件》，第3卷，第162页。

据他说，随着共产主义危险的增长而愈来愈感到恐慌的不仅有英国的社会活动家，而且还有英国内阁成员，他们欢迎佛朗哥这种主动精神，并认为，这种方针是对他们本国立场的支持。"①

1943年4月16日，霍尔达纳发表广播演说，宣布西班牙准备"在缔结和约的事业中进行合作。"这个西班牙的希特勒走狗威吓资本主义世界的头目们说，如果不同希特勒匪帮达成协议，布尔什维主义将在战争中取胜。他说，梵蒂冈也可以在单独媾和谈判中担当中间人。②

丘吉尔特别赞赏佛朗哥及其外交部长的"和事佬的"言论。1943年4月，恰巧就在佛朗哥提出愿意作为"中间人"效劳的时候，丘吉尔带领参谋总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以贵宾的身份出席了伦敦西班牙大使馆的招待会。甚至工党的《论坛》周刊也认为丘吉尔这样公开表示支持佛朗哥是不合适的，并对首相轻描淡写地责备了几句。③

① 《德国外交部文件》，第3卷，第152页。

② 《工人日报》，伦敦，1943年4月17日、4月21日。《战争与工人阶级》，1943年，第1期，第25页。

③ 《现代史料》月刊，1943年5月，第192页。

梵蒂冈直接参加了秘密谈判。庇护十二世在1943年1月5日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应当赶快结束战争，他时刻准备在这一事业中进行合作。①对于庇护十二世来说，赶快结束战争的意思就是赶快拯救希特勒。

意大利法西斯对梵蒂冈寄予特殊的希望。法西斯制度的处境愈来愈危险。2月末，由于意大利形势紧张，希特勒的使者——里宾特洛甫和瓦尔利将军来到罗马。被汹涌的人民怒潮吓昏了的意大利资产阶级，为了防止革命，要赶快退出战争的倾向在增长。

214 1943年2月初，原意大利外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伯爵被任命为驻梵蒂冈大使，由此可以看出，意大利政府对梵蒂冈的中介作用抱着多么大的希望。为了挽救意大利的法西斯制度，不许建立有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参加的反法西斯政府，梵蒂冈所有的外交人员、教会的全部势力和各种关系都动员起来了。

希特勒象墨索里尼一样，也认为这时在梵蒂

① 《战时联系》，第81页。

冈应该有他们自己的较高级的外交官。自 1920 年起担任德国驻梵蒂冈大使的冯·贝尔根被召回国。7 月 2 日，教皇接见了新任大使魏茨泽克——里宾特洛甫最亲密的助手。任命齐亚诺和魏茨泽克为驻梵蒂冈大使与在教皇调停下和斯佩尔曼参加下进行的媾和谈判有关。斯佩尔曼为参加这次谈判专程来到罗马。他是美国天主教高级僧侣最反动的代表之一，与当权的资产阶级和美国军队反动的将军们有密切的关系。

斯佩尔曼写道，他得到罗斯福总统、赫尔外交部长和军事当局的同意，于 1943 年 2 月初飞往欧洲。这次出使的目的，斯佩尔曼避而不谈；为此，他解释道，引用庇护十一世的国务卿、红衣主教哈斯帕里的话是十分合适的："有趣的东西我不能够说，而我能够说的东西却又是没有趣的。"① 确实如此，斯佩尔曼在报道他这次出使活动的长篇著作中，尽量回避最主要的东西：他为什么到欧洲、亚洲、非洲去，与军政领导人谈了些什么，同他们谈判过什么问题。

① F. 斯佩尔曼：《今日行动》，纽约，1944 年，第 12 页。

斯佩尔曼首先访问了葡萄牙，对它的法西斯制度大加赞扬。[1]他从葡萄牙到达西班牙，在那里会见了法西斯分子和天主教显贵。在马德里，斯佩尔曼先与霍尔达纳，后来又与佛朗哥进行了谈判。斯佩尔曼对这个刽子手颇有好感，并且指出，这个杀人魔王害怕上帝。与佛朗哥的会谈，他写道，"是围绕着国际形势和战争问题进行的"；而且两人都"稍微展望了一下未来"。[2]至于谈的究竟是什么，斯佩尔曼没有说。可以肯定，他们两人在"展望未来"时，最感到不安的是民主和苏联地位的巩固，佛朗哥在缔结单独和约时担当中间人的意见得到了斯佩尔曼的支持。

215

斯佩尔曼由马德里前往梵蒂冈。墨索里尼政府对他来的目的当然了如指掌，于是通知他说，他可以随意到各地去，虽然他当时是正在与意大利作战的美军代表。斯佩尔曼说，他在梵蒂冈同教皇、教皇国务秘书处的官员和各国驻梵蒂冈的外交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例如，他与英国大使以及波兰、中国和爱尔兰的大使进行过数次

① 斯佩尔曼：《今日行动》，第9页。

② F.斯佩尔曼：《今日行动》，第35页。

会谈。谈了哪些问题，他只字未提。

斯佩尔曼由梵蒂冈动身到非洲。他在非洲会见了同盟国军队的军事领导人和当地的执政者。然后由非洲飞往伦敦，与丘吉尔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斯佩尔曼找不到言词来颂扬与他志同道合搞反和平阴谋的丘吉尔。在伦敦，斯佩尔曼还与戴高乐、西科尔斯基将军、什拉梅克主教（当时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和其他政治家们进行了谈判。

他由英国前往爱尔兰，在那里会见了（直到战争结束时还与轴心国保持着最良好的关系的）德·凡勒拉，然后再次飞往非洲，访问了的黎波里、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之后，斯佩尔曼访问了土耳其，在美国大使斯坦哈特的陪同下会见了土耳其总统伊斯麦特·伊诺努。斯佩尔曼由土耳其到达伊拉克，受到摄政王的接见，又从那里飞往德黑兰，在德黑兰受到国王的接见。斯佩尔曼由伊朗动身前去访问以仇视苏联著称的波兰将军安德斯，然后再次出现在埃及，受到埃及国王的接见，最后访问了南非的统治者、种族主义者史末资元帅。斯佩尔曼称道这个殖民主义者、英帝

国主义的忠实奴仆为“当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斯佩尔曼出使有半年之久。1943 年 7 月，他回到美国。斯佩尔曼坚持说，他出行的目的是访问美军的随军神父。但是，众所周知，丘吉尔也

216 好，土耳其总理也好，埃及国王也好，伊朗国王也好，各种各样的将军、执政者和总督们也好，他所会见和与之进行谈判的这些人都不是美军的神父，甚至不是天主教徒。斯佩尔曼在各地与国务活动家进行谈判和会谈时都有美国外交官员和军人陪同，他出使是有政治目的的。斯佩尔曼是美国统治集团的特使，他们力图用背着苏联搞交易的办法结束战争，以达到在欧洲保存反动制度的目的。斯佩尔曼对佛朗哥、史末资、丘吉尔、戴高乐的热烈称赞，确实表现出他反动的政治态度。虽然他避而不谈谈判的内容，但是他的一些评语和“有声的思想”却能说明很多问题。例如，在谈到教皇最感兴趣的东西时，斯佩尔曼指出，庇护十二世“希望胜利者对待失败者不仅要公正，而且要仁慈”。① 通过如此谨慎的言辞表达了教皇

① F·斯佩尔曼：《今日行动》，第 35 页。

的对法西斯强盗要"公正"的要求。这一点教皇也曾向泰勒说过。对这个要把法西斯制度保存下来作为遏制民主和苏联的屏障的纲领，斯佩尔曼本人是支持的。他用耶稣会士特有的伪善腔调宣布："用武力也许能赢得战争，但是只有用正义才能赢得和平。"① 美国反动集团的代表斯佩尔曼为轴心国遭到必然覆灭的危险而忧心如焚，于是，便在 1943 年春季预先提出了用"公正"和仁慈的态度对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要求。

毫无疑问，这正是斯佩尔曼与丘吉尔、教皇、艾森豪威尔、外交官和军人们会谈的内容。他还直接参加了与德国和意大利代表进行的单独媾和秘密谈判。斯佩尔曼的出使与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和梵蒂冈的反苏阴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② 当斯佩尔曼进行谈判的时候，美国政府的另一位代表杜勒斯同时也在瑞士与希特勒德国的代表霍恩洛厄公爵进行谈判。这里和那里谈的都是把德国和意大利的反动制度作为欧洲"秩序的保证"保存

① F·斯佩尔曼：《今日行动》，第 79 页。

② G·萨尔维米尼，G·皮阿纳：《如何对待意大利》，第 159 页。

下来的问题。

斯佩尔曼保证说，他在梵蒂冈会见了许多外217交人士，但是没有会见过德国和日本的外交官。[①]他不说，没有会见过意大利的外交官。恰巧就在他到达罗马的前夕，齐亚诺被任命为意大利驻梵蒂冈大使。斯佩尔曼与齐亚诺谈判了意大利在保存法西斯制度的条件下退出战争的问题。纽约《民族》周刊在1943年5月报道，在斯佩尔曼到达梵蒂冈前夕任命齐亚诺为驻梵蒂冈大使，是因为"现在墨索里尼需要一个和他本人一样关心救自己皮囊的人。齐亚诺在这里为的是在摆脱目前困境的谈判中尽可能取得对墨索里尼——齐亚诺托拉斯最有利的结果。"[②]

法国新闻记者佩蒂纳克斯当时曾经报道，斯佩尔曼在梵蒂冈不仅与教皇及其国务卿进行了谈判，还与齐亚诺伯爵、格朗迪伯爵和意大利其他的政治家进行了谈判。佩蒂纳克斯写道，"使梵蒂冈深感不安的是意大利战败后将引起的社会动荡。"梵蒂冈认为，"为了保持社会秩序"，意大利

① 《如何对待意大利》，第36页。

② 《民族》周刊，1943年5月29日。

需要一个与保守阶级和军事指挥人员有密切联系的新政府。这样的政府应当由一位“不太直接受法西斯政策悲惨错误牵连的年青君主”来领导。佩蒂纳克斯接着指出，梵蒂冈认为，华盛顿方面提出比较宽大的媾和条件将是对新执政者的支持。①

综上所述，斯佩尔曼是以美国政府代表的身份，而不是以私人代表的身份（象他在自己的书中努力装扮的那样）在教皇参加下与意大利资产阶级代表在梵蒂冈进行谈判的，谈判的内容是：保存资产阶级政权，不让意大利人民摆脱万恶的墨索里尼制度。双方都害怕人民，都愿意保存反人民的恐怖制度，仅仅从墨索里尼匪帮中清除那些名誉扫地、民愤极大的人，建立以“年青的国王”——萨伏依王室的代表为首的、同样反动的政府。而萨伏依王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把自己的命运和法西斯制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且应对它的全部罪行负责。在教皇和斯佩尔曼的 218 参加下还制订了一个计划，几个月之后，丘吉尔

① «纽约时报»，1943年5月12日；«民族»周刊，1943年5月29日。

和美国统治集团以及受他们委托的意大利英美军事当局，就违背意大利人民的意志，坚决地着手实现这个计划了。

英美统治集团早已拟定了这个计划的基本轮廓，这个计划的实现应当阻止意大利人民把祖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早在 1941 年 2 月，英国保守党的机关刊物《十九世纪以来》就写道，“军官们（也许是巴多里奥元帅领导的）和梵蒂冈支持的宫廷”是“意大利新政治制度唯一的核心。”①

现在，1943 年夏季，在墨索里尼制度崩溃的前夕，美国和英国的统治集团急于实现这个计划。梵蒂冈积极参与此事。这也是斯佩尔曼在梵蒂冈的统治者的参加下与意大利资产阶级代表在梵蒂冈谈判的内容。这宗交易是违背意大利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斯佩尔曼的使命不仅包括挽救意大利的法西斯制度和采取措施制止这个国家里的革命。他的任务还包括：在希特勒匪帮将要被赶出法国的前夕，采取措施挽救法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

---

① 《十九世纪以来》，伦敦，1941 年 2 月，第 113—114 页。

法国人民对贝当制度深恶痛绝，而美英反动统治集团却赞成贝当的国内政策。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在1942年11月才与贝当断绝外交关系。大家还知道，战争期间与贝当保持联系的还有戴高乐分子。①

戴高乐较之丘吉尔和美国统治集团更害怕法国民主阵营胜利。个人野心家、民主和苏联的仇敌戴高乐与法国大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象他的靠山贝当一样，是第三共和国中掌握政权的‘二百个家族’的历代奴仆传统的继承者。”② 戴高乐的反动计划吸引着梵蒂冈和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叙述他在伦敦会见戴高乐的情况时，千方百计地吹捧他。赶走侵略者之后如何防止法国民主力量取胜，无疑是戴高乐和斯佩尔曼所谈判的问题。 219

斯佩尔曼保证说，他在梵蒂冈没有会见过德国大使。但是，为了进行单独媾和谈判，不一定非会见他不可。撇开这些不谈，还应当指出，斯

---

① 见A·伍姆塞：《戴高乐和他的同谋者》，莫斯科，1948年版，第56页；让·卡塔拉：《他们出卖和平》，第46—47页。

② 让·卡塔拉：《他们出卖和平》，第46页。

佩尔曼是隐瞒真相的，因为实际上他在梵蒂冈经常与德国大使见面并且还秘密会见过里宾特洛甫。①

红衣主教飞往土耳其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与土耳其总统握握手，而是为了与德国大使冯·巴本进行谈判，这件事斯佩尔曼在他的书中只字未提，但是报纸上却登载了。② 冯·巴本是德国反动的天主教阵营的代表。1933年以前，他是德国执政的天主教中央党的领袖之一。巴本以与梵蒂冈有牢不可破的关系而闻名。1933年，他帮助希特勒夺取了政权。战争爆发以前很久，他就被任命为德国驻土耳其大使。现在，在希特勒德国的危急关头，巴本为了达到单独媾和的目的，展开了非常紧张的活动。③

斯佩尔曼和冯·巴本在安卡拉谈判的正是与德国媾和的问题，还有在意大利"中立化"的条件下（即把意大利变为"中立的"国家，它的领土不能被用来继续进行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德国

① A·门赫坚：《梵蒂冈》，第208页。

② 《工人日报》，伦敦，1943年5月18日、5月19日。

③ 《战争与工人阶级》，1943年，第1期，第24页。

不阻挠意大利退出战争的问题。①

斯佩尔曼在梵蒂冈还同芬兰代表格里本贝格男爵进行了谈判，谈的是如何帮助芬兰退出战争并保存它的反动制度的问题。②

综上所述，梵蒂冈在1942年末和1943年上半年（和以后）是幕后谈判单独媾和（首先是和意大利）及美英统治集团力求建立的那种战后欧洲制度的中心。 220

苏联军队的胜利在法西斯阵营中引起了深刻的危机。法西斯意大利的危机特别严重。德国执政的资产阶级在妥协性媾和方面寻找出路，而意大利执政的资产阶级更为迫切。这种媾和一定要更换某些个别的人，但不致于推翻法西斯制度。

在纽伦堡审讯德国主要战犯时查明，希特勒匪邦在斯大林格勒失败之后，德国的统治集团和

① 《工人日报》，伦敦，1943年5月18日、5月19日。

② W·鲁特：《战争秘史》，第1卷，第48页。1943年，教皇汇给芬兰一万美元。因此芬兰驻瑞典大使在1943年5月24日宣布："芬兰感谢至圣的教皇庇护十二世对这个国家的关怀"（Ch·多伊尔：《庇护十二世生平》，纽约，1945年版，第201页）。"至圣的教皇"对芬兰表示"关怀"，因为它能够充当国际反动势力反对苏联的工具。

军阀们曾经有过用另一个法西斯或军事首领顶替希特勒的计划。这个问题在瑞士曾与美国代表杜勒斯谈判过。

美国和英国的统治阶级也因苏联影响的增长而惶恐不安。他们懂得，苏联军队粉碎“轴心”将加强苏联的地位，提高它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并解放欧洲各国受法西斯束缚的民主力量。战后丘吉尔承认，他是要求“轴心”无条件投降的反对者，[①]虽然这一要求是整个反希特勒同盟公认的宗旨。美英统治集团醉心于同德国搞妥协性单独媾和的计划，他们秘密地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

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袖支持丘吉尔和美国统治集团的反苏、反民主计划。1943年7月，在美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召开会议讨论德国战后制度问题。这些“社会主义者”惊慌不安地谈论“布尔什维主义获得战争胜利”的“危险”，并且说必须用一切手段直至武装斗争，来防止这种情况。[②]

坚持这种反苏立场的还有以诺尔曼·托马斯神父为首的美国“社会主义者”和英国工党的领

---

① 《新时代》，1949年，第32期，第14页。

② 《工人报》，纽约，1943年8月8日。

袖。他们和丘吉尔一起反对德国无条件投降。1949年7月21日，贝文在英国议会的发言中对盟国力求使德国无条件投降表示遗憾。[①] 贝文和其他的工党大臣，身为战争时期丘吉尔内阁成员，是知道丘吉尔的反苏备忘录的。因此可以肯定，221 他们同意他的计划，也主张与轴心国代表进行秘密的媾和谈判。

斯佩尔曼就是以美国政府特使的身份被派去进行反对苏联和欧洲人民的谈判的。梵蒂冈作为“中立的”和“对世俗事务不感兴趣的”国家，是密谋反对民主媾和、耍阴谋和搞外交勾结最好的地方。美国政府为了这个目的派遣一名神职人员，而没有派世俗的外交官，其用意在于迷惑社会舆论：因为表面上斯佩尔曼出国是完成“宗教使命”的。

斯大林同志在1943年5月1日的命令中指出：

“……法西斯营垒中空谈和平，只是说明他们正遭受严重的危机而已。可是同这些血洗全欧，

① 见《新时代》，1949年，第32期，第14页；《奥地利人民之声报》，维也纳1949年7月22日。

到处树立绞架的德国法西斯营垒中的帝国主义强盗，还能说得上什么和平呢？只有彻底击溃希特勒军队和希特勒德国无条件投降，才能使欧洲获得和平，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德国法西斯空谈和平，岂不是因为他们感觉到快要灭亡吗？"①

庇护十二世和丘吉尔、美英反动资产阶级一起反对德意法西斯强盗无条件投降。教皇照常引用上帝的话来掩盖他反人民的计划和目的。教皇宣布："在卡萨布兰卡发表的要求三国无条件投降的宣言是与基督教义水火不相容的"。② 在庇护十二世看来，法西斯的掠劫与"基督教义"是完全相容的，而从法西斯桎梏下解放欧洲与"基督教义"是不相容的。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非常明白，庇护十二世想把法西斯制度从覆灭的灾祸中拯救出来。天主教徒查费拉写道，自 1943 年春夏两季起，"当明显地看出，战争车轮向有利于联合国家的方向转动时，"梵蒂冈与轴心国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这虽然反常，但却是事实。查费拉又说，一位与法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 100 页。

② A·门赫烬：《梵蒂冈》，第 210 页。

西斯高级人士有密切关系的意大利外交官告诉他，墨索里尼认为，当"轴心"胜利的一切希望全部破灭的时候，教皇是唯一能够减轻意大利战败重负的人。① 222

关于教皇的"和平"建议，纽约《民族》周刊写道：假如教皇的建议被采纳，"就会大规模地重演慕尼黑事件。"②关于这种"和平"计划，甚至象《纽约时报》这样反动的报纸也写道："当胜利在望的时候，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更加可耻的慕尼黑计划。"③

为了在社会舆论面前为这一叛卖政策辩护，美国和英国的反动分子竭力设法分裂同盟国阵营。他们大叫"共产主义危险"。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助理国务卿贝尔利在1943年4月说过，对自己胜利丧失信心的德国和日本，竭力用各种方法"引起联合国家的分裂"，以便"通过这种途径达到妥协媾和的目的。"其中的方法之一就是进行反苏

① G·查费拉：《梵蒂冈与欧洲战争》，第298页。

② 《民族》周刊，1944年10月14日，第429页。

③ 转引自《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1943年，第1期，第26页。

宣传，散布各种关于苏联计划的恶毒谣言。贝尔利承认，“英国和美国各种各样播弄是非的人常常给纳粹这些宣传活动帮忙……”①

在英美这些为反对苏联而“播弄是非的人”中，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是不落人后的。

天主教主教们反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斯大林同志在1943年五一节发布的命令中指出：

“德、意法西斯阵营，正遭受严重的危机而处于灭亡之前。当然，这还不是说，希特勒德国的灭亡已经来到了。不是的，不能这样说，希特勒德国及其军队已被震撼，并遭受危机，可是还未崩溃。如果认为灭亡会自行到来，那就是幼稚的想法。要使德国的灭亡成为事实，就必须使希特223 勒的军队从东方和西方再遭受两三次象它在最近五六个月中所受到的这样强烈的打击”。②

德国法西斯军队从东方接二连三地遭受到打

① 《真理报》，1943年4月8日。

②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00页。

击。但在西方却并没有受到这种打击，因为英美统治集团阴谋拖延第二战场的开辟。丘吉尔奉行反苏政策，“企图推迟第二战场的开辟，并把它转移到巴尔干地区，因为他认为把战争拖延下去总比眼看苏联势力扩大要好些。”①

美、英两国天主教的头面人物也出来反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大主教斯佩尔曼在谈起第二战场时，就表达了这些人士的，同时也是梵蒂冈本身的期望。

斯佩尔曼在叙述他在伊朗同美国军人会见和谈话的情况时写道：

“这里人们对俄国人进行战争的有效方法惊叹不已。表示这种惊叹的人，不仅这里有，而且到处都是。英勇地保卫自己国家，无情地驱逐侵略强盗出境，以及俄国人在完成这一任务时所具有的高超的军事领导和国家领导艺术不仅值得赞扬，而且令人敬佩。要是德国自己不在俄国境内为自己的部队开辟第二战场的话，德国本来会在西线取胜。英美两国永远都应该承认俄国的援

① 拉帕克：《反和平的阴谋》，第5页。

助，没有这种援助是无法摆脱困境的。”①

斯佩尔曼作为盟国军队代表，似乎只能为苏联节节取胜而高兴，他本人也承认苏联对他的国家以及英国所作的不可估量的援助。但是事实上斯佩尔曼却是对苏联的辉煌战果深感不安。他写道：“人们在中东得到深刻的印象：俄国有自己的关于世界以及关于边界的打算……”。这种挑衅性的论断，完全符合美国国内“混乱的散布者”们的诽谤性运动。斯佩尔曼的声明发表于1943年5月。这个声明无疑是打算证明当时正在进行的，有他参加的有关单独媾和的秘密谈判和反苏阴谋都是有理的。

但仅此一端远非全部。当时各同盟国国内舆论都要求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那么对于这一点在1943年5月这位同时也表达美国军政界权威人士观点的斯佩尔曼又是怎样想的呢？他虚伪地、花言巧语地写道：英、美两国“正在许多条战线上进行着一场世界性的大战，而俄国则只在一条战线上打仗……，许多人都想要俄国去开辟对付日

① 斯佩尔曼：《今日行动》，第145页。

本的第二战场……。"[①] 斯佩尔曼大主教的这一声明真是厚颜无耻之极。结果，似乎并不是英美两国应该履行盟国的义务，早在1942年就应开辟第二战场。斯佩尔曼所异想天开的倒是要苏联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把日军的主力吸引到自己方面，在战争中流尽鲜血，以此保证英美两国帝国主义者的世界统治。

全世界都知道，苏联及其军队正在承担希特勒分子及其同盟国家战争机器的主要打击力量。斯大林同志在1942年11月6日报告中指出：

"根据经过审查毫无疑义的材料，在现时德国所有的二百五十六个师的军队中，集中在我国战场上的不下于一百七十九个师。要是再加上罗马尼亚二十二个师，芬兰十四个师，意大利十个师，匈牙利十三个师，斯洛伐克和西班牙各一个师，那么，现在集中在我国战场上的军队总共有二百四十个师。德寇及其同盟国所有的其余师团都是在他们占领的国家（法国、比利时、挪威、荷兰、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驻防，其

① 斯佩尔曼：《今日行动》，第146页。

中一部分在利比亚与英国交战争夺埃及，而且利比亚战场仅吸住四师德军和十一师意军。"①

第二年，德寇在东方战线的师的数目又增加了。斯大林同志在1943年11月6日报告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与我军对垒的为二百四十个师，其中有一百七十九个是德国师，而在今年与红军对抗的则为二百五十七个师，其中有二百零七个是德国师。"②

在这样的条件下，斯佩尔曼却恬不知耻地扬言，说苏联应当"开辟第二战场"。他就以这种耶稣会士的厚颜无耻的腔调写道："我们没有听说在俄国曾经举行群众大会要求俄国政府对日本作战，开辟第二战场来帮助我们。"斯佩尔曼的这个声明是一个美帝国主义分子对美、英两国的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蛮横无理的挑战，因为他们要求本国政府迅速履行自己的盟国义务，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225

斯佩尔曼在发表关于第二战场的奇谈怪论的同时，还对苏联进行诽谤性的攻击，他断言说：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68页。

②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97页。

“根据他的情报”，似乎苏联“并无宗教自由”可言。① 他进行诽谤的目的是企图挑动天主教广大信徒起来反对苏联和共产党人，是企图削弱各占领国家的抵抗运动。与此同时，斯佩尔曼在美国的朋友和志同道合者也在迫害赞成同苏联合作的天主教徒。例如，在华盛顿天主教大学就曾驱逐一名教授，因为他主张同苏联合作并谴责柯林神父的反苏宣传。②

斯佩尔曼也承认，英、美两国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冲淡这一事的印象，他说英、美两国正在帮助苏联。说到这类声明，应该提一提斯大林在 1942 年 10 月 3 日答美国通讯社美联社记者问中所说的话：“同盟国对苏联的帮助若与苏联吸住德国法西斯军队主力所给同盟国的帮助比较起来，其效果暂时还是很小的。要扩大和改进这一帮助，只需做到一件事，就是同盟国完全地、按时地履行自己的义务。”③

盟国全面并按时履行自己义务的标志 首先

① 斯佩尔曼：《今日行动》，第 146 页。

② 《工人日报》纽约，1943 年 11 月 28 日。

③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 59—60 页。

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但是这一点却为英、美统治阶层中极有势力的集团所抵制，特别为丘吉尔所抵制。他坚持要在地中海地区展开战役，以此代替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一位大战期间曾在美军欧洲战区总司令部作战部供职的军官，后来是记者的美国人拉尔夫·英格索尔，他是当时环绕着开辟第二战场问题而展开的斗争的见证人，他写道：英国统治集团坚持“用进军巴尔干来代替越过英吉利海峡：这条路线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因为在英国人看来，长远利益要求他们比俄国人早到巴尔干地区。不成为任何秘密的秘密就在于此。这就是为什么通过巴尔干取胜的道路如此吸引着他们。”①这位作者还写道：“……到1943年年底，英国人响往巴尔干，这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已经十分清楚了。巴尔干象一块吸铁石，不管人们怎样摇晃罗盘，不列颠帝国战略的指针始终指着这块吸铁石。”②

天主教的主教们都支持丘吉尔的政策，即拖

① 拉·英格索尔：《绝密》，国家外国书籍出版社，1947年，第453—454页。

② 拉·英格索尔，《绝密》，第94页。

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政策。毋庸置疑：斯佩尔曼反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论据以及他在他那本书中记载1943年3月他同丘吉尔所进行的亲切的谈话的那几页中所作的欧洲第二战场似乎通过英美空军空袭的形式在实际上“已经开辟”的断言——所有这一切都是丘吉尔和英美军界高级人士对他的启示，所有这一切都是同斯佩尔曼本人和美国天主教主教们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敌视态度相吻合的。

英国天主教会的头面人物也和美国天主教界的头头脑脑同时进行反对开辟第二战场的运动，并竭力在英国挑起对苏联的不信任和敌视的感情。①

综上所述，对于在斯大林格勒粉碎德军一事，庇护十二世以及按照他的指令办事的美、英两国天主教主教们的回答是变本加厉的反苏运动，是进行一次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反对苏联的十字军远征的号召。“中立的”梵蒂冈积极参预旨在拯救法西斯制度的妥协性秘密和谈。

---

① 《工人日报》，伦敦，1944年3月23日。

“对世俗事务不感兴趣的”梵蒂冈却不遗余力地去分裂同盟国的营垒，散播对苏联怀疑的情绪，以便建立反苏统一战线。为了拯救德、意两国的反动制度，庇护十二世和所有天主教主教们都组织了广泛的反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运动。

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利益一致的梵蒂冈的立场，也和英、美两国统治集团的反动计划完全吻合，因此梵蒂冈开始追随这两国的统治集团。

227

美国世界霸权计划的宗教根据

英、美两国统治集团在战争期间一直追求与反对德国法西斯斗争的解放任务毫不相干的卑鄙目的。对于他们来说，法西斯德国首先是他们在世界市场上的危险的竞争者。“出于狭隘的自私自利的目的，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想破坏德国的实力，主要是只想消除作为世界市场上危险的竞争者的德国。但是他们绝对没有想把德国和其他国家从那些经常是实行帝国主义侵略和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势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也没有想实行根本性

的民主改革。"①

英、美两国统治集团并不打算加强欧洲的民主阵营。他们"指望苏联实力削弱，精疲力尽，指望苏联由于战争折磨的结果，将会在长时期内失掉其作为伟大强国的作用，而在战争结束之后，沦为美利坚合众国和大英帝国的附庸。"② 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希望苏联放弃建设共产主义。

斯佩尔曼颇有同感地重复丘吉尔对他所说的话：现在（1943年春）只是战争"开始阶段的结束"③。丘吉尔计划延长战争。

正当苏联单枪匹马地同"轴心国"的联合力量进行巨大斗争的时候，英、美两国统治集团却不仅拖延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妄图同德寇暗中妥协，而且还在制订能够保证帝国主义制度保存下来，保证资产阶级反动派在英美的控制和支配下统治欧洲各国人民的世界体制的方案。

英、美两国统治阶级炮制出来的战后世界体制的计划包括：保证从法西斯桎梏下解放出来的

---

① 《历史的伪造者》，第75页。

② 《历史的伪造者》，第75页。

③ F·斯佩尔曼：《今日行动》，第71页。

228 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制度不受触动；不惜用一切手段反对民主阵营力量的增长；不容许欧洲各国人民在从占领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后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为此目的，从反动的资产阶级地主法西斯分子和教权主义分子中到处搜罗走狗，建立代理机构；防止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德国、意大利和其他法西斯统治国家的法西斯制度；在这些国家中，从能对美国统治俯首听命的“可靠的”顽固分子中物色依靠对象。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竭力设法使自己称霸世界的条件能够得到保障，他们不让苏联加强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并阻碍它去享用自己的胜利成果。

还在战争年代，美帝国主义就已尽力争取使战争的结局能保障美国建立世界霸权。梵蒂冈对这种违反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计划是完完全全同意的，并且也积极参加了实现这些计划的行动。

美国天主教的主教们同美国整个反动阵营站在一起，他们鼓吹“美国的战后体制原则”，也即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他们使宣传适合美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教皇和平条件”的书刊报章充斥市场。1942 年 11 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天主教

主教会议发表了一纸有关美国在战争中的目的宣言。该宣言声称：美国正在同其他国家一起进行着一场艰巨的战争来反对那些想要在世界上建立奴隶制度的人们，并宣称同这种势力妥协绝不可能①。

主教们宣称他们反对妥协，这是骗人的、虚伪的。从他们这方面来说，这是对真正不愿同法西斯妥协的广大的美国劳动人民群众的舆论不得不迁就。他们的宣言本身就足以证明主教们的虚伪。因为这个宣言对共产主义大肆诽谤，对那些真正为反对希特勒匪徒及其傀儡而斗争的人们进行攻击。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就此写道：当主教们对共产主义大肆诽谤的时候，哪里还谈得上主教们的宣言有助于团结人民战胜纳粹呢。②主教会议还声称：教皇的和平条件是美国天主教会 229 的行动纲领。

奥马赫区主教詹姆斯·瑞安根据主教会议宣言的精神，在1943年天主教会出版的一本小册子

① M·奥肖内西：《和平与重建》，纽约，1943年，第195页。

② 《工人日报》，纽约，1942年11月17日。

里阐述了美国天主教会的战后纲领。瑞安首先声言，世界正受到两大危险(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威胁。[1] 仅此一点，即足以清楚地说明美国主教们，这些法西斯分子的崇拜者和朋友们的反动性和厚颜无耻。他们企图用这一类卑鄙的共同谰言来破坏美国劳动人民对共产主义的好感。美国的主教们诋毁共产党人——法西斯的毫不妥协的宿敌，诋毁那些在欧洲各被占领国家英勇奋战反对希特勒匪徒的人们。主教们诽谤当时正在一鼓作气集中全力拯救世界免于法西斯瘟疫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瑞安主教以"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伦理标准为借口，坚决要求战后在各地都保留资产阶级制度，他扮演了美帝国主义世界霸权代言人的角色。他写道：美国必须在各国人民中取得领导的、控制的地位。[2] 瑞安迎合美国垄断资本家世界霸权的利益，要求各国人民放弃国家主权。[3] 这位美

---

① J·瑞安：《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和平观点》，华盛顿，1943年，第8页。

② 瑞安：《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和平观点》，第7页。

③ 瑞安：《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和平观点》，第19页。

国主教还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而证明殖民地统治制度有理，并为在战后保存这种制度辩护。诚然，他表示过赞成允许各殖民地被压迫人民再过……五十年实行自治；但他认为这种诺言之所以需要，只是为了转移视线，因为如果拒绝作出这样的许诺可能会引起暴动①。

瑞安主教还按照美帝国主义计划的精神写道，教皇除了为已有的泛美联盟祝福以外，还为在战后成立各种列强的国际性联合组织祝福；他提出计划成立远东列强同盟，成立多瑙河联邦、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联盟和西欧同盟。这个"各种区域性联盟"的方案与美国统治阶级的计划完全合拍，他们在战时即已制订计划建立各种从属于美国帝国主义和旨在反对民主和反对苏联的集团。 230

这位奥马赫教区主教还力主天主教会在战后全部国际生活中应起统治作用，他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苏联正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痛击德国法西斯匪军。苏军节节取胜，使美国的主教们惶惶不可终日。瑞安写道，苏联在未来的和平会议上将

---

① 瑞安：《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和平观点》，第19—20页。

起什么作用这个问题，使得那些捍卫“和平的健康原则”的人深感不安，这就是说，使那些保护帝国主义利益的人们深感不安。瑞安忧心忡忡，是因为“俄国由于战争中节节取胜，将在拟订未来的和约条款时起极大的作用。”① 他在这本小册子中就这个问题敲起警钟，并表示希望在未来的和平会议上形成一个足以与苏联抗衡的强大集团。他写道：“而且，俄国和日本定会因为遭受战争的严重损害，在战后国力定会非常衰弱”，因而完全可能认为“至少是在改组世界的各项基本问题上听从其他列强的领导”② 是明智的。这位美国主教的这个厚颜无耻的声明包含了英、美反动派反对苏联和反对世界各国人民阴谋的要点，这一阴谋在苏军不断取得对法西斯匪徒的胜利的日子里即已在策划了。引人注意的是这位奥马赫教区主教在自己的那本小册子中把美国在战争期间的盟友苏联同当时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的日本相提并论。瑞安妄想苏联在战争中被削弱到如此地步，以致于对它可以任意指使；它也象全世界一样，

① 瑞安：《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和平观点》，第49页。

② 瑞安：《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和平观点》，第50页。

定能服从美国垄断资本家的霸权。

奥马赫教区主教瑞安1943年所述的这一战后世界纲领，并非是他个人的创造。它的小册子是天主教的官方出版物，他阐述的也还是1942年11月主教会议制订的那几条“和平原则”。这个美帝国主义战后称霸的纲领也就是罗马教皇的纲领。

还有另一位美国天主教会的代表人物麦克莱恩主教，“华盛顿天主教大学社会、政治和国际道德学教授”，也提出一个类似瑞安的广泛的“战后体制纲领”。他那本叫《充满生气的世界秩序》的书 231 几乎是同瑞安主教的小册子在同一个时间写成的（虽然直至1945年才问世）。

魁北克城大主教红衣主教威利耶努埃瓦在为这本小书所写的序言中推荐说，这本书阐述了战后体制的“天主教理想”。麦克莱恩主教一开始即声言：战争结束后，摆在人类面前的将是“重建全世界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复杂的新问题。他同整个反动阵营一起，也对共产主义大肆污蔑，并呼吁把它“连根铲除”①。麦克莱恩为保留资产阶

① D. A. 麦克莱恩：《充满生气的世界秩序》，密尔沃基，1945年，第14、23页。

级制度辩护（他一再断言说，天主亲自创造了社会等级制度，即社会阶级划分。）这位主教不仅悍然攻击国家主权的原则，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在国际范围内”计划并成立各种国际性机构的世界主义的“方案”①，而这些国际性机构应该是能使全世界都服从美国钱袋的统治的一种形式。麦克莱恩断言，天主已亲自为美国“标上了记号”，在战争期间美国各城市没有遭到轰炸，美国在战争中发了财。这位主教还与统治的资产阶级唱一个调子，他写道，美国对全人类“负有责任”，并根据这一点要求美国在世界上应居统治地位。

这位天主教教授的纲领已说出美帝国主义战后计划的要点。与统治的资产阶级关系密切和血肉相连的美国天主教的主教们也就沿着这个方向开动机器。大主教斯佩尔曼就是以下面的话来结束他那本小册子的：他“相信美国”、相信“上帝赋予它的崇高使命”……②。天主教的主教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断言美国肩负着“上帝赋予的使命”，其目的无非是要在美国资产阶级称霸世界的计划

① 麦克莱恩：《充满生气的世界秩序》，第68、94页。

② F.斯佩尔曼：《今日行动》第240—241页。

上洒上几点“圣水”。①

综上所述，正当苏联各族人民全力以赴地去 232 保障对血腥的法西斯制度的胜利和拯救世界文明免遭毁灭之际，美国资产阶级关心的却是保障它在战后的世界霸权，而美国天主教的主教们则充当美帝国主义计划的代言人。

来源于梵蒂冈和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的有关战后体制的所有文件都一直强调：天主教会在战后巩固资产阶级政权方面一定能够起到不可代替的作用。美国、英帝国以及欧洲的其他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阶级都相当重视教廷以及其教会组织，把它们看作是实现自己战后全部反人民计划的有效工具之一。

英美帝国主义分子认为，天主教会及其组织应当成为防洪坝，以阻挡各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法西斯怒潮和反对产生法西斯的帝国主义资产阶

① 天主教的头面人物一直以在美帝国主义争霸世界的事业中充当狗腿子的脚色为己任。美国“信仰宣传协会”头子麦克唐纳主教在1943年即曾提出培训“传教士”的大纲，即培养美帝国主义天主教走狗的计划，这在美国大多数天主教学校均广为采用（《全国天主教年鉴，1947年》，第354页）。

级的怒潮。

梵蒂冈参予反动派为反对民主而拼凑后备力量的活动

1942 年秋，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战斗正在进行之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哥哥艾伦·杜勒斯这个美国垄断资本的代表以美国情报局头子的身份，被美国政府派至欧洲。他在瑞士落脚。美国统治集团交给他的任务之一便是在各“轴心国”垮台以后，不让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各国取得胜利，并准备新的战争，反对苏联的战争。杜勒斯承担任务：采取一切措施在欧洲各国保存反动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这些国家里建立美国的代理机关。有了这样的机关，美帝国主义者在推行其称霸世界、镇压民主和同苏联作斗争的政策时，就有了依靠。

欧洲各国那些资产阶级的老牌政党，由于在战前同法西斯分子有联系，由于其投降政策和同占领者合作，已经信誉扫地，各社会民主党也属这种情况。在欧洲所有国家，同法西斯占领者奋不顾身进行斗争的只有各国的共产党。

莫里斯·多列士写道："正当资产阶级政客遵[233]循凡尔赛分子的传说，陷入失败的泥坑而不能自拔，跪倒在独裁者脚下之际，巴黎公社社员的继承者们却宣告他们对法兰西的命运和对民主的胜利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正当法国的所有党派团体都惊慌失措、分崩离析，甚至干出卑鄙无耻的勾当和出卖行为，因而灭亡的时候，只有我们共产党，为了法兰西及其人民的最高利益，一开始就走上了引导我国走向解放的道路。"①

尤利乌斯·伏契克在极其隐蔽的地下工作的情况下，于1942年1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地下机关报上写道："我们共产党人热爱生活。因此，为了真正的、自由的、生气勃勃的、欢乐的、配称之为'生活'的生活开辟道路而需要牺牲个人生命的时候，我们是不会犹豫的。跪着，带着镣铐，任人奴役和剥削而生，这不是生活，而是非人的苟且偷生。真正的人，共产党人能满足于这样的生活吗？他能服服贴贴地顺从奴役者和剥削者吗？永远不能。因此，共产党人在争取真正的人的生活的斗

① 莫·多列士：《人民的儿子》，第144页。

争中从不吝惜自己的精力，从不怕作出牺牲。”①

法西斯匪徒对共产党人悍然进行了野蛮的迫害。成千成万的共产党人受尽占领者及其走狗的折磨，遭到前所未闻的严刑拷打，受到杀害；但是共产党人却仍然英勇地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对占领者及其傀儡的斗争。共产党人以其英勇精神，以其对劳动人民事业的无私的忠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深深的敬仰。跟随他们一起斗争的，有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其他国家的信天主教的劳动人民，他们置教皇和主教们的反共谰言于不顾。

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人影响的增长不能认为是一种偶然现象，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现象。共产党人的影响之所以增长，是因为在法西斯统治的艰苦岁月里，欧洲的共产党人表现出自己是反对法西斯制度和争取各国人民自由的可靠的、勇敢的、奋不顾身的斗士。”②

英美统治集团没有打算在各被占领国家清除法西斯强盗以后和在德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

① 尤·伏契克：《随笔论文集》，第153页。

② 《真理报》，1946年3月14日。

推翻法西斯制度以后，让民主力量在欧洲取得胜利。他们害怕反对占领者的人民运动。他们害怕 234 战后苏联的影响增长。正因为如此，英美军司令部便千方百计阻挠法国抵抗运动和其他国家游击运动的开展，不给游击队员武器，反而劝说他们不要拿起武器来同占领者作斗争，而只消极地等待英美部队的到来。

美、英两国统治集团竭力在欧洲各国建立自己的立足点，以便在这些国家解放以后能保障反动的资产阶级人物在那里登台执政。他们依靠的是反动分子，即那些曾同占领者合作过的家伙，那些民主和苏联的敌人。

1949 年 9 月对匈牙利罪犯拉伊克及其同谋者的审判，以及同年 12 月对保加利亚人民的叛徒科斯托夫及其同谋者的审判，无可争辩地证明：英国情报机关和艾伦·杜勒斯的美国间谍中心已经收买了铁托——托洛茨基奸细集团充当其代理人，这个集团进行了旨在破坏南斯拉夫游击运动和消灭人民的优秀战斗力量的反人民的活动①。

---

① 见《新时代》，1950 年第40期，第 17—21 页。

尚在战争期间，铁托集团即已同英国人与美国人达成协议：战后铁托分子在南斯拉夫和巴尔干将奉行一条旨在反对苏联的、适合英美帝国主义利益的政策。杜勒斯在匈牙利也建立了自己的间谍机关。

美国唯一教派教会代表菲尔德，这个杜勒斯的最亲近的助手，以援助德国政治侨民为幌子，竭力收买这些人来为美国间谍机关效劳[1]。

英美统治集团对天主教主教们以及天主教中的一切反动分子寄予很大的希望。拉尔夫·帕克写道：英国外交界人士在巴尔干“同各农民党的上层人士与天主教上层人士建立接触。后来它（英国政府——舍英曼）利用这些人充当其在东欧各国的代理人。”[2]

许多国家天主教界的领导人都同艾伦·杜勒斯的美国间谍中心有联系，并遵照他的指示干了235许许多多反对本国人民的罪恶勾当。同这个间谍中心建立联系的还有原本是希特勒的同伙、但现

① 《真理报》，1950年9月4日；《团结》，1950年，第9期，第801至805页。

② 拉·帕克：《反和平的阴谋》，第36页。

在对他能否取得胜利已失去了信心的德国天主教反动分子。

1943年奥地利天主教上层人士也同杜勒斯建立了联系，例如他们曾通过格鲁贝尔这个法西斯党人，这个希特勒和美国间谍机关的特务建立联系[①]。战后，格鲁贝尔一跃而成为天主教的基督教民主党的头子之一，并在其美国主子的扶植下取得了奥地利外交部长的职位。

在意大利，英美统治集团则指望依靠保皇党、反动资产阶级和教会上层分子。《纽约时报》1942年11月写道："甚至已经不怎么行时的国王也还代表人民所尊敬的传统。他能不经过革命就消灭法西斯制度并建立代表一切反对党派力量的临时政府。"将近一年之后，英、美军司令部便开始把这个保留君主制的纲领强加给意大利人民。

在德国，英、美统治集团则指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并寄极大希望于天主教主教团和前天主教中央党的活动家，而这个党应对希特勒独裁政权的建立负全部责任。美国在战争期间就制订了

① 《真理报》，1949年10月7日；《奥地利人民之声报》，维也纳，1949年11月30日。

一个在德国成立有天主教活动家参加，特别是有布吕宁这个曾在希特勒上台前担任过总理职务的前天主教党的领袖参加的政府的计划。布吕宁是“И·Г·法本工业托拉斯”的走卒，是为希特勒上台执政扫清道路的人物之一。战争期间，布吕宁居住美国，任国务院德国问题专员。尚在英、美军队进入德国本土以前很久，这两国统治集团就在德国把赌注押在这一类型的反动政客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身上。

在战争期间，法国资产阶级“脚踏两只船：其中一部分跟着贝当走，而另一部分则跟着戴高乐走。在占领期间，戴高乐一刻都没有放松反共斗争。他害怕人民的积极行动，他知道共产党是善于领导这一群众运动的唯一政党。”① 同戴高乐接 236 近的尽是些象他那样的反动分子。在这些人当中，有为德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僧帽党党徒。法国资产阶级有了戴高乐，就有了一个心腹，可以委托他遏制抵抗运动，同共产党人作斗争，并且在贝当

① 雅·杜克洛：《为争取国家独立、为反对美国扩张主义而斗争中的法国共产党》，载《几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9年，第168页。

一旦垮台时仍能保障资本统治。

但是，戴高乐这个仇恨苏联的人在战争期间却不得不把自己的敌意伪装起来。“他心中有数：在被占领的法国，作为第一个真正为反对希特勒主义而作战的强国的苏联享有巨大的威望。因为戴高乐无力同这种对苏联的友好感情作斗争，于是他便假装出似乎他也有这种感情。”①

戴高乐的反民主的反动计划，深得丘吉尔的赞赏。聚集在共和运动周围的天主教反动分子对戴高乐无条件地予以支持。在他那里也有梵蒂冈的奸细。梵蒂冈虽然完全支持贝当，但是同时却脚踏两只船，以防万一希特勒失败，从而其在维希的傀儡也随之垮台。在戴高乐的亲信中“梵蒂冈的间谍机关也保持巩固的地位。海军司令部掌握在多明我派僧团手中。在海军司令部的成员中有这样的人：例如，同该僧团法国分会会长热莱特神父有密切联系的奥布瓦诺和为了执行这一使命而特从修道院召回的隐修士蒂埃里·达尔让利埃等。至于耶稣会，则连戴高乐本人都掌握在它的

① 让·卡塔拉：《他们出卖和平》，第57页。

手中。戴高乐早年曾在耶稣会中学就学，他父亲深受耶稣会的信任，爬上了耶稣会学校教师的职位。"①

英、美反动派在波兰则依靠仇视苏联并与波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敌的资产阶级和地主。这些分子战前就主张同德国合作，反对苏联。塔斯社1943年3月3日就苏波关系发表的消息中说："……全世界都知道，波兰政府及其部长贝克奉行同希特勒接近的亲法西斯政策，竭力使波兰同苏联对立。"②

波兰有些主教和波兰天主教界头子红衣主教赫隆德（庇护十二世的信托人）都走上了同希特勒匪徒相勾结的道路。同波兰统治阶级（即同地237主和资产阶级）的联系和对苏联及共产主义的仇恨，促使他同占领者勾结。战争初期，赫隆德曾抗议过希特勒匪徒在他们所占领的波兰对天主教会的迫害。他曾向教皇提出过报告，陈述法西斯匪徒的罪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立场也转变了，以便符合梵蒂冈同希特勒分子合作的方

① 让·卡塔拉：《他们出卖和平》，第46页。

②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1卷，第450页。

针。关于这一点，法国政论家加罗迪这样写道：赫隆德"在战争刚开始时就离开波兰、侨居国外，政治态度模棱两可。《秩序报》和《今晚报》都已揭露了这位红衣主教同秘密警察的勾结，这一点，在秘密警察档案库里发现的赫隆德的秘书菲利皮阿克神父（现在梵蒂冈高等法庭"回转法庭"任职）所写的信函和收据也可证实。这些文件无可争辩地证明：赫隆德曾不止一次向秘密警察乞求过赠款，而这位红衣主教的秘书也曾不止一次地从党卫队队长费歇尔处领取过大笔款项。"①

波兰的广大人民群众懂得：波兰从希特勒强盗手中获得解放以及它的复兴都同波苏友谊和波苏联盟的巩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943年6月在苏联召开的波兰爱国者联盟代表大会主席团致斯大林同志书中写道："我们坚信：加强波苏友谊是波兰民族的根本利益，同时也符合苏联的利益和愿望，因此我们请您相信：我们决不允许那些竭力企图离间波兰人民和苏联之间关系的人们把水搅混，我们一定要作出一切努力来加强波苏友谊，

① 汉·加罗迪：《教会、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徒》，第88页。

把它看作战胜德国以后恢复我国的独立与巩固和平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①

同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安德斯将军在竭力企图离间波兰人民同苏联的关系的波兰反动派中间，扮演了一个不算不重要的脚色。安德斯这个民主和苏联的敌人所想的并不是同希特勒德国的战争，而是反对苏联的战争。这个凶狠的亲法西斯的将军在战后所写的一本小册子中写道，他"曾大声疾呼，祈求天主"，使德俄交战，②因为他希望苏联在这场战争中削弱。

238 在苏联的波兰爱国者的报纸《波兰之波》对安德斯及其一伙是这样写的："一小撮政治投机分子，既有文的，也有武的，他们利用苏联的好客、信任和友谊，欺骗民主舆论，把本国的士兵引入歧途，不遗余力地企图在苏联的领土上按照本国的样板建立一支法西斯的波兰军队，一支与民主为敌、根本不想同德寇斗争的军队，一支至少是先在情绪上是反对苏联的军队。"③

---

①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1卷，第398页。

② 《新时代》，1948年，第49期。

③ 转引自《真理报》，1943年5月17日。

安德斯同波兰的教权主义分子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波兰之波》所报道的，“在安德斯将军的军队中也有从事‘传教’活动的人，即从事宗教宣传的人，这种宗教宣传掩盖着最常见的反苏口号的传播，并散布不可能战胜德国的消极情绪。”①

梵蒂冈和波兰的教权主义分子对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的反苏政策起了不算不重要的作用。

1943 年春，正当波兰流亡“政府”已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其亲法西斯的真面目之际，正当苏联政府由于波兰流亡“政府”的反苏立场而迫不得已与之绝交之际，在整个战争期间对占领者在波兰的罪行一直保持沉默的梵蒂冈在这个时候却突然对这个国家“表现出兴趣来”。现在它认为很需要同在伦敦的波兰集团取得更牢靠的联系，以便协调反对苏联和反对波兰人民利益的行动。1943 年5月末，教皇命戈弗雷大主教(教廷驻伦敦特使)行使驻伦敦波兰政府圣使的职权。戈弗雷以其对苏联的极端敌视态度以及同英国有权势的反动派有密切联系而闻名于世。

① 转引自《真理报》，1943 年 5 月 17 日。

6月2日，在这一任命数天之后，教皇在提交红衣主教团的咨文中声称：他正在祈祷确保波兰人民的未来“能符合他们正当的愿望”①。教皇认为“正当的愿望”就是在伦敦的反动波兰流亡政府的反苏计划以及英国人和美国人变波兰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防疫线”的愿望。

239 美、英两国统治集团和梵蒂冈希望把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地主制度强加于波兰人民，在他们的计划中，对安德斯将军及其军队都相当重视。毋庸置疑，关于这件事，斯佩尔曼在梵蒂冈和伦敦进行的幕后谈判中也讨论到了，因而，斯佩尔曼1943年先后两次，如他自己所说，应在伦敦的波兰“政府”首脑西科尔斯基将军的请求访问安德斯的军队也绝非偶然②。

遵照梵蒂冈的直接指示而采取同占领者亲近和合作方针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会上层分子。德国在这个国家的强盗式的占领制度也猛烈打击了天主教会组织。宗教界有许多代表人物都被希特勒匪徒投入集中营，受尽折磨。

---

① 《国际新闻简报》，1943年6月12日。

② F·斯佩尔曼：《今日行动》，第139—151页。

1950 年 4 月和 10 月布拉格审讯梵蒂冈间谍证实：捷克斯洛伐克有一些天主教高级僧侣曾与占领者合作，并向秘密警察告发捷克爱国志士。他们以梵蒂冈支持占领制度为理由，为自己的叛卖行为辩护。①

希特勒在布拉格的地方行政长官弗兰克，这个屠杀成千上万捷克爱国者的刽子手，在 1944 年 7 月 5 日曾书面报告希特勒大本营：他依靠捷克天主教的上层分子，"他通过非官方的中间人，定期地遵循着反布尔什维主义宣传的路线指导教会。"这样策划的活动有，例如 1943 年 7 月 23 日各主教共同反对空袭恐怖的呼吁书和 1943 年 8 月 15 日保护国全体主教反对"来自东方的无神论"的牧函。1944 年 1 月，布拉格大主教辖区一名议礼员，以天主教界代表身分参加了'捷克反布尔什维主义斗争同盟'的领导委员会②。在这

---

① 《真理报》，1950 年 4 月 2 日，4 月 3 日；《新时代》，1950 年，第 15 期；《奥地利人民之声报》，1950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8 日。

② A·斯沃博达、A·图奇科娃、B·斯沃博多娃：《梵蒂冈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阴谋》，第 103 页。

些卖身投靠的天主教会的主教们中间，有些人竟由于"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即进行间谍活动，为秘密警察效劳和出卖捷克人民利益而得到了希特勒匪徒的奖赏。

英、美帝国主义者计划在驱逐德寇出境后，把捷克斯洛伐克攫取到自己的手中，为此，他们也准备依靠天主教会的上层反动集团，依靠战前240 各天主教党派的活动家，其中包括当时身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总理什拉梅克主教、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加尔主教。斯佩尔曼说，1943 年他在伦敦时也会晤过什拉梅克。后来的事件表明，什拉梅克和加尔都是1948 年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阴谋的参予者。①

美国当权派和梵蒂冈早在 1942 年就制订计划复辟哈布斯堡君主国和在欧洲中心建立包括奥地利、匈牙利、巴伐利亚和其他地区的"天主教国家"。同这些计划直接有关的奥地利王位追求者奥托·哈布斯堡和他的兄弟们沉渣浮起，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上。1942 年 11 月，奥托·哈布斯

① 《真理报》，1948 年 3 月 24 日，4 月 3 日。

堡受美国陆军部的委托开始组织“奥地利军团，作为美国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①。美国政府通过国务院和陆军部同哈布斯堡家族，奥匈帝国保皇党及其在美国成立的各种组织机构正式合作。

恢复哈布斯堡君主国和成立“天主教国家”的计划得到梵蒂冈的极力支持。庇护十二世想要把这样一个帝国变成欧洲反对民主的堡垒、黑色反动势力反对苏联的工具，罗马教廷在中欧和东南欧传播黑暗的天主教的立脚点。1943 年 2 月，斯佩尔曼曾受美国政府之托同庇护十二世讨论了成立“中欧罗马帝国”的计划。②

梵蒂冈同匈牙利人民的一切敌人一样，梦想哈布斯堡王朝的复活。马·拉科西在 1949 年 3 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中说：“1942 年 4 月 16 日，索姆巴特海上将（后作为战犯被处绞刑）、乌伊萨锡少将、韦赖什·亚诺什少将等人受到罗马教皇的接见。乌伊萨锡在

① 《工人日报》，纽约，1942 年 11 月 24 日、28 日、30 日；《现代史料》，1943 年，1 月号，第 423 页；1943 年 2 月号，第 509 页。

② 《中欧观察家》，伦敦，1945 年 5 月 16 日。

被接见后写道：'罗马教皇表述了其在多瑙河流域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的天主教大君主国的愿望。'这个哈布斯堡君主国，拟议由巴伐利亚、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地亚，可能的话，还有捷克斯洛伐克组成。此外其他的一些材料也说明罗马教皇进行过这类谈判。"①

241

当匈牙利统治集团的地位出现危机时，匈牙利反动营垒里的人们也想起了哈布斯堡家族。由于德寇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失败，匈牙利统治者便从臭球堆里拖出匈牙利反动派中那些因未同德寇合作而名声尚未完全扫地的分子。"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个年迈昏溃的哈布斯堡一约瑟夫大公。他晚年不知在什么地方苟且偷安。哈布斯堡家族的人一向为希特勒所不容。现在这位约瑟夫大公作为一个老元帅被授予坦克团名誉团长的体面头衔。"②

在欧洲许多国家中，各种天主教党派在战争

① 转引自《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49年3月15日。

② 马·拉科西：《匈牙利反动派的手腕》，《真理报》，1943年1月4日。

的转折时期重新复活或成立起来，这都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及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热衷于建立自己的反民主的支柱直接有关。在教会及其各种组织的帮助下，各天主教党派应为资产阶级以及英国人和美国人打好他们可以依靠的群众基础。

并非天主教刊物的英国金融寡头喉舌《经济学家》1943 年 9 月写道："盟国在天主教主教们和天主教组织那里可以找到恢复立宪制度和法纪的强而有力的支柱。"《经济学家》又写道：梵蒂冈的这一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害怕共产主义和世俗的左倾的独裁。"① 在《经济学家》的语言中，"立宪制度"和"法纪"指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1942 年 10 月，《纽约时报》也以同样精神写道："梵蒂冈作为一股保守势力，感到自己的帮助对英、美当局在战后重建时期是无比宝贵的。"②

梵蒂冈在"轴心国"发生危机的时刻提出了"和平与改良"的口号③。所谓"和平"，就是单独

---

① 《经济学家》，1943 年 9 月 11 日。

② 转引自A·彼得森：《神权还是民权》，纽约，1944 年，第 20 页。

③ 《经济学家》，1943 年 9 月 11 日。

同法西斯妥协，而“改良”，则是镇压劳动人民的斗争，以及为了欺骗人民群众而排除声名狼藉的法西斯分子，以保存这个法西斯制度。梵蒂冈甚至还向主教们发出指示，让天主教工会参加抵抗运动，以便从中阻挠并遏制其革命行动①。

242

1943年夏，正当苏军节节取胜使各国人民对迅速击溃“轴心国”有了信心的时候，正当各被占领国家的抵抗运动已发展成强大力量的时候，那些过去忠实地为希特勒及其傀儡们效劳的反动天主教集团的代表人物中有些人也对德国强盗的罪行表示“抗议”起来。因为这些人展望未来，心中明白：各国人民是不会饶恕他们同占领者合作的。他们企图欺世盗名，猎取反法西斯斗士的光荣称号。

在希特勒军队败北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匈牙利的几个师在沃龙涅什城下覆灭的影响下，匈牙利国内对法西斯德国及其代理人的仇恨日趋强烈。在这种条件下，连红衣主教塞赖迪也认为需要声明，法西斯主义同基督教精神背道而驰②

① 《经济学家》，1943年9月11日。

② 《新国际年鉴，1943年》，伦敦，1944年，第270页。

在比利时，以红衣主教范·罗伊为首的主教们在德寇占领初期曾奉劝教徒承认占领者为“实际的政权”并要服从他们，而到了1943年4月也出面抗议德寇掠劫教堂和以强迫手段成批驱使比利时工人去德国从事苦役[①]。当时出面反对德寇野蛮暴行的还有荷兰的教会[②]。

各国高级僧侣玩弄的所有这些手腕，无非是想欺骗社会舆论，无非是想在令人痛恨的“新秩序”垮台后他们有理由对欧洲各国人民说：即便是教会主教们也都“参加”了反对占领者的共同的人民运动。事实上，正当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巴尔干各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国家的部分低级僧侣以及许多劳苦大众中的天主教徒真正参加同占领者的斗争的时候，主教们却和梵蒂冈一起，站在“轴心国”和卖国贼的营垒中千方百计阻挠抵抗运动的开展。而当形势一旦明朗，占领制度已近末日，他们就开始同杜勒斯的间谍中心以及英、美帝国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取

---

① 《真理报》，1943年4月19日，4月26日。

② 《真理报》，1943年4月2日，《工人日报》，伦敦，1943年6月12日。

得联系，并帮助他们策划反对各国人民的阴谋。

243

梵蒂冈和墨索里尼法西斯制度在意大利的垮台

1943年7月25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制度被推翻，巴多里奥内阁成立。

墨索里尼的垮台同德军在苏德战线的失败直接有关。“法西斯军队在苏德战场上的失败和我盟军给德、意军队的打击，动摇了法西斯同盟的整个体系，它正在我们眼前分崩离析。”①

意大利劳动人民，首先是工人对法西斯独裁的深恶痛绝发展成罢工运动。人民要求：打倒战争，打倒墨索里尼！“1943年春，开始是在都灵，后来在米兰和热那亚发生了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大工潮。希特勒军队在东线的崩溃和盟军在西西里的登陆加速了事态的进程，并推动意大利资产阶级去寻找某种对策：例如，他们打算换马，用另外一个声名比较不那么扫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去代替墨索里尼，以防人民起义。为此目的，

---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23页。

就物色上了巴多里奥元帅。这个人必须依靠法西斯分子中最不走极端的那一派人和非法西斯的保守分子来为意大利寻找摆脱严重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处境的出路。"①

梵蒂冈和整个意大利资产阶级都力求防止用革命手段推翻法西斯制度，而限于更换个别人物。梵蒂冈在这方面的计划，特别寄希望于已经与之频繁接触的美、英统治集团。

5月12日《纽约时报》写道："斯佩尔曼在华盛顿说，梵蒂冈由于意大利军事失利所出现的局面深感不安。数天之后，传出消息说，教皇致书英、美两国政府，声称如果英、美部队在法西斯制度垮台之前不能占领意大利，那垮台以后可能 244 出现的局面使他不能宁静②。

梵蒂冈制订了一个盟军部队占领意大利后保留意大利的各种法西斯组织机构的计划，并把这

① 路·隆哥：《关于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活动》载《1947年几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莫斯科，1948年，第282页。

② 《工人日报》，伦敦，1943年5月17日、18日、19日；《纽约时报》，1943年5月18日。

个计划交给了斯佩尔曼。这个计划规定解散法西斯政党（梵蒂冈的主教们懂得，人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它存在的），但保留法西斯分子所建立的政权机关而不去触动，特别是保留墨索里尼任命的长官，并使之听命于占领当局①。这样一来，梵蒂冈以及通过它为中介的意大利资产阶级便指望只是除掉墨索里尼，但却保留这个刽子手所创建起来的压迫人民的全部暴力机器。

庇护十二世的建议，吸引了美、英两国统治集团，特别是丘吉尔，因为他害怕意大利革命不亚于教皇。6月末，当时在伦敦的英国驻梵蒂冈大使飞返梵蒂冈。报刊猜测，他给教皇带回英国政府对教皇致盟国书的复信②。

但是，意大利国内的革命浪潮却一浪高过一浪。人民革命逐渐成熟。于是教皇就从阴谋反对意大利人民切身利益的幕后活动和秘密外交转向公开的活动。6月13日，他在一次专门从意大利各地召集来的二万五千意大利工人面前发表讲

① 《民族》周刊，纽约，1943年8月7日。

② 《工人日报》，伦敦，1943年6月23日。

话①。这种集会如无法西斯当局的首肯是不可能举行的。教皇恳求意大利工人，要他们安份守己，而不要去想革命。他假惺惺地承认人民处境不好，生计艰难，但硬说"要得到拯救并不在于革命"，据说，革命是"产生于非正义和对世俗政权的不服从"。庇护十二世，这个墨索里尼的忠诚的盟友和多年的合作者劝说工人：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能鼓舞一切人，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无论是雇主还是工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总而言之，是能鼓舞社会上一切阶级的真诚的同心同德和博爱的精神"。人民决心清除墨索里尼制度，而教皇却呼吁他们同法西斯压迫者，"博爱"和"同心同德"。教皇采用了诽谤、造谣和恐吓的惯用伎俩。进步报刊都一致认为教皇的这场表演是对意大利政治的干予，这一行动是受意大利统治集团利益的支配和英美统治集团的唆使，因为后者害怕用革命手段推翻墨索里尼的程度不亚于庇护十二世。 245

① G·萨尔维米尼、G·拉·皮阿纳：《如何对待意大利》，第285页；《民族》周刊，1943年7月19日、26日、8月3日；《外交政策报道》，1944年1月15日，第286页。

庇护十二世对共产主义和革命斗争进行新的诽谤性攻击的呼吁，其对象并不限于意大利工人。这也是对法国、比利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呼吁，要他们放弃同占领者的斗争。这也是对欧洲天主教徒的一种号召，号召他们不要去参加抵抗运动。甚至连伦敦的《经济学家》也用害怕"左倾的独裁"[1]，即害怕人民运动来解释庇护十二世的这场表演。

意大利主教们也都紧跟教皇发表类似的呼吁。

7月25日，墨索里尼制度垮台。但仍有几名法西斯制度的骨干进入新组成的反民主的巴多里奥内阁。巴多里奥建立了军事独裁。他的政府把扼杀国内民主运动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巴多里奥周围都是些顽固的保皇分子。他本人在墨索里尼时期曾为法西斯效忠。《真理报》曾就墨索里尼垮台一事写道：这"仅仅是在清除意大利法西斯及彻底粉碎希特勒'轴心'伙伴的道路上跨出的第一步"。[2] 事态发展与意大利和英、美资

① 《经济学家》，1943年9月11日。

② 《真理报》，1943年7月26日。

产阶级的计划背道而驰，反对德国强盗和墨索里尼集团的广泛的游击斗争和群众性的人民运动在国内蓬勃开展。

7月27日，意大利五个反法西斯政党（共产党、社会党、民族党、天主教民主党和自由党）联合发表宣言，要求严惩法西斯头目[①]。人民的一致要求是结束战争。举行了群众性游行示威，人们高呼"巴多里奥滚蛋！我们要自由的民主选举！"[②]

在人民的压力下，巴多里奥政府取缔了法西斯党，但其余的法西斯组织团体却未取缔。政府企图借助军队来扼杀群众性的人民运动。全国实行戒严。巴多里奥宣称："意大利继续站在德国方面，进行战争。"关于巴多里奥政府，《真理报》当时曾写道：墨索里尼及其一伙冒险家、罪犯、人民公敌、德帝国主义喽罗凑成的匪帮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现在在意大利当权的却是曾和墨索里尼合作过的人们[③]。

246

① 《真理报》，1943年7月29日。

② 《真理报》，1943年8月7日。

③ 《真理报》，1943年7月31日。

正因为教皇了解巴多里奥政府的反人民计划，他便千方百计地支持它。意大利通讯社报道说："教皇一天两次听取有关事态发展的消息。梵蒂冈密切注视意大利国内的事态。"①

8月4日，梵蒂冈各部门中最重要的部门——教廷非常事务部同十六名红衣主教一起开会，讨论国际局势，根据事态的发展制订了教廷的相应对策。"②8月10日，梵蒂冈电台发表声明说梵蒂冈完全支持巴多里奥政府。这次广播内容包括反对要求意大利无条件投降。梵蒂冈要求以"体面和公正"为基础的和平③。

梵蒂冈在其幕后的外交活动中竭力从美、英统治集团那里争取对意大利统治阶级最为有利的退出战争的条件。为此目的，教皇又施惯伎：用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威胁"来吓唬人。8月末，当时丘吉尔正在华盛顿，教皇的代表——梵蒂冈行政长官恩里科·哈莱阿齐也到了那里。他此行目的是同丘吉尔和美国统治集团协商意大利退出战

① 《工人日报》，伦敦，1943年7月31日。

② 《现代史料》，1943年9月。

③ 约·斯蒂尔：《保卫和平》，第228页。

争的条件，这些条件应能阻挠意大利人民对自己国家施加决定性影响①。

梵蒂冈就这样直接参预了反动势力反对意大利人民的秘密勾结。

教皇对战犯的关心

梵蒂冈千方百计挽救战犯，使之免受正义的审判。苏联政府不止一次地在全世界面前抗议过在苏联和欧洲其他国家被占领的领土上发生的 247 法西斯野兽暴行，并声明罪犯必须惩罚。斯大林同志在 1942 年 11 月 6 日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知道这些伤天害理的凶犯，'欧洲新秩序'的建立者，所有这些刚刚粉墨登场的总督和省长、驻防司令和副司令是些什么人。成千成万的受害的人们都知道他们的名字。让这些刽子手知道，他们罪责难逃，绝逃不出受害的各国人民的惩罚之手。"②

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1942 年 11 月 2 日命令，成立了国家非常委员会，负责确定和调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及其同谋者的罪行和他们给

① 《工人日报》，伦敦，1943 年 9 月 3 日。

②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 76 页。

苏联公民、集体农庄、社会团体、国家企业和机关所造成的损失。在这个命令中指出，对德国法西斯强盗的全部滔天罪行，对他们所造成的全部物质损失，“罪恶的希特勒政府、德军司令部及其同谋者都负有完全的刑事上的和物质上的责任。”①

1942年10月14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作为对欧洲一系列国家的政府集团提出的照会的答复，这些国家政府表示希望苏联政府警告希特勒匪徒必须对其在被占领国家犯下的野兽暴行负责。这个声明说：“苏联政府赞赏并同情它所收到的集体照会中所表达的要求保证对犯有上述罪行的战犯进行公正的审判，追究罪责并执行判决的合理愿望。苏联政府准备支持盟国和友好国家为此目的所采取的实际措施，并认为有关国家彼此之间应相互配合，对在被占领地区组织和鼓励犯罪及犯有罪行的希特勒分子及其同谋者进行调查、引渡，交付法院、严加惩处。”②

“满怀仁爱的”庇护十二世对法西斯刽子手在

①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1卷，第323页。

②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317—318页。

欧洲各被占领国家屠杀千千万万的人漠然视之，而对世界各国人民决心要把刽子手交付法庭并对 248 他们严加惩处却焦急不安。梵蒂冈包庇希特勒刽子手们并不是在纽伦堡审判德国主要战犯的那个时期才开始的，而是早得多，还在战争期间就开始了，而在 1943 年，在墨索里尼制度垮台以前不久，这种包庇活动特别猖狂。

梵蒂冈在虚伪地呼吁“基督教的仁爱精神”，以此为幌子，要求宽恕法西斯强盗。梵蒂冈一直以“基督教的仁爱精神”为名，竭力要各国人民放弃他们审判战犯的要求。梵蒂冈的主教们在法西斯统治意大利的二十年中，已经与法西斯的许多头面人物亲密无间。梵蒂冈对这些人的命运极为担心。无怪乎墨索里尼被庇护十一世捧上了天，称之为“上天的使者”！

1943 年 4 月 20 日，梵蒂冈电台公开出面为战犯辩护，“证明”法西斯分子在战争中无罪，因为据说战争是天主的一种惩罚①。既然如此，那么在凡人当中谁也不能对它负责。

① 《工人日报》，伦敦，1943 年 4 月 21 日。

7 月 29 日，苏联政府向土耳其和瑞典两国提出照会，其中说：

“鉴于意大利国内事态的发展及墨索里尼、法西斯头面人物以及其他战犯们可能企图藏匿到中立国国土上以逃避等待着他们的应负罪责，苏联政府特向各中立国呼吁，不要允许上述人等避难。苏联政府还认为有必要声明，它认为允许这类人物避难、帮助和支援他们是破坏联合国所为之斗争的原则，而为实现这些原则它们决心使用它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①

英国政府②以及美国政府③也有内容相似的照会提交各中立国政府。这一照会梵蒂冈也收到了。瑞士、阿根廷和梵蒂冈都拒绝保证不为法西斯战犯提供避难所④。因此，梵蒂冈仍然忠于同法西斯的联盟。

249 梵蒂冈的这一方针也是同英、美反动集团的

①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 1 卷，第 401 页。

②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 1 卷，第 401 页。

③ 《国际新闻简报》，1943 年 8 月 7 日。

④ 《赫尔回忆录》，第 2 卷，纽约，1948 年，第 1361—1362 页。

政策相一致的，因为他们力图保存法西斯骨干分子为日后反对苏联的战争和反对劳动人民的斗争之用。

墨索里尼制度垮台以后，有许多法西斯头面人物都在梵蒂冈及其各种机关里隐藏起来。逐渐地，他们带着梵蒂冈的各种"慈善"团体的伪造证件，被送到南美各国，逃避了正义的审判①。

---

① 庇护十二世十分关心墨索里尼家庭的情况，尽管墨索里尼一家一向是从教权主义的意大利政府领取生活费，他仍然于1946年末给墨索里尼的遗孀寄去抚恤金。(1946年9月29日《真理报》)

250

第五章　梵蒂冈力图挽救德帝国主义

（1943 年末至德寇被全部赶出苏联领土）

“梵蒂冈囚徒”

对于快到 1944 年夏季形成的形势，斯大林同志曾作过如下的概括：

“在 1943 年至 1944 年间的冬季战役进程中，红军在争夺第聂伯河及其右岸乌克兰区域的有历史意义的会战中获得了胜利，摧毁了德寇在列宁格勒附近和克里木半岛上的强大防御工事，并以巧妙迅猛的行动打破了德寇沿南布格、德聂斯特、普鲁特，塞勒特等河川布置的防线。几乎在全部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克里木、列宁格勒省和加里宁省内以及白俄罗斯很大一部分领土内都把德寇肃清了。红军给祖国收复了南方的冶金基地，

克里沃罗日耶、刻赤和尼科波尔的矿区，第聂伯和普鲁特两河间的肥沃田地。从法西斯奴役中救出了几千万苏联人。

红军执行着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收复祖国领土的伟大任务，已进到了我国与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接壤的国界上，现时正在罗马尼亚境内继续歼灭敌军。"①

克·叶·伏罗希洛夫写道，战争的第三个阶段"包括 1944 年的各次战役，是苏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它以斯大林的十次打击而闻名。在这个阶段，苏联武装力量进攻行动的规模和摧毁[251]性质达到最高点。由于这些战役的结果，德国的巴尔干同盟国罗马尼亚王国和保加利亚帝国，及法西斯芬兰和霍尔蒂匈牙利都先后失去了作战能力，法西斯侵略者被一个不剩地从苏联国土上赶了出去，军事行动已经完全转到敌人的领土上。②

由于苏军取得的胜利，法西斯德国及其仆从国的处境越来越危急。斯大林同志 1944 年 2 月

---

① 《最高统帅 1944 年 5 月 1 日命令》——见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 142—143 页。

② 伏罗希洛夫：《伟大卫国战争的天才统帅》，第 8 页。

23日发出的命令："现在大概是人人都看得清楚了，希特勒的德国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①

1944年，占领者已经完全从苏联领土上被赶出去了。斯大林同志1944年2月23日发布的最高统帅命令中指出："可是，我们的任务不能只以把敌军逐出祖国境外为限。现在德军正如一只受了伤的野兽一样，为了医治创伤它不得不向自己的洞穴（德国）的边境爬去。可是，这只受伤爬向自己洞穴去的野兽，仍然是很危险的野兽。为使我国和我国的盟国免遭奴役的危险，就必须跟踪追击这只受了伤的德国野兽，一直追到它的洞穴里，把它完全打死为止。"②

苏军给予法西斯占领者的打击，使全世界民主阵营的阵地都得到加强。苏军的胜利鼓舞着欧洲被占领各国的人民去同占领军进行越来越广泛越坚决的斗争。被希特勒暴政所折磨的各国人民看到，多亏了苏联，法西斯同盟正日趋瓦解，一部分一部分地分崩离析，解放的日子就要来到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已经失败了，而他们所建立的血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36页。

② 《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45—146页。

腥'新秩序'正在崩溃。在欧洲各被占领国中，反法西斯奴役者的全民义愤的爆发日益猛烈。德寇在其同盟国以及中立国中原有的威望已经丧失得252无可挽回了，它与中立国的政治经济联系已经破裂了。"①

与此同时，苏军的胜利以及由此而来的民主阵营力量的增长，都使同盟国中的反动资产阶级大为不安。他们比以前更加害怕苏联的实力在战后增长，因为他们原来指望苏联衰败的愿望未能实现。美英统治集团仍然迟迟不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直到1944年7月他们才开辟，这也是因为害怕苏联自己把法西斯德国及其同盟国打败，害怕苏联自己把整个欧洲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从而在解决战后的世界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美英统治阶级一方面拖延开辟第二战场，一方面继续在幕后同德国策划单独媾和的阴谋。丘吉尔和美国统治者指望德国内部会有某些法西斯头领、将军或银行家发动"宫廷政变"，废黜希特勒，找一个德国的巴多里奥取而代之，从而挽救

① 斯大林：《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六周年纪念》；《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24页。

资产阶级的政权。在瑞士的美国情报机关的代表艾伦·杜勒斯进行的种种阴谋活动，目的就在于此。1944年7月20日对希特勒的谋杀活动，就是这些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尽管丘吉尔和美国统治集团一心想挽救德国法西斯制度，使之不至于崩溃，他们却不得不考虑本国的社会舆论，这些舆论要求同苏联更紧密地合作，迅速开辟第二战场，坚持斗争，彻底打垮法西斯德国。英美政府一面同德国军事集团和资产阶级集团进行密谈，一面却装作完全忠实于同盟义务的样子：它们的两面派政策在于反对反法西斯阵营的主力军苏联。

使美英统治集团大为不安的事，当然也使得庇护十二世惶恐不已。他知道法西斯"新秩序"破产的日子已为时不远，并惴惴不安地注意有关苏军把占领者从自己国土上完全赶出去的消息。他很了解我国政府一定要把这头法西斯野兽打死在它自己的巢穴的决心，因而跟丘吉尔一起，担心253这一事实会加强全世界的民主阵营。教皇害怕受到希特勒镇压的各国人民举行革命起义，因而千方百计地帮助国际反动势力试图尽可能地挽救法

西斯制度中可以挽救的东西。

1943年9月11日，巴多里奥政府和意大利国王逃出罗马，把首都交给德国占领军。在资产阶级的书刊中流传一种神话，似乎在德军占领罗马之后，教皇成为希特勒匪徒的“囚徒”。编造这种神话的目的，在于为教皇的亲德立场辩解。替他辩解的人强调说，教皇对于德国法西斯在意大利犯下的兽行不能有所反对，对于他们在别的国家所奉行的政策也不能有所反对，因为他本身已经“成了德军的俘虏”，因而无能为力。其实，这种说法跟实际情况截然不同。当法西斯德国的军队占领罗马之际，庇护十二世丝毫没有任何不快。教皇同占领军当局建立了极其良好的关系。

当时，斯佩尔曼、利物浦大主教杜恩和爱尔兰的红衣主教马克·罗里① 都叫嚣起来，斯佩尔曼呼吁天主教徒们都要为教皇祈祷，杜恩则宣称教皇已经成了“德军的阶下囚”。他们的目的在于向社会舆论隐瞒教皇同法西斯德国，特别是同驻罗马的德军司令部密切合作的事实。

---

① 《基辛的现代档案》，1943年10月9—16日，第6034页。

关于梵蒂冈在德军占领罗马期间的情况，有一个美国女天主教徒在她的日记中记叙得颇为详细。她当时用斯克里夫纳[①]这个假名在梵蒂冈的某机关工作。她的这本日记出版时，前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反动天主教徒海斯曾为她写了一篇序言。据他说，作者是他家的朋友，是长期生活在罗马的天主教徒。由于日记作者的地位不高，当然不可能了解当时梵蒂冈所玩弄的政治伎俩。尽管如此，这一篇篇的日记，却提供了有关梵蒂冈在罗马被占领期间的情况的有趣的材料。

从斯克里夫纳的日记可以看出，教皇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囚徒"。

驻罗马的德军司令部经过同梵蒂冈当局协商，在梵蒂冈的入口处划定"边界线"，在边界线上设置岗哨，对进出教皇国的情况进行检查，并声称，梵蒂冈由他们进行保护。在罗马被占领后，254 梵蒂冈当局宣布为它的瑞士近卫军紧急征兵；据宣布要征集二千五百人[②]（该军平时编制不超过

① J·斯克里夫纳：《同德国人一起在罗马》，1945年，纽约。

② 《现代史料》，1943年11月。

一百人)。

罗马的劳动居民对占领者怀有敌对情绪。斯克里夫纳记述道，10月的半夜里，许多房屋的墙壁上都用红颜料涂上大字："俄国万岁！"，"斯大林万岁！"，"共产主义万岁！"，"打倒墨索里尼！"，"打倒法西斯！"斯克里夫纳写道：梵蒂冈当局十分害怕，如果德国人进行挑衅，罗马人会不会到梵蒂冈来寻找避难所。由此可见，梵蒂冈当局采取加强守卫梵蒂冈的措施是针对罗马居民的。

有鉴于一些天主教国家，尤其是葡萄牙、西班牙、阿根廷，表示对教皇的处境非常担心，《罗马观察家报》于9月21日发表一项声明说，尽管德军哨兵站在圣彼得广场上，但是他们没有越过边界，所以梵蒂冈的独立没有受到侵犯①。教皇报纸的这项声明，以及后来的一系列解释和辟谣，无疑是符合德国利益的。梵蒂冈电台也急忙对德军越过教皇国的边界一事进行辟谣②。

9月16日，斯克里夫纳在她的日记中写道，

---

① 《基辛的现代档案》，1943年9月18—25日，第5997页。

② 《国际新闻简报》，1943年10月2日。

德国人极力向梵蒂冈表示友好。德国大使冯·魏茨泽克男爵，据她说非常有礼貌，并对教皇关怀备至①。除开魏茨泽克之外，当时担任德军驻罗马司令官的凯塞林元帅，这个曾屠杀过几千个意大利反法西斯爱国者的刽子手，也不止一次地拜访过教皇。斯克里夫纳在日记中就记载过凯塞林的一次访问(9月20日)："据说他(指凯塞林——舍英曼）是一位善良的天主教徒"②。

教皇不但接见希特勒的元帅和将军，他还接见希特勒的士兵和军官，并且鼓励他们去"同布尔什维主义进行斗争"，把反苏战争进行到"胜利"。《纽约时报》驻罗马记者报道，在该城被德军占领期间，教皇经常接见德国的士兵和军官，并向他们保证说，他是"德国人民的朋友"，表示希望德国在"同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会在自己身上找到力量。当时，宗座代牧主教就在罗马用德语为希255特勒军队的士兵印发传单，传单上印的是教皇讲演的语录，借以证明教皇是"德国人的朋友"③。

① J·斯克里夫纳：《同德国人一起在罗马》，第21页。

② 《同德国人一起在罗马》，第25页。

③ 《纽约时报》，1944年9月6日

一切都说明，在罗马被占领时期，教皇这个所谓的“囚徒”，为德军司令部大帮其忙，并在“同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作斗争的幌子下为希特勒的强盗们祝福，鼓励他们继续作战。

斯克里夫纳在她的日记里（9月16日）写道：希特勒匪徒们希望一旦他们的不可避免的末日来到之时，梵蒂冈会有他们的朋友来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东西[①]。她在10月28日写道：“好象他们懂得，一旦他们垮台的时候，教皇的声音是唯一能够为他们的利益而发出的，而且他们预料，他一定会愿意这么做”[②]。魏茨泽克、凯塞林和希特勒的其他仆从及其罪行的参予者没有看错：教皇的确是他们的庇护者。到了战后，魏茨泽克（他曾长期隐藏在梵蒂冈）作为里宾特洛甫的主要助手，同希特勒的其他外交官员一起受审判时，梵蒂冈动员了一切力量来为他开脱罪责争取释放。同样，由于英美反动派的努力，希特勒的刽子手、那位“善良的天主教徒”凯塞林也逃避了应得的惩罚。

德国占领军在罗马建立了最残酷的恐怖制

① J·斯克里夫纳：《同德国人一起在罗马》，第21页。
② 《同德国人一起在罗马》，第44页。

度。这一点并不妨碍教皇同凯塞林、魏茨泽克及希特勒的其他奴仆友好相处，并同他们合作。

按照教皇国的地位，分散在罗马各区的许多属于梵蒂冈的建筑物也在教皇的主权范围之内。尽管如此，德意政权于1944年2月却袭击了梵蒂冈的这些建筑物，并逮捕了躲在那里的意大利反法西斯战士。仅在圣保罗柱廊大厅里，占领军就抓走了六名意大利军官，接着马上就处死了[①]。德国政权还逮捕了对法西斯和占领军持反对立场的神父。4月4日，斯克里夫纳写道，昨夜德国人处决了一位年青的神父莫罗齐尼，因为他帮助过意大利爱国者[②]。又过了几天，她记载了凯塞林拜访教皇和他的国务卿。由此可见，占领军枪256杀神甫，丝毫也不妨碍教皇同刽子手凯塞林的友好关系。5月5日，斯克里夫纳又记下一起德国当局逮捕一名神父的事件，也是由于他帮助爱国者。在往警察局押送的途中，被捕者跑进圣玛丽亚小教堂里。于是党卫队员用电话通知梵蒂冈，请许可包围小教堂，并守住各个出口。他们得到了

① 《现代史料》，1944年3月和4月。

② J·斯克里夫纳：《同德国人一起在罗马》，第152页。

许可。该神父被德国人逮捕并被带走①。

梵蒂冈对于意大利爱国者处死法西斯犯罪分子一事的反映，则截然相反。4月，在佛罗伦萨有一个法西斯的主要“哲学家”任季列被人打死。为了这件事，《罗马观察家报》跟法西斯报刊唱一个调子②。

在德军占领罗马期间，“梵蒂冈囚徒”并没有脱离世俗事务，并且也根本没想过隐居生活。比如，11月26日，斯克里夫纳写道：“教皇接见了英国公使、美国代表和德国大使。据传说，希特勒极力要进行和平谈判……”③。梵蒂冈的外交界为了挽救法西斯德国，继续坚持不懈地要达到和平。“梵蒂冈囚徒”在他的伪装的“隐居生活”时期，进行了旨在反对民主和反对苏联的疯狂活动。

庇护十二世反对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决议

1943年9月1日，值战争四周年之际，教皇

① J·斯克里夫纳：《同德国人一起在罗马》，第170页。

② 《同德国人一起在罗马》，第162页。

③ 《同德国人一起在罗马》，第61页。

通过电台发表演说。他说，这场战争是所有战争之中最有破坏性和最可怕的。他抱怨说，“暴力的精神战胜了和解的精神”，并且要人们相信，他说这番话乃出自“对所有民族的爱”。在教皇这个长篇演说中，根本没有提到法西斯各国是战争罪犯，他们在被占领国家里犯下了滔天罪行，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教皇向“所有负有责任的人”发出呼吁，要他们促进“旨在缔结和约的每一步骤”。这是同时向丘吉尔和德国统治者发出的呼吁——就是要他们进行单独媾和。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教皇在演说中反对同盟国要求德国及其仆从国无条件投降。他宣扬，257“拥护和平者幸福无穷”，并坚持要宽恕发动战争的人。庇护十二世号召“不要采取任何不但无助于互相信任，反而会助长仇恨之火和反抗的坚强意志的任何行动”①。

庇护十二世号召对那些“在目前战争中运气不佳的强国”抱“公正的”态度。这便是号召要宽恕那些法西斯强盗，因为他们的“战争运气”到这

① 《基辛的现代档案》，1943年9月4—11日，第5980页。

时的确已经不佳了。教皇希望同盟国对待杀人如麻的希特勒匪徒们就象对待恶作剧的小孩子一样，可千万不要委屈了他们。然而，在整个战争年代，当希特勒匪徒在许多地区消灭所有的居民，在他们的集中营的炼人炉里烧死了几百万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时，教皇从来没有为这些无辜的人们说过一句话。可是到了各国人民的良心都要求打死这头法西斯野兽，到了苏军正在完成这一伟大的解放事业之际，教皇却厚颜无耻地号召人们要仁慈为怀！

关于教皇的这次演说，伦敦《工人日报》写道：教皇呼吁和平，然而不消灭法西斯怎能取得和平？同盟国要求无条件投降，教皇却一个劲儿说要"和平"，他们要的和平就是停止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作战。这家报纸又写道，轴心国的宣传，尽管披上宗教外衣，也仍然是轴心国的宣传。①

是什么原因促使教皇在全世界面前公然表明，他希望挽救法西斯强盗呢？伦敦的《经济学家》在解释教皇的演说时写道，他是害怕欧洲各

① 《工人日报》，伦敦，1943年9月2日。

国爆发革命。《经济学家》写道，教皇赞扬《和平运动》，并极力想领导这一运动，他希望为德国和意大利争得和平，而不希望他们一败涂地[1]；教皇不希望让德国及其盟国完全投降。

斯大林同志1944年2月23日发布的命令中指出："德国法西斯强盗们现在手忙脚乱，寻找逃脱覆灭灾祸的出路。……法西斯当权者拼命企图在反希特勒联盟营垒中、引起纷争并借此延长战争。希特勒的外交家奔走于中立国之间，力图与亲 258 希特勒分子勾结，而暗示有可能与我国，或与我们的盟国单独媾和……"[2]

梵蒂冈竭尽全力帮助希特勒匪徒寻求单独媾和的可能。梵蒂冈外交机构在这方面的活动是同德国一致的。1943—1944年冬，里宾特洛甫派他的走卒前往瑞士和瑞典进行结束战争的谈判。同时，德国驻马德里和梵蒂冈的大使也接到同样的指示[3]。梵蒂冈则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9月初，著名的银行家乔瓦尼·富米从意大利秘密前往伦

① 《经济学家》，1943年9月11日。

②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37页。

③ 《新报》，柏林，1946年3月29日。

教。当报界代表向英国外交部提出质问，与其交战的敌国代表怎么能来到英国时，外交部回答：富米是梵蒂冈的财政顾问，并且解释说，他是从教皇那里带着外交使命来的。教皇的银行家的到来，同希特勒的外交官提出的并得到庇护十二世支持的和平建议有直接关系。与此同时，梵蒂冈的代表恩里科·哈莱阿齐也带着教皇的建议去见罗斯福[1]。

教皇就是这样为以德国为一方和以英美为另一方的交战双方进行调停，同时，他并不是以中立国身分出现的，而是以法西斯德国利益的代表者身分出现的。

1943年11月末，德国驻土耳其大使冯·巴本来到梵蒂冈[2]。他受到教皇接见，并就媾和问题进行了会谈。受希特勒指使进行活动的巴本提出的方案归结起来是：德国许诺向同盟国采取某些让步以缔结和约，从而使德国帝国主义免遭彻底的溃败[3]。

---

① 《工人日报》，伦敦，1943年9月4日。

② 《工人日报》，1943年9月30日，12月1日；《国际新闻简报》，第25期1943年12月11日。

③ 《真理报》，1944年1月19日。

斯大林同志在 1943 年 11 月 6 日的报告中阐述了反希特勒联盟的纲领——这便是苏联一贯坚持的行动纲领，同时也就是整个民主阵营同法西斯德国及其仆从国作战所遵循的纲领。斯大林同志说：

“我们要协同盟国来实行：

（一）从法西斯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欧洲各国人民，并协助他们恢复被法西斯奴役者所分裂的民族国家——法国、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希腊及其他处在德寇枷锁下的各国人民，都应当重新成为自由和独立的人民；

259

（二）给欧洲获得了解放的各国人民以完全的权利和自由，来自行解决他们的国家制度问题；

（三）采取办法使一切法西斯罪犯，即凡是挑起现今战争并使各国人民遭受灾难的罪人，不管他们藏匿在哪一国内，都要为他们所犯的一切暴行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和报复；

（四）在欧洲建立一种秩序，使德国方面完全没有重新进行侵略的可能；

(五)在互信互助的基础上来创立欧洲各国人民久远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合作，其目的是复兴被德寇所破坏的经济和文化。"①

梵蒂冈和在它指使下的同盟国天主教主教们都千方百计地阻挠这一纲领的实现。

因此，梵蒂冈和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天主教主教们对1943年10月19日至3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的决议加以反对是不足为奇的。在这次会议上，"首先坦率而详尽地讨论了采取何种措施，以缩短对德国及其欧洲附庸国进行的战争"②。

众所周知，尽管会议作出了决议，美国和英国的统治集团仍然迟迟不肯开辟第二战场，直到过了八个月之后才开辟它。

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指出："三国政府承认首要的目的在于尽快结束战争，接着又就下述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即为了三国的国家利益，也为了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利益，到军事行动结束之后的时期，有必要保持当前为了共同作战而确立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25页。

②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1卷，第412页。

的紧密合作，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得到持久和平，各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才能得到全面发展。"[①] 这一决定也使反对苏联和民主的人大为不满。后来的事实证明，美英两国政府连这一决议也没有执行。

260

会议还通过了有利于在意大利恢复民主的宣言、关于恢复奥地利独立以及有关其他问题的决议。

在美国，天主教主教们随同整个反动阵营一起，大肆叫嚣反对莫斯科会议的各项决议，他们为此专门发表了宣言[②]。梵蒂冈也反对这些决议。庇护十二世对会议提出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以及其他一切决议都极为不满。伦敦的《经济学家》写道，梵蒂冈反对重建独立的奥地利的计划，反对把波兰的西部领土归还波兰，因为它希望保存这样一个德国，即"它将在欧洲起救世主的作用"[③]。换言之，梵蒂冈的统治者希望反动的德国复活，所谓的德国的"救世主的作用"将表现为

①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1卷，第412页。

② 《工人报》，1943年11月21日，12月28日。

③ 《经济学家》，1943年9月2日。

德国将成为反对欧洲各族人民的民主要求和反对苏联的反动堡垒。这同丘吉尔和美国反动派的计划相符合。

梵蒂冈千方百计反对莫斯科会议关于意大利的宣言的实现，这一宣言规定：在意大利建立民主政府，采取措施根除法西斯主义。梵蒂冈却大唱反调，坚持保存君主制和法西斯分子建立的整个国家机器，以及法西斯的干部。

教皇在这个问题上是同丘吉尔一致行动的，丘吉尔也坚决反对意大利的民主化，支持国王政权和巴多里奥的反动制度。美英两国在意大利的军事当局在实行反动措施方面也得到了意大利天主教高级僧侣的可靠支持。

同盟国军队刚一占领西西里之后，该地的新任总督英国将军亚历山大便同红衣主教拉维特兰举行会晤，达成教会权贵同英美当局进行合作的协议。

该地的学校置于僧侣的监督之下。同盟国军事当局在各个城市和乡村起用了本堂教区的神父来担任原来法西斯官吏的职务。在英美高级官员同当地高级僧侣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合作，旨在反 261

对意大利的民主发展[1]。

梵蒂冈还坚决反对惩办战争罪犯，反对苏美英三国政府关于希特勒分子必须对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的宣言。

1943年11月28日到12月1日，在德黑兰举行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会议通过宣言，表明了同盟国“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和平时期都要协作”的决心。会议协调了“消灭德国武装力量的计划”，并在“关于从东、西、南三方面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日期”达成完满的协议。三国宣言说：“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挠我们在陆地上消灭德国军队，在海洋上消灭他们的潜艇，并从空中炸毁他们的军事工厂”[2]。

斯大林同志说：“……德黑兰决议之顺利实现，便不能不促进联合国战线的巩固。”[3]

德黑兰会议关于为了击溃法西斯德国而协同作战的决议以及关于同盟国在战后互相合作的决议，不仅受到轴心国的敌视，而且也受到同盟国

① 《民族》，1943年10月2日，11月27日，12月11日。

②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1卷，第424—425页。

③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63页。

内那些希望同希特勒妥协的反动统治集团的敌视。美国的希特勒分子福特、赫斯特、胡佛、“社会主义者”托马斯等人为反对会议决议进行了疯狂的宣传，并要求马上同希特勒德国媾和①。美国天主教的主教们也同他们站在一起。柯林神父在这些日子里宣称，基督教会教我们爱敌人，因此我们应该爱希特勒和日本天皇，并要原谅他们的“凌辱”，亦即他们的罪行。与此同时，他还提醒说，教皇对同共产党人合作的行为表示谴责。柯林，而且还有美国天主教会的其他代表人物就根据这一理由要求迅速同德国缔结和约②。

庇护十二世于1943年12月24日发表的圣诞节文告，正是表达了这些集团以及法西斯德国政府的计划和愿望。这一文告正是教皇对于德黑兰会议的决议的回答和亲法西斯阵营的行动纲领。教皇一如既往，用一些关于和平的必要性与战争的恐怖的虚伪的辞句作掩护，坚持要挽救希特勒的制度，并极力分裂同盟国阵营。他在文告 262

① 《工人报》，纽约，1944年1月9日、23日、30日、2月20日。

② 《工人报》1944年3月26日。

中一开头就宣称：人类仿佛对科学越来越感到失望，“无神的科学”的道路仿佛明显是错误的，人类“应该回到上帝那里去”。教皇对先进的科学攻击一通之后，就向工人发出呼吁，教皇清楚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正在增长，知道劳动人民对资本主义、对战争都怀有满腔仇恨，了解游击队运动有广大群众参加，所以就号召工人要满足于做资本的奴隶的地位。他要工人相信：“你们之所以是普通的工人，这绝非偶然，而是上帝安排的，其中的道理奥妙无穷，不可解释”。他把为资本家和地主干活说成是“为天主服务”。教皇在这分文告中写道，“那些把希望寄托在人世间的享乐上的人们”是不幸的；他教训说，应该记住，只有忍受人世间的苦难，才能在“天国”得到奖赏。教皇在1943年12月发出的这些“告戒”，就是给那些反法西斯战士、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听的，他指望用以阻挠各国人民从希特勒强盗的压迫下获得解放。

庇护十二世在他的圣诞节文告中俨然以一个资本主义奴隶制度的直接辩护人的身分出现。庇护十二世跟前任的许多教皇一样，以前也曾不止

一次地发出文告，为资本主义和社会的阶级划分辩护。然而，到1943年末，法西斯刽子手的“新秩序”已经破产，欧洲被占领国家的各国人民在苏军胜利的鼓舞下，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之际，教皇对资本主义的命运就感到格外担忧了；于是他就劝告劳动人民不要为争取美好的生活而斗争，应该等待天国的奖赏。

庇护十二世在发出这些告诫与恳求之后，又转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他呼吁交战的各国媾和。他写道，双方都应该“超出狭隘的算盘”，不要进行“赢得军事优势的自我吹嘘”，要达成“公正的和平”。而“公正的和平”不应该是用“数学去计算双方力量对比”的结果①。

在1943年12月，“用数学去计算双方力量的 263 对比”，对法西斯德国来说是大为不利的，因此，教皇所呼吁的那种和平，是想让法西斯侵略者从中取得好处。

庇护十二世的圣诞节文告，也正是用来反对德黑兰会议的，因为教皇要求同盟国放弃彻底击

---

① G·戈内拉：《需要重建的世界》，第326—331页。

溃轴心国的计划。

所有这一切都是用教皇保持“中立”的保证遮掩着的。其实，1943年的圣诞节文告，正是梵蒂冈在整个战争年代为挽救法西斯统治所进行的活动的继续。又过了几天之后，12月29日，《罗马观察家报》写道，信徒往往提出问题：教会究竟站在哪一边？该报回答说：“教会为全体世人，不为某个人”①。但是，显而易见，梵蒂冈并不是为全体世人。1943年的圣诞节文告再一次向全世界表明，教皇是法西斯分子的朋友，是民主阵营的死敌。

教皇千方百计利用天主教教会组织的影响，去为迅速同德国达成妥协性和平而制造社会舆论。

奥尔莱曼斯基神父的莫斯科之行

教皇在圣诞节文告中提出的挽救法西斯的纲领，为许多国家，尤其是美英两国的天主教主教们发出信号，要他们为同德国单独媾和及反对同

① 转引自J·斯克里夫纳：《同德国人一起在罗马》，第79—80页。

苏联结盟开展新的活动。反动派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反苏宣传。美国的反动派同教权主义分子有密切联系，他们在 1943 年末和 1944 年初曾就波兰问题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问题掀起反苏运动。丘吉尔和美帝国主义者都想把地主资产阶级制度强加给这些国家①。赫斯特的卖身投靠希特勒的报刊，也呼吁同苏联断绝关系②。

美英的以及爱尔兰的天主教组织，也进行反苏活动。天主教报刊散布关于苏联的荒谬已极的谣言。教会组织出版充满造谣中伤的反苏小册子③。天主教报刊还把亲希特勒的波兰侨民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特别是集拢在安德斯将军周围的那些波兰人民的叛徒和苏联的敌人④。英国的天主教报刊尤其卖力地进行反对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运动⑤。英美天主教组织的反苏运动都是在这些国家的执政集团和梵蒂冈的唆使下掀起来

264

① 《真理报》，1943 年 12 月 22 日，1944 年 1 月 5 日。

② 《真理报》，1944 年 2 月 25 日。

③ 《工人日报》，伦敦，1944 年 4 月 22 日，5 月 4 日、5 日。

④ 《工人日报》，1944 年 5 月 8 日。

⑤ 《工人日报》，1944 年 3 月 23 日。

的。与此同时，作为在战争中苏联的同盟者的英国的天主教报刊，却对法西斯分子佛朗哥——希特勒的同盟者称颂不已①。它之所以这样做，也是效法丘吉尔，因为丘吉尔在下议院就赞扬过佛朗哥。

英国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当然十分了解苏联的真实情况（那怕是从当时访问过苏联的英国教会人士的报告得知的），特别是了解教会的情况和信仰自由。1943 年 9 月，约克大主教哈伯特作为英国教会领导人之一，访问了苏联。他在回国后写的报告中，对苏联的现状与我国人民反抗占领军的英勇斗争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约克大主教谈到宗教时宣称，他相信在苏联存在着宗教自由②。英国报刊在战争年代还发表了英国教会著名人士坎特伯雷大教堂的教长约翰逊写的充满着对我国的同情的真实的文章。约翰逊要求开辟第二战场，

---

① 《工人日报》，1944 年 2 月 9 日。

② 《工人日报》，1943 年 10 月 12 日，14 日，15 日。不过，约克大主教哈伯特十分健忘。后来他又参加了美帝国主义者、英国工党和罗马教皇的反共运动，于 1950 年 12 月说，共产党人"迫害宗教"。《工人日报》在反驳他这一言论时，提醒他说，哈伯特于 1943 年从莫斯科回国后曾宣称，苏联存在着完全的宗教自由（《工人日报》，1950 年 12 月 29 日，伦敦）。

并热情支持同苏联的友谊。

但是，英国那些同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侵略集团有密切联系的天主教教会代表人物，宁肯无视这些事实，进行反苏的恶意宣传，散布对苏联的不信任，从而为希特勒匪徒帮忙，便于他们在英国进行破坏工作。

梵蒂冈的反苏运动，以及英美天主教主教们遵照它的指令所进行的反苏运动，在信奉天主教 265 的广大劳动群众当中没有受到欢迎，也不可能受到欢迎。英美及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同情苏维埃国家的英勇斗争，并为它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不仅各国广大的天主教徒，甚至连一部分低级僧侣也不顾梵蒂冈的反苏方针，对苏维埃国家反对希特勒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表示极大的同情。其中有波兰血统的美籍神父斯坦尼斯拉夫·奥尔莱曼斯基。在战争年代，他极力主张波兰同苏联合作，反对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反苏方针①。1944 年 4 月，奥尔莱曼斯基动身访苏。他了解了波兰侨民的生活，访问了波兰军队，两次受到斯

① «真理报»，1943 年 7 月 1 日和 12 月 22 日；«工人日报»，纽约，1943 年 11 月 21 日。

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的接见。奥尔莱曼斯基从莫斯科电台向波兰居民发表的演说中呼吁建立波兰同苏维埃国家的友谊。他说："我应该告诉你们，斯大林是波兰人的朋友。他坚决地说波兰再也不能被敌人当作消灭苏维埃国土的通道。他希望看到一个伟大、强盛、独立和民主的波兰，这个波兰将会有效地保卫自己的边界。斯大林不想干涉波兰国家的内政。他希望看到波兰是同苏维埃各共和国友好的，同心协力合作的。"①

奥尔莱曼斯基支持波苏友谊与合作的演说，同美国天主教主教们与梵蒂冈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教会的代表人物纷纷攻击奥尔莱曼斯基。尽管他在教会中供职三十年，天主教的反动集团却毫不介意地忙于宣布他是"共产党员"和"反基督者"②。接着而来的便是迫害：奥尔莱曼斯基的上司奥利里主教免去了他的神父职务。正如奥尔莱曼斯基本人说的那样，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了③。与此同时，怎么能不想到，教会当局

---

① 《真理报》，1944年5月6日。

② 《民族》，1944年5月20日。

③ 《人民之声》，底特律，1944年5月20日。

对希特勒的走卒、法西斯分子柯林神父却未加任何处分①。奥尔莱曼斯基曾向驻华盛顿的教皇特使申诉，得到的结果是迫使他沉默，并且首先要他"为对教会当局不够尊重"而表示歉意。直到奥尔莱曼斯基保证"停止一切不符合天主教教会章程和精神的活动"之后，才得到了"宽恕"②。奥尔莱曼斯基受到教会当局谴责的活动，就是他宣传了同苏联合作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不符合天主教教会的章程和精神"，因为天主教教会从十月革命初期就采取了反苏立场。 266

奥尔莱曼斯基主张同苏联合作的时候，也正是梵蒂冈极力要英美两国同德国单独媾和的时候，媾和的目的在于反对苏联和整个民主阵营。奥尔莱曼斯基的立场同梵蒂冈的政策背道而驰。因此，主教们就迫使他沉默。

梵蒂冈处在反对和平与反苏阴谋的中心

1944年6月4日，同盟国军队占领罗马。在

① 见《真理报》，1944年5月18日。

② 《真理报》，1944年5月19日。

发生这件事的前两天，教皇向红衣主教们发表长篇宣言，阐明他对于目前形势的观点。这篇宣言经电台向外界广播。教皇在这篇演说中，用大量篇幅讲述罗马，讲述这个城市在多少世纪中经历过各种变乱的历史。在演说的第二部分，教皇极力想说服战胜国，对待战败国采取宽大的态度将是有利的，并号召“以公正和冷静的伟大精神克制复仇和愤怒的本能”，极力平息要求法西斯刽子手偿还血债的各族人民的愤怒。最后，庇护十二世声称，他反对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因为据他说，用“暴力达到的”和平是不公正的。他在演说的结尾号召战胜国要宽宏大量，以免使战败国失去希望①。

在同盟国军队占领罗马后的第二天，教皇又向集拢在圣彼得广场上的人群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号召罗马市民“丢弃愤怒和复仇的心理”，发扬“兄弟般的博爱”②。他害怕多年受到法西斯专政镇压的罗马市民会要求惩办墨索里尼的罪行

① 《基辛的现代档案》，1944年6月17—24日，第6511页。

② J·斯克里夫纳：《同德国人一起在罗马》，第203页。

的同谋者。教会害怕意大利大规模的人民运动会把王权和巴多里奥的政府打倒，人民会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他十分清楚，美英两国政府跟他有同样的忧虑。所以他有一切根据指望这两国的反动分子会极力阻挠意大利人民的解放斗争。梵蒂冈的反人民活动越来越同美国执政集团的活动交织到一起，因为梵蒂冈的活动完全符合后者的计划与利益。

6月9日，教皇接见了七百名美英士兵，并为他们祝福，第二天又接见了克拉克将军及其军官，并为他们祝福——这种情景，就跟战争初期，教皇相信德意必胜，而接见一群群的德意官兵并为他们祝福一样。

如今，教皇不仅想要向全世界人民表明他对于同盟国的事业的"垂青"，而且极力同美英执政集团以及同盟国在意大利的军事当局进行密切联系，因为他清楚了解他们的反动愿望。至于美英执政集团则有充分根据认为，梵蒂冈可以协助他们巩固在从希特勒占领军手中解放出来的欧洲各国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从而为他们帮一个大

忙。

1944 年 6 月 14 日和 19 日，罗斯福总统和庇护十二世就派遣泰勒再次出使梵蒂冈一事互致电报。6 月 21 日，泰勒便受到教皇接见。泰勒透露说，当时开始进行的谈判涉及许多问题，但大部分都与对德作战有关。为了给梵蒂冈开脱，他对于他同教皇谈判中的许多详情都秘而不宣，又信誓旦旦地说，教皇是“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然而，泰勒也承认存在着有争论的问题。这些问题，毫无疑问都跟德国有关。从泰勒闪烁其词的讲话中可以得出结论，庇护十二世坚持要求迅速签订单独和约。泰勒写道，教皇声称：“他的父爱将恩赐给所有的民族，德国人民的安全幸福应该同其他民族的安全幸福一样得到保护和保障”①。其实，教皇所担心的倒不是德国人民的命运，而是德国统治阶级的命运。

268 美国执政集团在这个问题上同教皇没有原则分歧；他们也担心法西斯一旦溃败，将导致民主的胜利。泰勒写道，教皇对于美国战后计划的某

---

① 《战时联系》，第 104 页。

些方面表示满意。但是，美国执政集团当时还不能接受教皇要马上同希特勒匪帮媾和的要求，因为苏联的一贯政策妨碍这样做；这样做也会引起全世界的强烈抗议，其中也包括美国国内。美国执政集团当时对于德国有另一种方案——这个方案应该靠杜勒斯在瑞士的间谍中心去实现，即干掉希特勒，一旦这一方案实现必然出现军事专政，美国将同后者签订和约。

至于其他问题，美国政府的代表同教皇的意见完全一致。从泰勒的说法可以看出来，这种一致首先表现在对意大利的政策问题，据泰勒说，意大利政府本身已经铲除了法西斯主义。

泰勒向教皇阐明了美国关于战后体制的计划；他说，美国的方案同教皇的看法不谋而合①。这种一致的基础是什么呢？从泰勒的说法可以看出，教皇十分担心：由于帝国主义给人们带来无限灾难，欧洲各国人民经过战争将对帝国主义更加仇恨。泰勒写道，教皇特别感觉到（也就是特别担心），战争结束后，“共产主义性质的学说”将

① 《战时联系》，第104页。

广泛传播①。

在共同仇视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教皇很容易同美国执政集团就战后计划达成互相了解。泰勒接着说，教皇正在努力寻求“在许多国家稳定秩序”的方法②。他知道美国资产阶级对这一点也很关注。教皇指望美英执政集团将阻止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对于战后问题的解决可能产生的影响，而美英统治集团这方面则把梵蒂冈当作他们的反民主政策的支柱寄予希望。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被击溃之后，教皇向两个交战阵营的资产阶级发出呼吁，要求他们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而联合起来。如今，到了 1944 年 6 月，必须实际解决战后体制的问题，他便号召美英政府建立一条防止“共产主义学说”的堤坝。1944 年 6 月 19 日，庇护十二世向罗斯福致电报说，“和平将以公正和宽容的精神将人们象兄弟般地联合起来”③。教皇一再呼吁的和平就是这种和平，其目的是在保存

269

① 《战时联系》，第 105 页。

② 《战时联系》，第 105 页。

③ 《战时联系》，第 111 页。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德国统治的基础上同法西斯德国媾和。

在泰勒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史汀生又来到梵蒂冈。关于他同教皇的谈判，报道说，他们涉及了将迫使德国接受的媾和问题①。不久，斯佩尔曼也来到欧洲。他的传记作者只提到，他在意大利曾同克拉克将军共进早餐②。然而，应该想到，这个美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于 1944 年夏绝不会为了进早餐而来到欧洲。他这次来访的目的是在新条件下组织反对欧洲各国劳动人民和反对苏联的斗争。教皇同美国统治阶级的这些代表在梵蒂冈进行的多次谈判，都同孤立和削弱苏联的计划有关。早在 1944 年夏秋之际，美国统治集团的某些代表人物便已呼吁进行反对我们祖国的战争。美国情报人员、冒险家、亲法西斯分子布利特曾以反动的《生活》杂志的“特约记者”身分来到意大利。在罗马他受到教皇的接见。1944 年 8 月，布利特发表文章，歇斯的里地狂叫“共产主义的危险”，号召进行反苏的“十字军远征”，并扬言，教皇庇

① 《现代史料》，1944 年 8 月，第 140 页。

② 《现代传记》，1947 年，第 4 期，第 47 页。

护十二世将为这一远征祝福[1]。布利特被苏军的胜利吓得发昏。他极力主张迅速同法西斯德国单独媾和，竭力用他那些卑鄙下流的反苏言论来分裂同盟国的阵营。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统治阶级的代表也同美国代表一起，纷纷前往梵蒂冈，希望借助教皇及其主教们的帮助，在欧洲"稳定秩序"，也就是进行反人民的阴谋。

270　1944年6月末，戴高乐将军来到梵蒂冈。6月30日，他受到教皇的接见。据报道说，谈判涉及到了法国临时政府的政治原则[2]。戴高乐——这个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表最为关心的是在占领军被撵走之后保持资产阶级的制度，使之毫不动摇，他的梵蒂冈之行，目的是制定一个旨在反对法国人民的共同行动计划。

---

① 《真理报》，1944年9月4日；《布尔什维克》，1944年第17～18期，第70～80页；Л·塞尔德斯：《一千个美国人》，国家外国书籍出版社，1948年，第141页；M·塞勒和A·凯恩：《对苏俄的秘密战争》，国家外国书籍出版社，1947年，第426，428页；《工人报》，纽约，1944年9月10日和11月17日。

② 《工人日报》，伦敦，1944年7月1日。

1944年8月初，丘吉尔来到意大利。这个英帝国主义者的首领、民主的疯狂的敌人与仇视苏联的人，考虑到英国的社会舆论，当时还继续虚伪地声明，他忠实于同苏维埃国家的同盟。1944年8月2日，他在下议院声称，对击溃德军，“俄国军队起了主要作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象苏俄军队那样击溃德军，并使之遭受如此巨大的损失”①。这一事实把丘吉尔吓坏了。他同美国反动阵营一道，制造了种种卑鄙的反苏阴谋，通过中介人同希特勒匪徒进行谈判，极力阻挠民主力量在战后欧洲的胜利。他同教皇进行的谈判，也与此有关。1944年8月23日，梵蒂冈的官方报道说，这些谈判“的特点是极为亲切”，涉及了各种问题，当代各种最重要的问题。

丘吉尔对于意大利的形势和君主制在这一国家的命运尤为担心。他对民主阵营力量的增长十分害怕。早在1944年1月，意大利反法西斯各党派在巴里市召开的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共产党、社会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和“行

① 《真理报》，1944年8月4日。

动党”），一致通过了要求国王退位的决议。决议说：“代表会议认为，意大利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改革，必须以国王迅速退位为先决条件，因为国王对于国家遭到的悲剧负有责任。代表会议宣布，必须组成一个具有全权的政府，以便应付各种紧急情况。这个政府应该有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各党派参加”①。

丘吉尔主张把意大利的君主制作为反动堡垒保存下来。他反对反法西斯各党派的合作，并极力要孤立共产党人。意大利共产党的纲领，包括下述基本要求：1.反法西斯各党派团结一致，2.（战后）用民主方法解决意大利的国家体制问题，3.在广泛基础上组成政府。共产党认为最重要的任务是从民族生活中肃清法西斯主义②。这个彻底的民主纲领使得美英和意大利、梵蒂冈的统治集团都大为不满，他们的希望只限于迫使维克多·厄曼努尔国王退位，而让萨伏伊王朝的另一位国王代替他。

只有苏联坚决维护意大利民主的利益。1944

① 《真理报》，1944年2月2日。

② 《真理报》，1944年4月3日。

年4月16日，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安·扬·维辛斯基在莫斯科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说：

“自从同巴多里奥政府签订停战协定以来，已经过去七个月了。这段时间用来把已经解放的意大利的民主和反法西斯力量联合起来，使他们积极参加同盟国反对希特勒武装力量和墨索里尼法西斯匪帮的军事行动是绰绰有余的。然而，民主和反法西斯力量没有实现联合，与此相反，意大利正在进行内讧：以巴多里奥政府为一方，它得到了一定数量表示愿意参加民主国家反对德国法西斯压迫者的共同斗争的居民的支持，以常设执行钟他会为另一方，它则得到要求积极行动与同盟国一起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民主分子的广泛拥护。这种状况只能对同盟国的敌人有利。排除这种状况，保障民主和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一致，并为了同盟国反对德国的共同斗争的利益及迅速击溃德国而毫不拖延地组成一个有能力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的政府，已是刻不容缓的事”①。

有鉴于此，苏联政府“向美国和大不列颠政府

①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2卷，第107～108页。

建议共同研究把已经解放的意大利的一切民主和反法西斯力量联合起来的措施问题，这种联合的272基础应该是让反法西斯各党派参加巴多里奥政府以相应改善该政府的成分"。①

由于这一建议的结果，巴多里奥于4月20日组成了有反法西斯各党派参加的政府。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也参加了政府。

这样，苏联政府就使英美和意大利反动派企图孤立意大利民主分子的计划遭到了破产。

5月18日，丘吉尔在伦敦澳大利亚俱乐部发表演说。他把英国君主制的"美妙"措绘得淋漓尽致，他还大肆攻击"外国"那些"无知的人们"，说他们"以为社会进步就在于用共和国去取代君主制"②，实际上是在影射意大利。丘吉尔还对佛朗哥的制度赞扬不已③。

意大利的王国制度也受到美国执政集团与美国在意大利的军事当局的支持。后者很快就同意大利上层贵族接近，支持反动分子，并千方百计

①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2卷，第108页。

② 《工人日报》，伦敦，1944年5月19日。

③ 《工人日报》，1944年6月2日。

阻挠意大利的民主运动[1]。

意大利人民“没有选择政府的自由。在意大利建立的一切政府，无论在成员上或政治方针上，都要取得同盟国的同意。显然，在这种条件下，意大利反法西斯运动中最保守的派别便非常易于使任何政党或几个政党联合提出的一切真正民主的建议遭到破坏和失去作用。意大利反法西斯运动的这些保守派别得到同盟国的政府和军事当局的直接支持，而后者有权监督意大利政府的活动并掌握着国内民族生活的所有指挥杠杆。右翼派别为左翼分子提出的革新要求设下重重障碍，任何旨在排除这些障碍的努力都要受到同盟国力量的反对”[2]。

1944 年 8 月，丘吉尔同庇护十二世就“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举行谈判，也涉及到意大利；他们谈到如何加强反民主分子的阵地，如何保存君主制并使民主阵营陷于孤立。 273

综上所述，当德国占领军被撵出罗马之后，

---

① 《民族》，1944 年 8 月 19 日。

② 雷·隆哥：《关于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载《1947 年几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第 289 页。

梵蒂冈就成了各国反动政客朝拜的圣地。在这里策划了反民主和反苏的阴谋，其中包括丘吉尔和美国统治集团为了实现他们的战后计划可以广泛利用天主教教会的各种组织。

由于梵蒂冈采取依靠美国的新方针，欧洲各国天主教主教们也相应改变了政策。这些主教在不久之前还欢迎德国人，为希特勒的成功而祈祷并帮助占领军，如今由于野兽般地仇恨民主和害怕人民追究他们同侵略者合作的罪行，他们热烈拥护英美对他们的国家实行军事占领并拜倒在美国膝下。1944 年 7 月，法国红衣主教利耶纳尔在里尔市主持了法国大资本家的代表会议。"会议说到必须立即'转变'，迅速而出人意外地表现出亲美倾向，这是梵蒂冈和主教们提出的要求"①。

其他国家的天主教主教们鉴于英美军队正是他们用以反对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实行了这种"转变"。比如萨格勒布大主教斯特皮纳茨本来是屠杀克罗地亚几十万东正教徒的刽子手，并死心塌地为占领军效过力，到了战争快结束之际，

---

① R·加罗迪，《教会、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徒》，第 105 页。

也通过斯佩尔曼跟美国统治集团进行勾搭。

战争末期，当苏军从捷克斯洛伐克驱逐德国占领军之际，该国天主教主教们在希特勒派驻布拉格的总督、刽子手弗兰克的唆使下，企图请求美英两国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从而阻止苏军去解放它。弗兰克把皮哈主教叫到他那里，对他宣布："您应当给教皇写信，说非常有必要请他通过自己的外交途径尽快同美国或英国的领导集团开始谈判，敦促他们马上宣布实行保护性占领的命令。只有这样，才能阻止红军向前推进"①。

皮哈主教依照弗兰克的愿望，通过驻德圣使奥尔塞尼戈向罗马给教皇发去一封信。所有这些罪恶计划都被苏军的胜利前进所摧毁，苏军把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军全部驱逐出去。 274

欧洲各国天主教教会领导集团的所有这些反动政策，都是出于他们对苏联的敌视，都是因为他们害怕本国人民在希特勒的统治垮台之后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到处都会建立起民主制度。

① A·斯沃博达，A·图奇科娃，B·斯沃博达娃，《梵蒂冈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阴谋》，第106页。

所谓的德国"天主教反对派"与谋杀希特勒

英美统治集团在整个战争年代同希特勒匪徒进行单独媾和的秘密谈判表明，他们多么希望同德国统治集团言归于好。然而，这些谈判却没能成功，因为苏军的胜利打乱了苏联的敌人的计划。另外，苏联一贯奉行旨在彻底打垮轴心国，迫使它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也阻碍了他们达成协议。正是苏联一贯坚持反法西斯的政策，才赢得了全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的同情。

人民群众对希特勒匪徒及其庇护者的仇恨是那么强烈，苏维埃国家及其军队的声望又是那么高，所以不管美国和英国统治集团多么希望做到这一点，然而如今已经到了希特勒德国的末日就在眼前的时刻，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同希特勒直接和好。那样的话，就会在他们本国引起巨大的震动。另外一点也无须怀疑，即同盟国军队的广大士兵对苏军击败希特勒匪徒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丘吉尔和反动的将军们要想使这些士兵马上掉转枪口去进攻苏联，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在这种条件下，美英统治阶级便选择了另一条途径。这种途径就是借助于那些对胜利已经失望、对苏军逼近德国边境又心惊胆战的德国工业界人士和军界人士的帮助，拿掉希特勒及法西斯匪帮的某些头目，同戈林、希姆莱或希特勒的将军们达成交易，然后建立军事专政，由军人政府出面同英美签订和约，并继续反苏战争。德国将军和工业家很容易同英美统治集团、同丘吉尔和艾伦·杜勒斯找到共同语言。杜勒斯是美国在欧 275 洲的情报机关的头子。早在 1944 年希特勒分子、德国工业界代表沙赫特便同杜勒斯建立了联系。

美国政府除开交给杜勒斯其他任务之外，还交给他一项任务就是同德国“反对派”取得联系，帮助他们除掉希特勒，寻找那种可能马上达成单独媾和协议的人物来代替他。1944 年 6 月 20 日[①]那次谋杀希特勒未遂事件的真正组织者正是艾伦·杜勒斯。

杜勒斯同秘密警察头子、同希特勒的将军、同资本家建立了联系，正是这些人把希特勒推上

---

① 原文如此，应为 7 月 20 日——译者。

了台，并完全支持他的一切计划。如今，这些人突然变成希特勒的“敌人”，不过是因为他没能很好地实现他们的掠夺计划。当德军侵占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的时候，当他们掠夺和迫害欧洲各族人民的时候，这些将军和工业家是支持希特勒的；但是当苏军给予希特勒匪徒一个打击又一个打击，粉碎了“新秩序”并逼近德国边境的时候，有一部分将军和工业家便成了希特勒的“反对派”。1944年4月——7月，杜勒斯在他给华盛顿的秘密报告中写道，阴谋的参予者是“具有保守思想的人”，他们最害怕苏联在欧洲的影响不断增长。1944年7月13日，杜勒斯报告说，德国的“反对派”想竭尽一切办法阻止苏军进入德国领土，这些“反对派”指望依靠英美两国，打算在西线投降之后，继续对苏作战[1]。“反对派”准备向英美军队开放西方前线，让它们进入柏林，并把西线撤下的德军投到东方前线。[2]

① 见A·诺登的文章《7月20日的真相》，载《每日评论》，柏林，1949年7月20日；又见《世界舞台》，1949年9月21日，第38期。

② 见A·诺登的文章。

侨居国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也持有这样的立场，他们同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有联系，并把赌注押在英美的胜利身上。早在1942年12月，杜勒斯便报告说，右翼社会民主党担心，一旦德国的希特勒制度垮台，会导致共产主义影响的增长。因此，这些"社会主义者"决定施展自己的一切影响，尽量延缓除掉希特勒的时间，以便争取英美军队早日在大陆上稳住阵脚①。

侨居国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本来是德国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国际工人运动和苏联的敌人。他们在自己伦敦出版的杂志《社会主义报道》上，直接为法西斯侵略者辩护，并煽动反对苏英美三国之间的合作②。 276

英美帝国主义集团在实现他们更换德国执政阵营的人选计划时，除了依靠反动军官、容克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之外，还把很大的希望放在天主教的保守分子和高级僧侣身上。因此，到了希特勒在德国的统治已经明显临近末日的时候，英美资产阶级报刊便大肆渲

① 《世界舞台》，1949年9月21日，第38期。

② 《真理报》，1944年7月16日。

染德国天主教僧侣的"反希特勒立场"，这是很说明问题的。伦敦的反动杂志《十九世纪以来》在1942年8月一期的编辑部文章中写道："德国基督教会所采取的立场不具任何破坏性，这并不是秘密。明斯特主教就表现了英雄气概，他公开谴责德国政府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对含沙射影地责难他是国家敌人的'同盟者'的说法将轻蔑地予以驳斥"①。换言之，德国天主教主教们尽管在纯宗教问题上同政府有分歧，却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掠夺政策。但是过了两年之后，同一家杂志在谈到德国天主教主教们的政策时，却写得完全相反(也以编辑部文章发表)："天主教徒表现了（对希特勒制度——舍英曼）内部反抗的伟大力量"②。这同实际情况毫不符合。

至于英国的死硬派为什么在1944年11月认为有必要对德国天主教集团大肆赞扬，这是不言而喻的；同一篇文章还谈到，战后德国天主教会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宗教力量，而且是巨大的政治力量。英美帝国主义者早在战争期间就为将来在德

① 《十九世纪以来》，伦敦，1942年8月，第58页。

② 《十九世纪以来》，1944年11月，第202—203页。

国推行反民主政策寻找支柱。除开其他反动分子之外，他们从天主教教会人士身上找到这种支柱。因此，到了战争末期，他们把德国天主教主教们吹嘘成在法西斯统治德国十一年过程中“英勇反抗 277 纳粹的”力量。

实际上，德国主教团完全支持德国资产阶级和希特勒政府的帝国主义纲领。对于希特勒军队在被占领国家中犯下的罪行，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早在1943年，德国主教会议就宣称，德国“正在进行一场英勇的斗争”，德国是在“保卫祖国，免遭布尔什维主义的侵袭”①。这些主教直到最后仍然是德国帝国主义的奴仆。

在战后的资产阶级书刊中，表现出一种想把某些德国主教说成是“抵抗运动的英雄”的倾向。这类企图就是对历史的捏造。明斯特大主教冯·哈伦伯爵在战争期间曾经声称反对政府迫害德国的宗教组织，反对逮捕某些宗教人士，反对没收教会财产。然而，与此同时，他还声言，政府采取这种政策会妨碍德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当有

① 《工人报》，纽约，1945年11月4日。

人责难他对秘密警察反对教会行为的攻击（并不是对这个罪恶机关的攻击），会“削弱德国人的内部阵线”时，冯·哈伦反驳说，削弱内部阵线的不是他，而是在战争期间剥夺宗教组织的财产并逮捕教会人士的那些人。他告诫希特勒的执政者，他们采取反对教会组织的行为对战争的进程将产生不良影响，因为他们“破坏了国内的民族团结”①。哈伦伯爵在谴责逮捕德国的隐修士和隐修女时，又急忙对希特勒政府加以安慰：“当然”，他在一次布道时说，“我们是基督徒，是不会搞什么革命的”。他下保证说，基督徒要“尽到自己的义务”，德国士兵“愿意为德国而战斗牺牲”②。冯·哈伦声称，他今后一定“忠实地为民族和祖国服务”。这样一来，他再一次表明了他对希特勒制度的“忠诚”。

到了战争末期，冯·哈伦伯爵突然处在英美军队占领的土地上时，他在同合众社记者谈话中把自己说成是“反纳粹派”，尽管如此，他和他的

① 《明斯特主教与纳粹》，伦敦，1943年（教会出版）第7、19、25页。

② 《明斯特主教与纳粹》第27页。

同伴们一样，仍然“忠于祖国”，并把同盟国看作[278]敌人①。在希特勒德国进行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中，“忠于祖国”就意味着拥护与支持这场战争。冯·哈伦在同记者谈话时，没有说一句谴责希特勒罪行的话，同时却声称，他最为担心的是德国会发生“共产主义的危险”，这就不足为怪了。

由此可见，冯·哈伦主教如同其他某些教会主教的“反对立场”一样，反对的并不是法西斯制度，也不是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恐怖统治，他们所反对的只不过是这一制度直接触犯了教会利益的某些措施；在重大问题上，首先在国内镇压工人运动的恐怖政策问题上，在战争问题上，冯·哈伦也好，福尔哈贝尔也好，或其他人也好，都是直到最后仍然忠于德国帝国主义的。

但是，就连在纯教会问题上的这种“反对立场”，随着战争接近结束，希特勒德国的日趋崩溃，也逐渐减弱了。英国大资产阶级的喉舌《经济学家》是这样解释这一事实的：德国天主教教会不希望被卷入任何主张“撤退”的运动中去，它怕战

① 《工人日报》，纽约，1945年4月7、13日。

争结束的几年之后，民族主义阵营会责难说："在德国最困难的岁月，教会曾向当时的政府发动进攻"①。由此可见，德国天主教主教们希望将来能在德国资产阶级的心目中保持拥护德国帝国主义的声誉。

那么德国主教们的纲领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经济学家》写道，他们呼吁和平，不希望失败。他们同希特勒有一个共同目的：以保存反动制度为前提结束战争，绝不无条件投降。

当德国的军事失利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天主教的领袖同统治阶级的其他一些代表都准备废黜希特勒，但保存希特勒所创建的反人民的恐怖制度。他们还希望不惜以向英美两国做任何让步为代价，在西方结束战争，而在东方则继续对苏战争。因而，那些从前曾同天主教中央党有联系的反动天主教活动家，同将军们一起参预了1944年7月20日谋杀希特勒的阴谋，是绝非偶然的。

279 原莱比锡市长戈台勒在阴谋的参加者中间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旦谋杀希特勒成功，内定他为

① 《经济学家》，1943年9月11日。

新独裁政府的首脑。戈台勒同德国大资产阶级有联系，是沙赫特的朋友，克虏伯家族也把他当作自己人①，跟冯·巴本——德国天主教阵营极右集团的代表也过从甚密②。

原中央党以及天主教工会的一些活动家都同戈台勒集团有联系，诸如平德尔、凯撒、赫梅斯。这些反动分子和苏联的死敌在战后的西德领导天主教党，并公开转而为英美帝国主义者效劳，采取极端敌视德国的统一与民主化的立场。大战之后，凯撒、平德尔及其他一些反动的天主教活动家，都把自己打扮成“7 月 20 日的英雄”，“反希特勒斗争的英雄”。但是，正如民主德国报刊揭露的那样，凯撒和平德尔在 7 月 20 日阴谋中只起了内奸的作用③。应该指出，平德尔本人就是法西斯党的积极成员。

从战后民主德国报刊所披露的关于 1944 年 7 月 20 日案件审讯的秘密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早在 1942 年戈台勒在同凯撒和原天主教中

---

① 《真理报》，1944 年 8 月 13 日。

② 《工人日报》，伦敦，1944 年 9 月 12 日。

③ 《每日评论》，柏林，1948 年 8 月 13 日。

央党的其他活动家的谈判中就表示担心，一旦希特勒军队打了败仗，必然产生“共产主义的危险”，因此应该及早做准备，绝不允许这种危险发生[1]。戈台勒早在1942年便从原先担任部长的天主教中央党员中，从将军和其他反动分子中物色人员，组成未来的内阁。戈台勒集团准备进行的斗争，并不是针对法西斯，而是针对共产主义，准备继续对苏战争。

在战后披露的材料中，戈台勒同平德尔于1943年春的一次谈话颇值得注意。他们谈到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被击溃，谈到德国战争的前景。戈台勒提出如下方案：为了有效地同苏联进行斗争，必须把军事行动同政治手段结合起来。他建议应该利用英苏之间的矛盾。接着，他进一步解释他的计划说，英国十分关心的是不让苏联的力量在西方和巴尔干得到加强，英国还害怕失去在280亚洲的领地，然而英国如得到“强大的”（即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德国的帮助，将可以同苏联对抗。戈台勒告诉平德尔说，他正在寻求军界的支

① 见《每日评论》，1948年8月13日，《新德意志报》，1948年8月21日。

持，也希望求得原天主教党的活动家和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的支持。

那些聚集在戈台勒周围的天主教“反对派”的计划就是这样的。他们同反动将军们协同行动，想挽救德国帝国主义，纠合新的力量进行反对苏联与反对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戈台勒、平德尔、凯撒和其他一些人指望取得希特勒本人以及其他法西斯党魁的帮助实行政府要人的和平更换。戈台勒准备同希特勒共同执政[①]。

早在1942年12月末，当苏军正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歼灭希特勒匪徒之际，一些参预阴谋者曾在巴伐利亚见面。由于英美军队不会迅速在欧洲登陆，目前苏联是欧洲大陆上唯一的实际力量，如果强行搞掉希特勒，便会被“共产党人所利用”。因此他们决定暂时延缓废黜希特勒的计划[②]。参加7月20日阴谋的天主教集团也有这样打算。他们同英美的情报机关，同艾伦·杜勒斯有联系。原美国驻德军事当局管理宗教问题的官员纳彭曾

① 《新德意志报》，1948年8月21日。

② 《世界舞台》，柏林，1949年9月21日，第1197—1200页。

报告说，1944年夏，参加谋杀希特勒阴谋的教会领袖，曾通过瑞士与同盟国当局进行了联系，并建议说，一旦阴谋分子在外省组成地方行政机构，希望同盟国当作德国合法政府予以承认①。

由上述情况可以知道，当德国已经输掉这场战争成为明显事实的时候，某些主教和天主教领袖对希特勒的“反对立场”，同那些上层贵族、将军和大资本家“反对”希特勒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美国记者兼经济学家萨苏利关于这些“反对派”评论说：“支持7月20日阴谋的人们都是有势力的人，他们从1933年起就可以在任何时候成功地把希特勒撵下台。因此，他们一直等到1944 281 年夏，是尤其值得注意的。到了这时，他们已经失去良好的机会，因为在这一段时间内，纳粹党徒已经强大，而原来曾同情阴谋计划的人们，有许多人认为在战争紧张的时期举行政变是不妥当的。他们所以等待了这么长时间，因为直到1944年7月之前，他们对希特勒都十分满意。当希特勒向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发动进攻的时

① M·M·纳彭：《盟国的军事政策与德国的宗教状况》，载《教会史料》，第2期，1947年6月，第93页。

候，连一点阴谋的迹象都没有。当德国武装力量侵占了整个西欧之际，不满的迹象就更少了。然而，到了1944年中，纳粹几乎全部被从俄国撵走了。1944年6月，英美军队在诺曼底登陆。如今终于明白，德国已经打败了。此外，同样明显的是，德国已经没有可能与西方同盟国进行和平谈判，如果能够进行和谈，德国将得到新的支持，继续东方的战争。于是过了一个月之后，便尝试实现戈台勒的阴谋。他们之所以要杀死希特勒并不是因为他错了，而是因为他遭到了失败”②。

这次阴谋所以失败，因为它是反民主的，并以继续对苏作战为目的。策划这一阴谋的人们害怕人民。戈台勒以及同他有联系的工业界人士和军界人士企图挽救德国帝国主义。

德国垄断资本和一部分将军以及通过艾伦·杜勒斯跟他们发生联系的美国统治集团和丘吉尔，企图在废黜希特勒之后，在德国建立军事专政，然而他们又企图向德国人民和外国民主舆论掩盖它的反人民性。他们用以掩盖的方法就是在

① 理·萨苏利：《И·Г·法本工业托拉斯》，国家外国书籍出版社，1948年，第155页。

未来的政府中将有天主教界和“社会主义者”参加。

在参加谋杀希特勒的阴谋的人们之中，也有个别人以前曾同工人运动有过联系，他们的确是反法西斯战士，希望把反对希特勒集团的斗争同广大群众反对希特勒制度的斗争结合起来。然而，这些人在7月20日事件中起不了决定作用，可是他们却首先成为希姆莱镇压的牺牲者，甚至可能就是戈台勒集团中有人出卖了他们①。

只有德国共产党一贯地毫不妥协地反对希特勒的强盗制度。法西斯对共产党人实行了残酷的镇压。有数万共产党人在集中营里被折磨死。德国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在7月20日事件发生后不久就被希特勒匪徒折磨死了，他树立了坚定不屈的榜样。但是，任何迫害，任何恐怖都不能摧毁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他们同跟着他们前进的先进无产者是真正的反对希特勒制度的战士。

282

1944年1月，恩斯特·台尔曼在给同牢的

① 见阿克曼的文章《1944年7月20日事实真象与传说》，载《统一》，1947年，第12期。

难友写的信中谈到德国共产党说："……我们的良心是纯洁的，对德国劳动人民一片赤诚。诸如战争罪行、帝国主义的强盗政策、残暴、恐怖、专制、违背良知、限制自由和横行霸道、虚假的社会主义、法西斯的种族论、卢森堡派的奇谈怪论、骄傲自满、自高自大、吹嘘自己等等，都跟它毫无瓜葛。我们是没有任何污点的。"①

在德国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普通神父之中，也有人同革命的工人、民主派、共产党人一起为反对希特勒的暴政而英勇斗争。其中有很多人被关进集中营受折磨；有许多人死在秘密警察的屠刀之下。这些正直的人们的立场，同德国主教们以及教皇的立场有根本的不同。教皇从来没有为保护他们而提出任何抗议。

至于谈到那些在7月20日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上层贵族和将军们的"反对立场"，他们所追求的不过是本阶级狭隘自私的目的。他们的动机出于对苏联的仇恨，对本国工人阶级的仇恨。这一点对所谓反对希特勒的"教会反对派"也是一

① 《布尔什维克》，1950年，第21期，第35页。

样。在7月20日的阴谋失败之后，天主教阵营的这些"反对派"马上就为法西斯党魁"奇迹般的脱险"向天主做谢恩祈祷，绝非偶然。请看1944年7月21日关于此事的报道："德国福音教会教务会议和自由教会联合会决定：除开为元首的例常的祈祷之外，兹决定在本星期日为(希特勒)这次脱险增加一次祈祷。天主教主教已分别向各教区发出类似的指示"①。

美国情报机关头子艾伦·杜勒斯策划的旨在283搞掉希特勒从而为在西方单独媾和并继续东方战事的谈判开辟道路的阴谋，梵蒂冈究竟参预了多少，从文件中不得而知，因为估计这类文件绝对不可能公布。然而，参预阴谋事件的天主教反动集团同主教团并通过它跟梵蒂冈有联系，这是勿庸争论的。德国驻梵蒂冈大使魏茨泽克无疑是知道这一阴谋的。他同德国军界有密切关系，并同情建立军事独裁的计划②。下述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在谋杀希特勒未遂之后不久，魏茨泽克在晋见教

① 转引自《中欧观察家》，伦敦，1944年8月4日，第16期，第238页。

②见《纽约时报》，1944年9月6日。

皇以后，马上宣布他不再代表希特勒政府。教皇对于美国统治集团的计划也十分了解，他是通过泰勒同他们进行联系的。

对梵蒂冈说来，把希特勒从政治舞台上撵下去，是"最小的罪恶"，因为这样可以为美英两国同德国资产阶级讲和创造条件。当7月20日阴谋失败之后，德国主教们为希特勒"脱险"举行祈祷，梵蒂冈的主教们并没表示异议，当德国主教们利用这一事件在国内掀起新的军国沙文主义运动的时候，他们也未表异议。

第六章　梵蒂冈反对民主阵营在战争中获胜

(1944年末至1945年5月末)

教皇拯救资本主义的宣言

1944年末，德国侵略者被彻底赶出苏联领土，军事行动转移到敌人的国土上。克·叶·伏罗希洛夫写道："战争的第四个和最后一个时期，从1944年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可以说是苏联不断战胜希特勒德国的时期……"①

苏军势如破竹的进攻，战争转移到敌人国土，对苏联单独战胜法西斯德国的恐惧，终于迫使英美在欧洲开辟了被他们故意拖延已久的第二战

① 伏罗希洛夫：《伟大卫国战争的天才统帅》，第8—9页。

场。

“英美司令部对在西方开辟第二战场，明里暗里进行破坏和采取小规模行动的战略，使德军得以集结全部兵力来对付苏联。‘同盟国’英美玩弄见不得人的阴谋诡计，想尽可能地消耗苏联的力量和削弱苏联，从而拖延战争，这使希特勒有可能在三年的过程中，集中大量部队和武器，拚命地、无后顾之忧地只在苏联战线上作战。

只有当事情已经显而易见，苏军毁灭性打击不可避免地要制敌于死地，而苏联单独能消灭纳粹德国及其附庸国时，丘吉尔之流才被迫于拖延……两年以后，慌忙开辟了第二战场。”① 285

盟军在法国得以顺利登陆，也是由于苏军牵制住了敌人主要的优势的兵力。

“……毫无疑义，”斯大林在1944年11月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没有红军在今年夏季的强大攻势牵制住德军达两百个师的话，我盟国军队是不能这样迅速地打退德军并将其逐出意大利中部、法国和比利时国境的。”② 法西斯德国的盟国一意

① 伏罗希洛夫：《伟大卫国战争的天才统帅》，第8—9页。

②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57页。

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相继脱离了它。这些国家不仅同德国断绝了关系，而且也对德宣战。

苏军所向披靡的进攻和进入罗马尼亚国境，结束了法西斯对这个国家的统治。8 月 23 日，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曾把罗马尼亚出卖给希特勒德国的安东内斯库法西斯集团。不久，罗马尼亚对法西斯德国宣战。苏军历史性的胜利，为推翻保加利亚的君主—法西斯制度创造了条件。9 月 9 日，保加利亚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并依靠苏军的胜利进攻，推翻了这个制度，并夺取了政权。保加利亚也对希特勒德国宣战。苏军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了波兰。苏军对由于铁托集团卑鄙的叛卖政策而经受严重危机的南斯拉夫游击运动给予了决定性的援助，并从侵略者手里解放了这个国家。苏军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赶走了占领者。为了追击希特勒军队，苏军进入挪威国境，以便把占领者从挪威国土上赶出去。

由于苏军所向无敌的进攻，整个欧洲从法西斯德国的蹂躏下得到了解放，全世界人民得到了拯救，免遭奴役，欧洲文明避免了毁灭

“现在，当卫国战争即将胜利结束的时刻，” 286 斯大林同志于1944年11月6日指出：“苏联人民的历史作用正在充分地显示出来。目前，大家都承认，苏联人民以其奋不顾身的斗争，从法西斯蹂躏者的铁蹄下拯救了欧洲文明。这正是苏联人民在人类历史上建立的伟大功勋。”①

苏维埃国家在粉碎“轴心”国和从法西斯敌人手里解放欧洲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向全世界表明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十月革命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同志说，“给了我国人民和我国军队伟大而不可战胜的力量。”②

在苏军从法西斯分子及其希特勒主子统治下解放了的国家内，人民群众才有了可能对自己祖国的命运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苏军所向无敌的进攻加强了民主阵营，打破了反动派的计划，打破了丘吉尔和美国统治集团的计划，他们一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还企图同法西斯德国单独媾和，使欧洲各国人民永世受剥削者统治。

---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62页。

②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58—159页。

战争越接近结局，惧怕民主力量增长的美英统治集团就越渴求同德国政府妥协。反映统治阶级情绪的美英反动报刊，此刻也开始坚决要求尽快缔结妥协性的“温和的”和约。希特勒德国的统治者考虑到美英资产阶级害怕苏联的强大和欧洲各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便极力利用这种情况，以分裂同盟国阵营。沙赫特、巴本以及法西斯分子的许多其他代理人和狐朋狗友就苏军进入德国本土以前结束战争问题进行了秘密谈判。斯大林同志在 1944 年 11 月的报告中说：“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希特勒分子曾进行过种种绝望的尝试来使联合国成员彼此疏远和相互对立，在他们中间挑起怀疑与不和，使其相互猜忌，从而削弱他们在军事上的努力，如果可能的话，就使其相互斗争。287 希特勒政客们的这类企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联合国在反对希特勒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致，对他们来说是再大不过的危险了，而同盟国在其反对共同敌人斗争中分裂，对他们来说就是军事上、政治上的莫大胜利。”①

---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 164 页。

梵蒂冈更加积极地参预了希特勒分子在战争最后阶段顽固地企图分裂同盟国阵营的活动。1944年末，梵蒂冈在德国统治集团与美英统治集团之间，充当了和事佬和调停人，公开介入事件的进程，以挽救希特勒德国免遭毁灭。

梵蒂冈的这种主动性与希特勒匪徒的目的完全合拍，与德国政府相互配合。1944年8月，法西斯广播评论员狄特马尔将军承认，战争对德国来说已毫无希望，“所有明智的道理”都说明必须“尽快结束导致双方大规模毁灭生命和物质财富的这种状态。”这个法西斯将军暗示，德国准备商讨“宽容的”，妥协性的媾和的可能性①。

与此同时，《罗马观察家报》发表文章，几乎逐字照搬了法西斯分子狄特马尔单独媾和尽快结束战争的论点。报纸写道，必须“结束战争，如果证明发动战争是正确的那些目的已经无法达到。”②

希特勒刽子手们希望媾和，以便策划新的战

① 见《真理报》，1944年9月3日。

② 《国际新闻简报》1944年8月19日，第17期；《现代史料》，1944年9月，第235页。

争。梵蒂冈支持法西斯集团的这种企图。

1944年8月，庇护十二世就德国司令部用"飞弹"使伦敦遭受破坏一事，通过威斯敏斯特教区大主教发表了告伦敦市民书：号召他们对敌人表现出"宽恕、怜悯和仁慈的基督精神来"。①教皇的呼吁，不仅在英国新教徒之间，而且在天主教徒之间也引起了极大愤慨。报刊指出，教皇以288自己的行动再次公开表示支持使欧洲各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罪魁祸首。

梵蒂冈甚至还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辩护士的可耻角色。1944年1月末，美国陆军和海军部公布了有关在日本战俘营中战俘的悲惨境遇和由于惨无人道的暴行使战俘大批死亡的材料。②对此，梵蒂冈于1944年8月发表了一篇报道作为回答。报道说教皇驻日本特使马列拉访问了日本集中营，感到这些集中营的生活条件"令人满意"③。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日本暴徒准备向苏

① 《国际新闻简报》1944年9月2日，第18期。

② 1944年2月2日《真理报》；《现代史料》，1944年3月，第250—254页。

③ 《现代史料》，1944年10月，第325页。

联、中国、蒙古人民共和国三国人民和美国军队投掷杀人细菌，他们对千千万万人，主要是对中国人和苏联人试验这种大量杀伤的武器。仅仅七三一部队通过惨绝人寰的罪恶试验，便残暴地杀死了三千多人。"①

就在日本军阀干着这种滔天罪行的同时，教皇的代表，却作为日本战犯的直接帮凶，发表声明说，他认为在日本集中营里受苦的人们的处境"令人满意"。战后，1946 年 1 月，主要战犯日本天皇通过马列拉向教皇致意，感谢他为日本所作的一切。②

战争末期，梵蒂冈比以前更加成了国际反动势力大搞阴谋的中心，国际反动势力抱定宗旨挽救希特勒法西斯免于彻底灭亡，并阻挠民主制度在战后的欧洲得到巩固的地位。

《纽约时报》驻罗马记者梅修兹 1944 年 9 月 5 日对梵蒂冈的情况作了如下的描述。他在该报上报道说，这些天来，梵蒂冈政治活动极为活跃，

---

① 摘自《苏联政府致美英中三国政府照会》见 1950 年 2 月 3 日《真理报》。

② 《全国天主教年鉴》，1947 年，第 707 页。

和谈的消息重又不胫而走。今天，教皇接见了罗马尼亚大使，昨天他接见了波兰和斯洛伐克大使，而在数天以前则接见过美国代办。上周教皇同泰289勒进行过会谈，最近几周以来，同德国大使冯·魏茨泽克男爵晤谈过数次。驻比利时和荷兰的教皇圣使在战争初期被迫离开这些国家，现在又重返自己的岗位。驻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圣使，也受命准备回到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梅修兹写道，目前，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魏茨泽克身上。他和德国军阀有着密切的联系。此间人士完全相信，尤其是7月20日以后(亦即谋杀希特勒未遂以后)魏茨泽克和教皇讨论了媾和问题①。

1944年末，梵蒂冈作为调停人，积极参加了德国军阀和艾伦·杜勒斯之间的秘密谈判。这些谈判还谈到尽可能更为长久地阻挡住苏军进攻的问题。②

在梵蒂冈不仅进行了拯救德国反动制度的秘密谈判。在这里还同时制定了战后镇压工人运动的计划，并策划了反对苏维埃国家的阴谋。

---

① 1944年9月6日《纽约时报》。

② 1950年8月19日《每日评论》。

1944年9月1日，在战争五周年这天，庇护十二世通过无线电发表了告全体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书。他号召拯救私有制和人剥削人为基础的制度，号召拯救资本主义，并使资本主义亿万斯年。

教皇在他的文告中声称，旧世界已成废墟。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决定性的阶段。人们都在考虑一个问题：新世界将是什么样子？从天主教会的观点来看又是什么样的？庇护十二世说，在建立战后世界时，必须以"基督意识不可能承认否定私有制原则或使对私有财产的天赋权利的存在成为不可能的社会制度是正确的"为出发点。在这份文告中，庇护十二世一面援引过去历代教皇，尤其是利奥十三世的话，一面顽固地反复强调，没有资本家，社会便不能存在；"基督意识""不能容忍"没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私有制的那种制度。教皇倒是很想让劳动人民相信，似乎摩根、福特、洛克菲勒、戈林、克虏伯等家族的财富是这些大资本家的"劳动成果"，而不是千百万雇佣奴隶的劳动成果。

庇护十二世从维护资本的利益出发，坚决反

对工业国有化。他极力用他"爱"工人阶级的保证290来掩盖他露骨地维护资本主义奴役制。他蛊惑人心地声称，当资本家"滥用财产"时，教会将"谴责"他们。教皇说，在战后的世界必须关怀小私有者。这个声明纯粹是蛊惑人心，因为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就谈不到人民群众的处境会有任何改善。梵蒂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全部活动，都旨在用一切手段捍卫资本主义。

但是，为什么恰在1944年9月，当战争即将结束时，庇护十二世选择了维护私有制作为他文告的主题呢？教皇本人对此作了回答。他抱怨世上"激进宣传"增强了，人们在渴求"普遍的幸福"。这创造了"宣传的良好基础"，培养着一种社会意识，使人们"不理智地、不公正地"拒绝"组织上的改革"，而期待着"革命"来改善生活。可见教皇并不愿意在希特勒匪徒被彻底粉碎以前错过时机，再一次尝试引诱群众脱离革命活动。教皇害怕人民群众粉碎法西斯强盗后，怀着满腔愤怒来猛烈地反对产生法西斯的资本主义。

庇护十二世害怕亿万人民，其中包括天主教徒，都跟着共产党走。在所有欧洲各国信奉天主教

的劳动群众，不顾教会当局的诅咒，都和共产党人站在一起，从而摈弃了教皇和主教们的反人民政策。例如，意大利成立了“天主教共产主义者”小组，(后来改名“基督教左翼”党)[①]。教皇在自己的文告中抱怨“激进宣传”获得成就的同时，也对共产党人的成就恨得咬牙切齿。无怪乎反动报纸《纽约时报》写道，教皇的文告是反对共产主义的。[②]

《泰晤士报》驻罗马记者于1944年9月报道说，教皇准备再次反对在意大利和法国已实现的天主教徒与共产党人的合作[③]。10月，教皇写了封专函给罗马代牧主教红衣主教马凯蒂·萨尔瓦尼尼，建议举行公开的“忏悔祈祷”，因为精神堕落似乎已笼罩着罗马。教皇未曾举行过公开祈祷来抗议德国占领者和他们在罗马的法西斯走狗的暴行。然而，由于意大利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一起参加了解放运动，他竟咒骂罗马人“精神堕落”。他当时打算，用关于“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危险 291

① 《纽约时报》，1944年9月6日第3版。

② 《纽约时报》，1944年9月3日第2版。

③ 《世界新闻与展望》，伦敦，1944年9月23日，第39期。

的宣传叫器，就能使他分裂同盟国和防止希特勒德国覆亡的企图得逞，他在 9 月 1 日的文告中，再次呼吁同法西斯德国签订“公正的和约”。

早在战争结束以前，梵蒂冈就把他的战后计划同德国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复兴联系在一起了。1944 年 10 月 12 日，庇护十二世对梵蒂冈德国学院（这所学院虽然仍叫“德国学院”但当时已靠美元过活了）的大学生们讲话时宣称，他将“满怀仁爱地关注着战后德国的发展，如有必要，将给予德国援助。”①

这里指的是帮助谁反对谁呢？显然不是帮助德国劳动人民，而是援助德国复仇主义者。即是现在，庇护十二世也是热衷于此。

在战争正酣的时候，甚至就在希特勒匪帮在他们暂时占领的苏联国土上干着罪恶的勾当时，苏联人民都没有想在战后向德国人民进行报复。斯大林同志在 1942 年 11 月 6 日的报告中说：“我们并没有规定消灭德国这样的任务，因为不可能消灭德国，正如不可能消灭俄国一样。但是，

① 《现代史料》1944 年 12 月，第 514 页。

消灭希特勒的国家是可能的也是应当的……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正是要消灭希特勒的国家及其罪魁祸首……；我们的第二个任务，正是要消灭希特勒的军队及其领导者……；我们的第三个任务，正是要毁灭举世痛恨的"欧洲新秩序"并严惩其炮制者。"①

美英统治阶级竭力想保存德国的反动力量。庇护十二世也力求做到这点，当1944年末，他下保证"爱"德国、"关怀"德国时，所指的则是德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德国容克地主和垄断资本家们。

1944年11月，斯大林同志说："任务不仅是赢得战争，而且要使新的侵略和新的战争不能发生，如果不是永久的，那末至少也要在很长时期内不能发生。"② 292

梵蒂冈在战争末期的政策所抱的目的曾妨碍这一任务的实现。梵蒂冈的活动，归根结底是要使得德国帝国主义在战后便于复活。

---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75—76页。

②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65—166页。

英美资产阶级借梵蒂冈之力在欧洲建立自己的支柱

众所周知，苏联的加强和共产主义影响的增长，使得美英和其他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集团十分惊恐不安。

梵蒂冈和所有天主教主教们，以及各国右翼社会党人和英国工党的领袖们，对此也深感不安。"……工党领袖们看到在英国人民中间渴望同苏联人民友好意愿在增长，早在战争结束以前，希特勒德国的灭亡刚成定局时，便开始焦虑不安，并急忙采取了旨在削弱英国人民同苏联人民友好关系的各种措施。只有上述情况才可以解释1944年工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英苏友好协会会员不能同时兼为工党党员的决议。"①

与苏联和整个民主阵营为敌的美英统治集团到处支持反人民分子——法西斯分子，君主主义者，右翼"社会主义者"的领袖，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叛徒。因此之故，美英统治集团对

① 《苏联政府答复英国政府照会的复照》，载《真理报》，1951年2月25日。

抵抗运动横加阻挠。他们极力在从希特勒强盗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内，安插能为英美资本效劳的法西斯分子、君主主义者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去代替为希特勒效劳的法西斯分子。英国军队枪杀希腊爱国者——曾英勇地同德国占领者进行斗争，并解放了自己祖国的人们；丘吉尔在工党领袖们的赞许和美国的支持下，把反动的君主法西斯专政强加给希腊人民。

初期，丘吉尔强加给希腊的法西斯制度的头 293 子是达马斯基诺斯大主教，此人曾效忠希特勒匪徒及其希腊傀儡。后来丘吉尔的傀儡——国王回到希腊。美英统治集团打算在其他由希特勒占领者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各国照搬"希腊经验"。

梵蒂冈伙同所有天主教主教们都推行了美英统治集团这一反人民的政策，并帮助他们实现这一政策。

梵蒂冈以及根据它的指示行事的美、英、意、法以及其他国家的天主教集团靠散布对苏联方面的诽谤性谰言来毒害社会意识，并直接参与美英帝国主义分子反对欧洲民主制度的阴谋。

美英政府伙同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依靠梵蒂

冈、天主教教会组织，竭力要在每个从希特勒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国家内建立其反对民主阵营的支柱。天主教集团、政党和组织在组织合乎英美胃口的政府方面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梵蒂冈重又大叫大嚷，企图在奥地利、匈牙利、巴伐利亚、西班牙和其他某些国家内建立天主教君主国。

1944年11月初，“奥地利王位追求者”奥托·哈布斯堡在美国当局的赞同下由美国前往欧洲①。他在里斯库、布鲁塞尔和罗马进行了谈判。根据天主教主教、教皇在奥德事务方面的顾问胡达利的文章，可以看出这些谈判的目的来。胡达利在战前，曾因效忠希特勒而臭名昭著。他是出面宣布天主教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完全能够而且也应该合作的头一批奥地利主教之一。当希特勒德国在战争中败局已定的时候，胡达利发表文章，证明必须恢复奥地利君主国，以统一奥匈帝国先前的全部领土（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奥地利、南斯拉夫），这决不是

① 《工人日报》，伦敦，1944年11月3—4日。

胡达利主教的私人计划，而是梵蒂冈的计划。[1]

得到美国统治集团支持的奥托·哈布斯堡为 294 了加速这一计划的实现，于1944年11月抵达欧洲，并访问了梵蒂冈，他在梵蒂冈受到“热情接待”。[2] 就哈布斯堡在布鲁塞尔同天主教人士进行谈判一事，比利时报纸《最后一点钟》写道，关于建立“罗马天主教中央帝国”的问题，早在纽约斯佩尔曼大主教在梵蒂冈时，就进行了讨论，复辟哈布斯堡帝国的计划得到了美国权势集团的支持。[3]

奥托·哈布斯堡到达梵蒂冈之前，他的叔叔鲁普列赫特亲王，“巴伐利亚王位追求者”，已经到了那里。在梵蒂冈，人们所操心的是消除两个失业的君主的竞争，并且希望鲁普列赫特能把自己的“权利”交给奥托·哈布斯堡。

梵蒂冈直到最后时刻始终是匈牙利法西斯制度的同盟者，这一制度是由于希特勒德国的恩典而在战时存在过。这个反人民的制度也曾得到以明曾蒂大主教为首的匈牙利天主教会上层分子的

① 《中欧观察家》，1945年5月16日№ 9。
② 《工人日报》，纽约，1944年11月17、24日。
③ 《中欧观察家》，1945年5月16日，第9期。

支持。明曾蒂对德国占领者于1944年在匈牙利推行的种族主义法令表示欢迎。1944年10月，德国当局在匈牙利成立了以法西斯分子萨拉希为首的新政府。梵蒂冈第一个承认了这个靠德国刺刀维持的、法西斯罪犯所组成的“政府”。明曾蒂于1945年1月16日写信给内政部长说，“神圣的宗座第一个承认了现存的制度。”①

梵蒂冈积极参与了意大利君主主义分子的阴谋。1944年10月，巴多里奥元帅召开了推翻政府(当时左翼党派的代表也参加了政府)的会议。梵蒂冈的代表和君主主义者一起参加了会议。②在意大利的英美军事当局袒护法西斯分子免受审判，而同时却审判与墨索里尼匪帮作斗争的游击队员。③梵蒂冈直接参与拯救法西斯罪犯的活动。

教皇一面支持君主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分子，一面帮助意大利的反动资产阶级建立群众基础，即建立各种组织，借助这些组织，反动的资产阶

① 《关于明曾蒂案件的材料》，布达佩斯，1949年第112页。

② 《工人日报》，纽约，1945年1月3日。

③ 《工人日报》，1944年9月24日。

级方能使劳动人民中的天主教徒脱离民主阵营并使他们反对共产党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教会[295]机器和在主教监督下进行活动的"天主教行动会"组织曾被广泛利用。

意大利的民主报刊指出，昨天还支持墨索里尼的资产阶级，现在却转而指望英美占领军和梵蒂冈阻碍意大利人民亲自掌握管理国家的大权。①教皇方面也打算让英美军事当局帮助意大利反动派镇压意大利的民主运动。

梵蒂冈和意、英、美资产阶级一起，把天主教民主党看成自己同意大利人民进行斗争的工具而寄予很大的希望。这个党的许多普通党员参加了反法西斯运动和游击队。但是，这个党的领导人则"反对同法西斯主义进行积极斗争，只许局限于单纯帮助军官和逃亡的士兵坐等解放，因为他们认为解放只是盟国军事力量应当做的事情。"②天主教民主党的领袖们一口咬定他们忠于反法西斯阵营，而同时他们的报刊并不是对着法

① 见《工人日报》，纽约，1944年11月4日。

② 隆哥：《关于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活动》，载《1947年九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第284页。

西斯主义，而是对着共产主义开火。①他们和宗座有着密切联系。他们之中的德·加斯佩里自1926年起就在梵蒂冈当图书管理员，与梵蒂冈上层分子过从甚密。他们装成劳动人民的朋友，进行社会性的蛊惑宣传，以便保持他们对天主教群众的影响，并使他们脱离民主阵营。

梵蒂冈和整个天主教会掀起猖狂的反共运动帮助意大利反动派。意大利共产党人不止一次地声明，表示愿意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和国内的天主教徒及天主教组织合作。他们也用事实证明了这点。在信奉天主教的劳动人民中间，存在着同共产党人团结合作的强大运动。②但是，教会上层分子和天主教民主党的反动首领们却害怕劳动人民建立统一战线。7月23日，教皇出面反对天主296教徒支持共产主义运动。他声称："我们有些儿女们，虽然他们自称为天主教徒，却信奉受到教会正式谴责的理论。"③

① 《战争与工人阶级》，1944年4月1日，第7期，第28—29页。

② 《现代史料》，1944年10月，第341页。

③ 《现代史料》，1944年10月，第232页。

法国主教们和梵蒂冈同样也帮了法国资产阶级的忙，趁希特勒匪徒被赶出法国以前把国内的反民主势力纠集起来。

美英统治集团把赌注下在戴高乐身上和天主教政党人民共和运动上。直到最后时刻还支持卖国贼贝当及其“政府”的梵蒂冈奉行的也是这种政策。同时，梵蒂冈也支持戴高乐，而戴高乐周围的人中也有梵蒂冈的亲信。戴高乐敌视人民运动，他反对开展抵抗运动，他仇恨共产党和忠于“二百个家族”，都使得他在梵蒂冈外交官的眼里成了贝当政府一旦垮台的情况下，在法国的可贵的同盟者。

“戴高乐回到法国之后，立即依靠社会党人和天主教徒联盟，进行了孤立共产党人和把他们排挤出政府的尝试。”①

8 月 23 日，法国游击队经过四天的战斗收复了巴黎的大部分地区。在战斗最前列的是共产党人。法国很快肃清了德国占领者。以贝当为首的

---

① 雅·杜克洛：《为争取国家独立，反对美国扩张主义而斗争的法国共产党》，载《1947 年几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第 169 页。

维希卖国"政府"逃到德国。有鉴于此，贝当驻梵蒂冈的大使贝拉尔于8月24日发表声明说，因为贝当"政府""再也无力行使权力"，他认为自己在梵蒂冈的使命已告结束。[①] 戴高乐成了法国最受梵蒂冈欢迎的人，而天主教政党人民共和运动成了教皇重要的支柱之一。

9月初，梵蒂冈和美国统治集团的代表斯佩尔曼大主教抵达巴黎同戴高乐举行谈判。[②] 谈判的目的是让法国主教方面保证支持戴高乐和定出措施反对法国的民主运动。法国主教们不久前还同德国人合作，并且直到最后还支持贝当，现在立即转而为戴高乐效劳，因为他们知道戴高乐跟贝当一样，也是民主制度的敌人。1944年4月 297 末，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祈祷仪式，贝当曾经出席。[③] 四个月后，在同一座圣母院里，巴黎大主教举行了祈祷仪式，这一次则是戴高乐在场。[④]

---

① 《国际新闻简报》，1944年9月2日，第19期。

② 《纽约时报》，1944年9月12日。

③ 《现代史料》，1944年6月，第529页。

④ Л·克拉米诺夫：《第二战场》，"苏维埃作家"出版社，1948年，第107页。

梵蒂冈也认为，法国"什么都没有改变"；戴高乐替换贝当也只是换了一个人而已。宗座对法国事变的这种态度表现在他要求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同意委派瓦列里主教为驻巴黎圣使，而瓦列利在整个战争时期曾任贝当"政府"时期的圣使，与贝当进行合作，于1940年在贝当与希特勒匪徒双方谈判法国投降时充当过掮客。梵蒂冈这一行动是对刚刚推翻维希集团的法国人民抱敌对态度的示威。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拒不同意委派瓦列里为驻巴黎圣使。[1] 为了报复，梵蒂冈拖延了承认临时政府的时间，直到1944年12月9日才予以承认。[2]

指靠贝当和直到被占领的最后时日还与德国人进行合作的法国资产阶级，等到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以后，便开始组织后备力量，一旦希特勒匪徒覆灭，好阻挠法国的民主运动，并使群众脱离曾领导人民同占领者进行斗争的共产党。靠大企业主资助[3] 的天主教政党（人民共和运动）就是

---

① 《真理报》，1944年12月1日。

② 《现代史料》，1945年2月，第167页。

③ Д·克拉米诺夫：《第二战场》，第115—116页。

资产阶级的这种后备力量。人民共和运动的上层分子和戴高乐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民共和运动的领袖之一，罗贝尔·舒曼既和戴高乐阵营有联系，又和大企业主有联系。托拉斯代表舒曼1944年投票赞成贝当并在贝当“政府”里待过一个时期。“参加戴高乐运动的天主教徒（尤其是罗贝尔·舒曼等人）代表了德·温台尔‘钢铁企业组合’的金融冶金王朝。它对戴高乐派有巨大影响。早在1943年，德·温台尔‘钢铁企业组合’就依靠戴高乐开始准备镇压各民主组织。”①

298 进步的法国政论作家让·卡塔拉给天主教政党的这位领导人作了如下的评述：罗贝尔·舒曼“……被认为是洛林人，虽然他出生在卢森堡，法语说得很糟，自1919年起，跟皮杜尔（人民共和运动的另一首领——舍英曼）一样，早就是梵蒂冈秘密外交的代理人，大概是通过耶稣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他在德国天主教中央党幕后活动。众所周知，这个党和鲁尔钢铁工业巨头有着密切的联系。凡尔赛和约缔结后，他成了

① A·伍姆塞：《戴高乐及其同谋》国家外国书籍出版社，1948年，第14—15页。

法国人。这时，他以摩泽尔省代表的身份，在法德资本巨头"钢铁企业组合"——德·温台尔的庇护下，十分自然地继续他的宦海生涯。1940 年舒曼进入贝当的第一届内阁担任"难民事务国务秘书"也是十分自然的。希特勒占领的最后几年，他是在修道院度过的，在这里培养他以备日后起用。法国解放后，当秘密的教皇外交归美国国务院管辖，而德·温台尔要受摩根财团监督时，舒曼成了人民共和运动的首领之一。"①

人民共和运动的另一个首领乔治·皮杜尔，于 1943 年秋被选为法国民族抵抗运动委员会主席，法国解放后担任戴高乐政府的外交部长。天主教政党的首领们以阻挠抵抗运动为己任，把运动控制在自己手里，在内部削弱共产党的影响，一旦占领者被赶走，就夺取政权。1946 年 6 月 4 日，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喉舌《时代报》向人民共和运动致意时写道："无论如何，若没有你们，共产主义早在 1944 年 9 月就夺得法国政权了。"

关于人民共和运动，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

① 让·卡塔拉：《他们出卖和平》，第 182 页。

斯·多列士写道："对人民共和运动的政策我们从来不抱幻想。我们熟知历史：我们知道经过每次社会动荡之后，在每次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之后（而抵抗运动已引起了这种变化），反动派就要进行改组，就要打出新的招牌进行活动，以便把人民引入迷途，并准备反攻。在人民共和运动的基层组织中，有着抵抗运动的真正战士，有天主教工人青年联盟和天主教工会原先的成员，他们真诚地渴望为劳动人民的事业服务。然而人民共和299运动则成了掩护那些支持维希政权的社会力量进行活动的屏障。"①

在比利时，英美统治集团在梵蒂冈的支持下，把代表反动资产阶级（这个阶级1940年曾投降德国）利益的，以天主教活动家皮耶罗为首的政府强加给人民。皮耶罗是天主教政党基督教社会党的右翼首领之一。这个党把同工人运动进行斗争看作是自己的主要任务。

比利时共产党人在游击运动中和从占领者的铁蹄下解放比利时的斗争中起着领导的作用。皮

① 莫·多列士：《人民的儿子》，第166—167页。

耶罗从伦敦（他战时在伦敦）一回到布鲁塞尔，立即领导了反对游击运动的斗争，并依靠英国军事当局，开始解除游击队的武装。皮耶罗政府（他的内阁有八名成员属于天主教政党）拒绝追查曾经与德国占领者合作的那些比利时企业主。同时这个政府却采取残暴的手段反对人民。①

受天主教主教们支持的比利时基督教社会党把国内的反动势力都纠集在自己周围。

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英美占领当局同样对天主教教会寄于愿望。战争末期，英美报刊“发现”，似乎德国天主教会曾“与希特勒制度为敌”。美英占领当局从英美军队进入德国国土的头几天起，所依靠的就不是民主力量，不是反法西斯人士，而是象依靠其他反动分子一样也依靠天主教僧侣。选拔市政府候选人时，他们曾和主教们商量过。② 在主教们的协助下，许多希特勒分子钻进了市政机关是毫不足奇的。

---

① 《工人日报》，纽约，1944年11月18、24、30日，12月1日。

② 《真理报》，1945年4月13日；《工人日报》，伦敦，1945年2月2日。

为了同德国反动的天主教集团顺利合作，1944年9月，委任与美国天主教集团及梵蒂冈保300持联系的罗伯特·墨菲为美国军事指挥部所建立的管理德国美占区的机构的政治顾问。“墨菲奉行与梵蒂冈和已解放的各国中天主教政党亲近的方针政策，指望借助他们之力与人民群众的明显左倾对抗。”① 他和慕尼黑教权主义集团——德国反动天主教的支柱有老关系，1921—1925年，他曾在慕尼黑任美国副领事。为了与教权主义者合作的同一目的，1945年初派往巴伐利亚的美国人中，天主教徒占将近百分之八十。② 美国统治集团指望依靠右翼“社会党人”和原德国天主教中央党的反动首领们。这个党的首领布吕宁战时曾住在美国，得到了国务院的信任。

中央党的反动家伙们在梵蒂冈也有着很大影响。《纽约时报》驻罗马记者1944年9月写道，教皇在梵蒂冈有两个“德国朋友”——路德维希·卡阿斯神父（中央党前主席）和耶稣会士雷贝尔。如记者所报道的那样，卡阿斯成了教皇非常亲近

---

① 马·克拉米诺夫：《第二战场》，第32页。

② 《工人日报》，伦敦，1945年3月14日。

的人物，教皇每周要同他会晤两三次，讨论德国问题。卡阿斯拥护建立追随美英的“联邦制德国”，他对把德国分成三个国家的萨姆纳·韦尔斯计划给予肯定的评价。①

为了使德国进一步受英美帝国主义的全面管辖，为了保住德国反动派的阵地，美国代表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提出了把德国分成五部分的计划。1944年10月，丘吉尔和艾登建议把德国分成三个国家。这些反动计划旨在反对整个世界的利益和德国人民的利益，但却得到梵蒂冈的热烈支持。而在梵蒂冈教皇的亲密顾问中有卡阿斯这类人物，他是天主教党原首领，这个党为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扫清了道路。

综上所述，战争将近结束时，随着欧洲各国从希特勒占领下获得解放，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英美军事当局，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反动的天主教政客和他们的组织。在主教们和梵蒂冈的协助下，资产阶级拚命想分裂民主阵营，使天主教群众脱离开民主阵营，唆使他们去反对共产党

① 《纽约时报》，1944年9月6日。

301 人，建立它能够依靠的那种群众组织。这首先是天主教政党。这样的政党在欧洲多数国家里成了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天主教会组织应建立起能挡住群众性的人民运动压力的堤坝。

梵蒂冈参与丘吉尔反对波兰人民的阴谋

丘吉尔千方百计地利用梵蒂冈和天主教主教们的帮助，特别是在他反对波兰人民的罪恶阴谋中利用他们的帮助。他想在波兰重复他曾伙同美国反动派一起在希腊所干的类似罪恶勾当，即把毕苏茨基分子、地主和资本家等反动集团强加给波兰人民，使波兰卖国贼重新掌权，并借助他们的帮助，把这个国家变成新的反苏冒险的桥头堡。丘吉尔打算把由亲希特勒分子组成的政府强加给波兰人民。这些人侨居伦敦，并恬不知耻地自封为"波兰政府"，虽然他们同波兰人民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也丝毫不反映波兰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1944 年 1 月 11 日，苏联政府发表的关于苏波关系的声明中说："波兰流亡政府脱离波兰人民，没有能力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这个政府也

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斗争反对波兰本土上的德国侵略者。此外，它奉行的错误政策，常常对德国占领者有利。[①]

波兰工人党领导波兰人民在波兰本国同占领者进行了斗争。1944年1月1日，在这个党的倡议下成立了地下议会——人民代表议会，它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权力源泉，是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机构。1944年7月24日，波兰部分领土从占领者的铁蹄下获得解放后，人民代表议会决定成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解放区的临时执政机关。 302

苏军从波兰赶走了德国侵略者，使波兰人民从希特勒匪徒的压迫下获得解放（这个国家所受的压迫最为深重）。1944年7月，苏军追击希特勒军队进入波兰领土时，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苏联政府“不打算在波兰领土上建立自己的行政机关，并认为这是波兰人民的事情。有鉴于此，苏联政府决定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签订关于苏军司令部与波兰行政当局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议。”[②]

---

①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2卷，第61页。

②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2卷，第155页。

越接近苏军彻底解放波兰，伦敦波兰“政府”越加紧进行反苏阴谋活动。受英美主子多方鼓励的伦敦流亡政府的代理人在波兰成立了与秘密警察相配合的法西斯地下组织，其任务是与波兰游击运动和即将到来的苏军进行斗争。流亡伦敦的波兰集团害怕战后民主运动在波兰得到发展。丘吉尔的这帮傀儡们所想的是他们的大地产，而不是波兰人民的利益。

“大多数英美外交官在波兰问题上所持的反苏立场，在华沙战役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对“流亡伦敦的波兰人”的军事代表布尔—科马罗夫斯基极为同情，根据这位代表的倡议，华沙的武装力量不同红军配合行动便开始起义。华沙的悲剧充分暴露了伦敦波兰政府和英国统治集团的背叛行径。”① 华沙起义招致了重大牺牲。10月初，起义的领导人向占领者屈膝投降。“布尔终于向德国人投降，并有些令人莫解地回到伦敦，当时，响应他的号召进行起义，随后被他抛弃而忠于他的华沙人英勇地死于故城的废墟之中，或被

① 拉·帕克：《反和平的阴谋》，第70页。

德国人用毒气毒死在他们想摆脱追击的下水道里。"①

以拉凯维奇和索森科夫斯基为首的伦敦流亡 303 "政府"发布起义的命令，是因为它和丘吉尔一样，不打算让苏军和与苏军一起粉碎占领者的波兰爱国者的部队解放华沙。伦敦流亡集团想乘苏军赶走希特勒匪徒之机夺取华沙和在国内建立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

塔斯社 1944 年 8 月 13 日报道说："塔斯社获悉，应对华沙事件负责的流亡伦敦的波兰人士并未做任何尝试预先通知苏军司令部和得到苏军司令部的同意在华沙采取某种行动。因此，对华沙事件应负的责任，只能落在流亡伦敦的波兰人士身上。"②

梵蒂冈和英美天主教主教们站在伦敦波兰流亡"政府"一边，赞同它的计划。庇护十二世跟丘吉尔一样，害怕波兰人民获得胜利，并参与了在波兰建立反动制度的阴谋。因此，伦敦流亡人士

---

① P·德·儒维内尔：《叛徒国际》，国家外国书籍出版社，1949 年，第 111 页。

②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 2 卷，第 343 页。

炮制的华沙起义计划得到梵蒂冈的赞同是不足为奇的。波兰流亡"政府"的首领索森科夫斯基将军在起义前不久还在梵蒂冈。[①]当时，底特律(美国)刊印的工人报纸《人民之声报》[②]写道，索森科夫斯基从罗马一返回伦敦就发布了开始起义的命令，他在罗马曾从事反苏阴谋活动。庇护十二世所称赞的波兰反动派的行动，使得成千上万的波兰人民作了无谓的牺牲。教皇知道，华沙起义是和伦敦波兰流亡集团及其保护者的反苏计划有联系的。

华沙起义被梵蒂冈和英美天主教主教们利用来从事卑鄙的反苏活动。《罗马观察家报》刊登了一批关于苏军司令部在华沙起义问题上所持立场的诽谤性"材料"。教皇的这个机关报支持伦敦波兰流亡政客拚命扩散的每一诽谤。[③]

304 9月10日夜，教皇就华沙起义事件通过无线电广播对波兰发出呼吁。呼吁是向伦敦流亡"总

① 《工人日报》，伦敦，1944年8月11日。

② 《人民之声报》，1944年8月19日。

③ 《工人日报》，伦敦，1944年8月23日；《纽约时报》，1944年9月9日。

统”拉凯维奇发出的。拉凯维奇及其一伙最应对华沙事件负责；然而教皇不仅没有谴责他，反而向他致以“使徒的祝福”。① 教皇在自己的文告中因波兰与列强的关系处于“危急状态”而假惺惺地对波兰表示“同情”。②

在当时已被苏军从希特勒占领者统治下解放的波兰部分领土上，已有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临时执政机关在活动。教皇并未向这个真正代表波兰人民的机关呼吁，而是向拉凯维奇、索森科夫斯基“政府”，向一小撮反动的流亡政客呼吁他想把他们看作波兰政府。

教皇于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魁北克(加拿大)举行会议的前夕（9 月 11 日）发表讲话不是偶然的。正如报道所说，魁北克会议对欧洲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等问题作出了决议。③

当时，梵蒂冈以及英美天主教僧侣围绕波兰问题挑起的诽谤性的反苏运动，乃是英美统治集团旨在反对波兰人民根本利益和反对苏联的阴谋

---

① 《纽约时报》，1944 年 9 月 12 日。

② 《现代史料》，1944 年 11 月，第 423—424 页。

③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 2 卷，第 562 页。

的组成部分。

由于华沙起义而遭受《罗马观察家报》和天主教主教们无耻诽谤的苏军，为从希特勒侵略者铁蹄下解放波兰而作出了重大牺牲。在华沙起义期间，苏军司令部前去支援受伦敦流亡政府欺骗的起义者们。例如，9 月 12 日夜里，苏军司令部组织了支援起义者的军事行动。在这一行动中，有二百八十二架飞机参加空投粮食，用了十八万发子弹，一千二百个手榴弹和数百枝自动步枪。[1]

英美天主教教会与梵蒂冈互相配合，围绕波305 兰问题发动的猖獗一时的运动与波兰劳动人民的真正利益毫无共同之处，而是打算帮助波兰反动派在波兰恢复他们往昔的地位。工党首领们也参加了这一有利于希特勒德国的可耻运动。[2]

英国天主教教会人士反苏活动的性质，可根据远非完整的下述资料加以判断。

诺廷厄姆天主教会艾利斯主教于 1944 年 8 月发表宣言，谎话连篇地说什么似乎苏联“威胁着波兰的独立”。这位主教断言，似乎波兰人民亲手

①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 2 卷，第 559 页。

② 《工人日报》，伦敦，1944 年 8 月 30 日。

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是“破坏基督文明”。他一口咬定，似乎英国在1939年就已“举起利剑”保卫波兰的独立，[①]虽然举世周知，在战争前夕张伯伦同希特勒谈判大搞牺牲波兰的交易。

英格兰主教们也突然对波兰“燃烧起爱情”，他们就波兰问题发表了通篇挑衅性的反苏宣言。苏格兰天主教报刊也同时开始了反苏的诽谤运动。[②]伦敦的天主教报纸《教堂时报》也不甘落后。在契契斯特主教的参与下，《教堂时报》发表了荒谬的反苏谰言，其目的在于激起反苏的社会舆论，在同盟国之间打进一个楔子，扇起对苏联不信任之火，并以此缓解法西斯德国的困境。[③]

按照梵蒂冈的指示，就波兰问题而开展反苏运动的还有美国天主教主教们以及其他国家的天主教报刊和组织。加拿大天主教报刊散布了伪造文件，说什么似乎存在“使南北美洲苏维埃化的计划”。[④]

① 《工人日报》，伦敦，1944年8月22日。

② 《工人日报》，伦敦，1944年8月25、28、30日。

③ 《工人日报》，伦敦，1944年9月9、14、27日。

④ 《战争与工人阶级》，1944年9月1日，第18页。

这一反苏运动的组织者背后，有英美统治集团撑腰，天主教主教们攻击的整个调子和希特勒反苏宣传的调子完全吻合。①

306 从十月革命的最初时期开始，梵蒂冈就把波兰看作“防御布尔什维主义的防疫线”。整个帝国主义阵营的政策都是这样。梵蒂冈力求使这条“防疫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保存下来。因此，它支持想把波兰变成反苏的进攻基地的帝国主义分子的计划。梵蒂冈也支持一小撮波兰流亡分子在波兰边界问题上的反苏政策——与波兰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政策。1944 年 1 月 11 日，苏联政府发表的关于苏波关系的声明中说：“现在出现了波兰作为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复兴的可能性。但是波兰的复兴，不应借助于侵占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来实现，而应收复被德国人侵占的波兰固有领土。只有这样，才能在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各民族之间建立起信赖和友谊。”②

梵蒂冈支持由伦敦流亡“政府”代表其利益的

---

① 见《人民之声报》消息报道，1944 年 12 月 30 日。

②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 2 卷，第 60 页。

波兰地主、资本家侵占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土的要求，而且为了保存德国帝国主义，它还反对把波兰西部固有领土归还波兰。不便于教皇大声疾呼的事，就由他的代表——主教们公之于众。1944年10月，在美国举行了有在美国的所有天主教波兰教会参加的大会，会上爱德华·霍本（克利夫兰）主教发言，号召进行反苏“十字军远征”。他声称战后的波兰应成为“基督教文明在东方的堡垒”和在苏联领土上的“宗徒活动的精神上的动力站”。这个好战的美国主教进一步阐述了在苏联领土上传播天主教的计划，以便，如他所宣称的那样，“同唯物主义哲学作斗争”。美国银行老板的另一个奴仆——底特律主教在同一个大会上发言，也号召进行反苏“十字军远征”，他认为，这次进军应从波兰开始。[①]这样一来，教皇在美国的代表就泄露了梵蒂冈和一切帝国主义者暗中的计划：把波兰变成进攻苏联的桥头堡。他们盘算，他们可以用干涉者的刺刀把天主教带给苏联，实现战争初期梵蒂冈确实企图借助希特勒军队要实现的 307

① 《人民之声报》，底特律，1944年10月21日。

东西。

梵蒂冈的所有这些计划完全违背波兰人民的利益。波兰人民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同苏维埃国家结盟和友好的道路。

战争末期，梵蒂冈也突然对捷克斯洛伐克表示“爱情”。希特勒刽子手们在这个国家横行霸道的整个时期，梵蒂冈的主教们对有利于捷克独立、或反对法西斯匪徒在这个国家建立恐怖统治的话一次也没有讲过。

梵蒂冈拒绝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早在1944年3月4日，西多尔——斯洛伐克傀儡“政府”驻梵蒂冈大使写往布拉迪斯拉发的密信中说：“我和红衣主教马尔昂纳(梵蒂冈国务卿——俞英曼) 进行了长谈。我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打算得到宗座方面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承认，并打算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对此梵蒂冈的态度如何？红衣主教马尔昂纳回答说：“宗座不可能承认这种政府并同它建交。”①

直到1944年9月末，当苏军已经解放了捷克

① A·斯沃博达，A·图奇科娃，B·斯沃博达娃：《梵蒂冈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阴谋》，第113页。

斯洛伐克部分领土时，教皇才“想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他对罗马的捷克斯洛伐克侨民讲了话，提到捷克斯洛伐克是个富饶的国家，居住着勤劳的人民，十四世纪时布拉格是欧洲文化的中心等等。为了不使自己的同盟者——希特勒匪徒恼怒，庇护十二世甚至没有提占领者的压迫行将结束，而只是以外交词令宣布事态正如捷克斯洛伐克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并表示希望这个国家战后用“基督教义的精神”建设自己的生活。① 这里他所指的自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教皇担心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正在引导着这个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前进。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所有政党中”唯一的，不仅对向慕尼黑投降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政党，而且是一直同慕尼黑政策作斗争的唯一的力量。这个党是民族抵抗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和组织力量。战前的党员几乎有 308 一半为了人民的自由在同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中牺牲了。②

---

① 《中欧观察家》，1944年10月13日，№ 21。

② D·斯兰斯基：《全国解放以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活动》，载《1947年几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第180页。

梵蒂冈和占领者合作，同捷克斯洛伐克大规模的游击运动进行斗争。1950 年 4 月在布拉格对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的一批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教会人士的审讯查明，1944 年梵蒂冈派遣神学博士扬·马斯季尔克(毕业于罗马教皇的东方学院，该学院训练梵蒂冈派往东欧的特务）前往斯洛伐克在游击队中进行间谍活动。教皇的这位代表同德国司令部建立了联系，并向德国司令部出卖游击队①。为占领者效劳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的许多领导人。

梵蒂冈在他的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民主计划中，跟英美统治阶级一起，指靠着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天主教主教团和各天主教政党。天主教人民党所起的作用应当和法国人民共和运动、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比利时天主教社会党一样。人民党主席什拉梅克主教战时曾任伦敦捷克流亡政府总理；这个党的副主席加尔阁下曾参加内阁当部长。事实表明，天主教政党的首领们参加政府所追求的目的和人民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什拉梅

① 见《消息报》，1950 年 4 月 6 日。

克、加尔及其他人于1948年2月参与了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阴谋，其目的是复辟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并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英美帝国主义者的附庸。保存资产阶级反动制度的计划，早在战时就炮制出来了。

梵蒂冈与联合国

战争末期，宗座把美国看作战后欧洲的宪兵，看作他认为的能在全世界捍卫资本主义的力量。泰勒说，1944年夏秋两季，他同教皇讨论了战后生活中的所有重大问题；讨论时，教皇表示希望美国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给予意大利等国以援助，直到它们“建立稳定的政府”。① 如果注意到梵蒂冈不断进行反苏阴谋，那么教皇想同美国及“其他联合国成员国”一起参与建立“稳定的政府”的意愿首先是和英国有关。梵蒂冈所说的“稳定”政府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 309

美国统治集团这方面也同梵蒂冈进行了最广泛的合作，他们认为利用天主教会、天主教政党

① 《战时联系》，第104—106页。

和组织达到自己的目的和依靠他们推行自己的战后纲领是有利的。罗斯福在1944年8月3日的信中指令泰勒向教皇转达，他希望同教皇进行尽可能广泛的合作。[①]

泰勒说，他同教皇会谈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战后建立保持和平的国际组织。[②]恰好这时（1944年8、9月间）英美苏在敦巴顿橡园（美国）举行了"关于建立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的基本问题的预备性非正式会谈"。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公报说，"会谈是有益的，并就说明组织的共同计划问题，尤其是在有关维持和平和安全必需设立的机构问题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协议。"[③]

经过非正式会谈制定了关于建立以"联合国"为名的国际安全组织的初步提案。这些提案应当成为联合国大会讨论的基础。

泰勒在谈到他1944年夏秋同教皇会谈讨论战后国际合作组织机构问题时，虽未详谈细节，

① 《战时联系》，第113页。

② 《战时联系》，第104页。

③ 《苏联的对外战策》，第2卷，第237页。

但却声称教皇的观点同美国的计划完全符合。①

泰勒在他关于这些会谈的记述中，并没有谈 310 过梵蒂冈希望加入联合国。美国前国务卿赫尔在回忆录中写过这件事。他说，1944年10月，泰勒曾长时间地谒见教皇。教皇提出了梵蒂冈加入联合国的可能性问题，并询问说，象梵蒂冈这样的国家，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才得以加入联合国。赫尔写道，美国政府并不认为劝说梵蒂冈加入联合国是适宜的，似乎是因为这个国家太小，一旦需要时，不能用武力来维持和平。②

美国政府没有建议梵蒂冈加入联合国的理由未必在此。梵蒂冈加入联合国的尝试准会引起全世界公众舆论的反对，因为梵蒂冈在战时的亲希特勒立场，对公众舆论来说并非秘密。这样做也无助于提高宗座的威信。而且美国统治集团对梵蒂冈这个政治工具所需要的，首先不是它在联合国里投的一票（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的票数早已足够了），而是一个“道义上的”、表面上“中立的”组织，因为它对亿万信徒具有影响并善于利用

① 见《战时联系》，第104页。

② 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711—1712页。

这种影响达到亲美的政治目的。

早在战时，美国统治阶级制订战后计划时，就打算借梵蒂冈之助同民主阵营进行斗争。他们认为重要的是使亿万人相信梵蒂冈置身于“政治之外”，所关心的只是宗教事务而已。教皇国一旦加入联合国，很快就会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它是最反动的、反民主的和帝国主义政策拥护者的真相。

基于这些理由，美国统治集团才会认为梵蒂冈加入联合国是不适宜的。

天主教主教们反对克里木会议决议

1944 年 12 月 24 日，教皇对红衣主教团发表了有关战后体制问题的圣诞节文告。这次他不仅充当了德国法西斯制度和各国反动派的维护者，而且还教训人类战后和平应怎样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这些教训恰好表明这个教会头子对民主充满了何等的深仇大恨。教皇再次坚决要求尽快地使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得到“温和的和平”。庇护十二世所拥护的“温和的和平”是法西斯罪犯的救星。在这一文告中，教皇表示反对同盟

国惩办战犯的决定。

《真理报》在评论教皇的圣诞节文告时写道：

“众所周知，希特勒匪徒是有朋友和保护人的。这些替他们的卑鄙勾当说项之徒，竭力影响软心肠的庸人的理智和感情，只要看一下某些美国报纸如何巧妙地利用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圣诞节文告就够了……。这份文告显然是打算诱使信徒的思想离开有关战争与和平这些根本问题的正确决定。实质上，这个文告是教皇长期以来所奉行的路线的继续，这条路线，正如外国报刊曾多次指出的那样，企图保护德国法西斯分子，替他们开脱罪责……梵蒂冈所说的公正的和平是什么，被反动的美国报刊说破了。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圣诞节文告被用于其直接目的：亲法西斯分子妄图利用教会的威信掩护希特勒分子的暴行，以达到帮助他们推卸罪责的目的。”①

“在这一长篇大论的文告中”，《真理报》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找不到片语只字涉及希特勒强盗骇人听闻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罪行。对这个使

① 《真理报》，1945年1月7日。

亿万人焦虑不安的问题，教皇庇护十二世并不认为他本人应该那怕写上两句话。教皇对意大利法西斯匪帮及其头子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没有片语只字的谴责。当然，这并不是由于教皇庇护十二世健忘，而是由于教皇庇护十二世既定的政策和固有的同情。"①

庇护十二世在圣诞节文告中还阐明了他关于战后体制的纲领。这一纲领实质上与最反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纲领完全一致。庇护十二世的纲领旨在反对民主阵营。

312 教皇由于担心人民群众解放运动的成长壮大，坚持在解决战后问题时，要把"民族"和"民众"区别开来。他重复着法西斯吃人生番的种族主义呓语，教训人说："民族"乃是"精神素质卓越，性格坚强的优秀人物集群，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全民族的代表，而不是群氓的全权代表。"

法西斯分子宣传"优秀集群"统治人民群众的奴隶占有制的理论，污蔑群众为群氓愚民。1944年12月，当希特勒匪徒的末日即将到来的时候，

① 《真理报》，1944年12月31日。

教皇拣起了这种法西斯"理论"，作为他的"战后世界体制纲领"的基础。教皇声称，群众是某种"不定型的"东西，是"任意利用群众的本能和感觉的人手中的轻巧玩物。"根据教皇的论点来看，"群众"是民主制度的敌人，他们"倾向于破坏社会秩序。"

教皇对人民群众，对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劳动人民就是这样进行诽谤的。

庇护十二世的圣诞节文告的出笼，与往常一样，是由于害怕民主阵营力量的增长和对苏联的仇恨。这是一份向资产阶级发出的呼吁书，号召在战后建立"优秀集群"的统治，并向另一个"优秀集群"——法西斯强盗伸出和解之手。教皇在自己的文告中特别称赞始终是希特勒盟友的西班牙和阿根廷的法西斯执政者，绝非偶然。

教皇的文告被所有天主教主教们理解为开始宣传"和解"与"宽恕"的信号。而且因为苏联一贯奉行民主的、反法西斯政策妨碍了同希特勒罪犯"和解"，又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人领导的整个民主阵营和苏联一起坚决抵制了同希特勒匪帮的勾结，所以天主教主教们便按照梵蒂冈的指示，变本加厉地掀起了反苏反共运动。

正当苏维埃国家给自己提出要在法西斯的巢穴中打死这头法西斯野兽的任务之际，天主教主教们掀起的反苏反共运动，旨在拯救这头野兽。梵蒂冈和所有天主教主教们顽固地进行反苏反共313宣传，其目的也是要削弱信奉天主教的劳动群众和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阻挠他们为在战后欧洲各国建立民主制度而进行的斗争。

天主教主教们攻击苏联和共产主义时，一字不变地重复着戈培尔的话，后者企图在这头法西斯野兽临断气前，在同盟国之间打进一个楔子，燃起对苏联的仇视。1945 年 1 月，戈培尔在《国家》杂志上发表文章。这篇文章通过无线电专门对美国进行了广播。戈培尔吓唬美国资产阶级说，苏军向西方推进是“对文明的危害”。[1]

梵蒂冈和各同盟国教会的主教们的讲话，贯穿着戈培尔的精神。1945 年 1 月 2 日，《罗马观察家报》曾提到梵蒂冈依然敌视共产主义。1 月 18 日，墨西哥天主教主教们发表了告信徒书，其中被迫承认俄国人民对粉碎法西斯野兽所起的巨大

---

① 《工人日报》，纽约，1945 年 1 月 27 日。

作用。可是又迫不及待地补充说："这并不能使我们目眩眼花，看不见世界革命的危险。"①

早在希特勒匪徒彻底覆灭的前夕，以梵蒂冈为首的天主教主教们便妄图向美英政府讨价还价，同希特勒达成对希特勒德国来说条件温和的协定，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害怕民主阵营的胜利是其主要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梵蒂冈不仅与希特勒和戈培尔完全合拍，而且与丘吉尔和美国权势集团也完全一致。英国大资产阶级喉舌、伦敦《经济学家》在新年号中反映出对苏军迅速推进的恐惧，建议放弃让德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和不要彻底消灭德国法西斯主义，而是遵循"和解政策"。②当时，西班牙法西斯报刊也建议"缔结不分胜负的和约"，③而佛朗哥却偷偷建议丘吉尔建立反苏"神圣同盟"。④

---

① 转引自查理·多伊尔：《教皇庇护十二世生平》，第208页。

② 见《真理报》，1945年2月3日。

③ 见《真理报》，1945年1月15日。

④ 见《真理报》，1949年4月8日。

综上所述，庇护十二世的政治方针到1944年年底还是帝国主义阵营最反动势力的方针。

进步的美国政论作家斯蒂尔写道，美国反动报刊掀起的运动和罗马主教们关于“以基督公正对待战败民族”的文告，都是符合德国政府的阴险计划的。[①] 教皇在这方面的行动是和希特勒军事司令部配合默契的，而且打算在最后时刻也要拯救行将灭亡的希特勒制度。

314

教皇号召同希特勒罪犯“和解”，遭到了世界各国民主人士的一致驳斥。美国共产党报纸写道，教皇所赞成的“温和的媾和”乃是“和平的代用品”。该报写道，我们深信，无论是欧洲各国人民，无论是美国人民群众，无论是大多数天主教徒，都不会接受教皇提出的，对法西斯强盗来说是“温和的媾和条件”的要求。[②]

非天主教教会也纷纷抗议教皇的立场。1945年1月末，美国非天主教教会的僧侣的一千六百多名代表公开发表宣言，抗议梵蒂冈干涉国际事务。宣言批评了梵蒂冈的亲法西斯政策，批评了

---

① 见U·斯蒂尔：《保卫和平》，第28页。

② 见《工人日报》，纽约，1944年12月27日。

它同墨索里尼、希特勒、佛朗哥、贝当以及其他法西斯执政者的结盟，指出时至今日，梵蒂冈依然站在民主敌人一边。① 东正教独立教会的代表也发表"告世界各国人民书"，抗议梵蒂冈拯救希特勒匪徒的政策。②

梵蒂冈和所有天主教主教们还掀起了反对苏美英三同盟国首脑克里木会议决议的运动，这完全是为了达到其拯救德国和其他各国反动制度的目的。克里木会议"曾经通过有关战胜德国和德国战后地位问题的极为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决议，以及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基本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决议。曾经就盟国军队从东边、西边、南边和北边对德国进行新的强有力打击的时间、规模和协作取得完全同意，并详细拟定了计划。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了苏联日后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③

会议重申，同盟国原来关于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决议是正确的。与会的三国首脑在声明中说：315

① 见《真理报》，1945年2月3日。

② 《真理报》，1945年2月10日。

③ 《斯大林传略》，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7年，第215页。

"我们已就强行实施无条件投降的措施方面的共同政策与计划商得同意，在德国武装抵抗被彻底击溃后，我们将共同将这些措施书面通知纳粹德国。"① 会议重申，同盟国将为消灭纳粹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而进行斗争。三国首脑在声明中说："我们不屈不挠的宗旨，就是要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要确保德国永无能力再破坏世界和平。"②

克里木会议决定建立一个广泛的国际组织，以维持和平与安全，决定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以便依照在敦巴顿橡园非正式会议中拟定的方针准备这一组织的宪章。"③

三国首脑在克里木会议上签署了"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在宣言中声明说，他们"相互商得同意，在被解放的欧洲暂时不稳定的时期中，在援助从纳粹德国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以及援助欧洲前轴心附庸国人民用民主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上，三国政府的政

①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3卷，第102页。
②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3卷，第102—103页。
③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3卷，第104页。

策将进行协调。"①

会议通过了关于波兰问题的专门决议。关于这个问题的协议说："在波兰，由于它已被红军完全解放，产生了一种新的形势。这就要求建立一个比波兰西部最近解放以前可能建立的基础更广泛的波兰临时政府。"②

会议决定，"波兰的东部边界，应依寇松线为准，但在某些地区应作出对波兰有利的五公里到八公里的偏离。三国首脑确认，波兰必须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领土。"③ 316

这些决议象克里木会议所有的其他决议一样，打乱了苏联敌人的计划，这些敌人指望能在同盟国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并拯救希特勒德国。

他们的计划之被打乱，首先是由于苏军的最伟大的胜利。苏军在当时"不仅从希特勒魔掌中解放了祖国大地，而且还从德寇强盗般地进犯我国的那些边界，把敌人驱逐到数百公里以外，使战争转移到德国本土上去，而且目前正协同盟军

①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105页。

②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3卷，第106页。

③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3卷，第107页。

顺利地完成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大业。"①

"我们冬季攻势的胜利的结果"，斯大林同志1945年2月23日发布命令说，"首先就是它打破了德寇在西方以夺取比利时和阿尔萨斯为目标的冬季攻势，并使我盟军有可能主动转向德寇进攻，从而把他们在西方的进攻与红军在东方的进攻接合起来。"②

1945年2月中旬，"红军彻底解放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很大一部分领土，占领了布达佩斯，使德国在欧洲的最后一个同盟国——匈牙利退出战场，占领了东普鲁士和德属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土地，并为自己打开了进入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以及通向柏林门户的道路。"③

克里木会议决议使人民群众和全体进步人士欢欣鼓舞。但民主制度的敌人，首先是美英反动的权势集团则对会议的决议怀着明显的仇恨。梵蒂冈和他们是一丘之貉。梵蒂冈伙同美英天主教

---

① 《最高统帅苏联元帅斯大林1945年2月23日命令》，载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77—178页。

②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78页。

③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79页。

主教们展开了疯狂的宣传，反对克里木会议决议。《罗马观察家报》为了维护德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利益，出而反对会议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决议。民主制度的敌人用似乎克里木会议决议“不民主”的 317 说法来掩盖他们的真实目的。《罗马观察家报》报道克里木会议宣言时写道，它“违反平等和合作的各项原则。”①

还在不久以前，教皇在1944年的圣诞节文告中，曾挖空心思地诽谤民主制度。而现在呢，梵蒂冈的头头们则以耶稣会士固有的伪善充当“热心于民主制度”的角色。实际上，会议关于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决议，关于从希特勒占领下解放的欧洲各国的民主体制问题的决议以及关于建立一个“强大、自由、独立和民主波兰”的决议等等，都使他们惊恐万状。苏联在决定欧洲战后体制问题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使他们尤其惊恐不安。

依照梵蒂冈的指示，美英天主教主教们出面反对克里木会议的各项决议。跟他们一起大哭大叫的有法西斯主义的所有拥护者和苏联不可调和

---

① 转引自《新时代》杂志1945年第3期（总13期）；亦见《新民主主义》月刊，1949年9月，第466—467页。

的敌人，诸如胡佛、林白、赫斯特、“社会党人”诺尔曼·托马斯、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德国右翼“社会党人”等等。后者在美国公布了反对克里木会议决议的宣言。他们的宣言证明，德国右翼社会党人想复兴侵略成性的德国。[①] 伙同所有反动势力叫嚷的还有美国天主教主教们。美国的大主教和主教们抛出了一纸旨在反对克里木会议各项决议的特别文告，这份文告渗透着对苏联的仇恨之情和充满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毒诽谤。美国银行大亨的这群走狗和法西斯主义的盟友打着“维护弱小民族权利”的幌子，攻击关于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决议；漫天撒谎要人们相信似乎法西斯主义“已经毁灭”。他们变本加厉地拚命要在大国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并按照梵蒂冈的指示扬言反对会议决议，特别是关于波兰的决议。[②]

英国的天主教报刊同样也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反苏宣传，并表示赞成同德国签订“宽容的”和约。

---

① 见《工人报》，纽约，1945年4月8日。

② 见《工人日报》，纽约，1945年3月5日，15日，4月17日；《工人报》，纽约，1945年4月22日；《民族》，1945年4月21日。

英国天主教僧侣的头子格里芬大主教攻击了克里318木会议有关波兰的决议。这位教会公爵反映了英国统治集团的观点，对会议决定波兰东部边界走向应沿着寇松线一点表示不满。格里芬妄图在波兰人中间点燃起对苏联的仇恨。他希望在波兰仍旧恢复地主的统治，使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仍然处于他们的统辖之下。①

攻击克里木会议决议的还有苏格兰天主教的主教们，他们对反动的波兰侨民表示同情，并且也希望在波兰复辟地主政权。② 梵蒂冈在英美的代理人，如同教皇一样，也装作"波兰之友"。实际上，他们推行的是英美资产阶级的政治方针，英美资产阶级希望变波兰为自己的附庸国和反苏阴谋的工具。

1945 年 1 月 17 日，苏军解放华沙。

正当苏军肃清波兰领土上的占领者的时候，《罗马观察家报》刊登了诽谤性的反苏文章，出面维护伦敦波兰侨民的反动的亲法西斯集团的利

① 见《消息报》，1945 年 3 月 10 日；《工人日报》，伦敦，1945 年 3 月 20 日。

② 见《世界新闻与展望》，伦敦，1945 年 4 月 21 日。

益。[1] 在美国，波兰天主教僧侣的代表和所有美国主教一起，也进行了卑鄙的诽谤性的反苏运动，并攻击克里木会议的决议。[2]

梵蒂冈和所有美英天主教主教们对苏军解放波兰人民并不感到高兴。还有波兰僧侣在德寇占领时期所遭受的迫害同时宣告结束一事也使他们颇不高兴。天主教卢布林教区的领导人于1945年1月告侨居美国的波兰人书中说，在希特勒匪徒统治时期，曾有百分之八十的波兰天主教僧侣被赶出教区，许多神职人员被投入集中营和被杀害。仅仅卢布林这一教区内就有六十七名神父被杀害和八十左右名神父被遣送到集中营，其中大多数都死于集中营。卢布林教区领导宣布说，苏军一解放波兰，宗教就恢复了充分的自由，而遭占领者破坏的卢布林天主教大学，也在赶走德寇之后，319 立即修复了。[3]

波兹南主教和波兰天主教会的其他代表都发表声明说，在解放后的波兰宗教是自由的。当时

---

① 见《消息报》，1945年3月30日。

② 见《人民之声报》，底特律，1945年2月24日。

③ 见《工人日报》，纽约，1945年2月1日。

《纽约时报》记者也报道说，在从希特勒匪徒统治下解放的波兰，政府很关心教会的需要，教会组织获得了充分的自由，进行土地改革时，教会的地产原封未动。① 然而这也使梵蒂冈和天主教的主教们感到不愉快，因为他们奉行英美反动集团反对苏联与波兰根本利益的政策。

梵蒂冈对待克里木会议各项决议的敌对立场，再次向全世界表明，天主教主教们将一如既往，疯狂地反对战后欧洲的民主体制；它将千方百计地阻挠各大国在实现共同决议方面进行合作；梵蒂冈政策的主要目的依然是同民主和苏联作斗争。

梵蒂冈哀悼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灭亡

1945年4月27日，苏联最高统帅约·维·斯大林在告红军和各盟军书中写道："……在欧洲进行解放战争的各同盟国战无不胜的军队……击溃了德军，并在德国境内会师了。我们的任务和

① 见《工人报》报道，纽约，1945年2月4日。

职责，就是要彻底歼灭敌人，迫使它缴械，并无条件投降。红军在我国人民和一切爱好自由的各族人民面前所担负的这个任务与职责，一定能彻底完成。"[①]

苏军越接近柏林，英美的反动派就越起劲地叫嚷要有"基督的慈悲之心"，并企图即或是到了最后一分钟也要拯救法西斯制度。《消息报》写道："目前，英国天主教报刊尤其焦躁不安，它担心对希特勒刽子手进行报复，它现在所关心的，320 主要是建立'友好德国'的'问题'。"[②] 英国天主教僧侣替希特勒匪徒的命运担忧。天主教报刊要求对希特勒匪徒"宽大为怀"，因为，据说他们在军事罪行方面都是无辜的。[③]

3月18日，教皇对聚集在罗马圣彼得广场的民众发表演说，他一口咬定，受暴力、种族和血统思想"诱惑的"人们，亦即法西斯分子开始"迷途知返"。教皇劝导这些"迷途羔羊"放弃"极端的民族主义"，尽快回复"普及众生的基督博爱精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86页。

② 《消息报》，1945年1月26日。

③ 《消息报》，1945年3月22日。

神”。[1] 教皇想欺骗千百万天主教徒。教皇建议在缔结和约时，不应当“从已形成的局势中得到好处”，因为这样做不公正。他要求对罪犯“慈悲为怀”。庇护十二世所拥护的对待法西斯罪犯应采取的“宽恕一切”和“公正”的原则，无论与真正的公正,还是与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毫无共同之处。

梵蒂冈始终顽固地奉行拯救法西斯主义的方针。4月3日,《罗马观察家报》号召,“为了上帝结束流血事件”；号召“停战”。[2] 而颇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那个时候，丘吉尔建议美国统治集团接受希姆莱关于德军向英美投降和继续同苏联作战的建议。[3] 由此可见，1945年4月，庇护十二世就成了希姆莱和丘吉尔的喉舌，来呼吁与希特勒匪徒媾和。

依照梵蒂冈的指示，美英天主教主教们和报刊也呼吁“宽恕”法西斯德国的罪行。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天主教主教们在1945年2月22日的声明中写道：“惩罚性的和约会给得胜的国家

---

① 《国际新闻简报》，伦敦，1945年3月31日，第7期。

② 《国际新闻简报》，伦敦，1945年4月14日，第8期。

③ 见《新时代》，1951年，第7期，第30页。

带来害处。”

梵蒂冈和主教们要拚命拯救的不仅是希特勒及其集团。他们还施展一切手段，要从各国人民的怒潮中拯救那些在被占领国家与法西斯合作的人；而他们是进行大规模杀人的凶手。

法国红衣主教和大主教会议于1945年2月28日向人民呼吁“民族和解”。他们要求劳动人民对“我们的弟兄”“放弃不公正的或夸大的控诉”。所说的“弟兄”正是那些曾为秘密警察效劳、残杀了许多法国爱国者，并伙同占领者一起摧残法国人民的家伙。现在，这帮红衣主教和大主教知道人民要向这些罪犯讨还血债了，竟然出来袒护凶手。可是，当希特勒的法国仆从们残杀法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时，这帮主教们在哪里呢？当时，这帮红衣主教和主教们是和贝当及凶手们在一起的。

321

意大利的天主教主教们也同梵蒂冈一起，使出浑身解数掩护墨索里尼匪帮罪犯逃避正义审判。

公然袒护法西斯罪犯有可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因此，希特勒匪徒的保护人认为，扮演热心于“道义上的公正原则”，“基督的博爱、宽

恕一切和爱的原则"的角色对自己较为有利。

希特勒的美英朋友，苏联的仇敌写道，与法西斯德国达成协议比与苏联合作为佳。① 他们不仅要求给希特勒德国"温和的和平"，而且还进行宣传，反对大国合作和联合国组织的各项原则。梵蒂冈所持的立场也是这样。1945 年 4 月末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之际，天主教报刊出面反对联合国宪章。它们和所有亲希特勒分子一起发动攻击，反对在决定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等重大问题时五大国一致的原则。

和平的敌人用"民主的"口号和"关心弱小民族"的假面具来掩盖他们反对联合国宪章的行动。莫洛托夫于 1945 年 4 月 26 日在旧金山会议上发表演说，揭露这些和平与国际合作的敌人时指出，反对建立有活动能力的、保卫普遍和平与各国人民安全的有效能的机构的人们"就是目前还在进行他们的破坏工作，尽管他们多半是偷偷摸摸、遮遮盖盖的。为此，他们往往利用从表面看来是最民主的口号和理由，直到口头保卫弱小民族利

---

① 见《工人日报》，纽约，1945 年 4 月 27 日有关文章。

益或公正与各民族权利平等的原则。"①

在决定重大问题时，五大国一致原则对和平事业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而且完全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

322　梵蒂冈和所有天主教主教们对联合国宪章的攻击，同样是用民主口号——"大小民族一律平等"来掩饰的。美国大主教和主教们针对旧金山会议发表的旨在反对国际合作的宣言，也是上行下效，如法炮制的，正如《民族》杂志所说，"自始至终贯穿着不可调和的反俄精神。"②

反对旧金山会议关于国际合作和建立联合国等决议的还有始终忠于希特勒制度的德国主教们。《芝加哥太阳报》驻德记者报道说，旧金山会议之后的第二天，德国教会就举行了布道演说，反对联合国决议。③

天主教主教们及其报刊，在旧金山会议期间，开展运动为梵蒂冈在联合国内争取一个席位。他们吹捧教皇在"调整国际合作方面"的"功

---

① 莫洛托夫：《对外政策问题》，第15页。

② 《民族》，1945年4月21日，第6期，第431页。

③ 见《新民主主义》月刊，1949年9月，第466页。

绩",[1]而一向以敌视民主为特点的梵蒂冈报刊，也开始说天主教会是欧洲"民主最可靠的支柱"。[2]

梵蒂冈与美英天主教主教们有利于希特勒匪徒和反对建立有效能的联合国组织的积极行动与猖狂的反苏反共运动有着极密切的联系。当苏军在希特勒匪徒的老巢彻底击溃他们，使战争宣告结束之时，梵蒂冈和它在各同盟国内的走狗，用卑鄙的反苏反共的诽谤毒化气氛。

1945 年 4 月 29 日，庇护十二世接见意大利"天主教行动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时声称，任何一个天主教徒都不该接受教会所谴责的社会理论。[3] 这个声明的目的就是鼓动天主教徒反对共产党人，尤其在意大利，因为在那里许多天主教徒，包括神父在内，都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游击运动。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针对教会权贵们的反共活动而发表声明说："我们知道，有许多神父真正懂得必须改变意大利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在北方有神父和游击队员们并肩同敌 323

① 《新时代》，1945 年，№，3，第 7 页。

② 《真理报》，1945 年 4 月 11 日。

③ 见《现代史料》，1945 年 6 月，第 553 页。

人作战……，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在教会机构内部有些保守的反动分子公开反对我们。”“教会当局参与反共恐怖活动”，陶里亚蒂继续说，“主要不是反对意识形态，而是反对共产党。”①

梵蒂冈开动了全部宗教恐怖机器，阻挠天主教徒同民主阵营合作。2月底，教皇命令主教们劝导天主教徒选民，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他们只应当投票选举教会能接受的那些候选人。②天主教主教们对信徒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按照梵蒂冈和站在背后为它撑腰的反动势力的计谋行事。

为了转移视线，为了欺骗信徒们，使之不了解自己的真正计谋，梵蒂冈象它以往常常干的那样，乞灵于社会蛊惑。战争结束前夕，庇护十二世在他的讲话中一口咬定他是“无产者的朋友”；是他们利益的“维护者”。教皇对意大利工人基督教协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发表讲话，保证他将支持工人的事业，似乎天主教会是劳动人民利益的“唯一保护者”。纽约《民族》杂志评论教皇这次讲

① 《真理报》，1945年4月12日。

② 见《国际大事年表与文献》，1945年，第5期，第117页。

话时写道，现在教皇的法西斯朋友们已被打倒，如果“他的每篇新的星期六讲话比过去的更激进些”并不足为奇，而且教皇依然是“国际反动派的大头目之一”。①

梵蒂冈连在战争最后阶段的政策，也是取决于他对苏联和民主的仇恨。美英统治集团对宗座政策的这种方针有不小的影响，梵蒂冈同美英统治集团的联系到战争末期变得更加密切了。早在1945年1月末，美国总统的代表哈里·霍普金斯访问了教皇，3月份爱德华·弗林又访问了教皇。

全人类都在欢庆粉碎法西斯德国的胜利。

1945年5月9日，斯大林同志在告人民书中说：“战胜德国这一伟大胜利日到来了。法西斯德 324 国已向红军和我盟国军队屈膝承认自己败北，并宣布无条件投降……，现在我们有充分的根据声明，彻底粉碎德国的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来到了，我国人民战胜德国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日来到了。”②

只有视利润和统治人民的权力重于一切的反

---

① 《民族》，1945年3月23日，第318页。

②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92—193页。

动资产阶级，只有产生法西斯主义和使希特勒、墨索里尼、贝当以及其他罪犯们上台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只有这个反动阶级听到希特勒德国败北的消息才怀恨在心。这个反动阶级害怕苏联领导的民主阵营得到巩固。

以梵蒂冈为首的天主教主教们也是满怀愤恨对待这一消息的。葡萄牙萨拉查法西斯天主教政府宣布为希特勒之死志哀。[①] 5 月 4 日，里斯本各教堂作祈祷追荐希特勒亡灵。5 月 5 日又追荐墨索里尼亡灵。[②]教会的这些追悼性的祈祷，具有公开的法西斯示威性质。

法西斯罪犯的西班牙朋友也痛悼他们。1945 年 5 月 2 日，西班牙《消息报》写道："天主教会之子"希特勒似乎是为"拯救耶稣教"而死，上帝会给这个罪犯加上"殉教的光圈"[③] 庇护十二世和他周围的人们若不是怕引起各国人民愤怒的话，他们定会宣布希特勒强盗为"神圣的殉教者"，就象希特勒的西班牙法西斯天主教朋友急急忙忙干的那

① 见《新时代》，1945 年，第 1 期，第 19 页。

② 见《战争与工人阶级》，1945年第 10 期，第 20 页。

③ R·加罗迪：《教会、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徒》，第 135 页。

样。

这个时期笼罩梵蒂冈的情绪如何，可以根据合众社 5 月 2 日从罗马发出的报道加以判断。报道说，此间认为，教皇通过他的驻德圣使对希特勒之死表示正式哀悼慰问。① 梵蒂冈对意大利人民法庭处决另一个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极端不满。纽约《工人日报》写道，梵蒂冈是“唯一敢于公开对墨索里尼被法庭处以绞死而痛悼的政治组织。”②

5 月 9 日胜利日，教皇通过无线电广播发表 325 了告全世界书。他号召在“公正”的基础上结束对日战争，打算以此保存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反动制度不受触动。教皇谈到欧洲局势时，表示希望在“唯上帝之命是从和听凭上帝吩咐”的基础上建立和平。③ 又因为教皇自封为“上帝意志”的解释者和表达者，所以他的希望也就意味着战后和平应

---

① 见《工人日报》，纽约，1945 年 5 月 3 日报道。

② 《工人日报》，纽约，1945 年 5 月 1 日。墨索里尼被处决五周年时，罗马圣奥古斯丁教堂曾为这个强盗作弥撒。(《世界舞台》，柏林，1950 年 5 月 31 日。)

③ 《国际新闻简报》，1945 年 5 月 26 日，第 11 期

建立在教廷所捍卫的那些反动原则基础之上。

这一次，教皇对法西斯罪犯也没有谴责一句，反而号召人们“慈悲为怀”。直到过了一个月之后，庇护十二世在1945年6月2日对红衣主教团的讲话中，才自整个战争时期以来破天荒第一次谈到了“撒旦的国家社会主义”在波兰和德国杀害了数千名天主教神父。而关于希特勒匪徒的其他所有罪行，关于他们毁灭的千百万人生命，就连这次讲话，教皇也一如既往，闭口不谈。但是，就在这次讲话中，当庇护十二世终于决定该对希特勒匪徒残杀神父和破坏家庭谴责几句的时候，他还一再诽谤由法西斯奴役下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因为他们正在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①

战争结束后，庇护十二世在梵蒂冈窝藏了许多战犯，掩护他们逃避各国人民法庭的审判。意大利、南斯拉夫、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战犯都在梵蒂冈找到了避难所。在东方战线活动的西班牙法西斯匪徒的所谓“蓝色

① 《国际新闻简报》，1945年6月9日，第12期。

师团”的部分残余也隐匿在梵蒂冈。梵蒂冈形形色色的“慈善”机构逐渐把所有这些强盗都运到南美各国去。

梵蒂冈直到最后仍然忠于他的法西斯盟友。

326

第七章　梵蒂冈反人民的战后政策

结　　论

梵蒂冈决定他的战后政策，与决定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及战前政策的原由是一样的。

近百年来，罗马教廷的一切活动，都充满了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仇恨。为“驱除”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如19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结成了“神圣同盟”。①

俄国革命后，决定梵蒂冈全部反动政策的是，它仇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恐惧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全世界掀起的巨大革命运动

①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第23页。

高潮。对苏维埃国家的恨和对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怕，使梵蒂冈变成了法西斯的盟友。梵蒂冈的主教们把建立恐怖的资产阶级专政看作拯救帝国主义的法宝。因此，梵蒂冈便与墨索里尼、希特勒、佛朗哥和一切丧心病狂的反动派（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结成了同盟。

对苏联和整个民主阵营的仇恨使梵蒂冈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轴心国的盟友。梵蒂冈的主教们指望，法西斯刽子手能够血洗工人运动，消灭全世界反动派所仇恨的和平民主堡垒、全体进 327 步人类的希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一切非天主教教会绝不相容的梵蒂冈，指望利用希特勒强盗的胜利在苏联传布天主教，于是便迫不及待地与希特勒政府缔结了协定，允许它的代理人在被德寇占领的苏联领土上与德寇合作。梵蒂冈为帮助占领者奴役苏联各族人民而建立了进行“传教活动”，即特务破坏活动的专门机构。

梵蒂冈支持法西斯强盗的欧洲“新秩序”，被占领国的天主教主教们则遵循梵蒂冈的方针去迎合“新秩序”。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与占领者合作，出卖本国人民的利益。

既然梵蒂冈与希特勒匪邦结成了反对欧洲各国人民的同盟，它就不可能反对法西斯匪徒在占领国中的罪行。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欧洲大战结束后不久，1945年6月10日，《罗马观察家报》对教皇在战争时期对法西斯罪行保持缄默作了如下的解释：教皇，这家报纸写道，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他“是远远近近所有牺牲者和肇事者的父亲。”① 梵蒂冈半官方刊物的这种“解释”，甚至在忠于罗马教廷的天主教界，也只能加深对梵蒂冈政策的不满，并激起广大民主群众的义愤。

考虑到这一点，教皇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1945年11月庇护十二世与法国《巴黎晨报》记者谈话时，后者对梵蒂冈既不反对希特勒匪邦的罪行，也不给予千千万万被法西斯占领者从欧洲各国强行运往德国做奴隶的人们任何援助表示惊讶，教皇回答，他知道这些迫害活动，“但是”，教皇补充说，“我们不了解”这些迫害活动“惨无人道的性质”。他保证说，梵蒂冈仅仅在战后才了解事情的真相。②

---

① 转引自《新时代》杂志，1945年第2期，第20页。

② 《每日镜报》，柏林，1945年11月14日。

实际上，梵蒂冈对欧洲被占领国和德国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的消息不仅来自教会，而且还来 328 自苏联的报刊和广播，因为在苏联政府屡次公开发表和广播的照会和抗议书中，援引了极其详尽的、揭露法西斯在苏联被占领地区所犯罪行的资料。梵蒂冈还从同盟国在战争时期公开发表和广播的大批文件中，非常清楚地了解到占领者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国家中所犯的罪行。因此，教皇企图以“不十分了解情况”为理由来解释他对希特勒分子罪行的缄默政策是说服不了任何人的。教皇关于调查德国集中营以便查清集中营里天主教神父的遭遇的命令（1945 年 6 月）也欺骗不了任何人。① 在德国集中营里有千百万人惨遭杀害。战后引起教皇注意的不是这千百万人的遭遇，而仅仅是其中天主教神父的遭遇。在这些集中营里，天主教神父和大批“世俗人”及其他宗教的教士一起受折磨，相继死亡，他们往往是被那些给占领者效劳的天主教主教们出卖给秘密警察的。

---

① 《德意志人民报》，柏林，1945 年 6 月 26 日。

梵蒂冈的天主教主教们在战争时期不愿意公开抗议法西斯占领者的罪行，因为一致的目标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至多认为这些罪行是“不可避免的灾难”，在梵蒂冈的统治者们看来，由于希特勒匪徒旨在扼杀欧洲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消灭苏联，那么，这种灾难就无可非议了。

梵蒂冈方针的转变，前已指出，发生于斯大林格勒大战击溃德军之后，德国败局已定。那时，梵蒂冈坚决转向美国和英国方面，但是仍坚持不渝地忠于自己的法西斯盟国。

梵蒂冈方针的改变，丝毫不意味着它政策目的的改变：对社会主义、苏联和民主的仇恨，仍然是决定它政策的主要原由；建立反对苏联的帝国主义统一战线，仍然是梵蒂冈的主要目的。因此，它坚持不懈地努力使英美等国与法西斯德国单独媾和，分裂同盟国的阵线，把这些国家的枪口转向苏联。梵蒂冈这种计划得到美英权势集团的热情支持。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和苏军的胜利却阻止了这些反动集团与希特勒匪帮的勾结。阻止他们勾结的还有同盟国中的人民群众，他们满怀对法西斯强盗的仇恨，抱着无比巨大的希望仰

望着使欧洲和全世界人民摆脱法西斯奴役的救[329]星——苏联。

斯大林格勒大战击溃德军之后，尤其在战后，民主阵营的加强、苏联影响的增长和人民民主制度在许多国家中的胜利，吓得梵蒂冈更加胆战心惊，它指望美国和英国的反动统治集团实现它那些狂妄的计划。

综上所述，梵蒂冈战后政策的总原由仍然和战前一样：决定这些原由的首先是梵蒂冈与帝国主义已经结合在一起以及它的中心任务就是坚持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统治，它全部的宗教活动都服从这一任务。这是罗马教廷和所有天主教主教们仇恨苏联、仇恨社会主义和整个民主阵营的根源。梵蒂冈作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侍从、新战争挑拨者，为民主的最凶恶的敌人充当先锋。

“战争的结束使国际形势和各个国家形势中发生的根本变化，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局面。政治力量进行了重新组合。离开战争结束的时间越久，战后国际政治中两大派的阵线越分明：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政治力量划分为两大阵营——一方面是反民主的帝国主义阵营，另一方面是反

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帝国主义阵营的主导力量是美国……，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帝国主义，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与社会主义和民主斗争，到处支持反民主的亲法西斯反动制度和运动……。

反帝和反法西斯力量组成另一个阵营。这个阵营的基础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这个阵营的目的是反对新战争威胁和帝国主义扩张，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残余。"①

330　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帝国主义，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与社会主义和民主斗争，支持亲法西斯的反动制度——所有这些都和梵蒂冈的目的一致。梵蒂冈和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是反民主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一部分。

1945 年 7 月 17 日到 8 月 2 日，苏联、英国和美国三国首脑举行了柏林（波茨坦）会议，会上通过了重要的决议和协定。会议决议的目的在于建立公正的和持久的和平。"会议达成协议，

① 安·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载《1947 年九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8 年，第 22—23 页。

设立一外长会议，代表五个主要国家继续进行关于和平协议所必需之准备工作，并受理经参加外长会议各政府同意而随时提交外长会议之其他事宜。"① 会议通过了关于德国的决议。"……本会议对于盟国在占领期间对战败国德国所持共同政策中之政治及经济原则业已达成协议。此协议之目的在履行克里木会议宣言中关于德国之条款。德国之军国主义及纳粹主义将予根除，各盟国将一致同意于目前或未来采取其他保证使德国永不再威胁其邻邦或世界和平之必要措施。盟方并无毁灭或奴役德国人民之心意，盟方实欲德国人民获得机会，在民主及和平之基础上重建其生活。"②

会议通过了关于战争罪犯的决议，决议中说："三国政府再度宣明愿迅速与公正审判此等战争罪犯之本意。"还通过了关于奥地利、波兰及其他极为重要的战后体制问题等决议。

实现波茨坦会议决议应对战后建立持久的民主和平与大国合作起巨大的作用。

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势力，首先是美国和英

①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3卷，第337页。

② 《苏联的对外政策》，第3卷，第339页。

331 国立即对波茨坦会议决议发起进攻。不久便暴露出来：美英两国政府不愿履行这次会议的决议，暗中抵制和破坏这些决议。他们显然不愿意根除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而是力图使它复活，力图把德国变成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进行战争的基地。美英反动统治集团和听他们指挥的其他国家反动统治集团，竭力破坏大国的团结，破坏同苏联的合作。显然，这些集团不要持久的民主和平，而是追求帝国主义目的。

在1947年11月外长会议伦敦例会上，维·莫洛托夫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美国、苏联及其他民主国家建立了反希特勒联盟，共同进行了解放斗争来反对企图夺取世界霸权和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法西斯制度的法西斯阵营，——正是这个斗争联合了它们，使他们有可能顺利地来解决许多有国际意义的复杂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形势起了变化。

"这时已很清楚，有一部分国家力图建立民主的和平，即基于各民族平等和承认大小国家主权的和平。这样的和平能保证各个国家间发展和平合作，虽然各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

建立民主和平还意味着各战败国也有权走上自由民主发展的道路，以及完全恢复本国的独立。

同时也暴露出，另一些国家力求建立的不是民主的和平，而是帝国主义的和平，而建立此种和平就是意味着某些强国对其他各个大小民族实行统治，无视他们的权利和民族主权。显而易见，建立帝国主义和平就不免要把世界各国分成为两类：一方面是占统治地位的强国，另一方面是处于服从地位的被奴役的国家，而这种情形就必然会引起新的国际冲突和战争，这些冲突和战争将孕育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当然，建立帝国主义和平的企图不能不受到 332 许多民主国家的反对。我可以公开说，苏联是完全与那些力求建立民主和平和反对强迫各国人民接受帝国主义和平的那些国家站在同一阵营的。帝国主义的和平是不能巩固的和平。只有基于民主原则的那种和平才能是巩固的和平。

由此就可以看出，昨天的同盟者彼此意见分歧的基础究竟何在。”①

---

① 维·莫洛托夫：《对外政策问题》，第511—552页。

梵蒂冈基于本身的反动目的，在战后自然处于民主和平的敌人的阵营之中，以及那些采取导致新国际冲突和新战争的政策者的阵营之中。梵蒂冈和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以及它们的报刊和各种组织，坚持挽救帝国主义的纲领，因此在波茨坦会议之后立即对它的决议发起进攻，并且在一切战后体制的根本问题上采取与这些决议背道而驰的立场。它们成了反苏反共的“十字军远征”运动的发起人，并表现出自己是国际合作最凶恶的敌人。

苏联在战胜轴心国的军队、消灭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从德国法西斯桎梏下解放欧洲各国人民以及使英国、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摆脱曾经威胁着他们的危险方面，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在苏联参加战争以前，希特勒在欧洲，如在自己家里一样主宰一切。有些国家，例如法西斯意大利，变成了希特勒的恭顺附庸；另外有些欧洲国家，例如法国，由于其当权人物采取亲法西斯的奴仆态度，遭到了希特勒铁蹄的践踏。数百年来未受敌人侵占的英国面临德军登陆犯境的极危险的威胁。

只有当苏联转入战时轨道，而苏军已在全线开始向希特勒匪军实行进攻的时候，才使局势根本转变。"①

苏联人民舍身忘我的英勇战斗把世界从法西斯野蛮人手中拯救出来。苏联在这次战争中肩负着反希特勒侵略者斗争的主要重担，并"为本身自由独立和为盟国共同事业"② 作出了最大的牺牲。 333

组织战胜血腥的法西斯制度的丰功伟绩属于苏联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的领袖——英明的统帅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

关于斯大林同志从人类最凶恶的敌人手中拯救世界文明的杰出作用，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在祝贺斯大林同志七十岁寿辰的信中写道：

"当希特勒德国把战争强加于苏联，我们祖国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的时候，是你，斯大林同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反对人类最凶恶的敌人——法西斯的武装斗争，发动全体苏联人民

① 维·莫洛托夫：《对外政策问题》，第485页。

② 维·莫洛托夫：《对外政策问题》，第146页。

进行了伟大的卫国战争，鼓舞苏联人民及其武装力量创造了非凡的业绩。列宁——斯大林的党使前线和后方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你的军事和组织天才给我们带来了对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①

俄罗斯人民对胜利事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他们是“加入苏维埃联盟的所有一切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他们“聪明智慧、威武不屈、坚忍不拔”②。伟大的俄罗斯人民，斯大林同志说，“在这次战争中，证明自己真不愧为公认的我们苏联一切民族中的领导力量。”③

战争再一次向全世界表明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斯大林同志在总结主要战果时说：“我们的胜利首先意味着苏维埃社会制度胜利了，苏维埃社会制度在战争的烈火中成功地经受住考验并且证明自己有充沛的生命力。”④斯大林同志

① 《真理报》，1949年12月21日。

②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96页。

③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96页。

④ 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选民大会上的演说》，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6年，第9页。

说，现在“说的是，事实证明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富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非苏维埃社会制度都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①

苏联从法西斯野蛮人的手中救出了世界，它 334 的伟大解放作用大大提高了我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为拯救文明付出最大牺牲的苏维埃国家，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就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迅速超过战前的工农业生产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却一落千丈，那里人民群众的境况江河日下；苏联的这种榜样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指出了摆脱资本压迫获得自身解放的道路。

苏联威信和国力的增长使帝国主义者很不舒服。使他们不舒服的还有苏维埃国家一贯的和平政策，这一政策妨碍妄图统治世界的野心家们实现他们的罪恶计划。旧世界用尽一切手段——政治的、经济的和思想的，疯狂地反对苏联。

① 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选民大会上的演说》，第10页。

梵蒂冈及其主教们站在美英战争贩子方面，非常积极地参加反苏斗争而毫不掩饰，它最担心的是苏联的加强、苏联威信的提高、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各国劳动人民解放运动波澜壮阔的发展。

战后，梵蒂冈采用丘吉尔和美国战争贩子惯用的恶毒诽谤手段反对苏联。

1945 年 10 月 3 日庇护十二世宣布，教会是“极权主义”的敌人，他又说，这个字眼的含义既包括“民族和种族”学说，也包括阶级学说。[1] 这样，庇护十二世用诽谤的手段把罪恶的法西斯主义和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学说——共产主义混为一谈，借以欺骗教徒。在 1945 年的圣诞节文告中，他又变本加厉地重复了这一诽谤共产主义的无耻谰言。为了诬蔑民主阵营，教皇企图把它……和法西斯相提并论。[2] 这样的诬蔑并不希奇：他只不过一字不差地重复了美帝国主义者的陈词滥调而已。

---

① 《每日镜报》，柏林，1945 年 10 月 4 日。

② 见《真理报》，1946 年 10 月 1 日；《现代史料》月刊，1946 年 2 月，第 173 页。

安·亚·日丹诺夫揭露了和平民主的敌人这 335 种骗人的花招。他说："在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美帝国主义者对政治问题一窍不通，表现出自己的无知，他们首先突出的思想是：把苏联说成似乎是反民主的、极权主义的力量，而把美国、英国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说成是民主力量。这种意识形态斗争纲领——保护资产阶级的假民主及指责共产主义是极权主义——把工人阶级所有的敌人，从资本巨头到一经帝国主义主子暗示就随声附和诽谤苏联的右派社会党头子，毫无例外地全部联合起来了。"①

梵蒂冈是反民主和反共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在妄图统治世界的美国野心家的直接指挥下，庇护十二世和天主教高级主教们号召进行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远征"，即反对以苏联为首的整个和平民主阵营的战争。

梵蒂冈的反苏斗争是英美帝国主义反和平阴谋的一部分，并且是按照他们的指示、用他们的金钱进行的。

---

① 安·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载《几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第33页。

梵蒂冈散布对苏联的敌意，用宗教掩饰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恨。天主教的主教们偷天换日，用两种意识形态——宗教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督教和共产主义不可调和的问题代替了两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共处的问题。斯大林同志不止一次指出，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两种经济制度的合作是完全可能的。当1946年9月，《星期日时报》驻莫斯科记者问及斯大林同志："虽然存在意识形态的分歧，您对苏联同西方民主国家长期友好合作的可能性和华莱士在演说中所讲的两种制度的'友谊竞赛'是否相信"时，斯大林同志回答："当然相信。"①

梵蒂冈主教们，首先是教皇庇护十二世本人所作的反对共产主义和民主的恶毒宣传，是用宗教为反对苏联、反对整个民主阵营的新战争挑拨者们的计划进行辩护。

336　部分天主教报刊和一些主教中的头面人物早在1945年就谈到，应当开始反苏战争。1945年5月9日，当全世界欢庆战胜血腥法西斯主义的

---

① 《真理报》，1946年9月25日。

节日时，底特律大主教、红衣主教多尔蒂对苏联进行了诽谤攻击。[1] 不久，美国的天主教报刊也公开号召同苏维埃国家作战。[2] 战后，资产阶级国家的天主教报刊日甚一日地恶毒反苏。

它们这样做根本不是基于什么“思想上的”、“宗教上的”原因。

安·日丹诺夫说：“帝国主义阵营的基本目的是巩固帝国主义。”巩固帝国主义、维护私有制、永远保存资本主义奴隶制的迫切愿望，也在教会活动中起着主要作用。教皇所有的战后文告、其他教会权贵的许多演说和对群众的讲话，都极力向人们的头脑中灌输一种思想，即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动摇的，社会的阶级划分是永恒的，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社会“制度”是神赐的。

共产党人在各地领导劳动人民进行斗争并驳斥反动的资本主义永恒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向全世界表明，资本主义不是永恒的，劳动人民能够建立

---

① 见《工人日报》，纽约，1945年5月12日。

② 见《真理报》，1945年7月8日；《工人报》，纽约，1945年10月28日。

并且已经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新的、美好的社会制度。显然，这一切使旧世界，其中包括梵蒂冈，更加痛恨社会主义世界。这就是教皇和主教们领导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远征”的原因。

针对战争贩子丘吉尔的反苏言论（1946 年 3 月），斯大林同志说：“不能够把共产党人影响的增长视为偶然。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现象。在法西斯统治欧洲的艰苦年代，共产党人是反对法西斯主义争取各族人民自由的可靠、勇敢、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因此，他们的影响就增长起来了。”①

庇护十二世的反共“十字军远征”号召象他开除所有支持共产党的人出教的命令（1949 年）一
337 样，反映出梵蒂冈主教们和整个反动阵营对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增长、对共产党人阵地的加强的恐惧。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中欧和东南欧的一系列国家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在这些国家中，

① 《真理报》，1946 年 3 月 14 日。

由于苏联军队取得了战胜法西斯侵略者的历史性胜利并驱除了占领者，而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人民民主国家在苏联无私的援助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

妄图统治世界的英美野心家从人民民主国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疯狂地反对它们，策划反对这些国家人民的阴谋，力图复辟资本主义，建立血腥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将这些国家变成反苏战争的基地。

帝国主义阵营，首先是美国和英国的统治阶级，利用天主教会从事反对人民民主国家的卑鄙阴谋活动。

梵蒂冈反对人民民主国家中所进行的进步民主改革。它向土地改革宣战，因为土地改革把一小撮地主的土地还给了千百万世世代代生活在贫困之中并为(世俗的和教会的)地主干活的农民。梵蒂冈反对工业和银行的国有化，从而暴露了它保护资产阶级、工业家、银行家利益的真面目。

在梵蒂冈的鼓励下，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中的红衣主教、大主教和主教参加了以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阴谋活动。1949 年 2 月对匈牙利首席主教、红衣主教明曾蒂的审判向全世界证明，这个力图复辟哈布斯堡王朝的教权主义分子、阴谋家的后台就是美国统治集团。1949 年 9 月对匈牙利国事犯拉伊克的审判也证明，教权主义分子在阴谋者的计划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捷克斯洛伐克对梵蒂冈特务和破坏者审判也证实了这一点。

梵蒂冈特别猖狂地反对波茨坦会议关于建立338统一的民主德国的决议。它积极参与实现英美的罪恶计划：分裂德国和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其目的在于把西德变成将来发动反苏和反人民民主国家战争的基地。

复活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的德国，使它成为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工具，是梵蒂冈战后对德政策的基础，这和美英新战争挑拨者的计划一致，因为梵蒂冈正是为他们服务的。

1947 年 11 月 26 日，维·莫洛托夫在外长会

议上发表关于对德国和约问题的演说时讲道：

“在奉行列宁斯大林和平政策的苏联看来，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很明确的，并且这种回答只能是这样：对德和约应该建筑在民主和平的原则上，应该促进德国经济恢复及重新建立成为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简而言之，对德和约所依据的原则与盟国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通过的有关德国问题的决议所依据的原则是一样的。我们应该根据这些决议来保证肃清德国军国主义和使德国民主化，同时又保证德国向各个遭受希特勒侵略痛苦的国家履行其所负担的义务。……

显然还存在有另一个对待德国的计划，其目的是不许德国经济得到恢复，因为害怕它成为欧洲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者。适应于这个计划的政策，是要在经济上削弱德国，并破坏德国这个统一的国家，虽然谁也没有公开说出这点。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列强将会力图利用德国，因为他们需要利用德国某些领土作为首先是发展军事工业的基地，利用德国内部反动势力作为支柱来实行其力求统治欧洲民主国家，以及反对摆脱了法西斯制度的欧洲国家中民主运动的发展的政

策。"①

339 维·莫洛托夫在1947年声明，目前的任务是"帮助那些力求走上新道路的德国人，把德国变成一个和平民主国家，不许德国重新复活为侵略势力。"②

英美帝国主义者却不愿把德国变成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

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阶级力图把德国变成他们世袭领地、欧洲反动势力的中心和反苏战争的策源地，因此，他们违背波茨坦协定，在战争结束后立即实行分裂德国的政策，最后终于建立了以美英帝国主义走狗为首的西德傀儡国家。

1949年通过的《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宣言》中说："波恩分立主义政府有一项任务，即使西德加入军事集团——大西洋公约并把分立国家的青年变成美帝国主义的雇佣兵。为完成此项任务，西德正在公开复活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

① 维·莫洛托夫：《对外政策问题》，第513—514页。

② 维·莫洛托夫：《对外政策问题》，第397页。

培育复仇主义思想……"①

英美帝国主义者让复仇主义分子、昨天的希特勒分子、工业巨头——蒂森家族、克虏伯家族，等等，在西德上台执政。他们违背波茨坦协定，无所不为，以达到复活德国侵略势力、复活德国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目的。他们释放了使千百万人死于非命的希特勒战犯。凶恶的美英强盗借助希特勒的将军们在西德建立了德国正规军。

苏联一贯遵守波茨坦会议的决议。苏联从来不以瓦解德国为目的，也从来不受报复德国人民的感情所左右。

斯大林同志在1945年5月9日的告民众书中说："苏联在庆祝凯旋，但是它并不打算瓦解德国，也不打算消灭德国。"② 苏联政府的政策旨在保证德国的统一并使其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独立民主国家。

340

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柏林宣告成立。

---

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文件和资料》，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0年，第18页。

②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193页。

斯大林同志在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和总理奥托·格罗提渥的祝贺词中说："爱好和平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是欧洲历史上的转折点。无庸置疑，爱好和平的民主德国与爱好和平的苏联并肩而立，势必排除欧洲新战争的可能性，结束欧洲的流血事件，并使世界上的帝国主义者不能够再奴役欧洲国家。"①

1949年10月7日通过的《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宣言》中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破坏波茨坦协定，使德国人民陷入了民族灾难，全体德国人由此奋起为崇高的目的而斗争：建立统一的、独立民主的德国，迅速缔结公正的对德和约，在短期内撤走所有的占领军"②。

帝国主义阵营实行其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策时，在德国国内依靠的反动力量之一就是天主教主教团。因为梵蒂冈完全支持这种政策。

1945年7月，以著名的反动红衣主教福尔哈贝尔为首的巴伐利亚天主教主教们发表了一篇文

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第7页。

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第17页。

告，它与民主和平的任务、与德国民主化和肃清纳粹主义的任务是背道而驰的。[1] 1945年8月末，在富尔达市举行了德国主教会议；这次会议的牧函是用反民主的精神写的。主教们竭力为法西斯罪犯开脱罪责。他们在牧函的末尾要求对这些罪犯施以"基督之爱"[2]。

德国天主教主教团对波茨坦会议关于德国民主化和肃清纳粹主义的决议采取敌对的立场。天主教组织，尤其是在战争刚一结束时建立的天主教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和中央党），开始在西德纠集法西斯分子。英美帝国主义象依靠右派社会党人一样依靠这些党在德国推行他们的政策。德国天主教主教团完全支持英、美、法占领当局在西德的反民主政策及破坏波茨坦会议决议的政策。主教们支持分裂德国和建立西德傀儡国的政策，领导傀儡国的还是反动的天主教营垒中在1933年帮助希特勒夺取政权的那些人。 341

① 见《真理报》，7月29日；《德意志人民报》，柏林，1945年7月31日。

② 《新时代报》，柏林，1945年9月11日。

当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德国天主教的主教们就是美、英、法占领当局在反对德国民主发展和反对工人运动斗争中的盟友。德国美占区军管会宗教事务处前任处长写道，德国僧侣都怀念霍亨索伦王朝执政时期，从那里寻找未来德意志的楷模。他又写道“大部分僧侣，希望建立容克地主、大企业家和僧侣共同起统治作用的保守制度。”①

英、美、法占领当局从占领德国的第一天起就不依靠进步的、民主的、真正的反法西斯人士，而是依靠反动派，其中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的教权主义分子。

德国主教团的反民主和复仇主义政策完全符合梵蒂冈的反动方针。战后，教皇曾向德国主教团发出数次专函。他虚情假意地一再表示“同情”德国，而他的“同情”却表现在：他完全支持美英统治集团的反民主政策，在德国国内依靠复仇主义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德国的银行家和企业家，依靠使希特勒上台执政的那些人。

---

① M·纳彭：《盟国的军事政策与德国的宗教状况》，载《教会史料》，1947年第2期，第93页。

庇护十二世同德国复仇主义分子沆瀣一气反对波茨坦会议关于波兰西部国界的决议。维·莫洛托夫在谈到这些决议时说："而在西部，波兰却收回了那些原系波兰国发源地区的古老领土"①。342

维·莫洛托夫声明："柏林会议关于波兰西部国界问题所通过的有历史意义的决议是谁也不能动摇的。事实证明，现在要动摇这个决议，已经决不可能。这就是苏联政府的观点"②。

继美国统治集团的代表和丘吉尔之后，庇护十二世在1948年4月致德国主教团的信件中也反对波茨坦会议关于波兰西部国界的决议。这引起了群众，其中包括天主教徒的抗议。

1945年11月，教皇通过驻意大利圣使向意大利政府请求赦免判处死刑的、双手沾满千百万人鲜血的法西斯刽子手③。天主教报刊（尤其是美国的）也要求宽恕希特勒罪犯④。梵蒂冈也要求宽恕德国战犯；例如，它曾为因杀害了千百万

① 莫洛托夫：《对外政策问题》，第428页。
② 莫洛托夫：《对外政策问题》，第245页。
③ 见《德意志人民报》，柏林，1945年11月17日。
④ 见《人民之声报》，底特律，1945年12月22日。

波兰人而于1946年6月在波兰判处死刑的前希特勒波兹南地方长官格雷泽尔鸣冤叫屈[①]。

西德的英、美、法占领当局，往往根据梵蒂冈和德国天主教主教团的请求，或在他们完全赞同的情况下，释放和赦免了许多大战犯，并让他们窃据重要的职位。

梵蒂冈支持在美国和英国的压力下建立分立的西德国家；教皇代表参加了建立西德傀儡国的谈判。

综上所述，梵蒂冈的战后政策，在德国和世界各地一样，完全从属于英美战争贩子以及德国 343 复仇主义势力的计划。美国天主教报刊在1945年反对消灭容克地主阶级这一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支柱，决不是偶然的[②]。

梵蒂冈帮助美帝国主义和被民主阵营力量的

---

① 根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将德国主要战犯处以死刑之后，《罗马观察家报》发表声明说，火葬处决的犯人是"违背基督教的法规和习俗的"（《1947年全国天主教年鉴》，第782页）。梵蒂冈的战犯保护人希望，哪怕给战犯留个坟墓也好，以便把它们变成各种法西斯败类朝拜的圣地。

② 见《工人日报》，纽约，1945年5月23日。

增长吓破了胆的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为战后出现的天主教反动资产阶级政党建立了群众基础。在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法国及其他国家，这些党占据了原来右派政党的地位，后者因同法西斯和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贼合作而威信扫地了。天主教党的头子们不得不考虑到广大劳动群众（包括信天主教的）的革命情绪和对巩固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统一战线的热烈要求，因此在战后的最初时期他们声明，愿意与共产党人合作建设民主和平。但是他们很快就表示，他们的目的与建设民主和平的任务毫无共同之处。天主教党的头子们提出，巩固帝国主义、巩固反动资产阶级的阵地、孤立共产党人和反对革命的工人运动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天主教政党和右派社会党人组成联盟——所谓的“第三种力量”，它们是反对人民群众利益的。美国统治集团对天主教政党的政策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些党奴颜婢膝地执行美国统治集团的侵略纲领。这些党由于害怕人民而变成了“美国党”——为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的党。

梵蒂冈及其主教团帮助美国统治集团把资本

主义国家的天主教政党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反动的新法西斯主义的政党。天主教政党的头子们与教权主义分子、主教团、以及对他们全部政策产生直接影响的梵蒂冈关系密切。

战争刚一结束，梵蒂冈就干涉欧洲各国的竞选运动。它用清除出教、打入地狱受折磨等一切宗教恐怖手段，为天主教政党争取多数选票。

1945 年 8 月 28 日，梵蒂冈通令所有的天主教主教，命他们通过低级僧侣要求教徒选举天主教会支持的候选人①。不久，教皇又在告意大利妇女书中要求她们支持教会的候选人——教权主义的基督教民主党②。

344

教皇坚持在意大利保存帝制。1946 年 3 月，他指示意大利基层教会神父参加竞选运动和帝制问题的全民投票。如果说在 1946 年 7 月 2 日全民投票时，赞成帝制的票数超过了一千万张（赞成共和制的超过一千二百万张），那么，票数如此之多的重要原因是：为了捍卫与法西斯多年联合而威信扫地的帝制，整个宗教宣传机构和对

① 见《国际大事年表和文献》，伦敦，1945 年，第 5 期。

② 见《工人报》，纽约，1945 年 11 月 4 日。

良心施加宗教压力的一切手段，都全部动员起来了。

全民投票前不久，天主教组织参加了在意大利各个城市里组织的帝制派活动；例如，“天主教行动会”的青年组织曾经散发过帝制派的传单①。

1946年10月9日，维·莫洛托夫在巴黎和会上谈到意大利的形势时说：“……不能不看到，现在意大利仍然有人在企图复活法西斯势力……，意大利司法机关往往宣布那些墨索里尼的亲信、法西斯头面人物无罪。在意大利各地不断发现法西斯秘密团体。法西斯分子日益经常地公开捣乱，当众散发宣传品，突然占据广播电台进行法西斯主义宣传等等……”②。美国垄断资本家的忠实走狗德·加斯佩利教权主义政府，用自己全部反对劳动人民的反动政策为复活法西斯主义服务。

梵蒂冈对法西斯在意大利的复活，对德·加斯佩利政府的反人民政策应负相当大的责任，因为参加这个政府的有教皇的亲信。

① 见《新时代报》，柏林，1945年5月18日。

② 维·莫洛托夫：《对外政策问题》，第205页。

梵蒂冈及其在法国的主教们支持天主教政党——青年共和党，该党成了法国一切右派分子麇集的地方和美国政策的工具。梵蒂冈还支持戴高乐——他是法国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看中的法西斯独裁候选人。

以维也纳大主教、红衣主教因尼茨尔为首的奥地利天主教反动集团，多年来一直依靠德国法345西斯势力，现在也支持梵蒂冈和美英反动集团的计划——建立哈布斯堡君主国，使它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和侵略苏联的力量。战争末期，奥地利王位的追求者奥托·哈布斯堡在某些欧洲国家的首都和梵蒂冈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谈判。1947年夏季，纽约大主教、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同当时访问美国的匈牙利红衣主教明曾蒂也谈判过这个问题。关于这件事，明曾蒂本人在法庭上供认："我的目的，同时也是匈牙利王朝正统主义运动的目的：在欧洲中部建立一个联邦王国，它将在奥托·哈布斯堡的统治下把匈牙利和奥地利联合成一个君合国，参加联邦王国的也许还有其他的天主教国家，首先是巴伐利亚。我承认，只有依靠外国的帮助，首先是来自美国方面的帮助，推翻

匈牙利共和国，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①。

对红衣主教明曾蒂的审判证明，复辟奥匈君主国的阴谋是在美国代理人的领导下组织的，梵蒂冈直接参与了这个阴谋。

苏联过去和现在一贯保卫奥地利的独立和完整。斯大林同志在1945年5月给奥地利首相伦纳的信中写道：……“您可以相信，我也象您一样关心奥地利的独立、完整和安宁。我准备尽自己的力量和可能向您提供奥地利可能需要的任何援助。”②1947年4月，维·莫洛托夫在外长会议上声明：“至于奥国独立主权问题，那末据奥国政府自己承认，苏军是头一个帮助奥国恢复成为独立民主自由国家的军队。这些事实是谁也歪曲不了的”③。

战后统治奥地利的天主教政党（“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同盟，实行违背奥地利根本利益、破坏其主权和独立以恢复反动派的统治并使奥地利服从美国垄断资本家的政策。天主教党成了法 346

① 《明曾蒂案件文件汇编》，布达佩斯，1949年，第7页。

② 见《苏联政府致南斯拉夫政府照会集》，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9年，第28页。

③ 维·莫洛托夫：《对外政策问题》，第461页。

西斯分子的避难所。据揭发，该党的著名领导人（例如格鲁贝尔——战后的外交部长）都是活跃的希特勒分子[1]。天主教党实行反动透顶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它是土地改革的反对者、法西斯分子的保护人、苏联的仇敌，它唯美帝国主义之命是从。以因尼茨尔为首的天主教主教团和梵蒂冈，对奥地利天主教党有很大的影响。

梵蒂冈象美国和英国的极端反动分子一样，特别喜爱和支持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法西斯制度。

继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要求与佛朗哥政府恢复外交关系之后，庇护十二世在1948年12月以同样的精神发表讲话；他在接见西班牙大使时，请大使向佛朗哥转达教皇的祝福，并百般吹捧这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盟友，说他"为宗教和文明建立了功勋。"在美国，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就是法西斯分子佛朗哥的崇拜者。

梵蒂冈非常宠爱法西斯组织，不论它们是哪里的——法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美国的、南美诸国的，还是其他地方的。一切反对民主、

---

① 见《奥地利人民之声报》，维也纳，1949年11月30日。

反对工人运动和苏联的东西、一切最反动的东西都得到梵蒂冈的支持。

梵蒂冈的主教们很快就和铁托法西斯集团找到了共同语言。经耶稣会士牵线，他们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1949 年末，对颠覆匈牙利人民民主共和国阴谋者的审判证明，这一阴谋的华盛顿指挥者及其在铁托法西斯集团中的走狗，曾委托梵蒂冈扮演特殊角色，积极参加他们的罪恶活动。

共同的目的把梵蒂冈与美国统治集团联系在一起，并把它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仆从。曾几何时，梵蒂冈的主教们还指望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实现他们的主要目的——镇压民主和共产主义并消灭苏联。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梵蒂冈却把自己的痴心妄想寄托在美国统治集团身上。

因此毫不奇怪，梵蒂冈在一切战后体制的根本问题上的政策不但与美国统治集团的政策一致，而且服从于它。梵蒂冈完全支持美国战争贩 347 子的扩张主义的和反民主的政策。为了美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它经常通过主教团和教会组织向全世界信奉天主教的群众施加压力。“被苏联的社会

主义成就、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成就和战后工人和民主运动的发展吓得惊慌失措的美国反动派，想承担防止共产主义以'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的任务"①。近百年来以反对共产主义为主要目的的梵蒂冈，为新生的"十字军骑士"祝福，并给他们的罪恶计划提供宗教"根据"。

梵蒂冈帮助妄图统治世界的美国野心家欺骗人民群众。它赞美美帝国主义的一切罪行、争取世界霸权的斗争和反对民主阵营的种种阴谋。它还赞同以美帝奴役各族人民为目的的"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梵蒂冈同意并赞美北大西洋公约这一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军事联盟。

梵蒂冈通过宣传带有宗教色彩的世界主义口号帮助美帝国主义实现他们的扩张主义计划。它在战后变成了美国国务院的"天主教分院"。

美国国务院代表在梵蒂冈内部的影响在战争时期已开始增长，战后更是扶摇直上。1939 年似乎因为当时大战的爆发而派往梵蒂冈教皇处的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迈伦·泰勒一直留任到 1950 年。

① 安·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载《几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第 20 页。

尽管要求与梵蒂冈断绝外交关系的新教教会反对，泰勒在梵蒂冈的支持下，帮助国务院把欧洲各国的天主教教会、天主教政党和天主教组织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另一个人接替他（1950年1月）并不意味着美国统治集团和教皇之间关系的削弱，他们之间的关系反而日益密切了。美国主教在梵蒂冈外交部门中所占的比重增加了，战后教皇开始愈来愈经常地派美国人担任最重要的外交职位。 348

美国统治集团对梵蒂冈的影响日益增长，例如，教皇在1945年12月宣布了三十二名新红衣主教候选人，并在1946年2月正式任命他们为红衣主教，而新红衣主教大多数是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政府有联系的人物；通常意大利红衣主教占多数的情况已不复存在了。在四名新任命的美国红衣主教中，有前面多次提到过的纽约大主教斯佩尔曼，他是美国侵略性最大的集团的代表、摩根金融家族的走卒。

战后，梵蒂冈在财政上对美国的依赖性和与美国垄断资本的"事务联系"加强了——教皇参加美帝国主义者经营的投机买卖、金融业务和股份

公司。美国银行源源不绝地给梵蒂冈及天主教组织的反共、反苏宣传提供补助金。梵蒂冈的许多机构，尤其是传教机构，改由美帝国主义者供给经费。1945 年，洛克菲勒为在欧洲进行“传教”宣传提供了数百万美元①。斯佩尔曼曾不止一次给教皇带来美国的金钱——供反民主、反苏运动用的补助费。

梵蒂冈的政策和一切活动从属于妄图统治世界的美国野心家们的计划和目的，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梵蒂冈和天主教主教们极端敌视和平运动的态度上。教皇庇护十二世不谴责原子武器，因为它完全拥护美国的侵略政策。庇护十二世和天主教主教们，对美国侵略朝鲜、对美国匪军在朝鲜的兽行，甚至对美国飞行员破坏朝鲜天主教堂的行为都不加谴责。许多国家的主教团把天主教堂的讲坛变成了煽动仇视人类的情绪和宣传战争的中心。

斯大林同志在与《真理报》记者谈话时说，为获得超额利润和掠夺别的国家而渴望发动新战争

① 见《每日镜报》，1945 年 12 月 6 日。

的美、英、法侵略势力……"害怕本国的人民，因为人民不要新战争，人民保卫和平。所以他们极力利用反动政府造谣惑众，欺骗本国人民，把新战争说成是防御性战争，而把爱好和平国家的和 349 平政策说成侵略政策。他们极力欺骗本国人民的目的，是为了把自己的侵略计划强加于人民并引诱人民参加新的战争"①。

梵蒂冈帮助战争贩子欺骗人民。梵蒂冈主教们经常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大肆污蔑并号召进行反共"十字军远征"，以此来圣化帝国主义者酝酿的罪恶战争。

天主教主教们的好战言论，象教皇"根除共产主义"的号召一样，与英美战争贩子的同类号召完全一致。美国天主教报刊经常发出帝国主义吃人魔王号召进行原子战争和细菌战争的叫嚣。

综上所述，罗马教廷的全部战后政策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罪恶政策——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天主教主教们与金融资本结合起来，用"神

---

① 《真理报》，1951 年 2 月 17 日。

恩”的光轮圣化帝国主义。罗马教廷把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和反对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看作是自己主要的任务。梵蒂冈使自己的整个宗教组织为这一任务服务。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主教们和信奉天主教的群众分别处于不同的阵营之中。

帕·陶里亚蒂说：“……在所有的天主教组织中都存在着教会领导集团的政策与劳动群众之间的深刻矛盾，教会领导集团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盟友、社会进步的敌人，而劳动群众，甚至最落后的，却希望和平和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虽然教会当局一再镇压，天主教运动中仍不断地涌现出进步的左派，他们本能地寻求与非天主教工人运动合作和团结。耶稣会士为破坏这样的合作和这样的团结而宣布开除共产党员出教，也改变不了这种形势，因为开除共产党员出教对工人阶级队伍没有任何影响”①。

---

① 帕·陶里亚蒂：《工人阶级的团结与共产党及工人党的任务》，载《1949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9年，第77页。

反对美帝国主义者煽起战争的斗争，团结了世界各国的愈来愈多的群众。他们不分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共同被一种强烈的要求鼓舞着——捍卫和平，不许侵略势力、贪求超额利润的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把毁灭性的战争强加于人类。

千百万天主教徒，其中包括一部分天主教低级僧侣，不顾教会领导的诅咒，不顾他们利用宗教进行反苏宣传，积极地参加争取和平的斗争。在参加华沙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的宗教界代表中，也有天主教僧侣的代表。他们和全体代表一起向全世界表示了自己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决心。

他们参加这次大会的行动就足以表明，他们不同意敌视和平运动的教会高级主教们的立场。意大利天主教神父哈杰罗在华沙和平大会上说：“我们感到，战争宣传，即使有宗教理由或假宗教理由作掩护，也不仅可能导致千百万人的牺牲，而且可能成为引起教会极不正常的分裂的原因。”

信奉天主教的劳动群众不能不看到，梵蒂冈宣传要对之进行“十字军远征”的苏联，却是为争

取普遍和平、反对战争危险而不倦地斗争的战士。正是在天主教主教们所仇恨和诅咒的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颁布了保卫和平法，把宣传战争作为严重的刑事罪行惩办。

所有这些情况都引起信奉天主教的劳动群众对梵蒂冈政策的极大不满并加深了天主教会的危机。

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为劳动人民的团结而斗争，他们认为宗教信仰的不同在为共同目的的斗争中，尤其是在拯救和平的斗争中，不是团结的障碍。

参考资料和书目

«Аксьон католик».

«天主教行动报»。

А. Жданов.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阿·日丹诺夫：«论国际形势»。

«Аксьон франсез».

«法兰西行动报»。

А. Мэнхеттен. «Ватикан».

A·门赫坚：«梵蒂冈»。

А. Свобода, А. Тучкова, В. Свободава «Заговор Ватикана против Чехословац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A·斯沃博达、A·图奇科娃、B·斯沃博达娃：«梵蒂冈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阴谋»。

А. Пленн. «Ветер в оливковых рощах»

A·普连：«橄榄丛中之风»。

А. Вюрмсер. «Де Голль и его сообщники».

A·伍姆塞：«戴高乐及其同谋者»。

«Безбожник».

«无神论者»。

Б. Бюло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B·比洛：«回忆录»。

Вильгельм II. «События и люди».

威廉二世：«人与事»。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对外政策»。

В. Ламздорф. «Дневник».

B·拉姆兹多尔弗：«日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历史问题»。

«Война и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战争与工人阶级»。

«Герман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Испания»

«德国的政策和西班牙»。

Д. Сельдес. «1000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Д·塞尔德斯:«一千个美国人»。

Д. Мейер. «Неизбежна ли гибель Америки?»

Д·迈耶:«美国在劫难逃吗?»

Д. Дэвис. «Капитализм и его культура».

Д·戴维斯:«资本主义及其文化»。

Д. Крaминов. «Второй фронт».

Д·克拉米诺夫:«第二战场»。

«Документ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Германии».

«德国外交部文件»。

Е. Адамов. «Дипломатия Ватикана в начальную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Е·阿达莫夫:«帝国主义初期梵蒂冈的外交»。

Ж. Дюкль.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в борьбе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страны, против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экспансионизма».

雅·杜克洛:«为争取国家独立反对美国扩张主义而斗争的法国共产党»。

Жан Катара. «Они предают мир».

让·卡塔拉:«他们出卖和平»。

«Защита мира и борьба с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

«保卫和平与对战争贩子的斗争»。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 за народную демократию!».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И. Беглов. «Миссия Уэллеса в Европу».

И·别格洛夫:«韦尔斯赴欧使命»。

И. Сталин. «О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约·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И. Сталин. «Речь на предвыборном собрании избирателей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го округа».

约·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И. Сталин. «26-я годовщина Великой Октябр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约·斯大林:«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廿六周年»。

И. Стил. «В защиту мира».

И·斯蒂尔:«保卫和平»。

«И. В. Сталин. Краткая Биография».

«约·维·斯大林传略»。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共产国际»。

К. Е. Ворошилов. «Гениальный полководец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克·叶·伏罗希罗夫:«伟大卫国战争的天才统帅»。

«Лайф».

«生活»。

Л. Лонго.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ЦК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Италии».

路·隆哥:«关于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活动»。

«Лидове листы».

«大众日报»。

М. Эрцбергер. «Германия и Антанта».

М·埃尔茨贝格尔:«德国与协约国»。

М. Торез. «Сын народа».

莫·多列士:«人民的儿子»。

Молотов. «XXII годовщина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莫洛托夫:«十月革命廿二周年»

М. Эрколи. «Италия в войне против 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Германии».

М·埃尔科利:«反希特勒德国战争时的意大利»

М. Сейер и А. Кан. «Тайная война против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М·塞尔和А·凯恩:«对苏俄的秘密战争»。

Молотов. «О внешней по-

литик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莫洛托夫：«关于苏联的对外政策»。

Молотов. «О ратификации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о ненападении».

莫洛托夫：«关于批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М. Торез. «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о франции».

莫·多列士：«论所谓的法国“民族革命”»。

М. Ракоши. «Маневры венгерской реакции».

玛·拉科西：«匈牙利反动派的手腕»。

Молотов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СССР».

莫洛托夫：«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对外政策»。

Молотов. «Сталин и сталин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莫洛托夫：«斯大林和斯大林的领导»。

«Новое время».

«新时代»。

««Ньюс кроникл».

«新闻记事报»。

«Нот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Югославскому правительсву».

«苏联政府致南斯拉夫政府照会集»。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Герман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文件和资料»。

«Обзоры военных событий».

«战争述评»。

«Оссерваторе романо».

«罗马观察家报»。

«XI пленум ИККИ.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十一中全会速记报告»。

«Попюлер».

«人民报»。

П. Тольятти. «Единство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и задач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и рабочих партий».

帕·陶里亚蒂：«工人阶级

的团结与共产党、工人党的任务》。

«Пари-матэн».

《巴黎晨报》。

«Приказ Верховного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1 мая 1944 г.».

《最高统帅1944年5月1日命令》。

«Приказ Верховного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Маршал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Сталин 23 февраля 1945 г.».

《最高统帅苏联元帅约·斯大林1945年2月23日命令》。

Р. де Жувенель. «Интернацонал предателей».

Р·德·儒维内尔：《叛徒国际》。

Р. Ингерсолл.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拉·英格索尔：《绝密》。

Р. Сесюли. «И. Г. Фарбениндустрия».

理·萨苏利：《И·Г·法本工业托拉斯》。

«Речь по радио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овета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 СССР 17 сентября 1939 г.»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9月17日广播演说》。

«Руде право».

《红色权利报》。

Р. Сланский.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Чехославакии со времени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страны».

Р·斯兰斯基：《全国解放以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活动》。

Р. Паркер. «Заговор против мира».

拉·帕克：《反和平的阴谋》。

«Свет православия».

《东正教的光明》。

«Свобода культов в Румы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宗教自由》。

«Сандей Таймс».

《星期日时报》。

«Трибюн».

《论坛》。

«Фальсификаторы истории».

«历史的伪造者»。

«Франкфуртер цейтунг».

«法兰克福报»。

Хозе Диос. «Под знаменом народного франта».

何塞·狄亚斯:«在人民阵线的旗帜下»。

«Черч таймс».

«教堂时报»。

«Чивилька католика».

«公教文明»。

«Эпок».

«时代报»。

Э. Серени. «Аграрный вопрос в Италии».

Э·谢列尼:«意大利农业问题»。

Ю. Фучик. «Избранные очерки и статьи».

尤·伏契克:«随笔论文选集»。

«Юниверс».

«宇宙»。

其 它 外 文

Ackermann. «Legende und wahrheitüber den 20/VII 1944».

阿克曼:«1944年7月20日事实真相与传说»。

A. Norden. «Die wohrheit an 20. Juli».

A·诺登:«7月20日的真相»。

«Ambassador Dodd's Diary».

«多德大使日记»。

A. Manhattan. «Latin America and the Vatican».

A·曼哈顿:«拉丁美洲与梵蒂冈»。

«Aufbau».

«建设»。

A. Roo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war».

A·鲁特:«战争秘史»。

A. Peterson. «Theocracy or democracy».

A·彼得森:«神权还是民权»。

«A Papal peace Mosaic».

«教皇的和平图案»。

A. King. «A history of Italian Unity».

A·金:«意大利统一史»。

B. Höve a. T. Ager. «The fight of the Norwegien Church against nazism».

B・霍夫和T・艾杰尔：《挪威教会反对纳粹的斗争》。

«Berliner Zeitung».

《柏林日报》。

C. Cianfarra. «The Vatican and the war in Europe».

C・查费拉：《梵蒂冈与欧洲战争》。

«Church History».

《教会史料》。

«Conditions in German occupied Europe».

《欧洲德占区现状》。

«Current History».

《现代史料》。

«Current Biography».

《现代传记》。

C. Walterbach. «Leo XIII und die Arbeiterfrage».

《利奥十三世与工人问题》。

«Chronology of International events documents».

《国际大事年表和文献》。

«Condition in occupied territories».

《占领区实况》。

Ch. Rankin. «The Pope speaks».

Ch・兰金：《教皇言论集》。

Ch. Doyle. «The life of Pope Pius XII».

Ch・多伊尔：《教皇庇护十二世生平》。

«Die. Klerusblatt».

《僧侣日报》。

«Democratie nourelle».

《新民主主义》。

D. Gwynn. «The Vatican and the war in Enrope».

D・格温：《梵蒂冈与欧洲战争》。

«Die Einheit».

《统一》。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alation».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汇编》。

«Dochments sur l'affairs Mindszonty».

《明曾蒂案件文件汇编》。

«Documents on intern-

ational affairs, 1938».

《国际事务文件汇编，1938年》。

«Der Tagespiegod».

《每日镜报》。

«Dio weltbühne».

《世界舞台》。

«Deutsohe Volkszeitung».

《德意志人民报》。

E.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E·拉图雷特：《基督教发展史》。

E. Mclnnis. «The war seconed year».

E·麦金尼斯：《战争第二年》。

«Einheit».

《团结》。

«Fortune».

《幸福》。

F. Thyssen. «J paid Hitler».

F·塞辛：《我给希特勒的回报》。

«Foreign Policy Report»

《外交政策报道》。

F. Spellmam. «Aotion This day».

F·斯佩尔曼：《今日行动》。

G. Salvemini, G. la Piana. «What to do with Italy».

G·萨尔维米尼、G·拉·皮阿纳：《如何对待意大利》。

G. Gonella. «Aworld to reconstruct».

G·戈内拉：《需要重建的世界》。

H. Gualtier. «The labor movement in Italy».

H·加蒂耶利：《意大利劳工运动》。

H. Stimson. «Prelude to invasion».

H·史汀生：《侵略序曲》。

H. Matthews.«Tho Fruits of Fascism».

H·马修斯：《法西斯主义的恶果》

«Haoologure et exhortore».

《讲经学及其应用》。

«International affairs».

«国际事务»。

I. Steel. «The future of Europe».

I·斯蒂尔：«欧洲的未来»。

I. Harrington. «Catholicism, Capitalism, Communism».

I·哈林顿：«天主教、资本主义、共产主义»。

«Journal de Geniva».

«日内瓦报»。

J. Mccabe. «The Vatican and the nazis».

J·麦凯布：«梵蒂冈与纳粹»。

J. H. Ryon. «The peace points of Pope Pius XII».

J·H·瑞安：«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和平观点»。

J. A. Aguire. «Escape via Berlin».

J·A·阿希雷：«经柏林逃亡»。

J. Mccabe. «The papacy in France».

J·麦凯布：«法国的天主教»。

J. Winiewicz. «Have we allies inside Germany».

J·威尼威茨：«我们在德国有盟友吗?»。

J. Scrivener. «Inside Rome with the German».

J·斯克里夫纳：«同德国人一起在罗马»。

J. Embree. «The Japanese nation».

J·恩布里：«日本民族»。

K. Algermissen. «Freidenkertum. Arbeiterschaft und Seelsorge».

K·阿尔格尔米森：«自由思想、工人阶级与牧师»。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基辛的现代档案»。

L. Sturzo. «Ital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L·斯图尔佐：«意大利与新的世界秩序»。

«Le Temps».

«时代»。

L. Sturzo. «wars and catholic thought».

L·斯图尔佐：«战争与基

督教思想》。

L. Lehman. «Vatica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莱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梵蒂冈的政策»。

L. Lahman. «Behind the Dictator».

L·莱曼：«在独裁者的背后»。

«L'humanite».

«人道报»。

«Martyrdom of the Serbs».

«塞尔维亚人的殉教»。

M. M. Knappen. «Allied Military Policy and the religion situation in Germany».

M·M·纳彭：«盟国的军事政策与德国的宗教现状»。

M. Sheer. «Stalin, Roosevelt und Churchill».

M·希尔：«斯大林、罗斯福与丘吉尔»。

M. de la Bedoyere. «The Vatican and the wored today».

米·德·拉·贝杜阿：«梵蒂冈与今日世界»。

M. O'shaughnessy. «Peace and Reconstruction».

M·奥肖内西：«和平与重建»。

«Neues Deutschland».

«新德意志报»。

«Neue Zürcher Zeitung».

«新苏黎世报»。

«Neue Zeit».

«新时代报»。

«Neue Zeitung».

«新报»。

«National Zeitung».

«国民日报»。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National Affairs».

«民族事务»。

«Osservatore Romano».

«罗马观察家报»。

O. Dutch. «Pall over Europe».

O·达切：«阴霾笼罩着欧洲»。

«Österreichiche Volksstimme».

《奥地利人民之声报》。

«Österreichisches Tagebuch».

《奥地利杂志》。

P. Graves. «The seventh Quarterly».

P·格雷夫斯：《第七季刊》。

«Papst Pius XI—Weltrundschreiben über die gesellschafthiche Ordnung».

《教皇庇护十一世—关于社会制度的全球文告》。

P. A. Mclean. «A Dynamic World. Order».

P·A·麦克莱恩：《充满生气的世界秩序》。

«People's Voice».

《人民之声报》。

R. Garaudy. «L'eglise, le communism et les chretiens».

R·加罗迪：《教会、共产主义与基督教徒》。

R. Garaudy. «La Pense».

R·加罗迪：《思想》。

R. Prins. «Until they eat stones»

拉·布林斯：《到他们吃石头的时候》。

R. a. F. Packard. «Balcony Empire».

R·帕卡德和E·帕卡德：《阳台帝国》。

R. Word. «Asia for asiatics?».

R·沃德：《是亚洲人的亚洲吗？》。

R. Massok. «Italy from within».

R·马索克：《从内部看意大利》。

«Schonere Zukunft».

《美好的未来》。

S. Welles. «The time for decision».

萨·韦尔斯：《关键时刻》。

«Two years of German oppression in Cechoslavakia».

《德国压迫捷克斯洛伐克的两年》。

«The trial of the German Major war Criminals».

《德国主要战犯审讯记录》。

«The memories of Curdell Hull».

《赫尔回忆录》。

«The new International book, 1939».

《新国际年鉴，1939年》。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曼彻斯特卫报》。

«The Pope's new order».

《教皇的新训谕》。

«The times».

《泰晤士报》。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政治季刊》。

«The diary of the war, 1939—1940».

《战争日志，1930—1940年》。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美国政治学评论》。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e».

《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鉴》。

«The Economist».

《经济学家》。

«The Mordern Quarterly».

《现代季刊》。

«The 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news».

《国际新闻简报》。

«Tägliche Rundschau».

《每日评论》。

«The Contemiprorary review».

《当代评论》。

«The national Catholic Almanach 1947».

《全国天主教年鉴，1947年》。

«The persecu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German occupied Poland».

《在德国占领下的波兰天主教会受到的迫害》。

«The Fortnightly».

《双周刊》。

«The Nation».

《民族》。

«The Luxembury Grey Book».

《卢森堡灰皮书》。

«The central European

Observer».

«中欧观察家»。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公共舆论季刊»。

«Th British war blue book».

«大不列颠战争兰皮书»。

«The worker».

«工人报»。

«The ninoteeth century and after». (Найтинс сенчери энд афтер)

«十九世纪以来»。

«The Annual register for the1940 year».

«1940年年鉴»。

«The Bishop of Münster and the nazis».

«明斯特主教与纳粹»。

Th. Maynard. «The story of American Catholicism».

Th·梅纳德：«美国天主教史»。

Th. Morgan. «The listening post».

Th·摩根：«听音哨»。

Th. Morgan. «Spurs on the boot».

Th·摩根：«长靴上的马刺»。

V.Bartlett a. G. Williams. «The war of 1939».

V·巴特利特和G·威廉：«1939年的战争»。

V. Cathrein. «Sozialismus und Catholicismus».

维·卡特赖因：«社会主义与天主教教义»。

W. Kolarz. «Das Regime Blum».

W·科拉尔茨：«勃鲁姆体制»。

W. Foster. «The twilight of world capitalism».

威·福斯特：«资本主义世界的末日»。

«Wartim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ope PPius XII and President Roosvelt».

«教皇庇护十二世与罗斯福总统战时联系»。

«Wiener Diozesenblatt».

«维也纳教区报»。

«Weg und Ziel».

«道路与目的»。

W. Shepardson.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38».

W·谢泼德森：«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8年»。

W. Shepardson.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39».

W·谢泼德森：«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9年»。

W. Shepardson, W. Scroggs.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40».

W·谢泼德森、W·斯克罗格斯：«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40年»。

«World News and Views».

«世界新闻与展望»。

人名译名对照表

А

Агирре　阿希雷

Адамский, Станислав　阿达姆斯基，斯坦尼斯拉夫

Аквинат, Фома　阿奎那，托马斯

Александр　亚历山大

Александр III　亚历山大三世

Альгермиссен　阿尔格尔米森

Альфиери　阿尔菲埃里

Альфонс　阿尔丰斯

Андерс　安德斯

Анри-де-кирилис　安利·德·基利里斯

Антонеску, Ион　安东内斯库，约恩

Антонеску, Михаил　安东内斯库，米哈伊

Атолико　阿托利科

Аунос　奥诺苏

Б

Бевен　贝文

Бедуар, Михэл · де · ля　贝杜阿，米海尔·德·拉

Бек　贝克

Бельмонте　贝利蒙泰

Бенедикт XV　贝纳迪克图斯十五世

Бенеш, Эдуард　贝奈斯，爱德华

Беран　贝伦

Берар　贝拉尔

Берли　贝尔利

Бернинг　贝尔宁

Бертрам　贝尔特拉姆

Биверброук　贝弗布鲁克

Бидо, Жорж　皮杜尔，乔治

Бисмарк　俾斯麦

Блюм, Леон　勃鲁姆，莱翁

Бодрийяр　波德利亚尔

Бонне　庞纳

Бонт, Флоримон　邦特，弗洛利蒙

Борн　博尔恩

Браун　布劳恩

Брейтингер　布赖廷格尔

Брикс, Рассел　布林斯·拉瑟

Броды 勃罗殖
Брюнинг, Генрих 布吕宁，海因里希
Буллит 布利特
Бур—Комаровский 布尔—科马罗夫斯基
Бюркель 比克尔

В

Валер 凡勒拉
Валерио, Валери 瓦勒里奥，瓦列里
Варлимонт 瓦尔利蒙特
Вейган 魏刚
Вейц 魏茨
Вейцзэкер 魏茨泽克
Вердье 韦迪埃
Вилсон 威尔逊
Вильгельм II 威廉二世
Вильенуэва 威利耶努埃瓦
Волошин 沃洛申
Ворошилов, К·Е· 伏罗希洛夫，克·叶·
Вышинский, А·Я· 维辛斯基，安·扬

Г

Габихт 哈比希特
Габриель, Пери 加布里耶尔，皮里
Габсбург, Отто 哈布斯堡，奥托
Гаджеро 哈杰罗
Гайта 加伊季
Гал 加尔
Галеацция, Энрико 哈莱阿齐，恩里科
Галифакс 哈利法克斯
Гамолен 甘末林
Гарбетт 哈伯特
Гароди 加罗迪
Гарро, Рожер 加罗，罗欧
Гаспарри, Энрико 哈斯帕里，恩里科
Геббель 戈培尔
Гедлей 格德莱
Генлейн 亨莱因
Геринг 戈林
Гермес 赫梅斯
Гесс 赫斯
Гизо 基佐
Гиммлер 希姆莱
Гимолле 吉莫列
Гитлер, Адольф 希特勒，阿道夫
Глинка, Андрей 格林卡，安

Л

Лаваль 赖伐尔

Лавитран 拉维特兰

Ламонт, Томас 拉蒙特，托马斯

Ла—Пиана 拉·皮阿纳

Лев XIII 利奥十三世

Леги 来格

Ледоховский 列多霍夫斯基

Лейбер 雷贝尔

Леопольд III 利奥波德三世

Линдберг 林白

Липпман, Уолтер 李普曼，沃尔特

Лонго 隆哥

Лысаковский 雷萨科夫斯基

Льенар 利耶纳尔

М

Макдональд, Джемс · Рамсей 麦克唐纳，詹姆斯·拉姆赛

Мак Доннел 麦克唐纳

Мак Кейб 麦凯布

Мак Лин 麦克莱恩

Мак Рори 马克罗里

Мальоне 马尔昂纳

Мамблас 曼布拉斯

Маннегейм 曼纳海姆

Марелла 马列拉

Марклен 马尔克兰

Маркс 马克思

Мастилк, Ян 马斯季尔克，扬

Маршалл 马歇尔

Мацуока 松冈

Мейер 迈耶

Мейнард 梅纳德

Мендсенти 明曾蒂

Мерфи, Роберт 墨菲，罗伯特

Меттерних 梅特涅

Метьюз 梅修兹

Молотов, В · М · 莫洛托夫，维·米·

Мольтке 毛奇

Монтини 蒙蒂尼

Морган, Th 摩根

Морган, Джон · Пирпонт 摩根，约翰，皮尔庞特

Морганы 摩根家族

Морозини 莫罗齐尼

Моррас, Шарл 莫拉斯，夏尔

Муккерман 穆克曼

Мунделейн 蒙代兰

Муни 蒙尼

Мур—Брабазон 穆尔—柏勒巴松

Муссолини 墨索里尼
Мэнхеттен 门赫坚

H

Нейрату, Мейснер 牛赖特，梅斯纳

O

Обуано 奥布瓦诺
О'Коннель 奥康内尔
О'Лири 奥利里
Орлеманский, Станислав 奥尔莱曼斯基，斯坦尼斯拉夫
Орсенито 奥尔塞尼戈
О'Рурка 奥鲁尔卡
Осборн 奥斯本

П

Павелич 帕维利奇
Паккард 帕卡德
Пап, Казимир 帕普，卡齐米尔
Паркер, Ральф 帕克，拉尔夫
Пачолли, Евгений 帕切利，欧金尼奥
Пеппер, Клод 佩珀，克洛德
Пертинакс 佩蒂纳克斯
Пётр 彼得
Петен 贝当
Пий IX 庇护九世
Пий XI 庇护十一世
Пий XII 庇护十二世
Пик, Вильгельм 皮克，威廉
Пикар 皮卡尔
Пиффль 毕福利
Пиха 皮哈
Платон 普拉东
Плен, Абель 普连，艾比尔
Псков 普斯科夫
Пьерло 皮耶罗
Пьндер 平德尔

P

Радимский 拉季姆斯基
Райк 拉伊
Райян, Джеймс 瑞安，詹姆斯
Ракоши, Матиаш 拉科西，马加斯
Рачкевич 拉凯维奇
Редер 雷德尔
Ренер, Карл 伦纳，卡尔
Ренсимен 朗西曼
Рехберг 雷希贝格
Риббентроп 里宾特洛甫
Рирдон, Лео 李顿，列奥
Родон 罗登

Рой, Ван 罗伊，范
Рокфеллер 洛克菲勒
Рокфеллеры 洛克菲勒家族
Рузвельт 罗斯福
Руплехт 鲁普列赫特
Рут 鲁特
Рюти 赖提

С

Савва 萨瓦
Савой 萨伏依
Салазар 萨拉查
Салаши 萨拉希
Сальванини, Маркетти 萨尔瓦尼尼，马凯蒂
Сальвемини 萨尔维米尼
Сарагат 萨拉加特
Свинхувуд 斯文胡伍德
Свобода 斯沃博达
Свободова 斯沃博达娃
Сельдес 塞尔德斯
Середи 塞赖迪
Серени 塞雷尼
Сидор 西多尔
Сидорович 西多罗维奇
Сикорский 西科尔斯基
Ситрин 西特林
Сметс 史末资
Сомбатхей 索姆巴特海
Сосновский 索森科夫斯基
Спаак 斯巴克
Спеллман 斯佩尔曼
Сплет 斯普列特
Сполето 斯波莱托
Сталин 斯大林
Степинац 斯特皮纳茨
Стил, Иоганнес 斯蒂尔，约翰尼斯
Стимсон 史汀生
Стурцо 斯图尔佐
Суньера, Серрано 苏纳，塞兰诺
Суре, Теодор 苏勒，特奥多尔
Сэсюли, Ричард 萨苏利，理查德
Сьюар 索阿尔

Т

Татбург 塔特布尔格
Телеки 泰莱吉
Тельман, Эрнст 台尔曼，恩斯特
Тиссен 蒂森
Тиссеран 蒂谢兰
Титман, Гарольд 蒂特曼，哈罗德

Тито 铁托
Тольятти, П 陶里亚蒂，帕
Торез, Морис 多列士·莫里斯
Траммель 特拉梅尔
Трумэн 杜鲁门
Тука 都卡
Тучкова 图奇科瓦
Тэйлор, Майрон 泰勒，迈伦

У

Уйсаси 乌伊萨锡
Уоллес 华莱士
Урбан II 乌尔班二世
Уэллес, Сэмнер 韦尔斯，萨姆纳

Ф

Фаульгабер 福尔哈贝尔
Фөрстэр 弗尔斯特
Филд 菲尔德
Филиппиак 菲利皮阿克
Филлипс 菲利普斯
Фишер 费歇尔
Флин, Эдвард 弗林，爱德华
фон・Берген 冯·贝尔根
фон・Гален 冯·哈伦
фон・Дирксен, Герберт 冯·迪克森，赫伯特
фон・Кевер, Густав 冯·克韦尔，古斯塔夫
фон・Папен 冯·巴本
Фор, Поль 富尔，保罗
Форд 福特
Фостер, Вильям 福斯特，威廉
Франк 弗朗克
Франк, Ганс 弗兰克，汉斯
Франко 佛朗哥
Фритч 弗立契
Фумми, Джиовани 富米，乔瓦尼
Фучик, Юлиус 伏契克，尤利乌斯

Х

Хайес 海斯
Харада 原田
Хедлунд 赫德伦
Херст 赫斯特
Хильгенрейнер 希尔根雷涅
Хинсли 享斯利
Хлонд 赫隆德
Хобан, Эдвард 霍本，爱德华
Хор 霍尔
Хордана 霍尔达纳
Хорти 霍尔蒂
Худаль 胡达利

Халл 赫尔

Ч

Чан Кай—ши 蒋介石
Чемберлен 张伯伦
Черннгов 切尔尼戈夫
Черчилль 丘吉尔
Чиано 齐亚诺
Чианфарра 查费拉
Чиконьяни 奇科尼亚尼

Ш

Шарич 沙里奇
Шахт 沙赫特
Шептицкий 舍普季茨基
Шинн 希因
Шмидт 施密特
Шмидт, Гвидо 施密特，吉多
Шрамек 什拉梅克
Шредер 施罗德
Штейнгарт 斯坦哈特
Шторер 施托勒
Шульто 舒利泰
Шуман, Робор 舒曼，罗贝尔
Шумахер 舒马赫尔
Шустер 舒施泰尔
Шушниг 舒施尼格

Э

Эберт, Фридрих 艾伯特，弗里德里希
Эйткен 艾特肯
Эллис 艾利斯
Эммануил, Виктор 伊曼纽尔，维克多
Энгельс 恩格斯
Эрколи 埃尔科利
Эрцбергер 埃尔茨贝格
Эттли 艾德礼

Ю

Юлиан 儒略

Я

Янош, Верош 亚诺什，韦赖什

地名译名对照表

А

Аахен 亚琛
Абиссиния 阿比西尼亚
Австрия 奥地利
Албания 阿尔巴尼亚
Англия 英国，英格兰
Анкара 安卡拉
Аррас 阿腊斯
Африка 非洲

Б

Бавария 巴伐利亚
Балкан 巴尔干半岛
Бари 巴里
Барселона 巴塞罗那
Бельгия 比利时
Берлин 柏林
Берхтесгаден 贝希特斯加登
Бессарабия 比萨拉比亚
Бирмингем 伯明翰
Болгария 保加利亚
Боливия 波利维亚
Бостон 波士顿
Босфор 博斯普鲁斯
Бранденбург 勃兰登堡
Братислав 布拉迪斯拉发
Бреславль 布雷斯劳
Брюссель 布鲁塞尔
Будапешт 布达佩斯
Буковина 布科维纳
Бургос 布尔戈斯
Буффало 布法罗
Бухенвальд 布痕瓦尔德

В

Варшава 华沙
Ватикан 梵蒂冈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英国（大不列颠）
Вена 维也纳
Венгрия 匈牙利
Вестминстер 威斯敏斯特
Виши 维希
Воронеж 沃龙涅什
Вюрцбург 符茨堡

Г

Генуе 热那亚
Германия 德国（德意志）
Голландия 荷兰
Греция 希腊

Д

Дания 丹麦
Данциг 但泽
Детройт 底特律
Джибути 吉布提
Днестр 德聂斯特河
Думбартон Оксе 敦巴顿橡园
Дюнкерк 敦刻尔克

Е

Европа 欧洲
Египет 埃及

З

Загреб 萨格勒布
Закарпатская Украина 外喀尔巴阡乌克兰
Зальсбург 萨尔斯堡
Западная Украина 西乌克兰

И

Ирак 伊拉克
Иран 伊朗
Ирландия 爱尔兰
Испания 西班牙
Италия 意大利
Йорк 约克

К

Калинин 加里宁
Канада 加拿大
Карпатская Украина 喀尔巴阡乌克兰
Карпаты 喀尔巴阡山
Касабланка 卡萨布兰卡
Каттовиц 卡托维茨
Квебек 魁北克
Келец 凯尔采
Кёльн 科隆
Кентербери 坎特伯雷
Керчь 刻赤
Китай 中国
Клайпеда 克莱彼达
Кливленд 克利夫兰
Криворожье 克里沃罗日耶
Крым 克里木
Курск 库尔斯克

Л

Ламанш 英吉利海峡
Латвия 拉脱维亚
Лейпциг 莱比锡
Ленинград 列宁格勒
Ливан 黎巴嫩
Ливерпул 利物浦
Ливия 利比亚
Лилль 里尔
Лион 里昂
Лиссабон 里斯本
Литва 立陶宛
Лондон 伦敦
Львов 里沃夫
Люблин 卢布林
Люксембург 卢森堡

М

Мадрид 马德里
Майданек 麦丹尼克
Манила 马尼拉
Милан 米兰
Милвоки 密尔沃基
Мозел 莫泽尔
Молдавия 摩尔达维亚
Моравия 摩拉维亚
Мюнстер 明斯特
Мюнхен 慕尼黑

Н

Никополь 尼科波尔
Новгород 诺夫哥罗德
Норвегия 挪威
Нормандия 诺曼底
Ноттингем 诺廷厄姆
Нью-Йорк 纽约
Нюрнберг 纽伦堡

О

Одесса 敖德萨
Омаха 奥马赫
Освенцим 奥斯威辛

П

Падерборн 帕德博恩
Палестина 巴勒斯坦
Париж 巴黎
Познань 波兹南
Польша 波兰
Померания 波美拉尼亚
Португалия 葡萄牙
Потсдам 波茨坦
Праг 布拉格
Прут 普鲁特
Псков 普斯科夫

Пюи 皮伊

P

Рейхенталл 雷亨塔尔
Рим 罗马
Ройял—ок 罗亚尔一奥克
Румыния 罗马尼亚
Рур 鲁尔

C

Сараево 萨拉热窝
Северная Буковина 北布科维纳
Серет 塞勒特
Силеция 西里西亚
Сирия 叙利亚
Сицилия 西西里
Скандинавия 斯堪的纳维亚
Словакия 斯洛伐克
Смоленск 斯摩棱斯克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苏维埃俄罗斯
Советская Украина 苏维埃乌克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苏联
Сталинград 斯大林格勒
Стокгольм 斯德哥尔摩
Судетская область 苏台德区
США 美国

T

Тегеран 德黑兰
Триполи 的黎波里
Тунис 突尼斯
Тур 图尔
Турин 都灵
Турция 土耳其

У

Украина 乌克兰
Уэльс 威尔士

Ф

Филиппин 菲律宾
Финляндия 芬兰
Фландрия 弗朗德勒
Флоренция 佛罗伦萨
Флорида 佛罗里达
Франция 法国
Фрейбург 弗赖堡
Фульда 富尔达

X

Хорватия 克罗地亚

Ч

Челмсфорд 切姆斯福

Чернигов 切尔尼戈夫
Чехия 捷克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捷克斯洛伐克

Ш

Шартр 夏特勒
Швейцария 瑞士
Швеция 瑞典
Шотландия 苏格兰

Э

Эльзас 阿尔萨斯
Эльзас—Лотарингия 阿尔萨斯—洛林
Эстония 爱沙尼亚

Ю

Югославия 南斯拉夫
Южно—Африканский Союз 南非联邦
Южный Буг 南布格河

Я

Япония 日本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梵蒂冈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作者=
页数=654
SS号=0
出版日期=